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彩纷呈：楚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王纪潮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楚文化知识丛书

ISBN 7—5351—3010—0

I. 异… II. 王… III. ①楚文化-研究 ②文化史-研究-古希腊 ③文化史-研究-古罗马

IV. ①K871.41 ②K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1082 号

出版 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 //www.hbedup.com](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 430015 电话：027- 83619605
邮购电话 027- 83669149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430034·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 145 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5 插页 8.25 印张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68 千字

印数 1-3 000

ISBN 7—5351—3010—0/G·2426

定价 14.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目 录

前言·····	1
---------	---

一 楚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的发现·····	1
----------------------	---

二 楚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的形成 ·····	16
-----------------------	----

三 楚人、希腊人、罗马人的社会生活与 物质文明 ·····	33
----------------------------------	----

四 楚人与希腊人、罗马人的精神世界 ·····	162
-------------------------	-----

五 楚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简论·····	247
---------------------	-----



前 言

楚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是个不容易写的题目。首先，三者很难做比较。从文化的源流讲，希腊罗马文化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源头，能与之比较的可以有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玛雅文化，而不应是这些文化中的支流文化。楚文化却是中国文化一个阶段中的支流文化，尽管它也辉煌，汉代以后也融入中国的主流文化，但是将三者放在一起总还是有点不协调，更不必说去做比较研究了。真的要去比较的话，我自己的底气就不足，好在编者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写出来再说。其次，我虽然勉强将三个不同的文化放在了一起，但是没有能力去深入比较。我也知道懂中国文化的人并不认为这样的老套方法就是高明，懂西方文化的人却知道你只是在搬弄希腊罗马的皮毛。其三，在有限的篇幅内你能讲清楚三种文化？读者不傻，我自己也不信。但是文化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你还得大谱不离地记录在案，尽管是只排队，不比较，头绪仍然很多，这就使人烦心。其四，将三个文化放在一起最不高兴的还是我自己。在不同语境中看这些东西，各有其妙。说楚文化堪与希腊罗马文化媲美，或许有人会产生某种自豪感，但这本身就是主观上将文化

分成优劣的过度反应，不足为取。

这些年楚文化研究的书不少，影响也大，贩夫走卒引车买浆者流或许都知道楚人有“凤图腾”一类的文化术语，但做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人都知道这实在是一个很荒唐的概念。丛书的编者倒是真心希望做楚文化研究的人能将楚文化问题通俗化、具体化，不要想当然地说些楚文化是与中原文化并列之类的八卦问题，所以特别指明这么一个内容。要求也不高，通俗、有根据就行。楚文化方面的材料比较好办，希腊罗马文化方面的材料就有些困难，因为后者西方研究已有数百年，材料浩如烟海而国内看得到的却不多。所以该书编写的过程中，我多数的时间都在寻找、核对材料。尽管如此，书中的遗漏、错讹仍有不少，希望读者能赐教。



一 楚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的发现

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都有自己的文化，人们对古代文化的认识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希腊罗马文化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泉，它的上限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但人们对希腊罗马文化的全面认识却是从世纪后期才开始的。楚文化作为中国南方文明中有代表性的地方文化，它的发现和认识就更晚，只是本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情。我们知道，无论是希腊罗马，还是楚国，在历史上都有丰富的文字材料，但是研究这些历史文献还只是认识古代文化的一个方面。因为古代文化的许多方面，像人们的衣、食、住、行、艺术风格等，文字无法完全记载下来。以希腊为例，当地的文字在公元前17世纪才出现，希腊文化的早期状况就无法依靠文字来了解。今天我们观察古代文化除了依据文献之外，还要从古代社会的居住遗址、生产工具、日用器皿、宗教遗物、艺术品等遗存来了解该文化的特点，了解其社会制度、生活情态、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的问题，因此这就需要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什么是文化

在今天的社会里，文化与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但“文化”一词的确切定义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了解，它的使用也十分宽泛和随意。有时候“文化”是指教育程度，有时候是指文化产业，有时候“文化”有价值判断的意义，有时候又指信仰、传统、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如“颓废文化”、“中华文化”一类概念。在学术定义中，“文化”没有价值评判的意义，它不仅指公众认同的高雅生活方式和情趣，也包括处理食物、垃圾一类的世俗行为，是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总和。文化为后天获得，是特定社会或集团共有的行为和观念。英国学者泰勒（E. B. Tylor 1832—1917）所下的文化定义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①它为多数学者所接受。这也就是说，了解古代文化不能局限于文献材料。

希腊罗马文化的发现

希腊罗马文化的发现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从西方主流文化的沿续上讲，希腊罗马文化在中世纪中断了1000年，有一个重新发现的过程。二是这一发现是指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的发现，其结果引发了文艺复兴运动和近代考古学的诞生。而拜占庭帝国的存在，是希腊

^① 泰勒：《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页。

罗马文化被重新发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①拜占庭帝国

公元395年，罗马分裂成东、西两个帝国。在蛮族入侵的打击下，公元476年，西罗马最后的皇帝罗慕洛（Romulus 475—476）被推翻，西欧进入封建时代。但因多年战乱和基督教文化的确立，西罗马帝国所承绪的希腊罗马传统文化已破坏殆尽，西欧变成“黑暗的中世纪”，而东罗马帝国却将希腊罗马文化基本完好地保存下来。

东罗马帝国是以巴尔干半岛为中心，包括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及南高加索之一部分，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Byzantium）的旧址，故称为拜占庭帝国。其疆域与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356—323 BC）时的帝国大致相同，在整体上以希腊文化为主并受波斯文化的影响。希腊罗马文化在拜占庭的沿续首先表现在政治上，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I 427—565）在位时修订罗马法大全，罗马法学传统得以保存下来。其次在教育上，世俗的雅典大学、君士坦丁堡大学一直存在，对希腊罗马文献的研习从未中断。第三在艺术上，尤其是建筑保持着希腊罗马的传统。这些成为西方日后文艺复兴的基础。

②希腊罗马文化的发现和复兴

罗马帝国分裂后，东西方的交往完全中断。在基督教神学的统治下，西欧对希腊文化渐渐一无所知。11世纪时，塞尔柱（Sejuk）土耳其人兴起，压迫拜占庭帝国并引发了西欧的十字军东征。在第4次十字军东征攻下君士坦丁堡（1204）之后，东西方逐渐恢复交通，

CHUWENHUA
ZHISHI CONGSHU
楚文化知识丛书



拜占庭所保留的希腊罗马文化开始零星地传到意大利。譬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 127—151 活动期）等人的著作。

在希腊罗马文化复兴之初，佛罗伦萨的彼特拉克（Petrarch 1304—1374）和薄加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起了重要作用。他们俩人都热衷于收藏古典文献，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荷马史诗被译成了拉丁文。^① 受到荷马的影响，彼特拉克鼓吹恢复和模仿古典文字，这使他在欧洲获得了“桂冠诗人”的称号。教皇和君主们纷纷给他赏赐和经费，这些恩宠激发了复兴希腊罗马文化的热情。荷马、西塞罗（Cicero 106—43 BC）、卢克莱修（T. Lucretius 99—55 BC）塔西陀（Tacitus 55？—118）、普鲁塔克（Plutarch 46—126）等这些古典文化的巨匠开始为人所知。古典文化的传播也适应了市民生活发展的需要，当时的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 1447—1455）就醉心于古迹和文献的收藏，为得到一本古希腊的地理著作译本，他情愿付 1000 个金币的代价，而翻译荷马的作品则要付出 1000 金币！^② 此后在废、旧城堡或修道院搜寻希腊罗马时期的手稿竟成为社会时尚。

③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在 1400 年前后，因奥斯曼土耳其帝国（Ottoman Empire）对拜占庭的压力，大量的希腊学者离开君士坦丁堡来到意大利传播希腊罗马文化，在佛罗伦萨讲学的

① 罗马共和时期，希腊人曾将荷马史诗译成拉丁文。

②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第 183 页。



克里索洛拉斯 (M. Chrysoloras 1350—1415) 就是最著名的一位。1453 年是西洋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 是其近代史开始的标志。该年 4 月, 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 (Mehemmed II 1451—1481) 率大军 15 万, 战船 300 余艘, 经过 53 天的血战, 在 5 月 29 日攻陷君士坦丁堡, 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被认为完整保留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东罗马帝国, 在西罗马灭亡 1000 年之后, 终于寿终正寝。该事件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更多的希腊学者和古典文献流入西方各国, 历史学家吉本 (E. Gibbon 1734—1794) 曾写到, 拜占庭图书馆的毁灭, 每位逃生者都从中抓了一把, 有一二万部手稿失踪了, 而一个金币就可以买到 10 卷书, 这样的价格 “还包括了古希腊所产生的最伟大的科学和文学作品, 亚里士多德和荷马的全部著作。”^①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成了欧洲文艺复兴高潮来临的促进剂。

④ 近现代考古学的产生

随着希腊罗马文献陆续被发现并传入欧洲, 希腊罗马时代的遗物也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过去因修教堂烧制石灰 (大理石很不幸具有易烧制成石灰的性质) 拆毁了大量的希腊罗马时代的大理石建筑, 同时自 1150 年以来, 宗教建筑风格流行利用零碎大理石作镶嵌的科斯马蒂 (cosmati) 建筑风格, 也毁坏了不少古典建筑。古建筑这时也开始受到保护。在尤里乌斯二世时期 (Julius II 1443—1513) 拉奥孔群像、梵蒂冈的维纳斯等著名古典雕像相继出土, 迅即掀起了古物的收藏之

^①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册,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第 621 页。

风，并很快从意大利传播到欧洲其他地方。这种有目的发掘古代文化遗存、收集遗物的风气促使了考古学的诞生，至此，才有了完整意义上的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

在近代考古学中，有 3 位学者的贡献非常重要。

第一位是 G. 菲奥雷利 (Guiseppe Fiorelli 1823—1896)。18 世纪中叶，德国学者温克尔曼 (Winckelmann 1717—1768) 因庞贝城 (Pompeii) ① 的发现，首次提出要从历史角度来研究希腊罗马艺术品，不能单纯地寻宝，从而开创了近代考古学。菲奥雷利遵循温克尔曼的原则，逐层揭露整个遗址结构。他把复原罗马时代的生活放在首位，收集艺术品放在第二位，无论精致还是粗劣的遗物都原样保存以作为文化研究的证据。这一原则直到今天仍为考古学家所遵循。②

第二位人物是施里曼 (Heinrich Schliman 1822—1890)。他是一位穷牧师的儿子，从小迷上了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人物。1829 年的圣诞节，当他 7 岁时，他父亲送他一本图画本世界史，他被特洛伊 (Troy) 城陷落的宏伟场面所感动，并问他父亲特洛伊在何处。当得到否定的回答后，施里曼却立下长大要找特洛伊宝藏的宏愿。1868 年，经商发财后的施里曼开始寻找荷马笔下的特洛伊城。

① 庞贝 (Pompeii) 在公元前 80 年成为罗马殖民地，公元 79 年被维苏威火山爆发所毁灭。1738 年在庞贝附近的赫库兰尼姆 (Herculaneum) 首先被发现，1749 年开始发掘庞贝。因它埋于火山灰下达 7 米，科学发掘从 1860 年才全面展开，迄今仍在继续。已发掘的城址占到 60%，街道、房屋、商店、剧院大都保存完好。

② Colin Renfrew: Archaeology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90. pp. 20 - 21.



1873年6月，他终于在土耳其境内的希沙利克（Hissarlik）发掘到了特洛伊城。不过按现代考古学的分类，该遗址有9层，最早的第1层建于公元前4000—3000年，施里曼发掘的第2层要早于特洛伊1千年，而真正的特洛伊是在第6层，约在公元前1600—1300年之间。1876年，施里曼又在希腊的迈锡尼（Mycenae）发掘了5座陵墓，出土了大量的金器、饰物，他相信他找到的是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阿加门农（Agamemnon）的陵墓。但实际上，它们是公元前16世纪的遗存，比特洛伊战争（公元前12世纪）要早得多。

尽管如此，他没有找到荷马时代的遗存，却使希腊的神话传说成为信史。他发现了迈锡尼和以特洛伊第2层遗存为代表的安纳托利亚这两个史前文明，开创了文化研究尤其是史前文化研究必须利用考古材料的学术规范。

第三位人物是伊文思（A. Evans 1851—1941）。伊文思与施里曼是完全不同的人，其父是收藏家和古钱学者，他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毕业于牛津大学。他注意到克里特岛（Crete）出土的石章上的象形文字，在1894年发表了《克里特的象形文字》一书，推测它与迈锡尼文化的起源有关。

从1900年起，他在克里特岛进行发掘（此前他已在牛津大学博物馆工作多年，经验丰富），一干就是25年！

伊文思最重要的成就是发掘了占地8000多平方米的克诺萨斯（Knossos）王宫。他认为这就是希腊神话传说中宙斯（Zues）之子米诺斯（Minos）王的迷宫，

因而称其发现为米诺斯文明，时间在公元前 3200 年—前 1600 年间，是迈锡尼文明的源泉。这个论点基本正确，现在认为时间应为公元前 2700 年—前 1500 年。^① 伊文思又发现 2000 多块新的线型文字泥板，但未能释读成功。与施里曼以考古证史不同的是，伊文思用现代考古学方法，根据遗物性质分型、分类，再结合地层关系建立起文化的分期，为研究古代文化自身规律树立了榜样。受其影响，今天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仍以文献与考古材料并重，从两者结合中探索文化特征及发展规律。

楚文化的发现

从文化的定义中我们可以说在考古学出现之前，人们了解楚国、楚史、楚人、楚辞，但不能说了解“楚文化”。屈原、宋玉的辞赋，老子、庄子的哲学一直是历史上的显学，它们是楚学，却不是“楚文化”。文献的记载存在着选择性和局限性，因此文化的研究要依赖其他材料补充。“楚文化”的发现，正是考古学发展的结果。

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起，陆续有楚人的文化遗存被发现并受到注意。较重要的有 1933 年在安徽寿县发现楚幽王墓，1942 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发现的楚帛书，50 年代以后，楚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渐由湖南长沙、湖北江陵扩大到河南南部、安徽、江苏等原楚境的地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1978 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

^① 格林·丹尼尔：《考古学 150 年》，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第 187 页。



市)发现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青铜礼乐器和漆木器等文物,总数达15000件,所出土的文物的主要风格明显异于当时中原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而引起人们对南方楚文化的强烈关注。以此为契机,中国考古学会于1980年在武汉召开了第二次考古学年会,夏鼐和苏秉琦在会上提出研究楚文化的倡议,次年又成立了鄂、豫、湘、皖四省的楚文化研究学会,楚文化的研究开始从考古学的领域扩大到整个文化、历史的范畴。到90年代末,各地楚墓发掘的总数最保守的估计已超过了7000座,^①楚国的城址也有十几座,楚墓和楚遗物的科学分类断代已基本解决。楚人遗物包括仪式用器、简帛文书、生活器具、服饰用品、车马兵器 and 艺术品,较全面地反映了楚地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情态和宗教信仰、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内容,大大超出了传统文献记载的范围,使研究楚文化成为可能。

①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幽王墓的发现

20世纪20年代,安徽寿县常有零星盗掘的文物在贩卖。30年代初,淮南一带因水旱灾害连年,寿县朱家集的一些人以“救荒”为名,公然聚众挖掘李三孤堆大墓,历时3月,盗出大批青铜器,引起了各界的注

^① 1980年代早期,楚墓发掘数目已是4000余座,占到全国已发掘的东周时期墓葬的70%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04页。)90年代初,发掘楚墓的数目已达到5000座,据近年的统计,仅湖北一地已发掘了4000多座楚墓 (《五十年来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9月第283页。)又据最近(1999年)荆州博物馆的统计,他们所发掘的墓葬已接近5000座,而文物出版社2000年新出的高至喜《长沙楚墓》一书中所收的仅湖南长沙楚墓已在2000座以上。加上近年陕西、安徽、河南、江苏、浙江等地的新发掘的楚墓,数目当在7000—10000座之间。

意。当地政府后来封闭了盗洞，追缴了部分青铜器。因器物上有楚王名号，可以说是地下出土首次被确认的楚国的文物。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桂系第11集团军李品仙司令部驻寿县，李竟派兵再次挖掘李三孤堆大墓，墓中余物席卷一空。1934年第1次盗掘楚幽王墓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景聃、王湘二位考古学家前往调查，认为这是一座大型楚墓，后来发表的《寿县楚墓调查报告》是对楚国文化遗存所作最早的科学报告。据该报告，两次盗掘的青铜器就超过了1000件，完整的鼎就有35件。其中一件镬鼎高1.13米，腹径2.9米，重400公斤，是中国青铜时代仅次于商代司母戊大鼎的一件重器。

为弄清李三孤堆大墓主人身份，1981和1983年，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对该墓进行探掘。其墓口东西长41.2米，南北宽40.2米，面积为1650平方米，规模相当于1978年在湖北随县发掘的曾侯乙墓（221平方米）的8倍！它深约15米，带有22.4米长的斜坡墓道，封土面积约为10000平方米，当是典型的楚国王墓。学术界多数意见认为这是我国晚期楚幽王熊悍（237—228 BC）的墓葬，所存遗物特征成为楚文化研究的重要起点。

②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的发现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说1942年），^① 湖南长沙

^① 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一书倾向于30年代中期出土，（中华书局1985年第7页），帛书经手人蔡季襄遗稿：《关于楚帛书流入美国经过的有关材料》称是1942年出土，1946年后为考克斯骗走，参见《湖南省博物馆文集》（第4集），船山学社，1998年第21-25页。



子弹库盗掘出土了一件楚帛书（又名楚缯书）。帛书长47厘米，宽38.7厘米，上面有900多个墨书文字，四周绘有12个神怪图案。帛书出土后为美国人约翰·考杰斯（John Hadtey Cox）购得带回美国（考杰斯曾在长沙雅礼中学任教，返美后会于1939年在耶鲁大学举办了长沙出土中国古代文化展览，但未展出楚帛书，这是已知最早向世界介绍楚文化的活动。），现辗转保存于美国史密森学会的沙可乐美术馆（A. M. Sackter Gallery）。

楚帛书是首次发现的帛书。与以前发现的金文不同的是，帛书的文字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上古时代的天文历法、算术、创世神话、宗教巫术及艺术等文化方面的内容。譬如《帛书乙篇》中提到的神话人物有伏羲、女媧、炎帝、帝俊、祝融、共工等。帛书材料公布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几十年来，中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学者从文字的释读、星占历法、艺术传统及对太平洋地区文化关系等方面都有多角度的探讨，它使楚文化的研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术话题。1973年5月，时隔30多年后，湖南省博物馆又对楚帛书出土的地点进行科学发掘，从墓中新发现一幅帛画，性质为招魂一类，它为楚帛书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③江陵楚郢都纪南城的发现

20世纪50年代，湖南长沙发掘了一批楚国墓葬并在北京举办了楚文物展览，由此揭示了楚文化考古学研究的序幕。楚文化的研究开始从个别墓葬、个别器物转向墓群及遗址的综合研究。湖北曾是楚国的中心地带，楚文王（689—677 BC）在江陵建都达400年之久，从60年代起，楚文化遗存考古调查的重点就移到了江陵

以及周围地区。

文献记载楚国郢都经常迁徙，但从楚文王元年（689 BC）到秦将白起拔郢（278 BC），郢都在江陵境内，只是未明何处。50 年代，考古学家在距今荆州城 5 公里处发现一大型古城遗址，因它在纪山之南故名“纪南城”。城内外遗物时代最早的为春秋，最晚的为东汉，经过勘察后认定它就是楚故都“郢”的遗址，并于 1956 年报请批准为全省文物保护单位，1961 年又成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从 1973 年到 1979 年，为配合农田水利建设，考古学家对纪南城及周边的文化遗存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发掘，1975 年，发掘达到高潮。当时在国家文物局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 7 所院校的考古、历史专业的师生和湖北、上海、天津等文博单位的考古学家参加了纪南城的发掘工作，这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协作发掘。在纪南城及周边地区文化遗存的发掘中，清理了望山、沙冢等中型楚墓、雨台山楚墓群等数百座小型楚墓，出土了大量楚人遗物，为深入研究楚文化打下了基础，今天这样的发掘工作仍在进行。

④曾侯乙墓的发现

对纪南城进行的考古学调查研究，引发了学术界对楚国城市、交通、军事、经济状态、社会分层等一系列文化现象的研究，如果说它是楚文化研究的一块基石的话，那么随县曾侯乙墓的发现则是楚文化研究迅速发展的促进剂。学术界在惊讶曾侯乙墓的发掘成果的同时开始重新认识长江流域的先秦文化，这成为在 1980 年中国考古学第二次年会上正式提出研究“楚文化”的动



因。当然从今天的研究成果来看，曾侯乙墓的主要文化成分属于周文化而不是发掘当初所认为的属于楚文化，它仅仅只是在楚疆域内受到楚的影响或者说与楚文化有若干共通之处而已，但对于文物考古学界以外的人而言，习惯上还是把曾国的文化当成楚文化。如果从广义的楚文化是指地域文化，而不仅是指严格的考古学意义上的楚人、楚族和楚国文化而言，曾国的文化也是楚地域文化的一种，所以本书以后谈到楚文化涉及曾国的情况时就不另行说明。

曾侯乙墓的发掘颇具戏剧性，其发现也纯属偶然。曾侯乙墓的所在位置地处鄂北岗地的淦水、潏水交汇之处，属于周代的古随国。1977年9月，空军某部驻军雷达修理所在随州城关西北郊擂鼓墩附近一个名叫东团坡的岗地上扩建厂房，施工放炮，结果在红色砂岩地上发现了一大片不规则的青灰泥土。平日喜爱阅读文物考古书籍的部队负责人怀疑这是古墓的迹象，并向当地主管部门作了反映，但未能引起重视。他命令施工的战士严密注视现场迹象，并减少炮眼的装药量。随后的施工中，发现了青灰泥土中的大石板，他立即下令停止放炮并向上级作了汇报。1978年夏，湖北省博物馆等单位的考古学家组成“湖北省随县擂鼓墩古墓考古发掘队”来到现场，勘探结果证实了它是一座先秦时期的墓葬，且最下的炮眼离椁盖板不到30公分，若继续施工，墓葬内的文物将会受到破坏。考古学家当即对该墓进行了清理发掘，编号为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即曾侯乙墓。田野的清理工作从5月11日到6月28日才全部完成。

曾侯乙墓是一座大型岩坑竖穴木椁墓，平面呈不规

则多边形，方向正南。墓口东西长 21 米，南北宽 16.5 米，总面积约 220 平方米，据残存封土推算，下葬深度当在 13 米左右。墓坑底部用 171 根长方形条木垒成椁室，高约 3.5 米，共用梓木约 378 立方米。椁室四周填以木炭，总重量在 6 吨以上。椁盖板上面依次铺竹席、绢、竹网各一层，其上再分别填以木炭、青膏泥、黄褐土、青灰土、五花土等直至墓口。

椁室分东、中、北、西四室，各室隔墙底部有方洞相通。各室器物的分布如下：

东室：放置主棺 1 具，陪棺 8 具，殉狗棺 1 具，还有金玉器、漆木器及少量车马兵器、乐器、骨角杂器、丝麻织品等。中室：主要放置以 65 件一套的大型青铜编钟、32 件一套的编磬为中心的乐器，及以九鼎八簋为中心的青铜礼器。北室：主要放置车马兵器、竹简和一对青铜大尊缶。西室：放置 13 具陪葬棺及少量饰物。

在墓内出土的器物中，许多带有铭文。其中标明器物为曾侯乙制作与使用的铭文有 208 处，如“曾侯乙乍作持”，“曾侯乙之用戟”等。在主棺旁出土的一件刻有“曾侯乙之寝戈”铭文的戈，是曾侯乙寝宫侍卫使用之物。更为重要的是在墓椁中室出土的一件青铜编钟上刻有“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的铭文，它记载了楚惠王熊章在五十六年（即公元前 433 年）赠送编钟给曾侯乙作为宗庙祭器一事。这些表明墓主人是曾国一位名叫“乙”的国君，侯是其爵位。

在历史记载上随州只有随国而无曾国，但是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之丰富、保存之完好、涉及中国先秦时代各方面的问题之广泛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成为中国 20 世

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曾侯乙墓的发现在考古学、历史学、冶金铸造、物理声学、音乐学、天文学、古文字学和艺术史诸多领域里，或是改写或是更新了学术界对中国先秦文化尤其是长江流域文化的认识，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高度的重视。由于曾、楚关系的密切和墓葬中的许多文物与楚国同类文物有相似之处，这一发现与克里特的克诺萨斯王宫发现一样，成为重新认识楚文化的一个里程碑。

1988 年在武汉和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San Dieg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分别召开了有关曾侯乙编钟的国际学术会议，1989 年在武汉、1991 年在美国华盛顿也相继召开了楚文化的国际讨论会。1999 年又在武汉召开了荆门郭店楚简的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国内外的学术活动更进一步将楚文化的研究变成一个国际性的学术话题。

CHUWENHUA
ZHISHI CONGSHU
楚文化知识丛书



二 楚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的形成

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

文化具有适应性和整合性（integration）。在人类学中，前者是指对环境变迁作出的反应，后者是指构成文化的诸要素相互适应，多数是和谐的而非随机的拼凑。只要某些习俗在特定环境中更为适应，那么条件相似的社会都能发现这些相关联的“文化簇”（Clusters）。文化是通过整合或者说“一体化”发生作用，在文化发展之初适应性是主要的。在历史学中，注重自然环境尤其是地理对文化影响的研究，使文化面貌变得更加清晰，正如布罗代尔（F. Braudel 1902—1985）所说，它将静态的历史变成了动态的历史。^① 楚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都经过了很长的发展过程，自然环境在文化形成之初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① 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20页。学术界认为地理环境对文化有根本的影响始于孟德斯鸠（见《论法的精神》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225 - 241页。）但布罗代尔的成果是做得最好的之一。



①自然环境对希腊文化的影响

希腊文化产生于爱琴海文明。早在希腊文化出现之前，爱琴海文明已有4个文化圈，即希腊本土文明；基克拉迪（Cyclades）群岛文明；米诺斯文明（克里特岛）和特洛伊文明（小亚细亚）。爱琴海地区的自然环境是海陆交错，希腊周围岛屿多达480个。除希腊本土外，没有一个地方距海超过50公里的距离。在陆地上，希腊北部为品都斯山脉（Pindos）分隔，中部被群山分隔成小块，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e）有小块平原，为希腊的主要农业区。

该地区属地中海气候，冬季温暖（6—12℃），夏季少雨，雅典的年均降水量还不足400毫米。因此该地区的农业不发达，当人口集聚之后，粮食就要靠里海沿岸和埃及等地供应，这就带动了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克里特和基克拉迪群岛正好位于希腊本土与亚、非、东欧航线的交汇点，商业繁荣促使这里最早出现文明并迅猛发展。克里特的米诺斯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经营彩陶、织物、宝石、金属制品等非农产品的贸易为主，它与埃及、叙利亚、意大利西南沿岸、希腊本土及小亚细亚有密切的商贸往来。为保证航海权，克里特岛向基克拉迪群岛和希腊本土殖民。稍晚的迈锡尼文化（2600—1125 BC）也以海洋贸易为主，其衰落也正是由于特洛伊战争（1260—1250 BC）破坏了其地位。特洛伊战争的起因也是特洛伊人控制了达达尼尔海峡威胁到迈锡尼的对外贸易。

自然环境还影响到希腊文化的核心“城邦制度（Polis）”。城邦是一种规模有限、独立自主的公民共同

体。人数通常以 4 位数计。雅典繁荣时人口最多达 25 万。^① 城邦这种小的政治单位是由地理环境和海洋贸易造成的。希腊本土崎岖不平，沿海的小平原被山区分隔成相互独立的区域，冬季几乎不能与外界通行，天然形成了城邦这种政治单位。同时依赖海洋贸易的居民为防海盗劫掠，有修筑共同防御设施的需要。修昔底德（Thucydides ? —400 BC）指出，海上殖民、商业贸易的发展才促使了有城墙的城邦开始在沿海出现。^②

人口一增多就会造成城邦供应的压力，造成殖民。因此随着殖民运动，城邦遂传播到整个希腊世界。

② 自然环境对罗马文化的影响

罗马文化源于意大利。意大利所在的亚平宁半岛（Apennines）是地中海 3 大半岛之一。它以山地为主，平原仅占 $\frac{1}{5}$ 的面积，主要在北部。境内降水集中在冬季，约为 600—800 毫米，而夏季只有 10 毫米左右。整个自然的环境可分成“大陆意大利”和“半岛意大利”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前者以波河（Po）谷地平原为中心，北为阿尔卑斯山，南由亚平宁山脉的边缘环绕组成，属中欧型气候，冬冷夏热，降水稀少。后者由被长达 1200 公里的亚平宁山脉分成东、西两部分，属于地中海气候，降水适度。总的来看，北部是由山脉包围的低地平原，南部是诸多的沿海平原围绕着中央山链，这两种不同的环境使当地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截然两样。

① 亚里士多德说 10 万公民（指自由的成年男子）在一起就不能叫城邦（《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214 页）。

②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第 5 页。



意大利北部在公元前 2000 年就有拉丁人入侵并在波河地区建立了农业文明。罗马文化则产生于南部亚平宁地区。南部水系发达，没有像希腊那样被分隔成小块闭塞的区域，海岸也平直，岛屿虽少却未影响与地中海沿岸的文明交往。亚平宁半岛东部狭窄，流入亚德里亚海的河流夏季无水，冬季又狂泄，使土壤易受侵蚀，难以找到良港，希腊也不向该部殖民。西部地势广、河流密集，加上火山地貌带来肥沃的土壤十分利于农业和贸易的发展。台伯河（Tiber）下游河谷是意大利中部的交通网络枢纽，罗马城就位于距海只有 25 公里的台伯河左岸。它是一片丘陵平原混合地带，宜于谷物、葡萄种植和畜牧业。尽管整个半岛的自然资源不算丰富，但罗马与内陆联系紧密和沿海的优势使之能继希腊之后建立地中海的霸权。古罗马史学家李维（Livy 59 BC - AD 17）指出：“神和人们选择这个地点作为我们的城市不是没有原因的。有利的丘陵地形、给我们运来海岛产品和外国舶来品的河流；距海洋近的便利，近到不担心海盗，且位于意大利的心脏地位；世界各地所有形成城市的最好便利条件使罗马注定成为伟大城市。”^①

③ 自然环境对楚文化的影响

楚人是北方中原人种，早年活动于荆山山脉，西周初年受封于丹阳（今河南淅川、湖北丹江交汇处）后，渐渐以江汉地区为中心发展起来。楚文化的核心是楚族的文化，但也包括江汉地区原住民的文化。江汉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对楚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① Livy 5. 54. 4. 转引自 Tim Cornell, John Matthews: Roman World, Phaidon. Oxford 1982. p. 17.

江汉地区位于长江中游，它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接洞庭湖平原，东、西、北三面接丘陵山地，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江汉平原由长江、汉水冲积而成。远古时期，长江并无堤防约束，夏季江水出峡之后，易形成漫流状态，在平原地带构成湖泊纵横、岗地交错的地貌，其中的一部分是古人所谓的云梦大泽。江汉地区的气候为亚热带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湿冷，年均气温在13—18℃，降水在1200毫米以上，无霜期超过了250天。江汉地区因之早就有了以稻作农业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依次是城背溪（枝江）、大溪（巫山）、屈家岭（京山）、石家河（天门）文化，时间在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共同的特点是原始农业较发达，商贸却不繁荣。商朝人进入这一地区之后，地方文化才有较快发展。

江汉地区是一个马蹄形盆地，水系发达、林莽茂密、物产丰饶、取食方便。当地居民长期采用火耕水耨、稻饭羹鱼的生活方式，不忧冻饿也无积聚。这种紧密依靠自然的生活，使人的行为易墨守成规，习俗普遍信巫好鬼，精神上则倾向清静无为的哲学。它与外部的中原地区、吴越地区和巴蜀地区都有良好的天然通道连接，也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楚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的起源和形成

一般而言，文化从起源到形成有很长的时间，文化的类型就只能按其成熟期的特征分类。在楚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发生地区，文明起源都很早，但是楚文化形成于春秋中期以后，希腊文化在古典时期（公元前5—4



世纪)与楚国相当。罗马文化稍晚,在公元前3世纪统一意大利(272 BC)之后。三种文化的一个共同点是都不是单一纯种族文化,而都是当地原住民与移民和外来文化整合的结果。

①希腊文化的起源和形成

考古发现在公元前6000年,希腊的色萨利(Thessaly)地区就有经黑曜岩贸易由小亚细亚渡海而来的移民建立的农耕文化。到公元前3000年初,爱琴海文明进入金属时代,新技术的出现使当地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原料及产品的供应和销售刺激了商业和航海业的进一步发展,但这种文明在公元前3000年末很快被大量操印欧语的半游牧雅利安人的涌入所摧毁。后者在此基础上新建了自己的文明,迁徙到希腊的居民有爱奥尼亚人(Ionians)、伊奥尼亚人(Aeolians)、亚该亚人(Achaeans)等。这些古希腊人都称自己为赫伦人(Hellenes),所居地为赫伦(Hellas)。这种迁徙持续了几个世纪,较早迁入的爱奥尼亚人很快与当地先进文化混合,接受海洋文化,在雅典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心。总的来讲,印欧语族不擅航海,其势力未及岛屿地区,原有爱琴海文明能在岛屿得到空前发展。

克里特岛是爱琴海最大岛屿,东西长约250公里,南北宽约12—60公里,克里特文明(2600—1125 BC)是欧洲最早的文明。它被以希腊传说中的克诺索斯(Knossos)王米诺斯的名称命名为米诺斯文化。克里特人不是原住民也不是希腊人,可能是来自小亚细亚和北非的种族,因此该文化受东方和埃及强烈影响,是一个典型的移民文化。

克里特岛上原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为米诺斯早期文

化（2600—2100 BC）所继承。米诺斯中期文化（2100—1700 BC）时期，克里特文明达到高峰，已有城市、文字、金属制造业，出现了奴隶制国家。商业范围遍及希腊本土和整个爱琴海地区。约在公元前1400年，克诺索斯城突然毁灭，原因未明。但外来侵略的可能性要大于自然灾害，入侵者为较野蛮的希腊多里安人（Dorians）或亚该亚人，从此米诺斯文化一蹶不振。

公元前1650年—前1125年间，米诺斯文化虽衰退，来到希腊的移民（主要是亚该亚人）受其影响融合自身文化却创立了新文化，因最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的阿哥利斯（Argolis）的迈锡尼发现，故称“迈锡尼文化”。施里曼引用荷马的话将迈锡尼称为“多金的迈锡尼”。荷马诗句和发掘结果都证明它有发达的金属业。金属的来源一靠海洋贸易，二靠大规模的海盗掠夺。约公元前1500年，迈锡尼由竖穴墓进入圆顶墓时代，繁荣空前，其宫殿的宏伟在仍保留下来的卫城城墙和狮子门上都可以看出来。1939年又在派罗斯（Pylos）发现迈锡尼时代的线型文字后并释读成功，它证明迈锡尼人是古希腊的亚该亚人。当时商人也通晓文字，文字已不是贵族的特权，这与中国甲骨文、金文、简、帛文书仅为贵族所用不同。在公元前1260年—前1250年的特洛伊战争中，迈锡尼元气大丧，除雅典之外，希腊其他地区的文明遭受另一印欧语族的伊里利亚人（Illyrians）的入侵而毁灭。

迈锡尼的衰落标志当地青铜文明的终结，之后的几百年，希腊半岛因民族大迁徙带来的混乱，进入“黑暗时代”（前11—前9世纪）或称“荷马时代”、“英雄时代”。其中主要的一支移民是落后的多里安人，因受多



瑙河一带民族的压迫由希腊北部南下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并逐渐占领爱琴海南部各岛屿，如米洛斯岛（Melos）、科斯岛（Karos）、克里特岛等。他们的迁徙又带动了早先进入希腊的爱奥尼亚人、伊奥尼亚人迁徙。这些落后的希腊人尚处于氏族社会阶段，经济上以农业畜牧业为主，政治上采用军事民主制。他们破坏先进的迈锡尼文明之后建立的文明有一个显著特点是使用铁器和牛耕，并利用军事民主制对王权或城邦最高权力进行限制。

在移民同时，希腊人在适合防御的地方，建立了城邦（Polis）政治体制。它原本是希腊移民在小亚细亚沿岸为保护商业、避免原住民侵扰而建立的，随即传遍全希腊。早年城邦是宗教、军事的共同体。宗教把贵族和平民聚合了起来，但军事只是贵族集团的权利，奴隶不能从军。黑暗时代终结后的公元前8 - 公元前6世纪，城邦结构也有变化，以雅典为主的城邦走向民主体制，而以斯巴达为代表的城邦则变为贵族体制。因土地缺乏、人口过剩和工商业重新繁荣引起了希腊本土向海外大规模的殖民运动，与以前的移民不同，它由城邦控制，也将城邦制度传到地中海沿岸。从这时起，希腊文化的政治特点基本形成。早先是贵族挑战王权，尔后贵族间的分歧产生了由某些阶层支持不经选举产生后“僭主”，“僭主”有好有坏。到公元前5世纪，出现了民主政体。所谓民主，是指平民（Demos）的政府，平民不包括奴隶和异邦人，妇女也没有政治权利，它与现代民主的概念是不同的，它只是一个扩大了寡头制。亚里士多德区别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时说，前者较穷，不

重要的公民没有政治发言权，后者凡是公民均有发言权。^①

城邦制度是希腊文化的主要特点，它与埃及、两河流域和中国文明中的城市完全不同，城邦是一个城市和周围农村的共同体。埃及、两河流域文明中的城市是围绕庙宇发展起来的，中国城市则是从政治军事中心发展起来的，楚郢都就是一个政治中心。它们的共同点是城市及国家都有最高神权和政治统治者，并能扩张成为帝国。希腊城邦是摧毁了原有文明基础以自身的氏族制度为基础建立的。城邦的政治权力属于公民（Polites）^②意为属于城邦的人，它只包括平民和贵族，却不是指全体居民。奴隶、妇女、异邦人都不是公民。希腊地理的分割状态使城邦天然独立，人口也不能太多，一旦超出城邦的供养能力，就要出现移民，就会在海外建立新城邦。新城邦与母邦没有统属关系，只有精神联系。城邦采用民主制度管理。雅典是由公民大会管理国家，每个公民在大会上都有发言权、投票权，多数官员由公民抽签决定。城邦的独立性使希腊文化在不同地方呈不同面貌，如斯巴达、雅典、科林斯等各不相同。它与中国文明形成之后，整体面貌较为一致迥然有别。

②罗马文化的起源和形成

罗马文化是拉丁人建立的。此前意大利有多种类型的文化，多是移民文化。公元前 4000—公元前 3000 年，东方民族迁徙到巴尔干和多瑙河平原，他们带来先进的技术使当地原住民由狩猎经济转入到农耕经济进入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第 200—202 页。

② 《政治学》，第 100 页。



到了新石器时代。意大利各地都发现了这一阶段有特色的用指甲、贝壳压印的印纹陶文化。公元前 2000 年初，印欧人由东北方进入意大利，其中拉丁人（Latin）在意大利北部波河平原建立了特拉马尔文化（Terramare 1700 - 1100 BC），也叫“黑土”或“沃土”文化。特点是农牧与渔猎经济并存，有发达的青铜器，住屋建在土丘或木桩上以免潮湿，有些类似中国南部的干栏式建筑。意大利中、南部较先进的亚平宁文化以彩陶、土葬为特征。

公元前 1000 年，铁器文化取代了亚平宁文化，这就是在意大利中部兴起的维兰诺万（Villanovan）文化。它以农业为主，存在公社组织，以骨灰瓮葬式最有特点（也称为“火葬文化”）。维兰诺万文化是被拉丁人称作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s）或多基人（Tusci）所建。传统上认为他们来自小亚细亚，今天意大利的考古学认为他们起源于地中海，与亚洲文化在种族和文化社会形态上没有共同之处。^① 总之，他们也是到意大利较早的一支移民，在罗马的文化形成上起了重要作用。

维兰诺万文化的分布从波河流域直到罗马所在的拉丁姆地区（Latium）。公元前 7 世纪，伊特拉斯坎在意大利北部、中部建立了若干城邦。公元前 6 世纪，他们进入阶级社会。在塔克乌尼（Tarquin 619 - 579 BC）统治时期，他们又在罗马疏干了的沼泽建立起城市，拥有强大的海军并与希腊、迦太基（Carthage）争夺霸权，

^① Etruscan 人他们自称为 Rasna 或 Rasena 人。Rodolfo Mosca etc：《希腊罗马的盛衰》，光复书局，中华民国八十年，第 100 页。R. H. 巴洛：《罗马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第 28 页。

势力达到全盛。公元前 510 年，罗马人开始反抗，到公元前 474 年，伊特拉斯坎人被叙拉古（Syracuse）王格隆（Gelon I ? - 478）战败，势力渐衰退，在公元前 396 年彻底被罗马人所灭。

伊特拉斯坎人对罗马文化形成的作用十分巨大。因他们与迦太基、希腊有商贸往来，这些文化因素由之传给了罗马人。此外，伊特拉斯坎的政治、宗教、技术和艺术都影响了罗马人。如罗马象征王权的“法西斯”就是学自伊特拉斯坎人，宗教仪式、凯旋仪式、建筑风格都来自伊特拉斯坎人，甚至希腊字母也由他们传给了罗马人。

普鲁塔克认为罗马人是特洛伊战争中率众逃到拉丁姆地区的武士艾涅阿斯（Aeneas）^① 的后裔，经历 15 代君主之后出现了罗慕洛兄弟（Romulus），他们在公元前 753 年 4 月 21 日建立了罗马城。^② 现在从考古材料知道，早期罗马人（可能为原始的拉丁人一支）来自罗马以南的阿尔巴山（Alba）。在公元前 9 世纪的铁器时代，罗马东南 20 公里的阿尔巴隆加（Albalonga）的拉丁人就迁居到台伯河口的丘陵，在河滩地与伊特拉斯坎人进行贸易。当时罗马人、萨宾人（Sabines）以附近的帕拉丁（Palatine）、爱斯奎林（Esquiline）、奎林纳尔（Quirinal）等七个小山丘为中心形成宗教性的同盟（七丘同盟）。罗慕洛统一拉丁部落之后经过 7 个

① 特洛伊的英雄，又译为伊尼斯，罗马诗人维吉尔曾以此创作长诗《伊尼德》。

②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第 41 - 51 页。



王共 250 年，称为“王政时期”。在第 6 位君王塞尔维·图里乌斯（Servius Tullius 578 - 535 BC）进行的改革中，罗马社会血缘组织解体，代之以按财产、地域划分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国家。

在按财产划分国事等级的国家中，罗马显示强烈的军事扩张性，它促使了奴隶制的发展。由氏族大会演变而来的元老院仍带有军事民主制的色彩。图里乌斯改革后，罗马城发展到占地 285 公顷。公元前 5 世纪，罗马领土已达 822 平方公里。到公元前 260 年，控制土地 1600 平方公里，包括同盟国在内则有 83000 平方公里。这时罗马公民 29.2 万人，同盟国有 75 万人，总人口约 300 万人。

“王政”之后的罗马共和时代（510 - 49 BC）是罗马文化的形成期。有 3 个重要因素促成了罗马文化的形成。一是与伊特拉斯坎人、迦太基人的战争。二是共和国内部贵族与平民的斗争。三是希腊、迦太基等来自海外的影响。在与伊特拉斯坎人的战斗中，罗马独立；与高卢人（Gauls）作战；促使罗马建立了拉丁人有公民权的殖民地；与萨莫奈人（Samnites）作战，罗马统一了意大利；与迦太基、马其顿（Macedonia）和叙利亚等希腊化的国家作战，罗马称霸了地中海，这些比罗马文化先进的文明被改变原有的政治结构成为罗马的行省。

罗马建国之初是贵族共和体制。身份低微的平民寻求贵族的庇护，贵族有司法权和习惯法的解释权。因战争规模扩大，贵族需要平民的支持，双方的讨价还价斗争导致了罗马第一个成文法（12 铜表法）等一系列法律产生，平民获得了政治平权，它主要包括永远免除论

为债务奴和竞选公职的权利，罗马的自由民因此成为统一意大利战争和海外扩张中的主要力量。有了权力的平民成为新贵族，他们逐渐修改政体，清除氏族制残余，到公元前 90 - 89 年，罗马公民权已普及于整个意大利半岛，却也为共和体制的崩溃种下根源。由于罗马人之间联系的纽带是政治道义而不是宗教精神，当海外征服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削弱了罗马公民的守法观念，共和政体就被军事独裁者如苏拉（Sulla 138 - 78 BC）、庞培（Pompeius ? - 87 BC）、恺撒（Caesar 102 - 44 BC）毁掉。公元前 27 年，屋大维（Octavian 63 BC - AD 14）接受“奥古斯都”（Augustus，意为尊者）的称号，罗马成为帝国。

奥古斯都采用文官政府、行省统治、实行军政改革，罗马公民失去了一些自由，帝国却维持了 2 个半世纪的繁荣稳定。在克劳狄（Claudius 41 - 45）时代，人口达到 1.2 亿，^① 这一时期罗马文化的特点是“富豪文化”，只有消费而不创造。建筑和贸易发达，社会两极分化，这使罗马原有精神衰退；人们冷漠政治、转而追求新宗教。到 3 世纪中叶，因强化行省制度（意大利也成为行省）和蛮族入侵，军人势力上扬。235 年，文官政府被军人取代。284 年，戴克里先（Dioletian 284 - 305）上台时已无法控制整个帝国，就将其分成 12 个行政区和 4 个大区由 4 帝分治，结束了元首政治。其中君士坦丁（Constantine 306 - 337）因意大利财赋枯竭，在拜占庭建立新都君士坦丁堡，称“新罗马”，帝国重

^①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卷，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第 41 页。



心完全转移到东方。在提奥多西 (Theodosius I 379 - 395) 时代, 帝国有短暂的统一。他死后, 两个儿子霍诺留 (Honorius 395 - 408)、阿卡狄乌斯 (Arcadius 395 - 408) 分治东西罗马, 帝国最终分裂。476 年, 帝国日耳曼雇佣兵首领奥多亚克 (Odoacer 430 ? - 493) 推翻西罗马皇帝罗慕洛, 西罗马灭亡。东罗马则到 1453 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攻陷后才灭亡。

③ 楚文化的起源和形成

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 “楚文化就是‘楚’的文化。这个‘楚’有 4 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概念: 地域概念、国家概念、民族概念和文化概念。”^① 这 4 个概念的核心是楚民族, 楚国的名号、地域只是文化形成的外部条件。楚文化并不仅指楚人的文化, 往往也包括楚地域中的各种文化。

楚国诗人屈原 (340 ? - 278 BC) 说自己是黄帝之孙高阳氏 (颛顼) 的后裔。楚贵族墓葬的人骨鉴定材料显示楚贵族是北方中原人种, 屈原的说法不是附会。它们表明楚人不是江汉地区的原住民, 楚人的直系祖先是祝融氏。祝融氏分为 8 姓, 其中季连这一支与西方部族联姻独立出来称为“芈”姓, 也是楚宗族的姓氏, 时间约在夏商之间。商末周初, 楚人首领鬻熊率部居于丹阳, 楚人进入信史时代。在周成王时, 楚熊绎受周子、男一级的封号, 以“楚”为国名。“楚”是在山林建国的意思。山林生活谄陋, 难以积聚, 这是无法从考古上找到楚人早期材料的原因。到周夷王时, 楚人进入

^①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香港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第 65 页。

江汉地区与当地居民友好相处。楚国君熊渠也以蛮夷自居，不奉周室号令，楚人开始走向自强发展之路。

楚文化是中原文化在江汉地区的一种变异，是中原文化与当地原住民文化整合的结果。楚之前的江汉文明按顺序有4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城背溪文化（约7000 - 500 BC），中心区域在湖北西部的三峡地区和湖南西北部的澧水一带。这时已有原始稻作农业，渔猎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社会组织也很松散。考古发现的遗址只有数千平方米，最大不过1万平方米。湖南澧县彭头山发现的较大的公共墓地，仅有18座墓葬。

大溪文化（约5000 - 3000 BC），中心区域在前者的基础上扩大到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地区。这时生产工具增多，出现了快轮制陶和玉器，聚落遗址中人口密度增大了，墓葬也看得见随葬品。在三峡杨家湾的出土陶器上，还发现了许多刻画符号，这是文字产生的迹象。

屈家岭文化（约3000 - 2600 BC），中心区域是江汉平原、略偏向汉水以东地区，包括洞庭湖北部和南阳盆地南部。这时稻作农业规模大，社会分工明显。在聚落中有等级划分，特别是有城市雏形出现。

石家河文化（约2600 - 2000 BC），其与屈家岭相当。文化水准更接近中原的夏文化。遗址规模宏大，石家河城的面积就有1平方公里。冶铜业和受山东龙山文化影响的制玉技术最具特点。其精神生活与后来的楚人有共通之处。

这4种文化在时间上差不多先后衔接，但不是同一种族的文化。这些考古材料中至少包括了3种不同的文化因素：一是西南系统，它以两湖平原的西南侧为中心，衍生出城背溪、大溪文化，种属可能主要为巴人。



二是北方系统，以汉水东侧为中心，发展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种属可能主要是三苗。三是外来的中原仰韶和东夷文化，它们是通过随（县）、枣（阳）走廊和长江通道影响江汉地区的原住民文化，在新石器晚期它的影响最大。

商代和西周，中原文化在主要交通路线上占有绝对优势，这些线路上已非传统文献记载的蛮荒之地，所以楚人立国虽晚，原有的文明为楚文化的成长奠定下了较好的基础。江汉地区原有的饭稻羹鱼的生活方式、信巫好鬼的精神传统在楚人进入前后的很长时间内都非常稳定。山林生活的楚人在优越的生态环境中也容易与当地原住民在精神上保持一致，^① 楚人自身具有的文化开放性以及与中原文化的亲缘关系很自然在当地形成优势。楚人势力从汉水西边扩展到汉水以东地区，在楚庄王（613 - 591 BC）时期，楚国已是春秋五霸之一，以楚为代表的南方诸侯已能与北方列国一争高下了。

文献和考古材料发现楚文化是渐次形成的。它始于熊渠时代，定型于春秋中期，此后江汉地区内的各种文化都归于“楚文化”的名下，它的定名并不是证明它已是一个纯粹单一民族文化，而最先只是在考古学上说明它的物质文化与中原地区有所区别。扩大到人类学上，楚文化也只是一种地域性文化，其特点是以中原文化为主干的多元文化的混合体，即所谓“亦夷亦夏”。

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区别大体表现在 3 个方面。一是饭稻羹鱼的生活方式。它实际上也是整个长江中下游

^① 舒之梅等：《楚文化》，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56 - 58 页。

地区的生活方式。二是信巫好鬼的精神状态，它与前者也有关联。三是夷、夏相杂的社会制度。它基本上以中原文化为主，如采用周人的等级爵称、鼎簋制度、语言文字、音乐体系，只是在职官名称、中下阶层的仪式制度有自己的特点。如楚官名多以“某尹”相称；中下阶层的用鼎制度有双数鼎的组合，这类细小差别还有很多；但从整体上看，楚与中原是同多于异，楚文化只是中原文化的一支。经过近 30 年的学术争论，国内外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都认为“楚文化”并不是一个与中原文化相对立的“文明”，而只是中原文化在南方发展的变异。^① 楚文化的形成仅仅是显示出南方雨水农业区在青铜时代有不同于北方干旱、半干旱农业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模式，其特点很大程度上是由地域环境决定的，而不是当地原住民文化独自发展的结果。

^①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25. 《楚文化》第 12 页。



三 楚人、希腊人、罗马人的 社会生活与物质文明

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不同文化中的物质文化的特点一直是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的基础。著名人类学家 L. A. 怀特 (Leslie A. White 1900 - 1975) 把文化分成技术、社会学和意识形态 3 个亚系统，其中社会学系统是人际关系、亲缘关系、伦理关系、政治关系等；意识形态系统是思想、信仰、知识等；技术系统则是由物质的、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仪器及使用仪器的技术构成。技术系统包括各种生产工具、生活资料的获得方式、居住材料和攻防器械等。这 3 个亚系统相互影响，但是技术系统位于首要地位，而且也是最为基本的系统，人类生活和文化特点都依赖于它。^① 楚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分别是东西方古代文化的佼佼者，其文化中的技术系统的发展与各自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而在社会生活和物质文明上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并影响到各自文化的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等方面。

^① 怀特：《文化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第 349 页。

城市建筑

① 希腊的城市与建筑

希腊的城市起源较早，考古所发现的克里特时代和迈锡尼时代的城市已颇具规模。在《伊利亚特》中，荷马说克里特有 90 个城市。这些城市一般是海外贸易的产物，多为港口小镇。城市布局以商业或政府中心为主，四周分布无数店铺；街道错综复杂，一般铺上石板，两旁有排水沟；街边的房屋多是手工作坊，但在克诺萨斯（Knossos）发现有宫殿，房屋最高达 5 层。而在岛南岸的法斯特（Phaistos），宫殿的中心院落面积达 930 平方米，有的房屋间数多达 23 个。从出土遗物的分布看，当地统治者米诺斯王还直接控制手工作坊和贸易。

迈锡尼的城市是施里曼发现的。1876 年，施里曼想证实阿加门农是否有其人，他在迈锡尼挖了 34 个探方。1884 年，他终于在梯林斯（Tiryns）发现了宫殿遗址，出土了珠宝、金面具等大量文物。施里曼找到的并不是阿加门农的宫殿和墓葬，而是公元前 14 世纪的建筑遗址，早于特洛伊战争二个世纪。其城市以城堡为中心，有多个村落环绕城堡。保护城堡的城墙高度 7.5—15.2 米不等。城中最大的大厅面积有 120.1 平方米。地面为水泥饰有图画，屋顶由 4 根立柱支撑，男、女房间分开，这后来成为希腊建筑的一个范式。由于希腊大陆较克里特生活原始，迈锡尼文化中的商贸并不发达。为防海盗袭击，城市距海岸有相当距离，其功能也是军事防御性的中心。城内建筑以住宅为主，与古典希腊建



筑以宗教为主并不一样，但是方形的建筑式样，以巨石为建材却为后来英雄时代、古典时代的希腊所继承。

公元前 1300 年—前 1100 年是希腊的英雄时代，它也是希腊文化由爱琴文化转变为希腊文明的时期。当时的主要居民阿哈伊亚人（Ahhiyava）从希腊本土到小亚细亚均有分布，他们与迈锡尼人的信仰、习俗有所不同，文明程度不及迈锡尼但超过后来的多里安人。阿哈伊亚人的社会以农业、狩猎为主，其城市也仅是聚集在山上城堡四周的村庄，族长的城堡成为城市的起源和中心。因人口增长，他们渐次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和特洛伊等地。荷马说他们的建筑是以石块为基础，用土坯作墙，没有采用石板或水泥地面；屋顶用芦苇再覆以黏土，门是单扇或双扇，没有厨房和窗户，仅在厅堂屋顶上开一出口散烟。这种情况还不如湖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湖北枣阳雕龙碑、应城门板湾发现的房屋遗址。当然富裕的人家有专门的浴室，如奥德修斯本人的宫殿有一个前院，用灰泥砌墙，部分铺有石块。房外有列柱的门廊，通常用作奴隶和客人过夜。他们的一大贡献是将迈锡尼建筑中的“大厅”改建成多里安神庙，最终酿成了古典时代的希腊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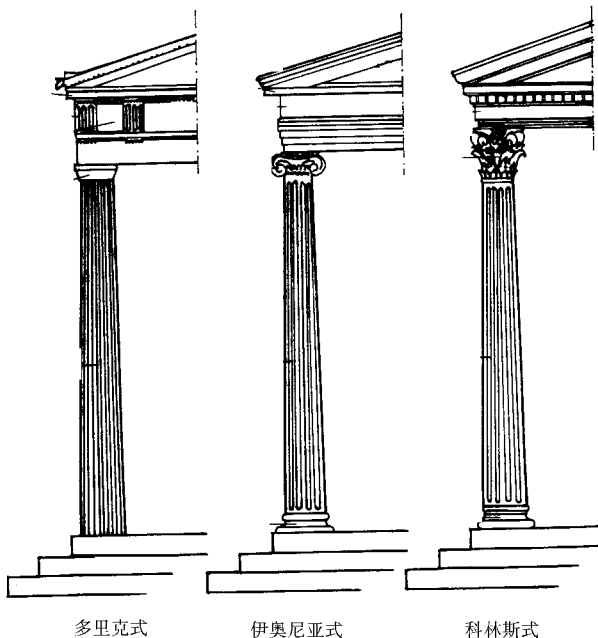
希腊古典时期，其四周的埃及、克里特、美索不达米亚在技术、科学和艺术上给予希腊重要影响。当希腊人向四周扩张在各地建立不尽相同的城邦之后，虽然城邦居民操希腊语，崇拜希腊诸神，实行希腊贵族式的民主政治，但城市建筑却有所不同。如斯巴达城在平原，四面环山是个天然城堡，故无城墙。在极盛时也只是 5 个村落的集合，人口 7 万。而雅典靠海外贸易成长，它的中心是迈锡尼时代继承下来的雅典卫城，居民按血缘

关系组织，不同的村镇环绕卫城，但迈锡尼城市中心的世俗性为古典希腊的宗教性所取代。这种以宗教为主体的城市结构是楚国乃至整个古代中国城市结构所没有的。在宗教精神的影响下，其建筑追求崇高和永恒导致了中西方古代建筑在选材用料及结构上一系列的不同。

早期的希腊神殿用木和砖建造，其长方形式、圆形柱体、人字屋顶都来自迈锡尼。目前最古老的赫拉（Hera）神殿遗址建造于公元前 1000 多年，在 2 世纪时，还残有一根木柱。公元前 660 年，希腊与埃及的贸易迅速发展后，木建已被石灰石取代，在公元前 580 年，大理石开始用于装饰。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古典希腊的神殿已全部用大理石建造，样式仍保留木制建筑形态。

希腊建筑的特征是神庙，它的建筑原则是立柱加横梁。由于当时祭祀仪式是在庙外的祭坛举行，神庙的内部结构并不复杂。希腊人历史上一共只有 4 种基本的样式，即：1. 由正殿和前殿构成的简单神庙；2. 正、背面有门廊的神庙；3. 有绕柱式柱列（环绕神庙的系列圆柱，即是绕柱式柱列 Peristyle）的神庙；4. 双排绕柱式柱列的神庙。绕柱这种形式使神庙看起来四面一样，同时对柱子和山墙的美化设计使之与户外的仪式活动相得益彰。希腊人一共有称为多里克（Doric）或多里斯、伊奥利亚和科林斯的 3 种柱式（Orders）。

多里克柱式由基座、柱身、柱头、檐 4 部分组成。特点是整柱下粗上细，柱长与径之比为 4 至 6 倍，不用柱石。柱头圆形，风格简单浑厚。伊奥利亚式较前者细长（柱长与径比为 8 至 10 倍），不同之处在于有柱础。柱头向两边卷成涡旋式，它本是赫梯、亚述等建筑的饰



图一 希腊建筑的三种典型柱式

物，在爱琴海东部、希腊阿提卡半岛的城邦流行，与前者比，显示出伊奥利亚人的柔顺、优雅。这两种柱式后来都对罗马的建筑式样产生影响。公元前430年，伊奥利亚的凯利马科斯（Callimachus）在科林斯的神庙柱头上首先加上莨苕叶（acanthus）的装饰，成为所谓科林斯式。它在古典时代并不流行，在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代才达到鼎盛。（图一）

希腊典型的建筑有雅典娜（亦称帕特农神庙）神庙、宙斯神庙等。雅典娜神庙屡建屡毁，现存者为公元前447年修建，当时耗资700塔兰特（约420万美元）。

它呈长方形，用大理石砌成，四周有双排绕柱式柱列，屋顶覆以彩色瓦。它坐落于雅典卫城的最高处，可以从各种角度感受到它的宏伟壮观。其最主要的成就是体现了当时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一是建筑体现了希腊人对和谐的追求，其神庙的设计包含了无数个黄金分割的长方形；二是采用了视差纠正法，对不同部位的列柱、神庙台基水平线等都做了数学校正，使之在视觉上和谐。古典后期最好的建筑是埃皮得洛斯（Epidaurus）的剧场，它建于公元前 350 年，考古发现的半圆形的观众席直径约 113 米，可容纳 1.4 万多名观众。其中在技术上有创新的是在观众区每隔一个距离安置一个铜瓮，以利用共鸣改善音响的效果。表演区则修建了乐池，反映出后期的建筑注重功能，这在中国建筑中是难以见到的。楚人在地宫奏乐或许与之相似。

②罗马文化的城市与建筑

罗马是一个曾被掩埋过的城市。16 世纪法国的蒙田在罗马就感慨自己“在屋脊上行走”。^① 罗马人似乎有在房屋上建房屋的习惯，也就是说喜欢破坏原建筑后重新再建。图拉真皇帝的浴场建在尼禄皇帝的“金屋”废墟上；戴克里先的浴场则建在神庙等建筑上。这种习惯为文化复兴后期考古学家、教皇、君主们大规模的发掘罗马，使罗马的古代城市与建筑重见天日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使今天的人们对罗马城市和建筑的了解要远远超过了希腊。

罗马的城市与建筑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在

^① Claude Moatti：《罗马考古》，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年，第 14 页。



公元前 2000 年，中欧人入侵意大利北部，传入将村庄建筑在水中木桩上的技术，后发展到陆地上，并在四周挖掘壕沟，成为罗马军营和中世纪城堡的先驱。当伊特拉斯坎人统治罗马后，他们不用泥、草的混合材料筑成村庄而采用烧硬的砖和石头筑房，并有按几何学规划的街道和围墙。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将希腊的建筑形式和巴比伦的拱门技术一起带到了罗马，使之由一个土墙的村庄联合体变成一个石砌的城市。

公元前 390 年，高卢人烧毁罗马城后，各种描述罗马建城的故事演变成由母狼带大的罗慕洛兄弟在公元前 753 年 4 月 21 日建立了罗马。考古发现罗马起源于拉丁人并在台伯河滩地与伊特拉斯坎人进行贸易。这块地方是个多山丘的小平原，面积约 1500 平方公里，其中罗马临台伯河离海岸有 32 公里多的距离，在河左岸有一条盐道（Via Salaria）通向内地。在滩地附近的山丘上的拉丁人、萨宾人、伊特拉斯坎人最初只有公社组织，即“方形罗马”阶段。贸易发展和人口增长使之向外山移居，形成 7 个主要的居民点，即“七丘同盟”。在公元前 7 世纪前后，分成 4 个区的罗马代替了按血缘划分的“七丘同盟”。在公元前 6 世纪图里乌斯当政时期，罗马开始有了城墙。

罗马是一个不断翻建的城市，早期只有 2 个主要的十字街将其分为几个区域。每一区各有行政长官和守护神，这与希腊以神庙为中心、楚国以王宫为重点的城市布局不一样。在公元前 189 年，罗马人口有 110 万，其中 27 万住在城内。城市布局分成台伯河东岸的商业区，在卡皮托兰丘（Capitoline）和阿庇安丘（Appian）之间的宫殿、庙宇区以及城北部的马戏场、校场、浴场公

共场所。罗马城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城中心广场周围除有大量庙宇、市场外，还有许多居民建筑，有的楼层高达 7 层，反映出罗马人口居住拥挤的状况。在公元前 378 年，扩建时罗马南北长 6200 米，东西宽约 3500 米。到公元 270—275 年，罗马城较共和时期又扩大了两倍，用混凝土新筑的城墙就达 16 公里，城门就有 20 余座。另一座有名的罗马文化古城庞贝原是希腊移民城邦，前 3 世纪为罗马人统治，因公元 79 年维苏威（Vesuvius）火山爆发而被埋葬，它比较清晰地展现了帝国时代罗马城市的风貌。现在已经知道该城长约 2600 米，宽约 1600 米。由一条南北大街与二条东西大街垂直相交，街道之间分成棋盘布局。城西为市政广场、神庙宫殿；城南为剧场、角斗场等公共区。城东南除公共场所还分布店铺、作坊和居民区，较罗马城显得有秩序。吉本说，罗马强盛时，意大利共有城市 1197 座。按罗马作家普林尼开列的韦帕芻皇帝（Vespasian 9 - 79）治下的城市名单，至少有 360 座。而在亚洲，受罗马皇帝统治的城市达 35000 座。所有这些城市通过公共大道与首都连接在一起，^① 其建筑规模与格局与罗马和庞贝城大同小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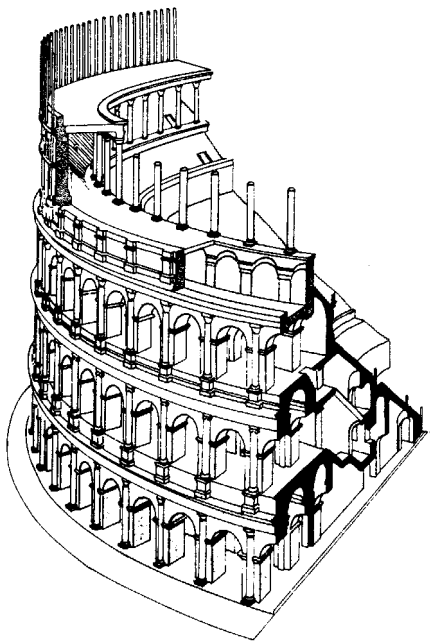
罗马的民宅和公共建筑与希腊略有不同。民宅由农家发展而来，分“四合院”和公寓二类。前者为长方形，由中庭（Atrium）、正房（Tablina）和柱廊（Peristylum）组成。中庭原是取暖做饭场所，祭台也在其中。其天井供采光、排烟，下面有水池供贮、排水，四周为正房。这种结构与希腊结构多样化的住宅比较，拘

^① 《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卷，第 47 - 49 页。



谨严格不变。到希腊化时代，罗马人将希腊的柱廊照搬入住宅中，形成柱廊式中庭与传统中庭的并列结构，这种住宅多为贵族使用。公寓一般砖砌，多为三四层，底层用作商店，就像今天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城市的街面建筑。少数楼房有阳台，个别顶层有拱桥与对街公寓相连。居民一般是贫民，如工人、商贩、屠户等。

罗马的公共建筑以高架输水道、剧场、竞技场和神庙最有特色。虽然伊朗、亚述帝国早就使用输水道，但罗马输水道的使用却构成了罗马文化的特色。在公元前312年，罗马修建了长达16公里的地下水道引入泉水，再用铅管、陶管将水引入住宅，由此罗马贵族开始每周洗澡一次，并有了商业浴室（20世纪70年代史学界曾有研究指出，长期使用铅管供水导致了罗马人的中毒和衰败）。在公元前114前，罗马人修了长88.6公里的马西亚（Marcian）拱券水道。最高的水道达49米，堪称奇观。整个罗马有14条共长达2000公里的渠道，每天将6.6万升的水引入罗马。希腊式的剧场建在山坡上，分成圆形乐池、舞台背景和观众席三部分。罗马人运用拱门、拱顶技术和混凝土可以在平地就建立独立的整体剧场，所以它一般也在城市中心。奥古斯都所建的马塞卢斯（Marcellus 为恺撒女婿之名）剧场的观众席直径130米，有2.5万个座位。他重建的庞培剧场，观众席有1.75万个，设有包厢、舞台上帷幕，还有传音设计和送冷却水、酒、香料的设备。如果将两个剧场合在一起去掉中间的隔墙就是椭圆竞技场了。罗马最有名的圆形竞技场（罗马人称科洛西姆，Colosseum），从韦巴芑时代建造，提图斯（Titus 39 - 81）时完成（公元80年）。它高48.5米，椭圆长188米，宽155米，舞台长



图二 罗马圆形竞技场结构图

87 米，宽 54 米，并用 4.5 米高的围墙防止野兽伤人。整个建筑分 3 层，依次用多里斯、伊奥利亚和科林斯柱式装饰，柱间为拱门设计。它有 80 个入口能在几分钟疏散所有观众。这种巨无霸式的造型的设计思想是要使人感到自身渺小，而在拱形空间中，个人却又显得高大，使罗马公民感到自己成为帝国意义的一部分。然而与恺撒建的容纳 18 万观众的马克姆斯（Maximus）马戏场比较，科洛西姆只能算是中等建筑了。（图二）

罗马的神庙采用了希腊神庙用柱子支持主柱梁、支撑屋顶的楣式结构，与希腊不同的是罗马出现了曲线结构的建筑（用圆拱支撑的神庙屋顶）。在外观上，希腊



神庙一般只有三层台阶，而罗马神庙建于高台之上，突出前门廊，使神庙正面看上去与其他三面不同，希腊神庙四面几乎是一样。圆形的万神庙可以说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建筑，它建于公元 118—125 年间，由柱廊式神庙发展而来。大厅直径 43.5 米不用一根主柱，圆顶高 42.7 米，中央有 9 米的圆形天窗。建造时采用在屋顶木架上沿张力线用砖砌成一个拱形的网，再浇灌水泥形成拱形圆顶，工程计算十分复杂精细。与希腊比较，罗马人采用拱券从力学上解决了物体承重问题。大量使用混凝土则在减轻建筑重量、节省石材和造价上为拱券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这是一大贡献。在继承希腊风格上，罗马把希腊的 3 种柱式加以改造，形成缺乏创意的罗马柱式。但是由于券拱的使用，建筑主柱渐失去承重作用，演变成为装饰的壁柱，并一直影响到今天欧洲的建筑风格。

③ 楚人的城市与建筑

中国城市与希腊城市的起源不同，是由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而不是商贸中心发展而来。考古发现在楚人进入江汉地区之前，当地最早的城属屈家岭文化，目前已知 6 处，其构筑方法都是利用人工河道和天然河道夯土筑成。如湖南澧县城头山城的直径有 310 米，墙底宽 20 米外墙斜角 85° ，城外护城河宽 30—50 米，人工河道部分的挖土被用来夯筑墙垣，该城有 4 门，其中有一座水门，^① 该城人口按推算当在 1700 人左右。当时最大的城是天门石家河城，面积 1 平方公里，人口在

^① 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年，第 216 页。

3000 人左右。在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阶段的石家河文化期，石家河城内发现金属冶炼、社会分工和分层的迹象，但还没有证据显示已出现中央权力。

江汉地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是在黄陂盘龙城发现的商代城址，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城内外人口约 11000 人。^① 它具有中国城市二个基本特征；夯土城墙和宫殿式建筑，它是商王朝为获得湖北大冶铜绿山的铜矿资源而建立的一个军事据点。西周在汉水以东分封了许多诸侯，所建城市多沿交通干线分布，城市构筑特点与新石器的城市并无不同。南方干栏式的建筑群仅在湖北蕲春毛家嘴发现了面积达 20000 平方米的聚邑遗址。有人统计春秋战国时期文献记载和考古证实的楚国城邑 171 座（不包括吴、越等灭国城市，考古遗址春秋 17 座，战国 9 座）。^② 这些城市少数是依照原有方国的旧城加以扩充改造，多数是新建。这些城邑的构筑方法也基本与中原城市相同，均夯土筑城，性质也基本是政治、军事中心，鲜有商贸城市。楚人强盛之后，城市伴随楚人的移民而发展。如公元前 533 年，“楚公子弃疾迁许于夷，实城父”。^③ 公元前 419 年，楚克蚩氏，“裂田以书蚩子而城之”。^④ 楚国的城市不是行政单位如“县”就是军事据点，所以建城也就是瞬间之事，事前已有详尽规划，各种类型城市的形制也基本一样，与希腊千差万

①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第 108 页。

② 高介华等：《楚国的城市与建筑》，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第 170 - 200 页。

③ 《左传·昭公九年》。

④ 《左传·襄公四年》。



别的城邦相比，了无新意。公元前 604 年，楚昭王让由于建立麇城、请子西问城的墙高、厚，由于却不清楚。子西说，你怎么可以不知城的高厚、大小？^① 可见楚人筑城均有定制。这种按规划建城在楚郢都的建设上表现最为突出。

楚人都城名郢，郢都屡迁是中国城市发展中一个特例。楚人进入江汉之初未设有都城。文献记载“若敖、蚡冒至于文王，土不过同（同是百里左右的面积）……犹不城郢”。^② 郢都建于楚文王。目前考古发现可能为楚人早期都城的是当阳季家湖和宜昌楚皇城。二座城址面积均不大，季家湖城为 2.2 平方公里，最下层是石家河文化，其上层就是春秋早期的遗物，它是楚人利用旧城新建的。宜城楚皇城约 3 平方公里，遗物最早为春秋早期，系新筑。两城均在汉水以西。现在被认为是楚郢都的江陵纪南城，规模宏大规整。它东西长 4450 米，南北宽 3588 米，面积约 16 平方公里。有城门 7 座，其中一座为水门。该城采用夯土筑城、南北轴线、严格分开宫殿区、平民区和作坊区的营建手法与中原城市相同，有宫室夹水而居的特点，它于春秋晚期一次建成。其后郢都迁陈、寿春都保持了纪南城的风格。例如寿春古城南北长 6.2 公里、东西宽 4.25 公里，面积 25 平方公里。除城门、城墙的构筑全同于纪南城外，在选址（依山傍水）、布局、建立水门、防护措施等也一如

① 《左传·宣公五年》。

②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纪南城。^① 据估算，纪南城和寿春的人口都在二三十万以上，基本居于城内而不是如希腊那样以村镇环绕城邦主体。维系城市间的纽带不是宗教而是政治权力。

早期楚国建筑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1975 年发掘的纪南城 30 号台基遗址或许可以作为代表。该台基下层为春秋中斯所建，长 34 米，宽 26 米；上层改建，为战国早、中期，长 80 米，宽 54 米，残高 1.2—1.5 米，有墙基、柱洞、散水、排水管、明沟等。基址上有房屋长 63 米、宽 14 米，它分成东西二间。^② 从中可以知道楚人建筑是中国传统的“梁柱式建筑”。从出土的板瓦、筒瓦和散水达 3.4 米之远来看，它可能为重檐悬山式屋顶，其墙体厚达 0.7—1 米亦可见其高大。梁思成指出，中国建筑屋顶出檐的“翼展和屋基崇尚厚阶高台是其建筑魅力所在。”^③ 纪南城之建筑出檐远达 3 米，台阶不过 2 米，这似乎与南方多雨、江陵土质疏松易崩坍不易高筑台阶有关。文献称楚人尚高台，“楚灵王作乾溪之台，立百仞之高”，^④ “楚王夸使者以章华之台。台甚高，三休乃至。”^⑤ 按照南方土质条件和流行干栏式建筑的风气，楚人似乎更应该采用干栏式结构的高台建筑；但是从 1984 年和 1999 年至 2000 年初对湖北潜江龙湾高台遗址的发掘来看，楚人仍采用北方的土筑高

① 刘和惠：《楚文化的东渐》，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第 114—125 页。

② 湖北省博物馆：《纪南城 30 号台基发掘简报》，《楚都纪南城考古资料汇编》，湖北省博物馆刊 1980，55—57 页。

③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第 15 页。

④ 陆贾：《新语·怀虑》。

⑤ 贾谊：《新书·退让》。

台样式。

该遗址面积 520 万平方米。1984 年勘探 200 万，2000 年为 324 万。探明台基 19 座，总面积 20 余万平方米。以放鹰台 1 号宫殿基址为例，它东西长 130 米，南北宽 90 米，面积 900 平方米，是三层台的层台结构。第一层台为黄色夯土，分布东侧门、贝壳路、高台台阶和长廊式柱洞；第二层台基高出第一层 35 厘米，台基上自西向东分布两排柱洞似为廊式建筑；第三层高出第二层 50 厘米，两层均为灰夯土。第三层是“回”字形，四周四廊分布二至三行柱洞，每边设小台阶，中间天井处布满瓦片。在建筑过程中，先在黄夯土台基上筑小夯土台基，同时架设主柱，埋下地梁、夯筑出土台。土台完全由台柱、周边圈梁、纵横地梁交错的木构网络固定，最后护以木板将台柱、台基壁围于护墙内，台基上铺设有三条地下水管。这种三层台的建筑遗址还是首次发现。^①

由于中国城市建筑受环境和文化制约，一是木材充足，缺乏利用石材力学和发明水泥的动力。二是不求建筑长存、顺应自然的观念。因不追求建筑之永恒，建筑和城市也都屡建屡毁，缺乏技术累积和进步。所以楚国的城市建筑很难找到堪与希腊罗马的城市建筑类比的東西，但是从建筑本身美化装饰来看，文献记载楚人宗庙壁画的辉煌程度当也不在帕特农神庙（Parthenon）等西方建筑装饰之下。

^① 《潜江龙湾遗址勘探试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2000 年 2 月 23 日。



楚人、希腊人、罗马人的社会生活与物质文明

交通运输

① 希腊的交通运输

在希腊文明诞生之前，希腊四周已有外族人建立的殖民地。由于爱琴海遍布岛屿，船只无论向何方行驶都不会远离陆地 65 公里以上。加之风向和水流的配合，希腊很容易与非洲、黑海地区交通。地中海少雾，除冬季外，几乎每个港口早晨都有微风将船只送出，晚上将船送回，外来文化容易进入这里，希腊文化也借此成长和传播。柏拉图曾说到，“我们就像一群青蛙围着一个水塘，在这个海岸定居下来。”便利的航行条件使希腊发展出先进的航海技术，所造船只较地中海其他地方更大、更快、更易操纵，水上的交通运输也成了希腊文明的支柱。

考古学家在今天的利比亚和意大利西部发现了迈锡尼时代的陶器，在西西里岛、撒丁岛及意大利中、南部也发现了类似器物，像法国南部、西班牙的利凡特地区（Levant）甚至黑海西岸和东岸都有希腊器物出土。希腊资源贫瘠只能用酒、油、手工艺品交换木材、金属，当时有一条海上“青铜之路”，使希腊人从东方或意大利运回矿石，铸好的青铜器再沿着多瑙河一直运到斯洛伐克的克尔特人（Celts）地区。可以说希腊人的生活是靠进出口贸易维持的。例如阿提卡几乎所有的土地都只是薄薄地覆盖在岩石上，物产十分贫乏；斯巴达虽说是农业城邦但北部多山，道路狭窄，发展远不及沿海的雅典、科林斯等城邦。科林斯是连接伯罗奔尼撒半岛与希腊本土的要冲，位于科林斯湾与沙罗尼克海（Saron-



ic) 之间,它繁荣于迈锡尼时代。公元前 883 年,为改善两海之间的运输,科林斯王伯林德 (Periander 625?—585 BC) 计划开凿一条运河,后来只修建了一条长约 6.5 公里的木质滑道,商船可以利用滚轴在陆上运行。雅典早期只是阿提卡周围的 12 个小城邦之一,在其 25.5 万公顷的土地上,有 1/3 不宜耕种,生产谷物仅够 1/4 人口的需要。它靠内陆贸易生存的话,其运输费用十分昂贵。当时最好的一条通往雅典东北埃利斯 (Eleusis) 城邦的“圣道”也只是一条土路,运输工具靠牛车,虽有骡子运输,效率仍不高;连政府部门的邮政传递都只能靠人腿,重要消息用烽火或信鸽。相比之下,海洋运输既经济又快捷,当时一家人花两个银币就可从雅典坐船到埃及或黑海。

海洋商贸的发达使希腊的造船技术十分发达。早在公元前 2000 年,克里特就造出了有龙骨的船。在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船队的船只类型有快船、空心船、翘首船多种,如维奥蒂亚人 (Boeotian) 的空心船可载士兵 120 人。^① 当时船只主要靠风力航行,商船设计呈圆首与战船有别,速度也较慢。最小级别的海洋商船为 3 帆 30 桨,无风时就靠人力划桨。公元前 700 年,科林斯就出现了三层桨、有 200 人操桨的战船。到公元前 5 世纪,海船装载量已达 250 吨,一次可载 7000 “蒲式耳”(1 蒲式耳约 35.238 升,合 25 万石) 谷物,每小时航行 12.8 公里,成为当时地中海最引人注目的事情。希腊海洋交通运输的发达又促进了海军的建设,在希波战争中 (480—479 BC),希腊船队击败数量远超过自己

^① 《伊利亚特》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第 49 页。

的波斯船队，控制了波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制海权，使希腊船队能自由地进入地中海各个港口，希腊文明也由此进入黄金时代。

② 罗马的交通运输

在布匿战争（Punic Wars 264 BC）前，罗马还是一个农村城市，永远淤塞的台伯河使罗马与外界的沟通主要靠陆路，但是糟糕的路面、不完全的桥梁和牛车这种缓慢的交通工具使陆路运输的成本高昂。自从罗马统一意大利中西部的拉丁姆地区和部分沿海城市之后，罗马开始向商业城市发展，但它与商业发达的迦太基发生了冲突。布匿战争前，罗马在地中海的贸易微不足道，到公元前 282 年，它的船只才第一次出现在意大利东南海面上。布匿战争爆发后，有了迦太基船只的样品，罗马人才造出了可载 500 人的五层桨战船，并发明了一种不靠撞船（这需要高明的控船技术）而靠送突击队登敌船的名叫“乌鸦”的吊桥。海战的结果改变了罗马的命运，罗马开始走向世界大国的舞台。

在迦太基控制西地中海、大希腊各地君主控制东地中海时，商人很少来意大利。海上运输多为小帆船，每小时只能航行 9.6 公里。台伯河口的淤塞封住了罗马的港口，加上水流湍急，船只溯河而上到罗马的成本高于赢利。在公元前 200 年后，到罗马的货物皆由陆运。因此罗马的运输主要靠 3 条“执政官大道”。（Consular roads）第一条维拉提纳（Vialatina）于公元前 370 年修建，长达 536 公里，把意大利东西海岸连结起来，它有助于意大利形成统一国家，这一点与希腊不同，倒类似于我国秦朝所修驰道。第二条弗莱明尼（Flaminian）修建于公元前 222 年，同时也开始修筑维莱里亚（Va-

lerian) 路,以后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交通公路网。它不仅运输商品,也为帝国调动军队、传递情报、传播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罗马共和和帝国时期,意大利本土有 372 条主要道路,共有 2 万公里高质量路面的道路,这些道路路基由沙子、碎石和三合土铺成,上面覆以石块,十分坚固。安东尼 (Antony 82—30 BC) 时代已达 8.2 万公里的铺设公路,此外,里昂、巴黎、奥格斯堡等欧洲城市都有公路相通。执政官大道按英里竖有界石,至今仍有 4000 个界石残存,每隔 10 英里有一个驿站,驿站有 40 匹马备用,每 30 英里有一客栈小镇,旅途服务设施良好。陆上交通的发达使运输工具也有改进,帝国时代的马车每天可行 60 英里。有一次恺撒乘车 8 天,走了 800 英里。在提比略 (Tiberius 42 BC - AD 37) 时代,邮车一天可走 100 英里。罗马的邮政系统是仿波斯建立,但发达的公路系统也刺激了私人邮政的出现。罗马的邮政比铁路修筑以前的任何时代都有效率。公元前 54 年恺撒的信件从英国送到罗马的西塞罗手中只需 29 天。

罗马称霸地中海后,利用原有海洋商路扩大势力范围,行省之间,罗马与东方、印度、中国都有商贸往业。罗马本身也成为巨大的消费城市,图拉真时代 (Trajan 98—117) 对台伯河奥斯提亚 (Ostia) 港口的治理使之成为仅次于亚历山大港口的货栈城市,大型船舶也开始驶入。在北方,这时已与爱尔兰有联系。有 2 条主要的道路一是经莱茵河进入法国,一是经多瑙河到波罗的海沿岸,它们把北欧、地中海和东方商路联结起来。在东方,罗马帝国经过宙格马 (Zeugma) 和尼西



比斯 (Nisibis) (两者均在安纳托尼亚东部) 形成 2 条主要商路：一条走俄国中亚的麦尔夫 (Merv)；一条走阿富汗的巴尔赫 (Balkh)，在塔里木与中国商队汇合。在南方，罗马和波斯湾的商队为罗马公民所有，南方的佩特拉城 (Petra) 成为红海与波斯湾联接的重要都会，尤其是对印度的海上交通已十分便利。公元 50 年希腊海员希帕鲁斯 (Hippatus) 发现季风后，500 吨以上的罗马船只从埃及出发 40 天就可到达印度诸港。^① 罗马帝国时代的船只也有长足进步，一般船只载重都有 250 吨，个别可达 1000 吨。有的船只载客多达 600 名，据罗马作家约瑟夫斯 (Josephus) 记载，甚至有载人 1500 名、载物 9.3 万蒲式耳粮食的货船。^② 这或许有些夸张。但却反映出海船的进步。当时船速每小时 6 海里，快船在 24 小时内能走 230 海里，顺风时，只需 6 天就可以从西西里到亚历山大。在大西洋沿岸、波斯湾和印度洋，罗马的商船川流不息运送大量消费品满足罗马的需要，而费用并不太贵，如从雅典到亚历山大只要 2 个罗马银币约 10 元人民币，而把 100 公斤谷物运过地中海比在陆地运 110 公斤还要便宜。交通运输的发达为罗马持续 400 年的繁荣提供了保障。

③ 楚人的交通运输

张光直指出，在公元前 4000 年这段时间左右，中国大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由独立性的区域“相互构成了一个共同的交互作用圈 (Common sphere of interac-

①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欧亚的商业和文化联系”《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 1985 年，第 70 页。

② 威尔·杜兰：《恺撒与基督》上卷，第 423 页。

tion)。”^① 这个“交互作用圈”的意思就是各个独立区域间有交通网络存在，使文化呈一致面貌。典型的例子就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玉石贸易将红山文化的玉器、或者良渚文化的玉器、或者是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向四处传播。

在楚国形成之前，江汉地区的东、西交通是经由长江和汉水。南、北交通是二条陆路：一是从南阳盆地沿唐、白河走襄邓大道；一是经随、枣走廊，沿淦水，二条路均可达江汉平原腹地。在新石器时代，中原仰韶文化经陆路、山东龙山文化沿水路影响江汉地区；同时，石家河文化也对广东、文西的原始文化产生过影响。

楚国兴起之后，在原有交通上，陆路形成 2 条干线。两条干线又分 2 支：一是司马迁所称的传统“夏路”。它经南阳至鲁山县，沿汝水抵洛阳，汉晋后称之为“三鸦路”，即今之焦支线。它险峻快捷，曾是庄王问鼎周室之路。二是东边的楚—郑—晋大道。它出方城经郑国国都新郑，转荥阳、过黄河抵晋。因地势平坦，多为征战、朝聘所用。东干线则出淮水北岸，利用陈、蔡、郑国间故道，基本沿贾鲁河经临颖、鄢陵、尉氏至郑国。^② 其后楚人东下，南北交通则向东又增加线路。其水路交通则有汉水、长江和往南方的湘、资、沅、澧诸水路。从 1957 年在安徽寿县发现的“鄂君启节”来看，楚地水路基本上多用于商贸往来，它有以长江中下



① 张光直：“Ancient China and its Archaeological significance” Archaeological thought in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57.

② 陈伟：《楚东国地理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第 212—217 页。

游为主的东线；以湘江为主的南线和利用长江、汉水支流、湖汉由鄂至郢都的西线。陆路交通也有与秦联系的西北线；与三晋联系的北线；与齐、鲁、宋联系的东北线和与吴、越联系的东线。

考古发现中，常可见到楚人的车，但未见船，可能由于遗物沉于水下，不易寻找。楚车多系战车，形制与中原无异，战车比中原多了装甲防护和插兵器的装置。用于装载的车辆没有确切载重数据，从文献记载看，一车的运量大约在 1000 公斤；而从“鄂君启节”得知，船的载重量要远超过此数，达到 18 吨。但与希腊的海船比较，吨位仍然较小。^①

从“鄂君启节”中还可以看出楚国地处水乡泽国，因舟楫之利，其水路运输远重于陆路运输。陆路运输除了成本高之外，与楚国不重视陆路建设也有关。仅从在纪南城西垣北门发现的惟一条楚国道路来看，该路面为黑灰土，仅宽 8 米，不能与罗马帝国几百条高质量道路相比，也不及秦始皇所修建达 50 步（约 17 米）的驰道。^②

这种水路经济、陆路艰难的自然条件，在军事上也决定了楚人北进呈仰攻之势而不能取郑魏，东侵有顺势之利所以克吴越。相反，秦楚争霸中，秦人统一天下仅“形胜”这一条就占了节省统一之军事成本的大便宜。

① 《楚文化的东渐》，第 138 页。

② 刘彬徽：《楚都纪南城西垣北边门的发掘》，《楚都纪南城考古资料汇编》，第 25 页。



商 业

① 希腊的商业

希腊地势加上岛链的总体走向是朝东南，乘船不需罗盘也可以安全到达埃及和小亚细亚，这是希腊文化中商业发达的自然优势。但是，希腊也是个多样化的地区，地中海地形和亚高山地形交错，有的相隔不过几英里，居于山地和内陆的农民根本就不知道海洋贸易，直到今天人们在希腊中部伯罗奔尼撒平原仍可看到当地维持传统的生产运输方式。所谓的希腊商业也只是指爱琴海和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希腊城邦的状况。

爱琴文明的兴起是与大规模殖民运动密切相关的。殖民运动的首要目的是土地而不是商业贸易，但它却大大刺激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希腊各地土地资源匮乏，人口增长和大地产兼并小土地的历史惯性使家庭小土地划分很快达到临界点，不能进行有效的种植，因而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就成为希腊殖民运动的动力。希腊“殖民地（Apoikia）”一词的字面意义是“远处的家”，它不是母邦的扩展，而完全是个独立的机体。在克里特、迈锡尼、亚该亚（即荷马所称的英雄时代的希腊人）、多里安文化相继影响希腊时，这种殖民或移民都未间断，以致它们对原有文化破坏的同时却又扩大了希腊与外部世界的商贸往来。到古典时代，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商业贸易已成为它们社会经济的重要支柱。这是与罗马文化和楚文化完全不同的特点。

在克里特文化时期，克里特岛的货物和艺术品在基克拉迪群岛、塞浦路斯、巴勒斯坦、意大利和西班牙都

有发现。岛上也发现外来商品如埃及的石瓶、甲虫形印章、牙雕及岛上的同类仿制品。克里特人还没有货币，他们用重达 29 公斤的铜块当钱使用。铜块做成牛皮状，显示出在早期交易中牲畜是交换单位。岛上发现有石制和铜制的砝码，上面刻有动、植物的纹样，说明已有完整的度量衡制度。当时大宗贸易主要集中在原料上，如克里特输出亚麻给埃及以换取木材。在迈锡尼文化时期，希腊大陆经济要远远落后于克里特。其城市兴建于内陆与海岸保持一定距离，以防海盗袭击，同时大陆居民也从事海盗活动，这后来却成为迈锡尼商业的起点。当海盗使双方贫穷化后，迈锡尼人逐渐从中发展出了合法贸易。公元前 1400 年左右，迈锡尼的海上船队已能与克里特抗衡，直接与埃及等地做生意。其市场东到塞浦路斯、叙利亚，西至西班牙，北及多瑙河。但在特洛伊，迈锡尼都受到了阻碍。有一种推测是特洛伊控制了达达尼尔海峡通道，并征收大量过境税，由此引发长达 10 年的特洛伊战争，而海伦的美貌仅仅是战争的一个次要诱因。

按照荷马的说法，迈锡尼人和发动特洛伊战争的亚该亚人均为希腊土著。现代的研究知道，亚该亚人是在公元前 1400 年后才定居迈锡尼，习俗与迈锡尼人不大一样。^① 考古发现亚该亚人的商业活动范围更大，法国南部、黑海和高加索南部均有亚该亚人的物品出土。在《奥德赛》等希腊作品中，希腊英雄们四海航行的神话多少也是这种商业活动的写照。到公元前 12 世纪，多里安人征服希腊后出现了二三百年的黑暗期，直到希腊

① 基托：《希腊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第 22 页。



城邦制度出现后，希腊商业才开始了新的繁荣期。

在古典和大希腊时代，商业贸易成为以雅典为代表的多数希腊城邦的经济基础。除了商业航路扩大之外，其货币制度、银行体系、市场规则等一系列相关部分都得到充分发展，每一个大的城邦都有自己的货币及度量衡制度。货币一般由金银混合铸造，它最早在公元前7世纪的小亚细亚出现，到公元前6世纪纯银货币已十分完美，纯金铸币在公元前4世纪前尚不普遍。由于各个城邦都有铸币，商业兑换中含金较少的铸币容易受到抵制，一些商人往往被迫运回商品以免受损失。希腊发现最早的货币是由阿尔戈斯（Argos）的执政官费登（Pheidon c. 7 BC）发行的。雅典自梭伦（Solon 594 BC 任执政官从事改革）改革后发行纯银的猫头鹰货币（440 BC），并保持货币坚挺。一时之间，整个地中海地区都将这种铸有雅典娜头像、猫头鹰头像的银币当作国际硬通货使用。

雅典货币体系包括铜、铁或青铜铸币（奥勃 Obel）、银币和金币。8个铜币换1个奥勃、6个奥勃换1个银币、2个银币换1个金币。1000个银币等于1米那（mina），6米那等于1塔兰特（talant）。在公元前5世纪，1个银币相当于1美元，可买到1蒲式耳（1蒲式耳合35.28升）的谷物（1938年的美金价值）。

当时希腊中部的德尔菲（Delphi）城的阿波罗神殿是希腊庙宇存款最多的地方（希腊人喜欢把金钱放在神庙中作为对神的奉献），起了希腊的国际银行作用，它将贵族存放庙宇金库的钱按普通利率贷给私人或政府，柜台兑款人也出现了。公元前5世纪，贷给私人的利率为12%—30%，直到希腊古典时代的终结。这类

柜台兑款人变成了银行家并影响到了罗马。希波战争后不久，雅典领袖地米斯托克利斯（Themistocles？—462 BC）就把 70 塔兰特（约合 42 万美元）存放在科林斯的银行家手中。银行及私人银行家的出现加快了货币的流通，更进一步刺激了希腊商业的发展。相比之下，楚国的商业远没有达到这一步，更不用说有希腊那样的银行制度对后世商品经济起到积极影响了。

公元前 5 世纪是希腊雅典海上霸权的全盛期，海盗基本绝迹，国际商贸发展速度比国内要快得多。雅典的皮里尤斯港（Peireaus）建立起完善的贸易设施，成为东西贸易的转运中心。当时在雅典可以买到世界各地的东西，如拜占庭、叙利亚、埃及的谷物，腓尼基、意大利的肉类、水果，黑海的鱼，塞浦路斯的铜，英格兰的锡，色雷斯的黄金，近东的刺绣和阿拉伯的香料等。按照公元前 431 年雅典对进出口货物征收 4% 的关税约 1200 塔兰特估计，当时爱琴海地区每年的贸易总数达到 31.44 亿美元。这种商业繁荣给雅典也带来了潜在危机，它一方面将更多的人口转入到手工业和商业领域，另一方面使农业萎缩、粮食完全依靠进口。为保证海上运输的畅通，雅典与其他城邦结成海上同盟（提洛同盟 Delos），当它与斯巴达的利益发生冲突后，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 405 年，斯巴达在赫勒斯庞海峡（Hellespont）击败雅典海军后，雅典供应中断只得投降，整个希腊世界的繁荣期也就此完结了。

② 罗马的商业

罗马最初的商业只是一种集市贸易，每 8 天^①在城

① 罗马共和时代，一周 8 天，帝国时代才采用东方的一周 7 天。



市广场举办一次集市日（纽丁尼 *nundinae*），这种集市日后移至台伯河岸。在共和时代后期，罗马商人开始在巴尔干、小亚细亚、高卢及各行省出现。当时罗马政府没有专门管理财政的机构，政府税收包给商人，这一做法刺激了罗马商人资本的膨胀，由之发展了高利贷业。当时大希腊和腓尼基分别控制东、西地中海，罗马的经济实力尚无法与之抗衡，因此商业的特点是入超，负责包收税的商人将从各地征收的直接税（什一税）向政府缴纳，有时是实物需要在市场上变现之后缴纳。入超带来的资金缺口要靠输入贵金属补偿，有些时候是靠降低货币成色来补偿。商人们从这种包税活动中发展出了许多纯银行的业务，如贷款、存款、过户等，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兴起。

在罗马帝国时代，罗马已完全控制了地中海的各商业通道。行省道路的改进、交通安全的增强，使罗马与行省之间、行省与行省之间的商业大为发展。除帝国内部贸易繁荣外，帝国与外部世界的商业往来更为密切，世界各地的货物几乎都可以在罗马买到。波斯的珠宝、摩洛哥的皮料、印度的香料及奢侈品以及中国的丝绸都是罗马大宗的进口货物，仅埃及一个港口每年就有 120 条船驶往印度和斯里兰卡。据老普利尼（C. Plinius 23 - 79）在《自然史》中的数据，罗马每年与印度购买的商品在 5500 万塞斯特提乌斯（Sestertius），这些商品在罗马的价格比在印度贵 100 倍，考古发现在印度东西两岸 79 个地点出土的罗马钱币多达 8455 枚。罗马与外国输入商品的价格估计在 1 亿塞斯特提乌斯。

罗马和中国的交往见于《后汉书·西域传》和帝永和九年（公元 97 年）。在桓帝延熹九年（公元 166

年），大秦王安敦（马可·奥里略 Marcus Aurelius 皇帝 161 - 180 在位）遣使与中国通商，但在中国很少发现罗马帝国与中国直接交往的商业证据。大秦可能为希腊，而罗马与中国通商的证据多不可靠，即便有往来也可能通过印度进行。^①

帝国时代的商业繁荣，使商人成份也有所变化。在大资本家中除了元老院的元老之外，骑士（equites）也开始经商。公元前 218 年克劳狄乌斯法颁布后，它禁止元老经商，商业权力开始向骑士阶层转移，骑士由军人变为一种社会等级身份。此外更多地是平民和获释奴隶也加入到商人队伍中来。罗马权力最大者往往也成为大资本家，他们靠商业活动牟利，^② 这是与楚国和希腊社会完全不同的。例如奥古斯都在内战中积累了大量私产并用来放贷，当他成为最高执政官后也不可能将私产与公产分开。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十分贪婪的克拉苏（Crassus 112 - 53 BC）最初不过有 300 塔兰特，后来增加到 7100 塔兰特。^③ 这些有权力的寡头为了防止元老院的阴谋采用保护工商业提出等级划分按财产的办法，凡有 100 万（一说 40 万）塔兰特的人就成为第二阶级，结果这一阶层多数为骑士和平民，他们的资产比第一阶级的贵族财产多 9 倍。这样由军事寡头联合平民阶层追逐商业利益使罗马的贵族政治走向了衰落。

罗马早期商品交换采用实物货币形式用牛和绵羊，

① 邢义田：《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再检讨》，《汉学研究》中华民国八十六年，第 15 卷第 1 期。

② M.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第 85 页。

③ 《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卷，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第 578 页。



拉丁语 Pecunia（钱）一字即从 Pecus（牲畜）转化而来。1 头牛等于 10 头羊，这种交易方式持续到公元前 4 世纪。约在公元前 330 年，才用加工的青铜块作货币，价值单位为“as”，使用时必须称量。这与楚国的郢爰是一样的。在《十二铜表法》中，有关罚金是按青铜若干来计算的。如第二表审判条例中的第一条规定：诉讼款额在 1000 阿司或以上者，向（教长金库）缴诉讼保证金 500 阿司。^① 青铜货币的比值是一头牛相当于 100 阿司。公元前 338 年，政府发行刻有牛、羊、猪图案的铜币即“Pecunia”。当时 1 阿司约为 1 磅铜（0.3359 公斤），由于布匿战争，遂逐渐减少了阿司的重量，以弥补公债，直到减少到最初的 1/12。这样青铜块变成价值符号，完成了向货币的转变。公元前 268 年，罗马有了自己的银币戴纳里乌斯（denarius）直译为“10 个阿司”。其后通行的塞斯特提乌斯特价值为 2 又 1/2 阿司。公元前 217 年，罗马铸造金币，币值为 20、40、60 塞斯特提乌斯。按照尼禄皇帝以前的物价水平，1 阿司约等于 6 美分，1 塞斯特提乌斯为 15 美分，1 戴纳里乌斯为 60 美分。但因当时贵金属少，其实际购买力要大得多。

罗马和希腊一样都以寺庙存放财富，由此古老的放贷行业中发展出了银行业，出现了金融高利贷资本。在《十二铜表法》中，禁止年息高于 8.33%。在公元前 347 年，降到 5%。到前 342 年，竟降为零。但共和时代高利贷的平均利息为 12%，高者达到 48%，甚至更

^① 《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商务印书馆 1974 年，第 333 页。

高。普鲁塔克指责克拉苏剧增的财富有很大部分是靠高利贷获得的。高利贷金融资本的存在促进了罗马包税者组织的发展，一般情况下，由几个包税人（多为骑士阶层）组成商号筹措资金以联合对付贷款风险。参加者按股份（prates）获利，他们出售股票和公债，公众也靠买卖它获利。到共和末期，高利贷渐衰落。

罗马商业的繁荣对资本需求增大，罗马采用货币贬值的办法（如塞斯特提乌斯不用银而用青铜铸造）来抑制高利贷资本以刺激商业的快速增长，商业资本的流动对资金管理技术的需求也促进了罗马银行汇兑业的发展。罗马兑换人（“argentarius”一词由 argentum “银”转化而来）早先为希腊人，后来多为释奴或外国人。其最初的活动是按成色兑换各种货币，后衍生出存、贷款、异地支付、汇兑等纯银行业务。在帝国的繁盛时期，罗马城内甚至出现专门的银行区；在里昂、拜占庭、迦太基、科林斯等地，罗马银行也普遍存在。这些外省的银行权力十分大，往往充当城市代理人，参与发行和分配地方货币，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罗马造币厂不能满足帝国对零钱日益增长的需要。^① 它说明当时商业繁荣，帝国的银行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这一点来看，罗马比楚国的商业要发达。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迦太基发行了类似纸币的皮币（楚国似乎也有类似的皮币、帛币，其根据尚待证明），上面印有符号，罗马的各种代币却没能迈出这一步，仍用金属为代币。

③楚人的商业

楚地幅员广大，《史记·货殖列传》将楚分为西、

^① 《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卷，第263页。



东、南三部分。西楚“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东楚“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西楚“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未练之铅），锡、……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帛）瑁、果、布三凑”。这些基本就是楚人做商业贸易的本钱，其中最主要的出口货物是青铜原料和黄金。楚怀王曾说：“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①齐管仲则说：“楚有汝汉之黄金，齐有渠展之盐……使夷吾（管子字夷吾）得居楚之黄金，吾能令农母耕而食，女母织而衣。”^②考古发现先秦时期中国的铜矿开采遗址集中在湖北大冶铜绿山到安徽铜陵一线，安阳殷墟所用之铜多半来自这里。楚国兴起之后，资源垄断的优势使之成为商业大国。

在楚国兴起之前，江汉地区就是中国南北长途贸易网络中的一环。楚国控制南方之后，楚国物品也沿原有贸易路线交通中原各国，甚至远达海外。在北方阿尔泰地区的墓葬出土过楚式铜镜和丝绸已为人所熟知，就很可能是经过了中原的转口贸易。1980年代初，英国考古学家皮尔迪奇等（J. Pilditch）在泰国著名班清文化（Ban Chiang）的班奈迪（Ban Na Di，位于泰国东北部的 Sakon Nakhon [色军] 盆地。班奈迪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800至公元前400年）遗址，发现青铜器上有丝织品覆盖。稍后在越南东山文化的拉克特翁遗址（Lach Truong，今越南马江入海口的河忠附近，时代约为公元

① 《战国策·楚策三》。

② 《管子·轻重甲》。

初年) 汉、越墓地中已发现丝织物和漆器遗迹。^① 这些遗物可能是楚国商贩与他国直接贸易的结果, 直到汉代这条贸易线路都不曾中断。

楚国的物产特点似乎决定了楚人贸易以出口原材料为主, 以进口生产、生活必须品如马、牛、羊等为辅。大宗原材料的出口需要由政府官商来操作, 鄂君启节就反映出了楚人在商业上的两个特点, 一是官商, 如鄂君启 (本为封君) 可以操控 100 艘船、150 辆车以下的长途贩运, 但从事军需物质如金属、皮革、箭和箭杆原料的贸易仍有限制, 当然走私的情况是肯定存在的。二是政府控制关税机构, 而不像罗马将税收包给商人, 当然官商有免税的特权。民间一般小贩无官府之权势只靠经商技巧牟利。这可能也是司马迁所说楚地商贩长于经商的一个原因 (“南楚好辞, 巧说少信”)。

楚人的货币有 2 类, 一类是普遍使用的青铜铸币蚁鼻钱, 它类似海贝, 表面有符号像人脸, 俗称 “鬼脸钱”, 重量在 0.5 克左右。另外有 2 种布币, 一种可换 10 枚, 另一种可换 4 枚蚁鼻钱, 两种数量都非常少。还有一类是金币, 有版状和圆饼状, 表面有 “郢爰 (读称, 有称量意)”、“陈爰” 等字样, 个别背面有 ||、| | |、×、⊥、⊥、+ 等记数符号。发现郢爰最多的一次是 1986 年 2 月, 在安徽寿县共出土了 38 块, 总重量为 1055 克。迄今已发现金币重量在 45000 克左右。^② 个别地方也偶有银郢爰发现。它们的使用可能只限于政

① Charles Higham : The Archaeology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95.

② 《楚文化的东渐》, 第 150—160 页。



府的官商。

郢爰是称量货币，使用时需要切割称重，因此小额交易时不方便。尽管楚地有完备的度量衡体系可以解决小额黄金的交易，如根据湖南、湖北出土的砝码重量推算楚人度量单位是斤、两、铢。24 铢（约 0.6 克）为 1 两，16 两为 1 斤。但最小块的郢爰重量都在 5 克以上，实际操作中如此小额的度量单位对用黄金交易而言意义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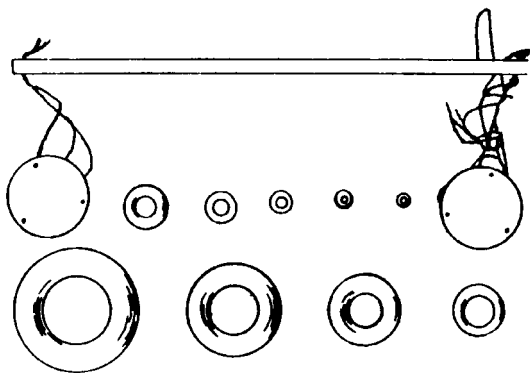
从包山楚简第 103 至 119 简的文书记录来看，政府机构的大宗交易和鄂君启节那样的官商才使用黄金为交易单位。例如包山楚简中第 114 简“册莫敖疥、州司马庚为册贷（汜）异之黄金七益余种”。^①“（汜）异”是楚政府的救荒机构，州府官员向之贷款以购种子救荒。^②这组简共记官府贷黄金 94 益 4 两，非民间所能为。它显示出楚国中央政府控制着黄金货币的发行，与罗马类似，而不像希腊有民间的银行和贷款机构。

目前还不清楚的是楚人的币值究竟是多少，郢爰与蚁鼻钱之间也没有发现兑换比值。《汉书·食货志》载魏李悝的言论说，春秋战国时魏国百姓用 30 石粟，为（值）钱 1350。当时的一石折合今天为 19.37 石，30 石共 5.811 今石。若按今天粟、稻米价格 1.5 元人民币 1 斤计算，约需 871.65 元，差不多是 100 美金。魏国 135 钱约可兑换 1 美元。魏国用布币，以 1 枚布币当 10 枚

^① 湖北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第 356 页。

^② 刘信芳：《〈包山楚简〉职官与官府通考》，《故宫学术季刊》，中华民国八十七年第十五卷，第二期，第 156—157 页。

蚁鼻钱计算，也就是 1350 个蚁鼻钱约合 1 美元。这种推算不可靠，只可参考。



图三 湖南长沙左公山楚墓出土的天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湖南 2000 座墓葬中出土天平、砝码的有 99 座墓。^① 江陵九店 597 座墓葬中出土天平、砝码的有 11 座墓。^② 而湖南又出土过铜方币，上面划分出 16 格，每格铸有“一两”字样，郭沫若认为这就是“金若千斤”中的一斤。^③ 它和其他铜币之间会有很方便的换算。因此众多的天平砝码出土恐怕另有用途，如称珠宝、料珠一类。而称药品、麻醉剂一类亦无不可。珠、玉古代称为上市，因无规范重量故可称之。

① 高至喜：《湖南楚墓中出土的天平和砝码》，《考古》，1972 年，第 4 期。

② 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第 254 页。

③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1973 年版，第 53 页。



农业

①希腊的农业

公元前 6000 年小亚细亚的移民给希腊带来新石器时代的耕种技术。在后米诺斯文化（约公元前 16 世纪），克里特岛的居民已知道犁耕，农作物有小麦、大麦、大豆、橄榄和葡萄等。迈锡尼文化中的农业状况目前也不太清楚，但通过在迈锡尼派罗斯（Pylos）发现的泥板文书^①可以略知一二。现在学术界认为，迈锡尼的农业水平不高，其社会结构仍是一个部落制国家，而不是奴隶制国家。国家分为若干省，下辖村社，地方行政长官巴西罗斯（Basileus）就是村长。国王拥有最多土地，贵族有俸田，另有公共祭田，这些土地均可出佃。在线形文字 B 有关土地分配、人数口粮记录中可以看到迈锡尼农作物以小（大）麦为主，土地的计算以麦籽为单位。1 单位约 120 公升，合土地 2.4 公顷。以养活人口计，可供 1 又 2/3 人一年的生活，而每户占地往往不到 1 个单位，还需要靠其他方式谋生。例如文书中记载某贵族有私地 240 公升麦籽，佃给 4 户。1 位神婢最高为 32 升，1 位国王工匠最低只有 2 升。在有关祭献的文书中，物品有面粉、酒、干酪、油、蜜、枣树、牛、羊等畜牧副业产品。

在荷马时代，亚该亚人的农业水准比迈锡尼有了很大进步。首先它表现在生产工具上。《伊利亚特》中提

^① 即线形文字 B，1953 年由英国学者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 1922—1956）释读成功。

到的生产工具有犁、鹤嘴锄、镰刀、铲等，尤其是开始使用了铁器（前 11 世纪）。铁器的普遍使用虽说还在 200 年后，尽管这样它比楚国使用铁器的历史要早得多，这与更早使用铁器的赫梯人的（公元前 20 世纪）文化影响或许有关（在荷马的文诗中，青铜工具仍是主要的）。其次是耕作方式进步。如使用双牛牵引犁具深耕；农田有再耕、三耕；施肥、灌溉技术都已流行。如《伊利亚特》第 18 卷描写“阿基琉斯之盾”中写道，“肥美宽阔的土地，在作第三次耕耘，许多农人在地里赶着耕牛不断来回往返地耕地”。^① 到希腊城邦的形成时期（公元前 8—公元前 6 世纪），平原地带已基本开垦完毕，坡地上也种上果木。考古发现这时的农具多用铁制，犁具已变成复合结构，更利于深耕。从赫西俄德（Hesiod c. 9 BC）《工作与时日》（又名《田功农时》）的教谕诗中可以看到，希腊农村注重农时，休耕养地，采用了一系列提高粮食产量的办法。赫西俄德写道，“耕作的季节一到，你要和奴仆们一样不分晴雨抓紧时间抢耕抢种。每天清晨你自己就下地干活，只有这样，人手才能到齐。你的田地才有可能适时耕种完毕。你要在春季耕种；但是夏季休耕的田地不会使你的希望落空。”^② 但是由于地少人多，农业的发展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希腊最终还是选择了商贸立国的道路。不过从中不难发现希腊农业技术的快捷进步是在环境和人工压力下发生的。一般认为，当时希腊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似乎要比地广人稀的楚国所采用的

① 《伊利亚特》，第 497 页。

② 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第 14 页。



火耕水耨的生产方式进步一些，但按照生产投入的成本比率来看，情况就不是如此，在人类学的观察中，两者都只是环境选择和适应的结果。

希腊城邦形成时期，雅典和斯巴达的农业很有代表性。雅典因人多地少，土地一方面向富人手里集中，一方面自耕农的土地也越分越小。靠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已无法解决生活的农民往往借贷，沦为债务奴，这引起了社会矛盾的紧张。公元前 594 年，梭伦改革和庇西特拉图（Petisstratus 605—527 BC）的僭主政治都力图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没有成功，所以在这一时期向海外要土地就成为希腊城邦早期移民运动的主要目的，而当地的农业生产水平仍基本上保持着荷马时代的水准。值得一提的生产技术是在提高地力方面，雅典采用了利用碳酸盐（石灰类）碱化土地，施销酸钾、灰肥与水肥，并知道用豆科类植物制备绿肥。但总的来讲，雅典农业上的成就与其商业相比不值得重视。

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拉哥尼亚平原（Laconia）的斯巴达是希腊最大的农业城邦。拉哥尼亚四面环山、土地肥沃、宜于农业。斯巴达极盛时人口有 7 万，但所奴役的人口数倍于己。为保证国家的军事强大，斯巴达公民不从事农业和商业，尽管公民每户按 10 顷分配土地，却都由所奴役的希洛人（Helots）耕种。希洛人每年将收获物的一半约 82 斗麦子和一定数量的油、酪、酒交给主人。从中可见希洛人的农业生产量并不高。除了希洛人的生产传统陈旧之外，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斯巴达不鼓励改进技术以提高产量。普鲁塔克说，斯巴达首领吕库古（Lycurgus c. 12—8 BC）认为多余的粮食

并无用处，为消灭贫富不均，他甚至还取消了金银货币。^① 当斯巴达面临人口过剩危机时，它没有采取希腊其他城邦常用的海外殖民做法，而是采用征服邻邦扩大领土的做法。在合并麦西尼亚（Messenia）后，它的领土达到 3200 平方公里。为了使兼并经常进行，斯巴达保持了一支常备军。从农业传统这一点来看，斯巴达的城邦与雅典是截然不同的，它对其政治、军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② 罗马的农业

罗马是个农业国家。在地理上，亚平宁半岛是孤立的，不同于雅典有与小亚细亚相连的岛链，它没有去发展商业和航海业。意大利有丰富的水系，亚平宁半岛肥沃的土壤为罗马农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罗马也因此保持了长期的小规模自由土地占有制。农民在社会中起重要作用，以致成为罗马帝国后来征服整个地中海的工具。

罗马的农业十分发达，但早期情况仍不十分清楚。在伊特拉斯坎人时代，仅知道其农村灌溉系统比同期希腊水准要高，在出土文物中有牡牛拉犁的图案。但总之，伊特拉斯坎人属移民，商业仍居社会生活的主要地位。稍后的王政和共和时期，罗马的农业发展仍十分缓慢。在农业技术上，伊特拉斯坎人的木犁变成了组合犁，在帝国时代又从高卢引进带轮子的犁具。其他生产工具有耙、手锄、镰刀、锹、弯刀（用于割果树）等。已知使用人、畜肥料，以防地力耗尽的土地轮种是标准的耕作方式。较显著的进步是蔬菜、水果较以前丰富，

^① 《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卷，第 95—96 页。



亦成为主食。一些贵族还用扁豆、洋葱、大豆命名，大蒜成为大众调味品。对农业节气、时令、选种、施肥和工具使用都很有章法。

公元前4世纪，罗马的经济基础是农业。一般农户有土地2~3英亩。法律上也限制农户任意占田（前367年的法律规定农户可有2~7罗马亩*iugera*犹格）的权利（1罗马亩约合0.25公顷）。随着罗马征服土地的增加，以农民经济为主的罗马殖民地传播到全意大利。它使得原有的一些希腊商业城市萎缩如在南意大利，罗马固有的小土地占有制也开始发生变化。罗马的监察官们将新增的国有土地分配给申请者经营，这些占有者后来变成领主（*Possesores*，它由领地*Possessiones*一词变来）。它缓解了罗马农民要求更多土地的紧张矛盾，却也促进了大庄园奴隶制的发展和小农经济的瓦解。公元前2世纪，罗马的扩张，使东方的财富和奴隶源源不断地进入意大利，大农庄有条件使用大量的奴隶劳动和廉价的东方粮食的输入，使小农的土地易受到兼并。一部分小农成为新的土地占有者和商人，一部分沦为城市流氓无产者——这批人后来为摧毁罗马民主制、结束共和国起了重要作用。罗马的农民经济逐渐变得更像希腊、腓尼基的商业经济。老普林尼有句名言。“大庄园毁了意大利，也毁了行省。”普林尼提到一座庄园，有奴隶4117人，7200头牛和25.7万只其他牲畜，足见其大。更有的庄园大到“鸟都飞不出去，野兽都跑不出去”^①的地步。这一现象使罗马的农业有了新的变化。

① 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年，第80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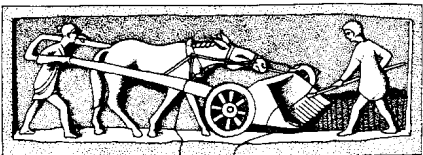
首先是农业上的谷物生产开始衰落，罗马传统的小麦、大麦、黍的种植面积减少。在加图（M. P. Cato 95—46 BC）著名的《农业志》一书中，加图写道：“如果你问我，哪种地产放到第一位，我是这样说的：种植一切作物和地位最好的 100 犹格（亩）土地为准，则生产美酒且产量丰富的葡萄园居第一；灌溉的菜园为第二；栽有柳林者第三；橄榄园第四；牧场第五；粮田第六，取枝叶的树林第七；果园第八；结果实的森林第九。”^① 农业中粮食的生产地位下降除了大庄园和海外廉价竞争的原因外，另一原因是农业生产方式如轮作、生产工具都一如既往没有太多的变化。其次是在经济作物的引进和栽培上有许多新的技术被采用，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方的传入（因许多奴隶都来自东方）。

当时几乎所有的欧洲的蔬菜罗马都有种植，果树品种更是繁多。如波斯的桃子、亚美尼亚的杏子、叙利亚的葡萄、小亚细亚的梅子、榛子、希腊的胡桃、非洲的橄榄和无花果，可以说应有尽有。果树的嫁接技术也十分流行，如胡桃接杨梅、梅子接法国梧桐、樱桃接榆树等，普林尼列举了 29 种不同的无花果树在意大利种植。罗马社会对葡萄酒和橄榄油的需求增大也使大量农田变成了葡萄园和果树园。当时意大利出产的名酒有 50 种之多，仅罗马一地，每年销售酒达到 2500 万加仑（1 加仑为 0.22 升，合 550 万升），平均每个罗马人（包括大人小孩和奴隶）一周要喝 2 夸脱（1.76 升）酒。橄榄油是在食物中代替牛油，洗澡时可以代替肥皂，又

^① 加图：《农业志》I.6 转引自《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第 376 页。



可用作火炬和油灯的燃料。在地中海夏季干燥的气候条件下，橄榄油膏是必需的护肤品，因此需要量大。这些经济作物不仅在种植物面积而且在经济收入上都超过了谷物和蔬菜的生产，这也加速了意大利本土的农业萎缩。罗马行省的农业如高卢、西班牙等地的农业生产开始在



图四 北高卢地区的收割谷物的机械

罗马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罗马农业有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当时社会对农业的普遍关注，无论是土地制度、农作物种类、农业生产技术都有专门的讨论。这在希腊和楚国文化中是很难看到的。从公元前 200 年到公元前 146 年之间，罗马征服希腊，灭亡了迦太基帝国，一些富庶地方成为罗马的行省。这些地方十分先进的耕种方法很快被罗马人学了过来，并且写成了农业专著，在罗马境内广为流传。

罗马第一部农业著作是老加图写的《农业志》，这是罗马吸收迦太基农业成就后的结果。当时罗马元老院把迦太基人美哥的许多农业论文都译成拉丁文。加图的《农业志》涉及到农庄管理、土地耕种、水果栽培、养蜂、葡萄修剪多方面的内容。这类专业书籍的出现，使罗马的土地所有者采用了更精细的种田方法，土壤研究、牲畜改良、蔬果的新品种以及施肥、排灌等方法在意大利各地都有发展。

其他重要的农业学家有瓦罗（Varro）、科琉麦拉（Columella）、帕雷狄乌斯（Palladins）等。瓦罗生活在恺撒和庞培时代的极盛期，活了 90 多岁，他撰写的 74

种著作中只有一本文法书和《农业论》3卷流传下来。《农业论》是对话体，第1卷讲耕种方法，第2卷讲饲养牲畜，第3卷讲养家禽和鱼类。科琉麦拉是罗马化的西班牙人，生活在尼禄（Nero 37—68）时代。其父传给他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庄园，他非常感兴趣耕种，因此下功夫研究一切有关农牧业的知识。他撰写的《论农业》有12卷，文笔优美、实践性强、完整地流传到今天。其中有些涉及农奴制的材料是今天研究一世纪时意大利社会的重要文献。例如科琉麦拉指出，“如果气候和土壤令人满意的话，则主人个人的经营永远比租给隶农有更多的收入。……与其把全部田地的耕种事宜交给奴隶管事，却勿宁交给自由的隶农了。这个规则特别适用于种粮食的土地，因此隶农对这种土地能够给予的损害，比对于葡萄园和果木园的损害要小得多；奴隶对于这种田地则会带来最大的损害。”^①它反映出奴隶制对意大利生产力的摧毁。帕雷狄乌斯在公元400年时生于高卢的普瓦捷（Poitiers，今法国中部），著有《农业论》14卷。其中主要部分（1—12卷）是依日历或历书形成排列的，依次讲各月份的工作（我国汉代类似的《四民月令》一书要早于它）。他书中一大特点是引述了罗马作家的农业专著，同时也引述了希腊的农业专著，基本上是整个罗马古代世界的农业总结，直到中世纪仍成为人们的必读书。

③楚国的农业

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属雨水农业区，因自然的厚赠，农业可以靠天吃饭，生产粮食是以水稻为主。1995

^① 《古代罗马史》，第807页。



年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距今 1.4 万年的人工栽培稻。稍后湖南的城头山文化（距今 9000 年）、湖北的城背溪文化的经济体系中，水稻比重不断在渔猎采集经济中加大。楚人进入江汉地区之前，水稻农业已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构成。其优点在于生产工具简单，管理成本低廉，与北方旱作农业比较，一般不需要集约化劳动和复杂的生产组织，其生产方式超常稳定。从玉蟾岩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时代到魏晋时期约 1 万年的时间内，南方稻作农业技术一般无大的变化。^① 司马迁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执熟食，无饥荒之患。故伏羲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② 这主要从食物构成和生产方式上对楚地农业进行了概括。

“火耕水耨”中的火耕是指烧荒，它并不限于水田，在旱地，土山一样可行，它是流动农业的特点。一般烧荒种植作物后的四五年内就得另迁新地再行火耕，以避免土地出现肥力递减效应。楚人发源于荆山山脉对此法不会陌生。水耨是指除草，它是稻作农业生产特点。有关水耨的解释很多，西嶋定生的看法较为合理，水耨主要为一处休闲轮耕式的直播稻种烧旱田，通过灌水来除去杂草以利于水稻生长。^③ 它简单地可以概括为 3 点：1. 稻种直播而非插秧；2. 烧荒除草以水灌田；

① 王纪潮：《论先秦时期湖北地区的技术发展与文明》，《鸿禧文物》，中华民国八十六年，第二期。

② 《史记·货殖列传》。

③ 西嶋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农业出版社 1984 年，第 164 页。

3. 休耕轮作。它所需要的条件是充足的水源和足够的土地，在地广人稀的南方正好适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已知楚国为解决水耨问题修筑了许多陂塘^①和水井解决稻田用水问题。1980年代末，距纪南城150公里的湖南澧县大坪乡就发现专用于农田灌溉的井群遗址，证实文献所谓楚人“井衍沃”的记载。^②火耕水耨的生产方式以牺牲天然林木资源来补充地力以获得省力低费的效益，因此缺乏改进农业技术的动力。

从新石器到西周，楚地的生产工具为砍斫、挖掘和收割3类一直未有变化，主要有斧、镑、铲、镰。在江汉平原中心地区没有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农具被发现，东周时期增加北方传来的农具耒、耜，但一直未发现犁。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代的铁制农具在楚国有很多发现而且中耕的农具如锄增多，在已出土的79件铁农具中，锄有43件，占到54%。^③中耕是旱田技术，在水田运用或可以提高产量，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方式。至于铁制农具的使用也是如此，它们只能提升生产效率，不能改变生产组织，正如西嶋定生指出的“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不虞匮乏，所以几乎没有促使讲求精耕细作的动力。”^④《左传·昭公七年》说楚文王时已有

① 如孙叔敖修期思陂（今河南滨县南）、芍陂（今安徽寿县）。今天仍在发挥效益。

② 向安强：《湖南澧县双堰东周遗址的农业遗存》，《农业考古》1990年，第2期。

③ 郭胜斌：《考古所见楚国铁农具初论》，《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二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20页。

④ 西嶋定生：《前汉的社会经济史》，《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608页。



“仆区之法”。所谓“仆区”就是根据户籍查阅逃亡的法律。所查者乃一户之正丁，它表明公元前6世纪楚国已有了户籍制度。^①但当时的土地仍由国家分配，从楚国经常迁移灭国和属国人口（如从公元前524到506年许国人口迁移4次）可以看出楚国农民没有希腊、罗马存在的小土地私有制。有人推测有，但文献和考古都提供不了证据。农民私有的仅仅是所分土地之上的物，而不是土地私有权。^②另外土地私有化需要外部条件。以粮食生产为例，战国旱地亩产生1.5—2石之间，折合今石为120斤毛粮，水田略高一些。以每人一年480斤计算，5口之家需田20亩，水田轮作要40亩。在人口稠密的北方，人口增长带来的供应紧张，用集约化的劳动如施肥、中耕、水利工程等和利用新技术如牛耕或者改变土地所有关系几种方法都能缓解。战争也是解决办法之一，但成本高。而低成本的火耕水耨生产方式在地广人稀的南方就很稳定，缺乏更新社会组织、产生新生产关系的刺激。所以李约瑟、白馥兰认为水稻农业能使技术、经济发展，但“真正的社会变革和历史变迁却在粗糙的旱地系统。”^③

在《招魂》、《大招》中论及了楚国许多山珍水产和各种烹调方法。出土遗物中也时常可见藕、笋、桔、梨、柿、桃、栗、荸荠、菱、梅、枣等蔬果，物产可谓丰饶，楚地也有农学家如许行，但其农学著作却没有一

① 杜正胜：《编户齐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中华民国七十九年，第25页。

② 《编户齐民》，第173页。

③ J. Needham: Science &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VII. Part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616.

本流传下来。《汉书·艺文志》载先秦农业著作六种，其中《野老》十七篇可能为楚地农书。班固说后者“六国时在齐楚间”流行。具体内容现在无从知道，与罗马重视农业著作相比实在是不幸得很。也有人说《神农》二十篇是楚人的农书，《神农》一书保存在《吕氏春秋》中，但从《吕氏春秋》所载“任地”、“辨土”、“审时”诸篇均为北方集约农业技术之产物来看，与楚地殊不相类。在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中很难想象需要复杂的农业技术，这大概也是楚地农学不兴的原因。^①

手工业

①希腊的手工业

1873年6月15日，是施里曼在希沙立克发掘特洛伊城3年工期的最后一天。这天清早，他和妻子索菲亚来到工地，他对发掘工作已不抱任何希望，只是按照工作习惯随时注视民工们的挖掘。这时遗址已深达8.53米，这也是施里曼断定普里亚摩（Priam，是特洛伊战争期间特洛伊国王，其子帕里斯 [Paris] 诱拐宙斯之女海伦而引起特洛伊战争）宫殿的底部。突然间，施里曼的眼睛着魔似地定住了。在一处民工刨出的浮土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如电光石火一闪而逝。他本能地抓住索菲亚的手低声耳语：“金子！”“你立刻让所有民工回家，随便找什么借口都行。哦！我想起来了，今天是我

^① 刘玉堂：《楚国经济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60—170页。



的生日，从现在起就放假。”民工走后，施里曼跳进坑中拼命挖掘起来。他头上是风化的石头，旁边有随时可能坍塌的墙垣。施里曼后来写道：“我在墙角下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用一把大折刀尽快地挖掘，残垣随时可能倒塌下来压在我身上。”施里曼找到了大批黄金、象牙饰品，他用索菲亚的红头巾将它们包好带回住地。这里面有王冠、胸针、耳环、链条、钮扣、金线、手镯等饰品（后来清理总共有黄金、青铜饰品、青铜工具 8700 余件，金制品占绝大多数）。施里曼写道：“看来这是普里亚摩家中某个成员匆匆离开时装入盒中的，他连钥匙也来不及从锁中取下，结果在城墙边送了命，并很快被坍塌的皇宫所覆盖。”施里曼死后（1890）的第 3 年，由其助手年轻的建筑师和考古学家德普尔德（Dörpfeld, W）主持特洛伊的发掘。他正式确定施里曼的“普里亚摩宝藏”实际早于特洛伊 1000 年。其成果发表在《特洛伊和伊里昂》（1901）考古报告中，为学术界所公认。^①施里曼虽未找到真正的特洛伊，却把我们带进了早期爱琴海文明的门口。

爱琴海文明早期 4 个主要的地区除特洛伊外，还有基克拉迪群岛、克里特和希腊本土的阿尔戈斯（Argos 是迈锡尼文化所在地区）。公元前 3000 年时，这些地区的手工业比较发达，主要表现在青铜制品的使用、黄金珠宝的加工、制陶和石刻工艺等方面。从源流上看，它们都受到了西亚和埃及文化的影响，虽然在技术水准上还达不到同期西亚、埃及文化的水准，但却是欧洲手工

^① 格林·丹尼尔：《考古学 150 年》，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第 130 页。

业技术的发源地，大多数手工业技术要比楚国乃至整个中国先进。在克里特岛东边的格罗尼亚（Grouinia）的米诺斯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片手工业作坊，有铁匠铺、木匠店、制陶所和榨坊。发掘者清理出了三脚架、花瓶、陶器、炉、灯、刀、研钵、抛光器、钩子、别针、匕首等各种工具。这个发现使之被称为克里特文化中的“机械之城”。^① 克里特手工业之水准由此可见一斑。

陶器

克里特岛上有优良的陶土，制陶技术发展也较早。考古发现在公元前 6000—公元前 3000 年时期，克里特的陶器已有带柄杯、钵等种类，但还没有发现轮制技术。陶器上有深黑、玫瑰、褐、绿等色彩，学术界称之为“虹霓陶器”。在早期米诺斯文化中，克里特陶器采用了轮制技术，其陶器按样式和风格分为麦西尼亚（Messara 克里特中部地区）陶器和卡马雷斯（Kamarse，是克里特岛东部著名的费斯托斯 Phaistos 宫殿遗址附近的卡马雷斯山洞）陶器。

麦西尼亚陶器的工艺特点是色彩多变，它采用特殊的涂料涂在陶坯上，烧制时会产生类似窑变的效果。其色彩往往从深褐过渡到浅黄，并带有褐边，又被称作“斑纹陶器”。

卡马雷斯山洞原是宗教场所，故这类陶器可能用于祭祀。其特点是采用更先进的快轮制陶技术，黑底上绘

^① 该遗址 1901 年被发现，后由美国考古学家（Harriet Boyd）发掘，其物品至今仍保存在克里特 Herakkeion 港的博物馆中。Greece. Phaidon Press Limited. 1985, p. 233.



白、橙、黄色花卉，图案大部分临摹植物和螺旋线，它在米诺斯文化中期最为流行。这些器皿还销往埃及、叙利亚。在米诺斯文化后期，制陶技术已十分成熟，这时陶器主要是在纹样上流行海景，如鱼类、海藻、海螺等和植物纹一样。

迈锡尼的手工业比克里特落后，其成就主要表现在黄金加工方面。制陶技术基本上是模仿克里特岛，但陶器的产量很大，远销海外。特洛伊战争导致迈锡尼文化衰落，多里安人在公元前 1200 年左右摧毁了迈锡尼，希腊进入所谓的黑暗时代（Dark Ages），制陶技术已衰落，在这一时期发掘出土的陶器朴素粗糙。陶器制作采用堆筑法而没有采用轮制法。在纹样风格上，以水平和平行的带饰为基础饰以几何纹，整个英雄时代，这种几何形纹样风格的陶器是主流。它们虽然未达到克里特、迈锡尼的水准，却为后来希腊制陶工艺的发展起了桥梁作用。

和楚国文化不同的是，希腊陶器是日常用品又是出口商品，同时还是外销葡萄酒、橄榄油的包装容器。公元前 8 世纪，科林斯成为对东方贸易的中心，希腊重新接受东方的影响，动、植物纹开始取代几何纹；埃及的莲花、狮身人面兽、两河流域的神怪都开始在陶器纹样中出现。以雅典为中心的阿提卡地区也追随科林斯转变风格成为希腊商业陶器生产的一个中心，尤其是采用快轮技术生产大型陶器。公元前 6—公元前 5 世纪，因荷马史诗的广泛传播在陶器上描绘荷马故事成为出口陶器的热点，传统所用的线描方式很难交待故事中人物相互关系，这就刺激了陶工们寻求新的装饰技法和制陶技

术，结果产生了“黑像瓶画”技法。^①

“黑像瓶画”的制作技法是先在红色或褐色泥胎上涂上一层含铁的涂料。干燥后，再罩一层透明的釉。然后用工具在器壁上刻画出图案轮廓，将轮廓内的颜色刮掉后还要加上白、紫等色涂料使画面色彩更丰富。但这些涂料的色彩不易保存下来，最主要的画面是填入黑漆。黑漆与陶器的红、褐色形成鲜明对比。这种黑漆有光泽、耐热、耐寒，不论何种情况都不变色、龟裂，它在今天看来仍鲜亮如初。究竟是何种材料制成，在 20 世纪早期学术界也不清楚，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斯塔罗斯（Stross）和阿萨罗（Asaro）的研究才发现这种陶器表面色彩和光滑的效果是由于使用了特殊的陶土，主要成份是伊利石（illite，它是一种粘土矿物，是含水的钾的铝硅酸盐又称云母）并在烧制时仔细控制窑内的温度的结果。^② 它与楚国发明的漆可以说是交相辉映。

人物故事画陶瓶的出现，使希腊陶器的商业出口大增，雅典很快也超过科林斯，执地中海制陶业的牛耳。在公元前 6—公元前 4 世纪。“黑像瓶画”逐渐被“红像瓶画”^③ 取代。在制作“红像瓶画”时，基本上沿用了原有黑像瓶画的技术，只是将传统的配色颠倒，即

① Black - figure 又称“黑彩风格”或“黑花式”最先由雅典画家 Nessos Painter（学术界为匿名的希腊瓶画家取的代称）发明。John Boardman : Greek Art. Thames and Hudson Ltd. London 1985. p. 80.

② P. M. Rice : Pottery Analysis. p. 17.

③ Red - figure，又称“红彩风格”或“红花式”。它在公元前 530 年发明于雅典，发明者安多西德斯 Andocides 是阿提卡人，也是“黑像瓶画”的大师，现存他的 30 多件陶器还有 8 件呈黑像风格。



先在红色泥胎上勾出故事轮廓，用黑涂料将轮廓以外的地方涂满，然后用笔在轮廓内描绘细部。它的优点是不改变传统的色彩对比，而又增强了装饰效果，同时也创造出了更自由的绘画空间，艺术家可以用柔软的毛笔代替坚硬的刻刀，描绘出人物的衣纹、表情细部。这一点与楚国漆画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希腊的“红像瓶画”风格的产生有一个市场激励的背景，而楚国漆画的风格变化却是因社会转型的结果。

金属加工

金属加工最早出现在西亚和近东地区。公元前5000年约相当于江汉平原的大溪文化时期，近东的村落通过孔雀石贸易掌握了金属冶炼术。近东一些铜矿多是露天富矿，如以色列南部的提姆纳（Timna）成为当时的矿冶中心。一些铜制品都是在祭祀场所冶炼出来，蜡模和陶范技术这时已发展出来。金属加工技术也由于冶炼水平的不断进步得到提高并传播到爱琴海地区。如特洛伊城的第1期是公元前3000年的遗址，当地居民已掌握了铜和青铜。第2期是在公元前2400—公元前1900年，青铜已完全取代了石器，金银珠宝的加工已十分杰出，以致施里曼把它当作了阿加门农时代的特洛伊。

希腊自己的金属加工技术始于克里特岛。在早期米诺斯时代，铜和青铜并用。在中期米诺斯时代，青铜就非常普遍，但只是用作武器和工具。在克里岛东部一处居民遗址中，发现一户住宅内有青铜武器和一套完整的工具，包括斧、刨、小齿锯，其中一把锯长1.6米。新发明的武器有剑，其长度已达1米，没有极高超的青铜加工技术是做不到的。楚国是在战国中期才有了长达1米的青铜剑。克里特最为出色的金属加工技术还不是青

铜器的制作而是黄金加工。在克里特的莫霍洛斯（Mokhlos）镇的一个公元前 2500—公元前 2200 年的墓葬中，出土的黄金饰品达 150 件之多，其中颈饰、耳环、胸针、腰带、金花卉等制作都极为精美。在马利亚市（Mallia）的一处从 1945 年就开始发掘的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中期米诺斯文化的黄金加工技术中的精细工艺已相当发达。如有一件黄金耳环以 2 只蜜蜂抱一圆球为基本造型，蜜蜂翅膀和尾部挂有 3 个嵌有绿宝石的坠饰，而圆球镂空成蜂巢状，十分精湛。它不仅反映出公元前 2000 年克里特的金属加工水平而且表明当地手工业中已存在养蜂业了。

迈锡尼时代的手工业比克里特要落后，但是在黄金加工上仍然胜出。在荷马史诗中，迈锡尼一带称为阿尔戈斯，荷马常用“多金的”来形容迈锡尼。《伊利亚特》11 卷有以下记载：

阿特柔斯之子大声命令阿尔戈斯人整装出战，他自己也穿上闪亮的铜甲。他首先给小腿披上一副精美的胫甲，用银质扣环把它们紧紧固定在腿肚上，然后把胸甲牢牢地锁在胸前，……那件胸甲由十条法琅饰带，十二条黄金饰带，八条锡带组成，^①……他再把双刃剑背到肩上，剑上的金钉熠熠闪光，那剑放在银制的剑鞘里，剑鞘系在一条镏金的过肩背带上。他拿起一面可遮护全身的精制盾

① 英文是 “a cuirass with ten bards of dark enamel, twelve of gold, twenty of tin.” enamel 原义是珐琅，有些学者认为是铜、铁的合金，类似装饰物在埃及墓葬中常常发现，也是地中海较为流行的一种装饰。（参见 The Iliad 的英译本，Robert Fitzgera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80.）。



牌，形象可怖而华丽，周围有十匝青铜圈，面上突起二十个闪光的锡锻半球……^①

1876年12月6日，幸运再次降临到施里曼身上，当他发掘出迈锡尼5处墓葬后找到了大量的黄金制品和青铜武器，几乎就和荷马描写的一样，他为此发电报给希腊国王：“我十分高兴地禀报陛下：我已经发现了一处墓葬群，它们当是阿加门农、卡桑德拉、尤里米登和他们同伴的埋骨之地。”^② 这些宝藏实际上要比阿加门农时代早四五百年，但它们却完全印证了荷马对希腊英雄时代工艺技术的描述是非常准确的。迈锡尼4号墓中出土的鸽子杯杯子是用黄金制作，两边的把手装饰成鸽子状。施里曼看到这只杯子就称之为“涅斯托尔（Nestor，派洛斯的国王）的杯子”，它与《伊利亚特》中的描述几乎完全一样。如第11卷中说到：“旁边再放一只老人从家里带来装饰着许多黄金铆钉的精美酒盅。酒盅有4个把手，每个把手旁边有一对金鸽啄食。”^③ 从文化传统上看，迈锡尼的金属加工技术受到了克里特的影响，但迈锡尼喜欢用黄金来装饰物品则是受到了埃及文化的影响，如“阿加门农的面具”就是受埃及埋葬习俗的影响。从迈锡尼出土的泥板文书上看，当地手工业已分得极细，如弓匠、战车制造匠、刀剑匠、金匠等，类似周代的百工。最令人称奇的是当时在4号墓中发现的长24厘米的青铜剑正反两面用黄金

① 《伊利亚特》，第266—277页。

② 克里姆：《神、陵与学者》，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33页。

③ 《伊利亚特》，第291—292页。

和银嵌错了两幅图案，一幅是 5 个猎人手持盾牌、长矛和弓捕杀狮子；一幅是狮子捕杀 5 只羚羊。其构图之巧妙，制作之精湛，堪称天工。

迈锡尼文化衰落之后，希腊进入黑暗时代。按照手工业发展的技术水平来看，荷马时代的金属加工技术没有显著的进步。从公元前 8—公元前 6 世纪，希腊奴隶制城邦形成，海外殖民活动又重振雄风。尤其是希波战争（492—449 BC）之后，希腊城邦经济空前繁荣，手工业分工十分琐细。普鲁塔克提到伯里克利时代的手工业有“木工、铸工、铜匠、石匠、染匠、金匠、象牙匠、画匠、刺绣工、浮雕工……造大车的……编绳子的、织布的、制革的、筑路的、开矿的”，这还不包括酿酒、榨油、造船、制陶等行业。^① 行业内部也有分工，如陶工分粗工、细工，粗工有拌土、担水、烧窑、运料；细工有塑形、制坯、彩绘、烧培，甚至制坯中还再分瓶、碟、罐、杯等器类的制坯。古希腊作家色诺芬说到当时的制衣业中斗篷、绒线上衣、背心都是分工制作。^② 金属制造也由于这种经济的繁荣得到提高，它主要表现在大型青铜塑像的铸造上面。

现藏雅典国王博物馆、于 1928 年从优卑亚岛（Euboea）北端的阿特米西恩角（Artemision）附近海域里打捞出来的波赛冬青铜铸像除了雕塑上艺术的成就外，其铸制技法也十分高超。该像铸于公元前 460—公元前 450 年，高 2.09 米，完全用失蜡法铸成。我们知道，西亚很早就使用失蜡法铸造技术。公元前 3000 年左右的乌尔

① 《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卷，第 474 页。

②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75 页。



(Ur) 王朝的墓葬中就有许多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器。到公元前 6 世纪中时, 靠近土耳其的萨摩司 (Samos) 岛上的两位伟大的建筑师罗伊克斯 (Rhoecus) 和提奥洛斯 (Theodorus) ① 将失蜡法传入希腊本土, 希腊青铜塑像的制作就逐渐摆脱了传统雕像的僵硬造型, 更加生动活泼, 艺术性也更强了。具体铸造方法是先用蜡涂在已完成的粘土模型上, 蜡的表面就是今后青铜器表面, 再用粘土做成模子包住涂蜡的模型, 模子要能承受住金属溶液的压力。当蜡溶化掉后再将青铜溶液倒入外模与内模 (或内范) 之间的空隙, 待青铜冷却后取出抛光打磨, 一件作品就告成功。实际操作中往往还要复杂, 像波塞冬这样大型失蜡法铸件需要很高的铸造技术才能做出。它的制作时间要晚于河南淅川下寺楚墓的青铜楚 (约公元前 6 世纪中期) 却早于曾侯乙墓的青铜尊盘 (433 BC)。两者比较, 在雕刻技法上, 楚人似较精细; 在溶模形成的控制技术上, 希腊却占有优势, 因为大型铸件中的失蜡法铸造对模范要求和温度控制更严格一些。1972 年 8 月 16 日, 在意大利南部的里亚切市 (Riace) 附近的海滨又发现了两件青铜雕像。佛罗伦萨的修复中心用 5 年的时间将这两件雕像修复, 一件高 2.1 米, 重 250 公斤; 另一件高 1.98 米, 略重于前者, 均为失蜡法铸造。时间约在公元前 506 年, 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它们是萨摩司岛上雕刻家波弗拉斯 (Pythagoras)

① 希罗多德认为希腊有 3 项最大的工程是萨摩司人做的。其中 560BC 建造的希腊最大神庙 (102 × 52 米) 就是这两位他们的作品。希罗多德:《历史》, 商务印书馆, 1983 年, 第 221 页。“Samos” Greece p. 466.

的作品。工艺特点是在雕像特定部位使用其他材料。例如眼圈用银镶嵌，嘴唇、头发、眉毛、眼睫毛用红铜镶嵌，眼球则用象牙、琥珀等原料制成。因它们做工精细复杂被西方学者称为“近 500 年来最伟大的考古发现”。

希腊手工业的发达，有赖于商业的需要，这和楚国手工业多是政治和仪式活动的产物不一样。除了制陶和金属加工外，希腊的造船、酿酒、榨油、纺织、矿冶、珠宝加工等方面的手工业活动也都与希腊传统的商业有密切关系，当然政治和军事对手工业的发展也有作用。例如希腊政府的开支、贸易支付需要大量的白银，它刺激了希腊银矿的开发。公元前 483 年，在雅典劳里昂（Laurium）发现富银矿，在该矿就建立起了复杂的采矿冶炼体系。据考古调查，劳里昂矿是坑采，坑道仅高 0.9 米，宽 0.7 米，略宽于楚国春秋时期铜绿山的坑道，窄于阳新港下（ 1.00×1.05 米）。操作时都一样为卧式，用斧、凿、锥子开采矿石然后由人传送出来。选矿时先将矿石放入臼内捣碎，然后研磨筛选。筛选利用高处水槽流下来的水柱分开金属颗粒和矿渣。熔炼时，熔炉装有风箱，底部开有金门放出溶液，溶液放入多孔材料做的器皿中使之氧化。当铅变成氧化铅后，银就被滤出来。这种技术非常先进，使当时雅典银币的纯度达到了 98%。^① 又如，在公元前 4 世纪末，希腊科斯岛（Cos）的妇女已掌握了丝织技术，并有剩余产品出

^① 威尔·杜兰：《希腊人的生活》上卷，东方出版社 1999 年，第 353 页。



售。^① 大量的纺织手工业的产品估计还是用在士兵的绵甲装备上面。按希罗多德的记载，当时埃及输出给希腊的一副亚麻制胸甲，黄金与棉花混纺成线并织出图案，每股绦都由 360 根细股线编成，工艺精湛无比。^② 这种软甲在希腊军队中也得到广泛使用，每个市民都能装备得起，其原因在于战争刺激了制甲业的发展，并使成本逐渐降低。另外，便宜的装甲也促进了希腊社会民主制的发展，无论贵族，平民在装备上首先获得了平等。

②罗马的手工业

公元 458 年 7 月 11 日，罗马帝国皇帝利奥一世（Leo I 440—461）下令保护罗马城的古代建筑，这是针对罗马人喜欢拆毁旧建筑以建新屋的习惯而颁布的，^③ 但这也未能使古罗马城免于毁灭。在此后的一千年，寻找罗马的过去就一直吸引着人们，包括教皇、国王和学者。特别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冒险家们去寻找新大陆，而欧洲的文人、学者和艺术家则来探索罗马。他们比施里曼寻找特洛伊早了好几个世纪。到了施里曼的时代，现代考古学已在罗马考古中应用，人们知道了古罗马之前还有伊特拉斯坎文化，再之前还有维兰诺夫文化，虽然为不同人所创造，但是他们的手工业、农业技术却有相互影响和借鉴之处。

罗马手工业概况

考古发现意大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公元前 2500 年）中欧来的部落移居波河地区，他们放弃干栏式建

① 《希腊人的生活》上卷，第 354 页。

② 希罗多德：《历史》，第 215 页。

③ Claude Moatti：《罗马考古》，第 147 页。

筑而采用居于土丘之上的住屋。他们在手工业技术上的成就是能用青铜铸造 100 多种工具和武器，其文化因其遗址土地肥沃称之为“特拉马拉（Terramara）文化”。他们是意大利人的直系祖先。伊特拉斯坎人统治罗马后，在手工业方面的最大特点是使用铁器，时间约在公元前 1000 年左右。他们的文化因在波隆（Bologna）的维兰诺万被发现而称之为“维兰诺万文化”。伊特拉斯坎人的陶器十分平庸，多是希腊的仿制品。但这时的铜器制造、铁器制造仍有值得一提的地方。公元前 7 世纪，伊特拉斯坎人开始在意大利西海岸采铜，在埃尔巴（Elba）岛采铁矿。铁矿运到波普洛尼亚（Populonia）溶炼，然后再销售。青铜制品如青铜小像、剑、甲冑，餐具、家具用品的产量数以百万计，也四处销售。其中以青铜烛台和雕刻的青铜镜最为有名，但总体来看，伊特拉斯坎人手工制品的艺术风格与希腊十分接近，有时还难以区分。在罗马人早期的手工业状况不清楚的情况下，伊特拉斯坎人的手工业发展水平，都被学者们看作罗马文化早期的手工业状况。而实际上，伊特拉斯坎人的文化虽说影响了罗马人很长阶段，两者之间还是存在许多差距的。^① 在罗马的共和时代罗马人逐渐壮大，公元前 394 年在威伊（Veii，罗马以北 20 公里的伊特拉斯坎人最强大的城邦）战争后，罗马人结束了伊特拉斯坎人的统治。公元前 275 年，罗马人击败希腊伊庇鲁斯（Epirus）、王皮德洛士（Pyrrhus，319—272 BC）统一意大利，全意大利的商业城市都受到罗马的控制，城

^① Tom Rasmussen：“Early Roman Art”，Martin Henig ed. A Handbook of Roman Art. Phaidon Press. 1983, p. 14.



市同盟之间的直接商贸受到限制。罗马的商人垄断了皮革、肉类等货物运输，一些零散的手工业作坊因之也为国家所征用，罗马的手工业获得了发展契机。

在早期的罗马社会，农业虽占主导地位，手工业仍有一些进展。普鲁塔克说国王努玛时期（Nama 715—673 BC）按手工业种类组织同业公会（Collegium），手工业者分乐师、金匠、木匠、染匠、皮匠、制革匠、铜匠和陶工 8 类。^① 考古发现，这些从事手工业的人多半是希腊人和伊特拉斯坎人。公元前 4 世纪，因重新建造被高卢人毁坏的罗马，手工业中首先建筑行业得以大力发展，此后一直成为罗马手工业中最主要的一个部分。从现今遗留下来遍布欧洲和地中海的罗马建筑遗迹中不难发现建筑行业的建筑师、石匠是手工业中最为庞大的人群。另外在兼并战争中，征集公民从军变成了组建常备军，原来的公民自带武装改由国家统一供应军备。罗马在原有的同业公会的基础上很容易将从事军备制造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成为国家军备的供应商。在公元前 3—4 世纪，武器、头盔、甲冑、攻城工具等完全都由手工业作坊供应，这与希腊士兵自由采购军备是不同的。^② 在建筑、军需品生产方面因为有国家力量的介入，都大量使用了奴隶劳动。这些大规模的生产除了成本低廉、可产生宏伟的产品之外，在技术方面的进步却非常有限。到共和制末期，金融商业资本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资金转移到农业（意大利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农业）和行省。农庄使用奴隶劳动获利与在行省采购

① 《希腊罗马名人传·努玛传》，第 150 页。

② 《古代罗马史》，第 212 页。

日用品和奢侈品都比本地的手工业品生产要合算。这种状况进一步抑制了罗马手工业的发展，直到帝国时期，罗马的手工业才有了一些进步。同时，作为罗马文化的一个整体部分，行省的手工业发展与希腊时代比较也有所进步。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分工更加细密和技术的进步上面。它们基本上是为使产品低廉化、标准化的产物，但这种进步却又最终扼杀了手工业中常见的创新精神。^①

共和后期和帝国时代大型手工作坊中出现较复杂的分工，如陶器的造型、烧制、绘画都有专人负责，生产的陶器供应市场，几乎无艺术可言。在图拉真、哈德良、奥里略等皇帝时期，工厂以此种陶器牟利，产品几乎充斥整个罗马世界。在建筑上，设计拱门、砌墙、抹石灰、粉刷、装水管、铺大理石地板也是专人专工。在金属加工上，分成铸工、铁工、磨工等。有些行业的规模十分庞大，如面包制造同业公会甚至连从原料生产到最后销售都加以控制。在庞贝城一地发掘出来的面包店就有 40 家，而当时全城的人口也不过 20000 人。也是在庞贝城，考古学家还发现当地家俱的金属镶嵌来自卡普阿（Capua），长椅腿来自希腊的德洛（Delos），烛台上半部分出自土耳其的埃吉（Aegae），下半部来自搭伦图（Tarentum）。在帝国晚期这种分工一直持续，让罗马人都觉得好笑。^②

在罗马奴隶制的全盛时期，技术发展受到了抑制。罗马帝国完成对地中海的控制后，国内外贸易的刺激以

① 《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卷，第 254—258 页。

② 《古代罗马史》，第 786 页。



及它对希腊化时代许多技术成就（如起重装置、水磨、航海技术等）的继承，在手工业技术上有所发展。在老普林尼的《自然史》中记载了开采金银的复杂技术、排水机械在矿山上的应用、熔铁的不同种类熔炉等。这些技术进步的动力主要是罗马扩张是战争对金银对金属制品的需求。当扩张告一段落之后，技术进步也因为随之而来的手工业分散化而结束。公元1世纪以后，罗马的一些行省如高卢、西班牙的手工业开始逐渐取代罗马（或意大利）的地位，尤其是一些东方的行省的原手工业迅速恢复。如小亚细亚是制羊毛衣的中心，叙利亚和埃及是制亚麻布的中心等。日耳曼的陶器、莱茵河地区的玻璃、高卢的青铜器等手工业制品现在都超过了意大利行销整个罗马帝国。

罗马手工业的总体水平没有希腊世界高，但仍有几个比较突出的方面，它们是银器加工工艺、青铜工艺、玻璃工艺和玉石工艺。

银器工艺

罗马银器工艺的发达有赖于罗马对贵重金属尤其是白银的需求。帝国时代因银币作为帝国统一货币，需求量增大。罗马接二连三地将矿产地并入帝国，由帝国统一发行铸币。银矿的开采规模也十分惊人，生产出来的白银除了满足铸币外，大量地用于制造银制工艺品，这成为罗马手工艺品最有特色的一个部分。最为杰出的代表作是1895年在坎帕尼亚（Campania）的博斯科利勒（Boscotrecase）别墅中发现的一批银器，其中16件有浮雕图案的银杯是为帝国宫廷制作的，这些浮雕刻出历史的故事、帝国仪式大典、宗教哲理和动物图案等，在作

品中刻意宣传罗马帝国的精神。^① 这些浮雕银器在制作时，多用双层银板加工，外层浮雕图案，内层则光滑明亮。因其做工精湛，往往被视为有地位身份人物的拥有品，物主本人有时还不得不掩饰它们以免遭受世人的嘲讽。^② 这种心态与楚国贵族喜好用复杂的工艺品炫耀地位是有所不同的。到帝国后期，银器常见的浮雕工艺被线刻纹样所取代，工匠们用银、铜、铅的合金在银器上进行镶嵌，在工艺技巧上与楚国后期青铜器上金银嵌错比较接近。

青铜器工艺

罗马的青铜工艺成就并不在它的艺术上而是在于当时的日用品已多用青铜制造，如家具、烛台、吊灯、壶、杯、盘、铜镜等物品。公元前 1 世纪意大利的卡普阿（capua）成了青铜铸造业的中心，其手工业制品不仅供应意大利，还供应北欧。青铜制品的这种普遍性完全不像楚国那样，仅仅只是贵族身份和财富的象征，这也是与罗马时代矿冶发展比中国更普遍有关。直到公元 1 世纪以后，高卢生产的黄铜制品更为价廉物美，罗马本土青铜制造工艺的中心地位才被行省取代。

玻璃工艺

研究罗马玻璃的专家普赖斯（J. Price）说，“在文艺复兴以前，罗马时代的玻璃应用之广，影响日常生活之大，没有任何时代可比。”^③ 玻璃在公元前 3000 年

① Donald Strong: Roman Ar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89—93.

② Martin Henig: “the Luxury Arts” A Handbook of Roman Art. p. 141.

③ Jennifer Price: “Glass” A Handbook of Roman Art. p. 205.



就出现在西亚，真正的玻璃器皿约在公元前 1500 年才在埃及使用。公元前 4 世纪后，地中海东岸和南意大利已发现有玻璃，主要是些单色器皿。到公元前 1 世纪，玻璃在罗马世界中不再仅仅作为了奢侈品，而成为日常用品，这可能与当时采用玻璃吹管技术取代传统的熔化玻璃铸造器物的技术有关（1970 年在耶路撒冷发现的公元前 50 年的灰坑中，出土了吹管玻璃的残片^①）。小普林尼（61—114）曾说吹管玻璃是从西顿（Sidon 黎巴嫩城市）或亚历山大传入罗马的，时间是提比略皇帝（Tiberius，42 BC—AD 36）时代。这稍晚于实际的情况。吹管玻璃技术的出现一方面使工匠们能制作出更复杂、色彩更丰富的玻璃，一方面也刺激了传统的熔铸玻璃的生产。在 1 世纪左右，传统玻璃的生产技术已大量用于餐具方面，与金属、陶制和优良石材同类制品一较短长。^② 据历史记载，尼禄皇帝就曾用 6000 塞斯特提乌斯买了两个吹制的小玻璃杯，^③ 这种小杯是用不同色彩的玻璃棒熔合后吹制而成（即今天人所称的“千花”Millefiori）的玻璃器皿。更有一种称“萤石”的玻璃瓶，十分精致，制作方法是用不同色彩的玻璃排列成物体形状，然后烧成，也可以用彩色玻璃嵌入到透明的内胎中。据说为一个这种昂贵玻璃制品的杯子，尼禄竟付出 100 万塞斯特提乌斯（约合 15 万美金）！

现存最富传奇色彩和高超技艺的玻璃器皿是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波特兰花瓶”（Porteand Vase），它采

① N. Arigad：Israel Exploration Journal 1972. 22.

② Jennifer Price：“Glass” A Handbook of Roman Art p. 207.

③ 普林尼：《自然史》，转引自 A Handbook of Roman Art p. 209.

用了浮雕玻璃工艺，先吹制出蓝色玻璃内胎然后再罩以乳白色玻璃并在上面雕出人物树木图案。花瓶的具体制作年代并不清楚，其艺术风格是奥古斯都时代的。它于1770年在罗马附近被发现，由波特兰公爵收购后借给大英博物馆。孰料在1845年被一个疯汉打碎成250片，经修复曾在1959年出售，因最高出价只有15.2万美元被认为太低而未售出，如今它成为大英博物馆中代表罗马玻璃工艺技术的镇馆之宝。

玉石工艺

罗马的玉石工艺是其手工业中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部分，它与楚国相比，有同有异。相同处是都认为佩戴玉石有避邪功能，可以表示身份；不同处是罗马人对玉石的定义比楚人要宽泛。楚国制玉的材料在矿物学分类上是软玉（Nephrite），它是透闪石（Tremolite）——阳起石（Actinolite）呈纤维状的结晶集合体。个别情况下，楚人也把玛瑙、绿松石、水晶当作玉材。但罗马人的玉石加工几乎就是所有的美石（Precious Stone），它有硬玉（Jadeite 翡翠），软玉和一切石材。学术界将罗马玉石分成二类，一类是切割磨光的矿材（Gem），无论材质本身的珍贵与否；一类则是贵重的宝石（Jewellery）。

楚人的制玉技术与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制玉工艺找不到继承关系，它是由中原制玉工艺发展而来的。罗马人的制玉工艺渊源较为复杂，若从刻石技术（Engraved gem）上看，可以追溯到克里特的米诺斯文化。受埃及文化的影响，米诺斯文化中的石刻有印章一类。希腊化时代，相当一部分来自希腊的手工艺人到罗马从事石刻工艺。若从佩带玉石的传统上看，在伊特拉斯坎人统治罗马时期，伊特拉斯坎人佩戴坠饰避邪的习俗传



给了罗马人。在共和制和帝国时代早期，罗马成年男子虽不像小孩那样佩带坠饰作为护身符，但刻有各种纹样的印章成为公民个人特征或荣誉标志。有些操守严谨的元老可以不带玉坠却一定要戴一枚印章戒指。这些戒指设计独特，雕刻精湛，佩带它成为罗马社交的必备，这也使印章石刻成为罗马手工业中十分兴隆的行业。各种用于戒指印章的石材据普林尼的描述就有 100 多种。在安东尼时代，玉饰印章一类的制作达到了高峰。当时有一位元老院议员，在戒指上镶了一枚大如榛子的蛋白石（Opal，一种氧化硅凝胶，是非晶体），价值 200 万塞斯特提乌斯，因而被放逐。实际上，这些在琢磨后的矿材上雕刻的印章指环一带饰物，已不仅仅是个人符号，更多的是地位和等级象征。佩戴者依据饰物品质炫耀贵族的地位（元老或骑士），这一点与中国君子佩玉是没有什么差别的。^① 因雕刻石料或矿材的硬度不一，一般的雕刻工具要软于材料本身。罗马工匠采用可换钻头的弓钻^②（钻头有细小尖锐的转轮和石头二种）用解玉砂琢磨，以雕刻出作品。

在罗马的鼎盛时期，传统玉饰或石刻印章戒指的避邪功能和身份标志功能逐渐隐退，追求奢华成为玉饰手工业进步的主要动力。贵族、妇女都大量佩戴各类玉饰，贵重家具、用品上也都镶嵌各类玉饰，著名的尼禄

^① Martin Henig: “Engraved” Gems A Handbook of Roman Art pp. 152 - 158.

^② 普林尼提到过钻，但在任何罗马遗址中都没有发现，埃及时代的地中海就流行弓钻，但钻矿物材料时须用解玉砂，这种解玉砂来自希腊纳克索斯 Naxos，有解玉砂的研磨，弓钻才能顺利刻出所需纹样来。

皇帝的“金屋”就用了大量宝石、珍珠来装饰。^① 收藏各类雕刻的玉石、宝石制品成为富人的时尚。庞培、恺撒、奥古斯都均收藏大量的饰玉珠宝。将饰玉纯粹作为工艺品收藏，打破了饰玉本身的文化禁忌，更加拓宽了制玉手工艺的题材和促进了技巧的发展。这一点与楚人一直视玉为身份等级象征，从而阻碍了制玉技术的进步和创作题材的多样性是不同的。罗马制玉工艺的代表作品是现藏于奥地利康斯多里斯克博物馆（Kunsthistorisches）名叫“奥古斯都（Gemma Augustea）的缠丝玛瑙（缠丝玛瑙 Sardonyx 是微晶石黄玉髓的变种，所雕刻的戒指印章最为罗马人喜爱）浮雕作品。这件缠丝玛瑙宽 22.3 厘米，长 18.7 厘米，黑白两色。它用黑色为底，用白色雕刻人物，可能制作于公元 12 年。上层浮雕奥古斯都凯旋场面，下层浮雕搬运战利品的士兵和战俘共有 19 个人物，色彩对比强烈、人物形象鲜明、雕刻技法细致入微。这一类描绘人物故事的雕刻在罗马帝国时代的玉雕工艺中有相当比例，其余动物、神灵的雕刻也不少，这是在楚人玉雕工艺中很难看到的。

③ 楚国的手工业

1982 年元月下旬，荆州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考古学家们聚集在荆州博物馆，准备清理一具长 2 米、宽 0.67 米、高 0.61 米的内棺。在以往楚墓的发掘中，这种小棺都是现场清理，这次为何来了许多专家？原来自 1972 年长沙马王堆 1 号汉墓出土保存完好的女尸和 1975 年江陵凤凰山 168 号汉墓出土

^① 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242 页。



完好的男尸之后，考古学家就十分留意密封良好的棺槨的清理工作。眼下这具棺材出土于江陵马山1号楚墓，现场清理时，槨室在密封性能良好的白膏泥中未有丝毫腐朽。在揭开槨盖板后，棺盖上枝叶翠绿的竹竿、边箱内木俑身上的丝绸服饰完好如新，预示棺内会有重要发现。在元月16日田野清理完成之后，该棺被小心翼翼地运抵荆州博物馆，人们期待重视发现古尸的奇迹。当棺盖缓缓揭开之后，映入人们眼帘的却是满满一棺的丝织品，表面覆盖着一床鲜艳夺目的蟠龙飞凤浅黄绢面衾。中国古代的“丝绸宝库”被打开了。仅此一项发现就足可以将楚国的手工业技术带到世界的巅峰水平，这是世界其他文明所无法企及的。除此之外，楚国的矿冶、金属加工、漆器和料器都达到了先秦时代的高峰。

矿冶

考古发现楚地铜矿遗址有湖北大冶铜绿山、阳新港下、湖南麻阳九曲湾等。楚人控制苏皖之后，江西瑞昌、安徽铜陵、青阳等地古铜矿亦为楚人所用。从技术上观察，大冶铜绿山春秋时期的矿冶遗址最能代表楚国的矿冶水准。

铜绿山遗址是1973年发现的，共清理出古露天矿场7个、地下采区18个、采矿巷井400多条、冶铜竖炉8座、冶炼遗迹50多处，另有残渣约40万吨以上。时代早到商代，延续至汉以后，春秋战国时的矿体占有多数。楚国早先是露天采矿，不久转入坑采。坑采方式为联合开拓，即由竖井（斜井）——平巷——盲井（穴道）组合。该法具有矿石剥离量小、运输容易、便于追踪富矿的特点。在矿井支护上，春秋时的矿井已在20—30米以下，矿井截面积为60×60厘米，稍晚达到

80×80 厘米。矿井内的照明、排水、提升、通风都有相应的解决办法。例如通风可能利用不同高度的井口产生气压差输送新鲜空气和利用井底燃烧物品以加热空气，形成对流的辅助通风办法。^① 在冶炼上，春秋时的炼炉高约 2.25 米，直径 0.7 米，装有 2 个鼓风口，炉底有金门。据模拟实验，它一昼夜可处理矿石 1200 公斤，产粗铜约 350—400 公斤。炉渣的熔点在 1100 以上，含铜量为 7%，它说明粗铜冶炼已达到现代冶铜的标准。^②

金属加工

中国青铜器的文化特点是与政治紧密联系，技术特点是用范铸法，它能应付各种复杂青铜器的制作要求，但这也抑制了失蜡法技术在中国的运用。春秋中期楚国开始采用失蜡法来加工青铜器的附饰。失蜡法即是用蜡壳裹在两层耐热涂料中，翻制空心铸件的方法，小型铸件则用实心蜡模，楚人所用即为后者。蜡模加热后会从导管中流出形成铸件形状，将青铜熔液灌入后即得到所需铸件。1978 年河南浙川下寺 2 号楚墓出土一件长 1.07 米、宽 0.47 米、高 0.18 米的铜禁，其周缘的透空附饰即为失蜡法做成。稍后在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中也发现有制作更为精良的失蜡法工艺。这是一套由尊与盘组合而成的仪式用的礼器，尊是盛酒器，盘则一般作水器用，也可置冰，名为“夷盘”或“夷冰盘”，于大

^① 杨永光：《铜绿山古铜矿开采方法研究》，《有色金属》，1988 年，第 1 期。

^② 卢本珊等：《铜绿山春秋炼竖炉的复原研究》，《文物》，1981 年，第 8 期。



丧时使用。上古时人们往往在尊内盛掺有香草汁的酒，祭祀酌以献尸，礼宾时酌以饮客，是重要的礼器。出土时尊置于盘中。尊盘造型典雅，制作精良考究，纹饰繁缛华贵。尊与盘的口沿均饰以蟠虺纹透空花纹，它分为高低两层，内外两圈，错落相间。每圈有 16 个花纹单位，每个花纹单位由形态不一的四对变形蟠虺组成。表层纹饰互不关联，彼此独立，全靠内层铜梗支撑，而内层的铜梗又分层联结，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整体，达到了玲珑剔透、层次分明的艺术效果。从实用的功能上看，繁缛的装饰费工费时；从仪式的功能上看，繁缛纹样给人带来世俗的审美快感要大于宗教的虔诚。因此这种失蜡法技术的采用一是在炫耀技术，二是出自艺术的欣赏目的。这种新技术的使用适应了当时青铜器的总体风格都逐渐摆脱凝重厚实的仪式作风，趋向繁缛的为装饰而装饰的艺术作风之变化，尊盘是这种极端化的产物。出土时盘内“曾侯乙”的铭文系改刻其先君的铭文而成。这两个例子反映出春秋中期之后，楚地的金属加工工艺已达到中国先秦青铜器制作技术的高峰；其技术之复杂，目前尚无任何希腊罗马的青铜器可以比拟。

楚国失蜡法的技术没有希腊早，来源尚不清楚，但它的出现是由于追求华丽纹样的装饰成为新时尚的结果，反映出青铜器的政治功能开始被审美要求所冲淡，追求繁缛的纹样风格成为了新技术消费的动力。与此同时，失蜡法以外的各种镶嵌、铸镶技术也纷纷出现成为战国时期青铜工艺的一大景观。楚国代表性的器物还有江陵望山楚墓、包山楚墓出土的错金银的铜尊等。

楚地金属加工技术的另一重大成就是反映在青铜编钟的铸制上。以淅川下寺的楚钟和曾侯乙编钟为例，它

们的铸造集中反映了我国先秦时期青铜器范铸技术的水平。编钟除了严格遵循《考工记》“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剂”的配方，含锡量控制在14%左右外，还有意识的加入少量的铅（平均含量为1.85%），以增加声波传递的阻尼作用，加快钟声的衰减，以利于演奏。通过对曾侯乙编钟的研究，发现当时已能用科学的方法做出合乎音律的双音编钟，具体成就是：一、利用数学关系预先调出合律的双音钟模，二、利用青铜合金比例控制音色，三、利用预热铸型、延时脱范的铸造技术来稳定编钟后期调音的音频，四、掌握了合瓦型钟体的双音发声机制，在一件钟上调出能发两个和谐三度音的双音钟。在范铸过程中，还采用了预热铸型和延期脱范等技术，使钟均匀退火，以利于后期调音的音频稳定。^①

楚地金属加工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武器制作上。一是青铜剑采用了复合铸造法，即剑脊、剑刃分别用含锡量为11%、18%的青铜铸造，合成后达到硬度和柔性的完美统一。^②二是吸收吴、越青铜剑的防锈技术，采用了金属膏剂涂层这种金属表面合金化的技术。^③楚国一些出土的带有暗纹的戈、矛、剑上面经过金属膏的涂层处理后，可以产生装饰和防腐蚀的双重效果，在南方潮湿环境中利于兵器的保养。

① 舒之梅等：《曾侯乙墓的发现与研究》，《鸿禧文物》，中华民国八十六年，第2期。

② 后德俊：《楚国科学技术史稿》，湖北科技出版社1990年，第35页。

③ 谭德睿等：《东周铜兵器菱形纹饰技术研究》，《考古学报》，2000年，第1期。



丝织技术

丝绸是中国的发明。楚国丝织手工业在商代和西周传统上有新的发展，它可以归纳为3个方面：一是政府加强对桑田的管理和蚕丝生产的控制。如公元前519年，吴、楚两国民女争桑叶引起地方当局的过度干预导致了两国战争。^①从马山楚墓蚕丝的检测中可知楚国织物的蚕丝生产是从蚕的育种、饲养方面就开始了，各项工艺有严格的控制。^②二是政府有专门的织造机构“织室”，为发展复杂的纺织技术和大规模、专业化的织物生产提供了财力保证。如马山楚墓的纺织品中有很复杂的织锦，像“舞人动物纹锦”纬向宽49.1厘米、经向长5.5厘米，经纬密度为156根×52根/平方厘米，全幅宽50.5厘米，共用7698根经线。它只能用结构复杂高约2层楼的“束综提花机”才能织造，民间百姓一般不具备这种条件。^③在马山楚墓出土的楚衣物上也的确发现了官府工匠和机构的名称。三是染色技术进步。楚国的染色剂有植物和矿物两类，织物色彩有红、黄、绿、兰、棕、褐、黑、藕色多种。引人注意的是楚人用朱砂（硫化汞）做染色剂，克服了朱砂不溶于水、不易附着丝织物的困难，不过它究竟使用何种媒染剂尚不清楚。在植物染料中，楚人用矾石做媒染剂解决了色彩附着问题，出土的楚墓丝织品经2000多年，仍色泽鲜艳。

① 《史记·吴太伯世家》。

② 彭浩：《楚人的纺织与服饰》，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14页。

③ 《楚人的纺织与服饰》，第24—26页。

目前考古发现东周时期楚国墓葬出土的丝织品最多，分布最广，北到阿尔泰，南到印度支那半岛都可发现楚地民间丝织贸易的证据。几个比较重要的墓葬如曾侯乙墓、马山 1 号楚墓、荆门包山 2 号墓、郭家岗 1 号墓、江陵望山楚墓、长沙左家塘楚墓、信阳长台关楚墓中出土的丝织品种包括了几乎已知所有的东周时期的丝织品种，有绢、纱、縠、绋、绮、罗、锦、组、绦、纨等。织造技术有刺绣、提花、平织、绉（绢、革复合）、针织等，它对汉以后丝织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漆器

漆器是中国独有的手工业技术。1950 年代，长沙楚墓大批出土的楚国漆器与公众见面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到 20 世纪末，楚国漆器的研究已成为与楚国青铜器研究并立的一大门类。相对中原地区及世界其他文明很少漆器或者没有漆器而言，漆器几乎就成为楚国物质文化的象征。实际上早在商代和西周，漆器已在仪式场合作为礼器使用，只是因北方地下保藏条件不好，难以见到完好的漆器。目前考古所见数以千计的先秦漆器绝大多数出自楚墓和楚地的墓葬如曾侯乙墓，其数量庞大、保存完好、制作精良、修饰华美蔚为大观。

楚国漆器种类繁多，按材料质地有木、竹、青铜、陶、皮、苎麻等；按器物用途有礼器、乐器、兵器、葬具和日常杂器等，形成了庞大的器类，显示出楚国漆器手工业的发达。这其中有几个重要因素：一是与楚地青铜技术进步一样，是资源优势。楚国是漆树的原产地之一，鄂西至今仍是国漆的主要生产基地。二是南方潮湿的环境易疏松陶器、锈蚀铜器，漆器的轻便防水有利于



它的普及。三是贵族以漆器为礼器，刺激漆器向民间生活用具演变。四是政府对漆园和漆器手工业进行有效管理保证了漆器技术的发展。

考古所见楚国最早的漆器出自春秋中晚期墓葬，战国早、中期是漆器盛行期。楚地高级贵族墓动辄随葬数十、数百件漆器。如春秋的当阳赵巷4号墓有20件，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有230件，信阳长台关1、2号墓分别有150、236件，战国中期的长沙浏城桥1号墓有60件，江陵望山1、2号墓，沙冢1号墓分别有97、125和29件，战国晚期的包山2号墓也有81件。这些漆器多是作为礼器使用，到战国中后期，生活日用漆器如耳杯一类开始大量出现。我们按已发掘的3个楚墓群的时代排序可以看到这个变化。

春秋早期到战国早期当阳赵家湖的297座墓葬中，17墓出土漆器共68件，礼器有25件，无耳杯；春秋早期到战国晚期江陵九店的597座墓葬中，158墓出土漆器共760件，礼器96件，耳杯210件；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的江陵雨台山558座墓葬224墓出土漆器，共900件，礼器186件，耳杯272件。3个墓群出土漆器墓葬的比例分别为5.7%、26.4%和40.1%，而漆礼器的比例分别是36%、12.6%、20.6%，日用耳杯的比例为0、27.6%和30.2%。

战国时代漆器需求的增长促使政府加强对漆器生产的管理，庄子曾为漆园吏，楚国当有相应的机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曾记载当地漆园管理不善受到处罚的例子，其机构和措施当是借用楚国的无疑。以出土漆器的相同类型来看，无论是礼器的俎、豆还是仪式用器的镇墓兽，各地风格都基本接近，尤其是耳杯几乎可以肯

定是作坊批量生产的结果。云梦秦墓中曾发现有漆器贸易的现象，估计楚地也会同样存在。由于政府权力的介入，楚地漆器的技术水平是当时先秦各国最高的。它表现在制漆工艺上发明了油漆技术，所添加油料为植物油。在漆胎的制造上发明了“脱胎”技术，所谓“脱胎”是用苧麻为胎，它至今仍为漆器手工业所沿用。

料器

料器就是中国古代的玻璃。西周时期贵族的墓葬中就有料器出土。春秋时期的楚墓未见玻璃，战国时代才普遍发现玻璃。楚地玻璃有两大类：一类是玻璃，另一类是准玻璃，即一种内核为石英砂等粉状物质，外层包裹釉料的料器，西方称之为“氟昂斯”（Faience）或“准玻璃”（Pre - glass）。^① 这两类材料的成份检测是现代考古学鉴别文化类型及技术来源的重要依据。^② 楚国料器的成份复杂，大致可分 3 种：1. 二氧化硅、铅、钡。2. 二氧化硅、钾。3. 二氧化硅、钠、钙。^③ 第一种只见于湖南楚墓，后二种分布广泛。从技术上看，铅钡玻璃是楚国制造，余为西方贸易传入，如曾侯乙墓出

① 氟昂兹（Faience）是意大利小镇，因产类似玻璃的锡釉制品销往法国，法语称这种“玻璃”为 Faience。实际上，Faience 在公元前 3000 年的埃及就已出现。之所以称 Faience 是为了不与欧洲早期二氧化硅釉的器物混淆（参见 Prudence M. Rice：Pottery Analys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t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td. London. 1987, p. 19.）。氟昂兹现在正确的名称叫做马略尔卡釉（Majolica），是指一种十六世纪意大利的装饰陶器。

② Colin Renfrew：Archaeology. Thames and Hudson Inc. 1991. p. 295.

③ 后德俊：《楚国的矿冶髹漆和玻璃制造》，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第 278 页。



土的钠、钙玻璃经鉴定后认为是由阿拉伯传入的^①早在公元前 2500 年，美索不达米亚已制造出纯玻璃珠，成份是 75% 的硅、15% 的苏打、10% 的石灰，形成钙钠玻璃。它很早就经贸易网络传入中国，其北方路线经中亚、玉石（丝绸）之路，西周发现的料器多是这种贸易的产物。南方路线经印度渡海到马来半岛再北传中国。1905 年，英国学者伯克（W. W. Bourke）率先在马来西亚的甲米（Krabi）发现印度来的琉璃珠。^②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清文化遗址都相继发现印度传入的西方料珠和玻璃。^③

料器质地晶莹，色彩斑斓，它既是货币上品也有埃及料珠的那种护身符和装饰作用，受到楚人的喜爱。屈原《离骚》中“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的“陆离”，一说为玻璃。马山 1 号楚墓出土的衣饰上面的确系有琉璃珠、琉璃管。战国中后期楚国料器开始增多，据统计，出土料器的墓葬占到了 5%。在江陵九店 39 座墓出土的 253 件料器中玻璃珠有 38 件，类似埃及氟昂斯式的玻璃珠和料管分别有 26 件和 144 件，化学成分为硅、铅、钠、钙等，与埃及氟昂斯基本一致。^④ 埃及氟昂斯由硅酸盐的滑石类，石英加钠碱制成，硅、钙、钴等成份却非常确定。楚国料器采用的压模制作方

① 《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第 658 页。

② Bourke: Some archaeology notes on Monton Phuket,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1905, pp. 49 - 62.

③ Charles Higham: The Archaeology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p. 207.

④ 《江陵九店东周墓》第 332—333 页。

法和料器所特有的孔雀兰色泽都几乎与埃及氟昂斯一致。^① 埃及的氟昂斯后传入希腊罗马，与西亚的玻璃技术都对罗马玻璃产生了影响，楚国料器或许也间接受之影响。

玻璃制造比较复杂，近东和西方这方面的手工业技术明显高于中国。楚地尚没有发现春秋中期以前的琉璃，目前所见的楚地玻璃仍较原始，它们明显是在外来技术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外来技术的影响可能有两方面，一是直接通过进出口贸易从西方接受；二是使用中原已消化后的技术。1977年在河南登封发现的战国熔铁炉中有玻璃状结晶，近年经分析研究，知道其成份为钠、钙，有人主张为中原独创。独创恐怕仍有疑问，但这类制造技术会流传到楚国不会有什么问题。^② 楚地迄今没有发现玻璃遗址是一个遗憾，但大量的不同于西方的铅钡玻璃应该是楚人手工业能制造玻璃的证据。另外也要说明，有人喜欢将非钠钙玻璃的琉璃都说成是楚国自制的。其实除氟昂斯系统之外，西方玻璃成份十分复杂，既有钠钙玻璃（Soda - lime glass），也有钾玻璃（Potash glass）和铅玻璃（Lead glass）等。^③ 在没有确凿根据之前，仅楚地制造铅钡玻璃的一项就足以反映出当地玻璃熔炼的水平。这种似玉的玻璃是以重晶石为原料烧制的结果，以追求似玉的效果，它有文化属性的根

① The British Museum: "faience" The Dictionary of Ancient Egypt. British Museum Press. London. 1995. pp. 95 - 96.

② 周双林等：《河南东周阳城熔炉玻璃成份分析研究》，《考古》1999年第7期。

③ E. R. Catey: Analysis of Ancient Glass. 1790 - 1757. New York,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1962. pp. 93 - 104.

据，其技术是世界玻璃史上的首创。

在希腊、罗马、楚国三者之间，希腊手工业的发展水平最高，它源于希腊很早就有的商业海外贸易，其优势在于2个重要因素。一是能很快吸收东方的技术，二是大规模使用了奴隶劳动。罗马手工业在罗马人心中是贱业，这一点与中国古代没有两样。罗马又是以农业经济为特征的社会，富人有钱后宁愿把钱投入农业、做包收商、投机买卖，也不投入手工业，所以罗马的手工业不及外省如高卢、西班牙发达。楚国的手工业规模最小，但它在王权或王权与神权混合体的支配下，生产并不计成本。在个别领域如青铜器、丝织品方面也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高峰。

CHUWENHUA
ZHISHI CONGSHU
楚文化知识丛书



军 事

①希腊的军事

爱琴文明出现之后，战争就伴随着不断涌动的移民浪潮在种族、城邦、国家之间时断时续地上演。希腊英雄时代最为人熟知的战争是发生于公元前1260—公元前1250的特洛伊战争。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迈锡尼的商业扩张通道受到了特洛伊的威胁。在此后的1000年的时间内，互不统属的各种希腊城邦遍及地中海。城邦居民操希腊语，读写希腊文学，崇拜希腊诸神，实行贵族式的民主制度。若按中国“大一统”标准，它仅仅缺少一个共同拥立的君主。当时比希腊文明水准要高的埃及、腓尼基、叙利亚、波斯没能形成一个共同的文化圈，希腊却做到了，地中海成了“大希腊”的内湖。从军事技术看，其他文明在使用铁兵器、用马作冲锋工具、发明方

阵战术都比希腊要早，而特洛伊战争这种大规模渡海作战的方式在希腊向外殖民的过程中却很少出现。这也说明在希腊文明的扩张中，军事没有扮演主要角色。

希腊早期的殖民是因为缺少耕地而非掠夺和征服。第一个海外的希腊城邦是公元前 750 年在腓尼基建立的。约 200 年的时间，殖民城邦遍及地中海、黑海，到公元前 6 世纪中叶才基本停止。这种殖民活动刺激了商业的繁荣而不是武力的征服，殖民城邦与母邦之间只有宗教精神的联系，而无政治瓜葛，这也是希腊式征服与罗马和楚国的扩张最为不同的一点。纵观希腊发生的战争，斯巴达之外，攻城掠地从来就没有成为希腊战争的主要目的。几次著名的大战如希波战争（492—479 BC）、伯罗奔尼撒战争（431—404 BC）、留克特拉战争（Leuctra 371 BC）等，其结果都没有出现统一局面，相反是为希腊城邦的更自由化的发展开辟了空间。

希腊的军事特点和成就由希腊文化的背景所决定，早期的希腊移民到希腊之后为防止入侵，就在所居地的要塞建立卫城（Acropolis，意为高墙），围绕卫城形成了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城邦（Polis）。“Polis”是希腊语“πολις”的英译，意思是城市国家（city state），但它既不像城市，又不像今天的国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只是一个社会团体，同时又是一个有道德的武装团体。^①他认为柏拉图所说的理想城邦的公民为 5000 人太多，因为加上妇女、奴仆，城邦人数就几倍于 5000 人。10 万人的城邦在亚里士多德眼里几乎难以想像，原因就在于战争时期，城邦的公民都是军人，人口一多，城邦的供养就成为问题。当时公民人数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 45 页。



超过2万的城邦只有雅典等3个。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阿提卡地区人口约为35万,雅典人口占了一半,而阿提卡的面积为2千多平方公里,仅仅相当于中国方圆百里的一个县。公元前480年,科林斯有5万公民和6万奴隶,面积只有830多平方公里。在希腊靠兼并土地的城邦如斯巴达控制麦西尼亚(Messinia),面积达到8000多平方公里是个罕见的例子,多数情况是城邦之间的天然障碍阻挠了兼并。其社会的原因更为重要,即希腊人的爱好自由的性格和个人主义的本质使之不会为乏味的政治共同体——“国家”而牺牲生动活泼的文化道德共同体城邦。^①由于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城邦制度决定了希腊公民即军人的兵制,继而也限制了城邦的军事活动的范围和不需要制定长远的帝国式的战略目标。与罗马、楚国的军事比较,希腊的军事成就十分有限。

在梭伦(Solon 640—558 BC)改革(594 BC)前,阿提卡的人民分为“Hippes”即贵族,拥有马匹,可以编成骑兵。“Zeugitai”即农民,是自备甲冑武器的重甲步兵(Hoplites)。“Thetes”即手工业者、受雇佣的劳动力,组成轻装步兵3类。亚里士多德指出,一个好的城邦除了陆军外还应有海军,海军的水兵从公民中招募。桨手则为农奴或雇工。在适宜于骑兵作战的平川可以建立寡头城邦,当时骑兵必须家庭富饶才负担得起。^②希腊社会早期曾接受东方的战术,以骑兵为陆军的核心。在公民即士兵的制度推广之前,这种军事组织结构也不可能产生出民主制,只不过希腊大多数城邦的地形不利于发展骑兵。除了亚里

① 《希腊人》,第84—95页。

② 《政治学》,第357—359、327—32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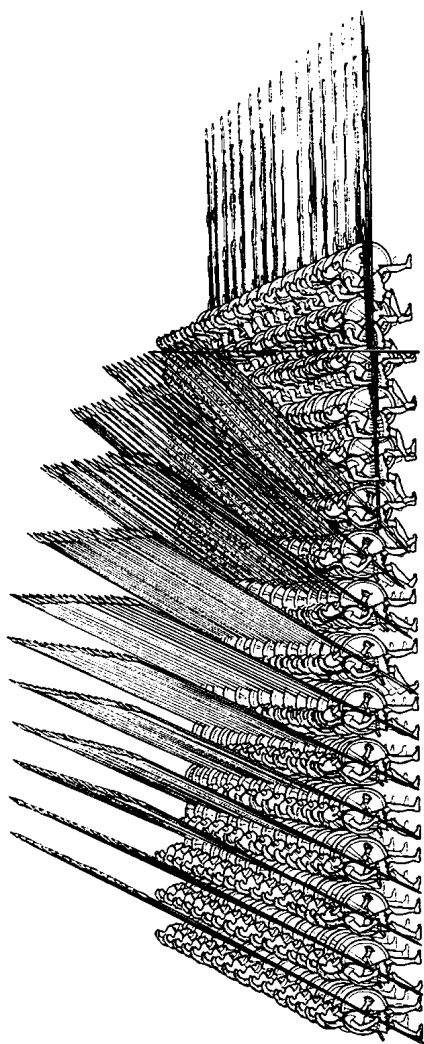
士多德列举的如优卑亚 (Euboea) 几个寡头城邦外, 骑兵在希腊的几百年时间的战争中只被当作辅助兵力使用, 而步兵才是城邦间战争的主力。^①

希腊陆军标准的作战方式是方阵 (Phalanx), 它由东方传入, 为斯巴达人最先采用。又由于冶金技术的进步, 甲冑成本逐渐降低, 每个公民都有能力购置一套重甲步兵的装备, 它包括一个金属的头盔、胸甲、胫甲和股甲, 一个圆形盾, 一支 2.7 米长的矛和重型的剑。这种变化使贵族和平民在战场上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典型的战术是双方的方阵相对前进直到交战。战斗实际是蛮力的对抗, 战胜的一方通常是队形稳定、纪律严明和体魄强健的一方。在方阵中, 公民各有位置, 荣誉地位最高的在第一排, 地位最低的在最后一排 (第八排), 实际上贵族和平民的地位已逐渐模糊了。斯巴达人的方阵是希腊各城邦中最厉害的。首先是斯巴达有职业军人, 其次其方阵组织复杂, 每个斯巴达士兵至少都有一个背盾牌的人跟随。在公元前 479 年抗击波斯人的普拉提亚 (Plataea) 战争中, 一个重甲步兵就有 7 个农奴^②跟随, 使整个方阵达到 8 个人的纵深。这些农奴还负责救护主人, 处死负伤之敌。直到公元前 371 年留克特拉战争之前, 这种方阵战术所向披靡。

希腊采用方阵这种简单战术的原因也很简单。在城邦制度下, 士兵就是公民, 公民多数是农夫, 加上战争目的往往与粮食有关, 战争时间也多发生在农闲的秋季

① 《政治学》, 第 181 页。

② Helot 即农奴 (黑劳士), 是指斯巴达征服麦西尼亚后当地的全体居民。



图六 希腊的方阵队形

(这也是不需要常备军的原因)，一次战役的时间就不能太长（农夫还需要照料自己的庄稼），往往是一战定胜负，装备重的一方就容易获胜。方阵作战一般选择在少数几块平地进行，战斗一展开就无法控制，由于农夫没有职业训练，战场上也无需指挥，保持方阵队形就是取胜的惟一办法。在丘陵地带作战或使用骑兵等机动兵力反倒易使方阵失去防御和进攻能力。这种种限制使得希腊各城邦没有去建立一支适应长期作战的常备军来完成军事征服。

希腊早期城邦战争的起因都是商业贸易而不是土地征服。在优卑亚与厄立特里亚（Eretria）之间为争夺利兰丁平原（Lelantine）发生的第一场希腊战争中，双方对有争议的土地都无兴趣。^① 公元前 664 年科林斯与科拉西人（Corcyraeans，即科孚岛 Corfu 人）进行的希腊历史上第一场海战是母邦与其殖民地的战争，也与领土无关。^② 希腊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其因果也不像罗马帝国和楚国那样明确地开疆扩土，建立行省、郡县制度。希波战争的原因是希腊及殖民地城邦的商贸发展，逐渐在海洋上开辟了一条自西班牙东岸到黑海的贸易通道（希腊——意大利——西西里），而波斯的扩张却控制了黑海通道，使希腊各邦的粮食和工业品的进出口受到威胁。它控制下的东方水陆联运道路（印度——波斯——西西里）与希腊的贸易通道竞争激烈，战争自不可避免。公元前 490 年 9 月

① 《希腊人》，第 100 页。

②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 年，第 1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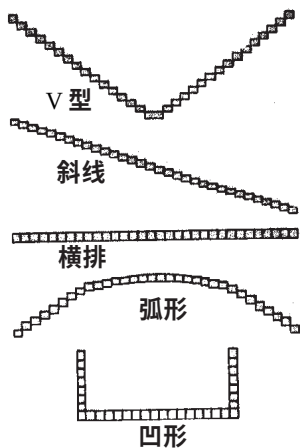
21 日，希腊约 11000 人的军队与数倍于己的波斯军队在马拉松（Marathon）平原作战，结果希军大胜，波斯损失 6400 人而希军仅伤亡 192 人。公元前 480 年 9 月 23 日的撒拉米（Salamis）海战是决定性的战役。波斯集中了 1207 艘战船，3000 艘运输船约 18 万人的兵力，^① 与希腊 8000 多兵力和匆匆组建的 324 艘三列桨的战船（trireme）进行海战，结果希腊获胜。希波战争结束后，波斯放弃了争夺海上霸权，希腊由此进入黄金时代，繁荣达 300 年之久。导致希腊城邦制走向衰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一是雅典获得海上霸权之后向西扩张影响到斯巴达和科林斯等城邦的传统利益，二是雅典推行民主制受到实行寡头制度的斯巴达的反对。这场长达 27 年的战争结束后，雅典失败，城邦制度实际上已终结。公民军在希腊逐渐被职业化的士兵（雇佣兵等）取代，而斯巴达也未能就此统一希腊，称霸地中海。

希波战争前，雅典没有像样的海军，舰船只有 50 支桨。希波战争中，在地米斯托克利建议下，组建了一支 200 艘的三列桨（170 桨）的舰队。^② 同时征召全体居民而不仅是公民充当水手。舰船笨重坚固，与由埃及、腓尼基人组成的波斯快船交战正好采用最简单的撞击战术。即将敌舰一侧的桨全部撞断后，再掉头撞击敌舰中部。希腊船上有 14 个重甲步兵、4 个弓弩手，决

① 希罗多德认为有 264 万人，加上辎重勤杂人员共 528 万人。军事史家却认为没有那么多（《历史》第 540 页）。富勒：《西洋军事史》第一卷，军事科学院 1980 年，第 34 页。

② 希罗多德：《历史》第 521 页。

战时还要采用跳帮的战术。学者指出“这是陆地居民制造的船只，其想法是用舰只的撞角猛撞敌舰，然后在甲板上解决战斗。”^①稍后在远征叙拉古（Syracuse）时，雅典的船只上安装了投石机（dolphins），增加了舰船的攻击性（415 BC）。



图七 希腊军队的阵式

在方阵战术中，骑兵不是主力，它和轻装甲兵（Peltasts）只是辅助兵力。方阵以每列 8 个重甲步兵排成密集形纵队结构，有中部和两翼，靠笛声控制进退。因其简单，它在公元前 7 世纪流行全希腊。公民没有多余时间去掌握复杂的战术和从事机动作战，城邦战争的性质也无此需要，因而方阵流行几百年无变化。具体的方阵形式有“V”形（open wedge）、斜线（oblique）、横排（straight）、弧形（crescent）、凹形（open half）

^① 《希腊人》，第 209 页。



square) 等。^① (图七) 由于方阵作战只需纪律和勇气, 军事谋略作用有限, 希腊的战争艺术比中国和罗马落后很多, 许多胜利和新战术都带有偶然性。例如马拉松战役中, 雅典 10 个部落轮流派人作司令官。9 月 21 日轮到米尔提亚戴斯 (Miltiades 550 ? —489 BC) 指挥, 他考虑到波军主力为弓弩兵, 希军突破波军正面必须加速通过弓弩的射程 (约 200 米), 而长达 1600 米的方阵很难保持队形, 于是他将方阵中部减去 4 排, 两翼 8 排不变, 希望保持与两翼一致的速度。结果在正面受到波军阻击后, 两翼的速度未变使方阵形成凹形, 波军反而陷入希军不经意造成的包围出现混乱, 导致失败。^② 斯巴达职业军人在呆板的方阵使用的冲击战术 (shock) 使它所向披靡, 直到公元前 371 年底比斯将军伊巴密浓达 (Epamiondas ? —363 BC) 在留克特拉战争中发明斜形阵式 (减少中部和右翼并增加左翼人数, 纵向人数达到 50 排), 一举突破斯巴达方阵, 传统方阵战术从此衰落。该役意义深远, 它导致斯巴达的衰落和马其顿人入主希腊。马其顿方阵即以斜形阵式为基础, 横扫欧亚。其方阵有 1536 人, 每列 16 人。重甲步兵手持 6.4 米的长矛 (因矛太长, 后排士兵或高举, 或将矛放在前排士兵的肩上) 和盾牌, 近敌时掷出长矛再用短剑搏杀。方阵右翼部署骑兵, 空挡由机动的轻步兵连接, 后面是弓弩兵, 作战按斜行序列前进。在罗马军团出现之前, 它最具威力。

^① Peter Levi: Atlas of the Greek World. Phaidon Press 1982. p. 134.

^② 《历史》, 第 444—450 页。

城邦制度的衰落使机动战术和职业军人受到重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将军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e）发现在与埃托利亚人（Aetolian）的战斗中（426 BC），对方的机动的轻装的标枪兵能够击败方阵的重甲步兵。^① 到公元前 390 年，雅典的伊菲克拉特斯（Iphicrates）才建立了一支轻步兵，他们穿棉或皮胎短衣，携带轻便圆盾、标枪和刀剑将斯巴达一个营（Mora）歼灭。它是希腊职业军人兴起的预兆。当时希腊将军色诺芬（Xenophon 430—354 ?）率 13000 雇佣军投靠波斯的小居鲁斯（The younger Cyrus ?—401），转战 3200 多公里，历时 5 个月，到过帝国的中心，最后回到希腊。此事震动了希腊城邦，显示职业军人的优点，并鼓舞了亚历山大征服亚洲。^②

在海军方面，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科林斯改进了原始的撞船战术，在船头设置专用撞船的吊锚架，雅典舰船竟然不是对手。^③ 雅典侧面撞击敌舰船桨的技术需要更专业的水手才能完成。在城邦海战频发的情况下，只有靠职业军人来作战。战争的变化也说明了城邦制必然衰落。

考古发现的希腊武器比楚人的要早。在克里特、迈锡尼文化中，攻防武器剑、矛、盾、甲冑都有发现。米诺斯文化中的剑已长达 1 米，晚期还发现“角剑”（1350 BC）。它与楚国铜剑采用剑格的作法不同，护手是在靠

①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 249 页。

②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58 页。
《西洋军事史》第一卷，第 93 页。

③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 52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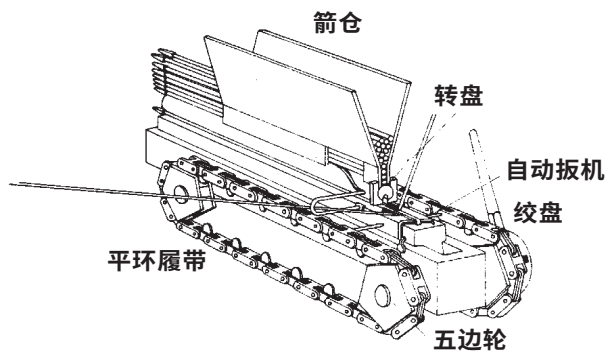
剑柄处的刃部铸成三角状并可以增加剑的强度，该形制一直影响至今。施里曼在迈锡尼的一座墓葬（约 1650 BC）中，一次发现 90 多柄剑。克里特、迈锡尼的剑装饰华丽，手柄镶金、象牙、水晶十分普遍，这与剑可能用于仪式有关。迈锡尼已有头盔和护腿。《伊里亚特》中曾描写奥德修斯所戴皮盔“里层用多绳条紧固地网紧，外面有牙齿发亮的野猪的闪光獠牙分插在左右两侧。”^① 这种头盔也被施里曼发现。

荷马时代已不流行车战，战车仅是城邦体育竞赛的工具。陆战时士兵使用长矛、标枪和剑，很少用弓弩，这也与希腊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传统有关。希腊的单兵装备和攻防器械比楚军复杂，重甲步兵和轻步兵携带的武器都在两件以上，方阵各排的长矛均不一样。军种中有（弩）炮兵和工兵专门应付城市的攻防。希腊城市为石材建造，十分坚固。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地米斯托克利修筑的底里犹斯城墙有并行的二辆四轮马车宽，石墙当中填满碎石和泥土，墙外又用铁和铅版加固。^② 因此撞城槌、弩炮等攻城器械也应运而生。公元前 400 年左右，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使用新型抛弹机（katapeltes），可以射出更大的石块。它后来成为亚历山大炮兵的利器，亚历山大首先将它用于野战阻击敌军。^③ 此外，罗得岛（Rhodes）发明的连发弩炮和叙拉古发明的可发射火箭的大型弩都十分复杂。前者较楚人的连发弩威力要大，后者类似《墨子·备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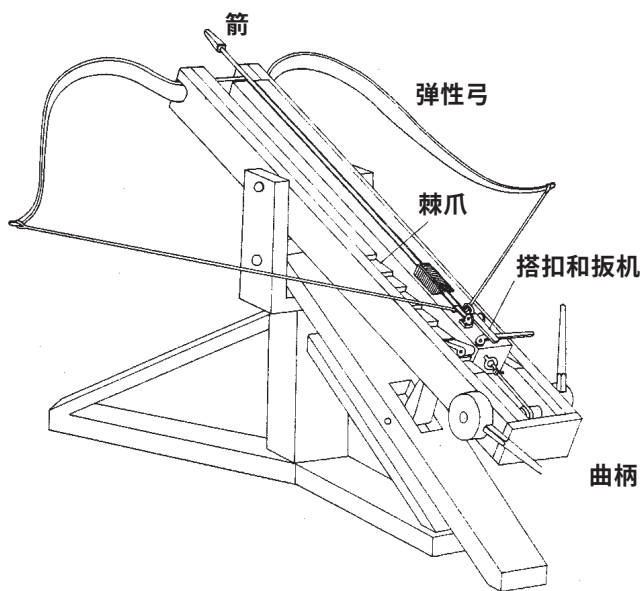
① 《伊里亚特》，第 252 页。

②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 66—67 页。

③ 《亚历山大远征记》，第 18 页。



图八 希腊罗得岛的连发弩



图九 叙拉古的大型弩

临》所称的强弩。在海军的装备中，雅典一直保持优



势。希腊一般是三列桨舰，上层操长桨的老水手指导下层操短桨的新水手。舰上有海、陆两套军械，如陆军的投石机等。到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已有四五层桨的战舰，它要求更专业的配合，其速度和攻击力都是希腊历史上最为强大的。

②罗马的军事

在西方战争史中，罗马军团是一支令人生畏的武装。它萌生于王政时代，从共和制到帝国时代都在不断的变化，其兴衰也基本上代表了罗马的命运。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个部分，西罗马的主力已是雇佣军。476年，日耳曼雇佣兵首领奥多亚克（Odoacer 430—93）推翻罗马皇帝罗慕洛，西罗马灭亡。吉本评述道：“在远处作战沾染上异族人民和雇佣军各种恶习的常胜的罗马军团，先是压制共和国的自由，后来则是冒犯皇帝的威严。急于维护个人安全和公众和平的皇帝苦于无计，只得采取了破坏他们纪律的下策，使他们对他们的君主和他们的敌人一样可怕了；军事政府的活力趋于松弛，最后更为君士坦丁的不公平的制度所彻底毁灭；从此整个罗马世界便被野蛮人的洪流所淹没了。”^①

王政时代，罗马实行军事民主制。第6代王塞尔维·图里乌斯开始改革军制。他把罗马公民按财产分为10万、7.5万、2.5万和1.5万阿司5个等级。第1级组成98个百人团（centuria），其中18个骑兵百人团的公民（6个贵族、12个平民）称为骑士（eques），余下为重甲步兵。武器有长矛2、短剑1、剑1、头盔、

^① 《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卷，第139页。

胸甲、胫甲和盾。第2级组成22个百人团，装备只少1胸甲。第3、4级均为20个百人团，是轻步兵，没有铜盔甲。第5级为30个百人团，仅装备投石器。无产者组成1个百人团。他们通通混编成军团（legion）。作战采用斯巴达方阵的震荡冲击战术，军团分为8排，前6排为重甲步兵，后面是轻步兵（velitis 按户籍、不按年龄组成的步兵），没有预备队。



图十 罗马的重甲步兵

高卢焚烧罗马之后，传统的方阵已不适应作战。公元前366年，卡米鲁斯（Camillus）改革军制。他按年龄和经验组成重甲步兵，将军团分为3部分，即枪兵（Hastati）均为年轻人、主力（Principes）均为成年人



和老兵 (Triarii)。缩小了战术单位，将不灵活的军团分成 30 个中队 (Manipulus 它意为缚在竹竿上的干草，可能是最原始的军旗)。每个中队 120 人，老兵中队为 60 人。另外还改善了武器，采用金属盔和金属标枪 (Pilum)。(图十)

新战斗队形是枪兵、主力兵在前，老兵在后。老兵为后备兵，在危急时才投入战斗，当时罗马有“竟然使用了后备兵”(res ad triarios rediit) 的谚语来形容事态岌岌可危。每一师有 10 个中队，纵深为 4 排，中队间隔一个中队的正面宽度。战术单位是支队 (cohort)，包括 3 种中队和 120 名轻步兵，30 名骑兵共 450 人。10 个支队为一军团，共计步兵 4200 人，骑兵 300 人。在战斗序列中，各中队为棋盘格部署，后排掩护前排，骑兵保护侧翼。战场指挥是百夫长 (centurio)。第 1 个百人团的百夫长也是整个中队的队长，第 2 个百人团的百夫长为副手。百夫长从有军功的士兵中选任，方阵战术却没有战地指挥官。另外，罗马设立了营地 (castra) 制度，每日行军后就要建设防营地。它通常是一个长方形、四周有壕沟和土墙的区域，每一面有 4 个出口。营地的制度使敌军无法偷袭，它是战争时间增加后的产物。

军事改革后，军团的机动作战能力大大增强。中队结构有很大的战术弹性，使原有方阵只有一次的冲击变成一连串的攻击。通常战斗是由轻步兵最先投入，他们携带剑 1 支、标枪 1 支和 1 盾牌。标枪矛头较细，投出

后立即弯曲，敌人拿到也无用处，无法反掷。^① 他们如被击败，则退入间隔，由枪兵、主力兵对敌。枪兵携带短剑 1 支，标枪 2 支（它是重型标枪，有长铁矛头，掷出可刺穿盾牌与铠甲）和宽 0.8 米、长 1.2 米的大型防盾（scutum）。防盾由牛皮蒙住两层木板，四周镶有铁边。枪兵用齐掷的战术削弱敌军的防御后，再用短剑格斗。主力兵和老兵则用长矛（hasta）进行白刃战。罗马士兵将重标枪与剑配合使用产生了极大的威力。军事史家认为，它的作用相当于近代的火枪与刺刀，投掷标枪为刀剑的肉搏战做准备，“正好像先放一排枪，再用刺刀冲锋一样。”^②

罗马军力增强后，开始了统一意大利的战争。在北部对高卢的战争一直进行到恺撒时代才结束。在中部经过 3 次塞尼乌姆战争^③后，拉丁姆和坎普尼亚（Campania）平原成为了罗马的领土。之后，罗马向意大利南部大希腊（Magna Graecia）各城邦发出战争威胁，他林敦（Tarentum）因此向希腊的伊庇鲁斯（Epirus）的国王皮洛士（Pyrrhus 319—272 在位）求援。皮洛士是当时名将，亚历山大的堂兄，他一心想恢复马其顿式的帝国。公元前 280 年，他率 2 万重甲步兵、2 千射手、3 千骑兵和 20 头战象在意大利登陆，两次击败罗马人。战斗中，罗马执政官列维鲁斯（Levinus）采用中队战术队形顶住了马其顿枪兵方阵的冲击，却无法应付骑兵

① 事见恺撒：《高卢战记》卷 1，25 节。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第 22 页。

② 《西洋军事史》第一卷，第 129 页。

③ Samnite War 343—290 BC，是罗马人对塞尼乌姆人（Samites）的战争。塞尼乌姆是罗马南部的一个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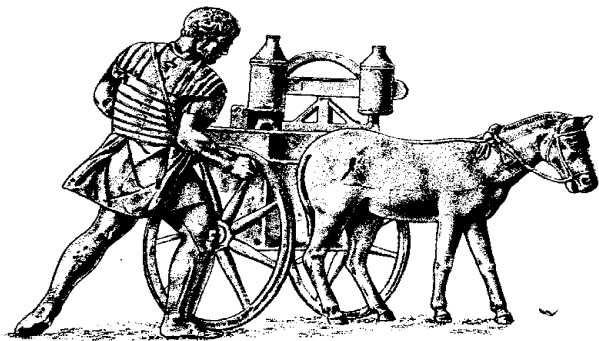


和大象。5年以后，在贝勒文托（Benevento）战役中，罗马军团的轻步兵和机动中队已明显优于马其顿方阵，受罗马射手攻击的大象反扑皮洛士的方阵，引起混乱，罗马军团大胜。此役在军事史上有决定性意义，此后，希腊城邦屈服于罗马军团的威力一个个投降，罗马统一了意大利。

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起，罗马通过3次布匿战争（264—241、218—201、149—146 BC）、3次马其顿战争（215—205、200—197、177 BC）、叙利亚战争（192—188 BC）等一系列战争征服了地中海地区。到公元前130年，已设置了西西里、撒丁尼亚（Sardinia）、科西嘉、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马其顿、亚细亚9个行省。在扩张中，罗马公民都发了财，他们希望逐步免除兵役。骑士最早由军种变成等级，后来成为罗马的金融贵族。其次是长年在海外作战的农民变为职业士兵，造成农庄衰落和土地集中，士兵生活来源就靠饷银和掳掠，结果破坏了军团的纪律。第2次布匿战争后，军团组织开始变化。公元前104年，马略（Marius 157—86 BC）改革军制，一方面允许有产者以外的人（包括外国人、奴隶和罪犯）投军；另一方面改革军团，取消枪兵、主力兵和老兵的划分，因长期征战这一区别已不必要。军团的3师建制不变，每个支队辖5个中队，中队人数增为600人。第1师4个中队，2、3师各3个中队。中队的战术组织是中间为主力兵，左翼为枪兵，右翼为后备兵。骑兵改由外国籍骑兵担任。改革使罗马古老的民兵制度变成了具有雇佣兵性质的职业军队，效忠共和国的罗马军人开始要效忠将领，其职业化进程直到帝国屋大维时代才完成。

共和制下的罗马军团理论上战争结束即解散。内战时期，已职业化的士兵只对发饷人负责。屋大维第1个重要步骤是取消私兵，建立对他个人效忠的统一常备军，军团总数由70个减为28个。陆军分成从公民中招募的军团和非公民身份的辅助队（Auxilia），征兵原则是自愿，公民服役年限是20年，退伍后可获得一块耕地或养老金。辅助队为25年，退伍后可获得公民权。第2是组建近卫军（Praetoriani），共9个支队，每个支队1千人，士兵来源限于意大利人。经过马略和屋大维的改革，罗马军团的战斗力空前强大，军纪、荣誉和传统都是重要因素，但也种入了军阀主义的毒素。

罗马从希腊、马其顿、迦太基和东方引进改良了许多军事装备，罗马的武器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在防卫方面，士兵头戴金属头盔，身着皮制胸甲。重甲步兵胸甲上还有一块铜掩心镜（Pectorale），后来又引入链式和片式二种锁子甲。前者由交错连接的金属环构成，有时也缝在亚麻或皮制的软甲上，缺点是没有刚性，以弹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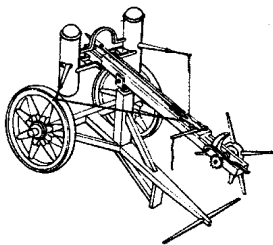


图十一 罗马的抛射机

射来的箭。片甲出现较晚，它克服了前者的弱点，对中



世纪欧洲骑士的装备影响很大。在进攻方面，公元前3世纪，罗马已掌握最先进的攻城技术。特点是使用机械，如云梯、攻城槌（aries）、弩炮（catapulta）、抛射机（ballistae）等。（图十一）



图十二 射程两英里的
罗马野炮

攻城槌是一根附有大铁块的长木头。槌头通常做成羊头状（aries 本意是牡羊），它挂在楼车下，攻城时靠巨大的撞击力攻破城墙。有时楼车分几层，分别安排不同的兵力。楼车上还有升降桥，一旦破城，升降桥可让士兵快速突入城内。晋楚鄢陵之战，双方君主使用楼车（巢车）观战，文献却没有进一步发展楼车技术的记载。弩炮和抛射机都是利用粗绳的扭矩力量射出弓矢、标枪和石块。罗马的弩炮和抛射机巨大，要靠车辆运载。在骡车上的抛射机采用平射，可将100公斤的标枪射出500米远，命中率十分准确。大型弩炮有特制的炮车（carroballistae）运载，它采用曲射，可将250公斤的石块抛得更远。两者配合使用威力强大。恺撒时的罗马军团每百人一门抛射机，每个支队一门弩炮，共装备10门弩炮和60门抛射机。公元前87年的米特拉梯战争（Mithridates War）中，苏拉（Sulla 138 - 78 BC）的军团在攻打雅典当年由地米斯托克利所建的底里犹斯城墙时，充分发挥了机械的力量。云梯、楼车、弩炮、攻城槌全部用上，在一次可发射

20 颗最重的铅弹的打击下，敌方的楼车、城墙都被打垮。^① 公元前 51 年在征服高卢的俾洛瓦契（Bellovaci）人的战役中，恺撒首次把机械投入野战，向敌军发射矛、矢进行狙击。^②（图十二）在公元 105—113 年罗马建立的著名的图拉真纪功柱（Trajan's Column）上还有许多罗马军备细节的浮雕，反映出当时罗马军事技术的高度成就。

在海战上，罗马与雅典相似，一夜成为强国。布匿战争之前，罗马没有海军，迦太基人的舰队却有几百年的历史。公元前 261 年第 1 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公民出资出人建造了 20 艘 3 层桨和 100 艘长约 46 米的 5 层桨的战舰（每舰 300 划手，120 名士兵），但在麦西尼亚的首战就告失败。罗马人可能受到科林斯、叙拉古战舰的吊锚架的启发，在舰首设计了一种吊桥，士兵称之为“乌鸦”（corvi）。乌鸦两侧有栏杆，首端装有搭钩。它可以竖立并左右摆动，接近敌船时放下乌鸦即可钩住敌船，然后吊桥上的士兵冲上敌船展开白刃战。公元前 260 年的米雷角（Milae）海战，首次使用乌鸦战术，大败迦太基海军。当时的希腊史学家波里比尤斯（Polybius 200 - 120 BC）写道，迦太基人十分藐视罗马年轻的海军。当他们看到装有乌鸦的罗马战舰时：“起初他们莫名其妙而对这从未见过的设备感到惊奇，最后因激于对敌人的蔑视，最前面的船大胆地展开了战斗。在战斗的时候，每次舰船都用上述工具连在了一起。于是

① 阿底安：《罗马史》上卷，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第 434—439 页。

② 恺撒：《高卢战记》，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第 217 页。



人们立即从吊桥上过去，而甲板上就发生了战斗，一部分迦太基人被杀死，一部分在惊恐中投降了敌人。因为海上的战斗好像是在陆上的战斗了。”^① 罗马内战时，屋大维手下的将领阿格里巴（Agripa）发明了一种新的海战机械“钳子”（Harpax），它是长约 2.1 米包有铁皮的木杆搭钩，尾部拴有缆绳由滑车控制。它被弹射后拖住敌船，有些类似捕鲸炮。公元前 36 年 9 月 3 日，屋大维与庞培（Pompeii, Sextus ? —35 BC 前三头庞培之子）的海上决战中，钳子起了决定作用。敌军从未见过也无法割断包有铁皮的长钳子和绳索，导致失败。^②

③楚国的军事

楚国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它从土不过百里的小国一跃成为地方千里、带甲百万的大国，统一中国南方，依靠的是文、武二道。文即融合原住民的信仰习俗，“亦夷亦夏”，以获得广泛的支持和拥戴。武则穷兵好战。楚康王曾对令尹子庚（即淅川下寺 2 号墓墓主）说，五年不出兵征伐，就是忘掉先君之业。^③ 楚国立国 800 年，灭国 60 余个，是先秦灭国最多的国家。所谓春秋无义战。

从齐桓公始，战争基本就是围绕中原联军抗楚而展开。它包括南北战线的晋楚战争和东西战线的吴楚战争。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最后集中在以楚国为中心的六

① 波里比尤斯：《历史》第 1 卷 23 节，转引自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第 261—262 页。

② 阿庇安：《罗马史》下卷，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第 509 页。

③ 《左传·襄公十八年》。

国合纵抗秦战争。楚国是六国中军力最强的国家。荀子曾评论楚的军力说：“楚人铍革，犀兕以为甲，坚如金石；宛钜铁铍，惨如蜂蛰；轻利僇速，卒如飘风。”^①它反映出无论是军事装备还是战略战术，楚国在当时世界上都堪称军事强国。

东周时期楚国的战争目标依次是称霸中原、兼并列国和扩张领土。它既没有希腊式的移民战争，也缺乏罗马追求帝国的统一战略。从楚文王 11 年（679 BC）齐桓公称霸到楚康王 11 年（546 BC）宋国的向戌召集诸侯弭兵大会共 134 年，楚国为称霸中原而战。其中 4 次重大战争，宋楚泓之战（638 BC）、晋楚城濮之战（632 BC）、郢之战（597 BC）和鄢陵之战（575 BC）的 93 年间，是楚与中原战争最激烈的时期，中原列国以晋为首组成联军。楚或联秦，或联齐，双方基本是势均力敌。战场是在郑、卫、许、陈、蔡、宋、江、蓼、六、舒等国进行，即今天河南的中部、东部，山东西南和安徽、江苏的北部，是中原的核心地区。作战都以车兵、步兵为主。楚在中原列国的协力抵抗下，一度也让所灭的陈、蔡复国。从楚共王 6 年（584 BC）吴国兴起，到楚威王 7 年（334 BC）楚灭越，楚国的军事中心渐转向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开始放手兼并扩张领土，作战也出现了舟师（水军）。这时的楚境东接齐鲁、西邻强秦，战线漫长。因缺乏统一的雄心，在公元前 278 年秦将白起拔郢之后，楚国的政治中心也东移到安徽寿县。新的秦楚边境无险可言，楚人的商丘、上蔡至桐柏防线与秦东郡（原魏地）、颍川郡（原韩地）、

^① 《荀子·议兵》。



南郡（原楚地）毗邻，防线后面均属开阔平原。楚境内河流上游的浍河、惠济河——涡河、贾鲁河、汝河——颍河已在秦境，季节干燥时可步涉，秦灭楚之战开始之后，楚军在王翦壁垒战术下无功而退，被秦军追击引起平原上的大逃窜。楚都寿春旋即被攻克，楚亡。

楚国是军政合一的国家，政府首长令尹就是最高军事长官。楚国的兵制与中原各国一样，逐步采用扩大的征兵制。士兵来源由国人逐步扩大到野人（无当兵权的人），最后举国皆兵。公元前 528 年，楚平王即位后就去校阅“西国”和“上国”的地方军队，表明楚国已将地方“野人”纳入军队系统，在“编户齐民”的基础上进行征募。^①

当时楚国的军队有三种：即车兵、徒兵（步兵）和甲士。据公元前 548 年楚国司马蔿掩调查全国资源的情况看，楚人的军事装备似乎都由国家征收民间赋税统一负责，而不是由士兵个人负担（“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卒、甲楯之数”^②），这和希腊公民要自负军备不大一样，显示楚国有一支常备军。另外，楚国贵族保留有私兵，作战时也编入战斗序列。私兵的身份性质如何不太清楚，他们的供养是由贵族的封地收入支付的。就在公元前 548 年，楚令尹子木与吴军交战，子强、息桓等 5 位贵族率先用私卒发动进攻，吴军发现楚正规军没有跟进，遂反击大败楚军。

早期楚国的军队编成左、中、右三军，楚王另有近卫部队左广、右广随军行动。作战时，中军为中央控制

① 杜正胜：《编户齐民》，第 56 页。

②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部队，左、右两军有时由地方军队或属国军队组成。城濮之战时，斗宜申指挥息邑和陈、蔡的部队居右，斗勃则率领申邑和郑、许的军队居左。邲之战时，三军均为楚正规军组成。孙叔敖任令尹时进行军制的改革，他将楚军编成五军，“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前锋侦查）虑无（左右搜索），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① 即在三军之外增加行军前锋斥候和左右的搜索部队。在战国晚期包山楚简中，楚国军队建制仍延续孙叔敖的改革不变，有许多“五师”的字样和相应的职官名称。“五师”即是五军的建制。^②

春秋时期，楚人作战以车战为主，战术编制是以战车为中心辅以步兵构成方阵。一车配多少步兵不详，按文献记载是 75 人，到战国时期增加到 100 余人。也有人认为在城濮之战时，楚一车已配 150 人。楚王近卫部队的建制比较清楚，它分成左右两广，共 30 乘车。晋国的栾武子说：“广有一卒，卒偏之两”。杜预的注解是，一广 15 车，100 人为卒，25 人为两。^③ 即广——卒——两。两是战车单位，即 25 人配置一车。春秋中后期，各国都增加了一车的徒兵人数。楚国配一车人数在 150—200 之间。

楚国徒兵分为组甲、被练二种，具体形制不详。从楚墓出土的甲冑推测，二者可能分别相当于希腊的重甲步兵和轻甲步兵，不过装甲是由皮革或丝麻制成的。战

① 《左传·宣公十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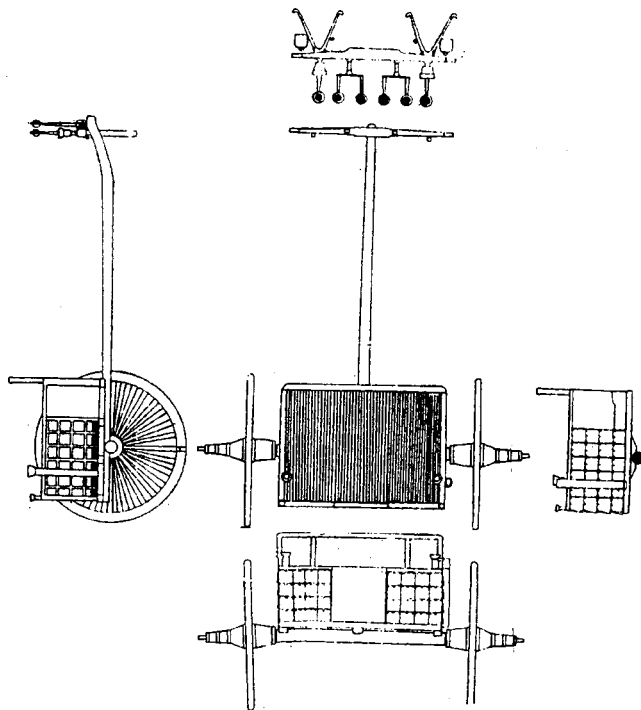
② 刘信芳：《〈包山楚简〉职官与官府通考（下）》，《故宫学术季刊》中华民国八十七年第十五卷第二期，第 156 页。

③ 《左传·宣公十二年》。



国时期因车战地位下降，步战、野战逐渐占有上风，同时对吴越的战争使楚舟师成为重要的武装力量。舟师的建制不详，包山楚简中有“司舟”、“舟（伋）公”、“司舟公”等职官，当是不同职等的水军官员。

在战术上，楚人车战与中原一样采用正面作战的方阵战术。它以行摆阵，以列为纵深，在平原地带有很强的攻击力。在泓之战中，宋军让楚军从容渡河布阵失去战机。城濮之战，楚晋二军列横阵对抗。晋军突然攻击楚右翼，导致楚军溃败。邲之战时，楚人布阵完毕后，



图十三 河南淮阳马鞍冢战国晚期楚墓出土的战车

不待晋军的方阵迫近即展开攻击，大败晋军。在吴越地区作战时，楚人较早使用了独立的步兵。楚共王 21 年（570 BC），他命邓廖率领组甲 300、被练 3000 为前锋，不料败北。但此后楚人在南方水网丛林地带作战，步兵的作用仍得到充分重视，“轻利彊速，卒如飘风”的战术机动性成为楚军的一大特点。

在军事装备上，楚人战车比中原列国讲究。车厢面积长宽为 123—165 厘米和 76—98 厘米之间，淮阳马鞍冢出土的战车车厢安装有 80 片铜装甲，每甲长 130.6 厘米、宽 11.6 厘米。淮阳和包山 2 号墓出土的战车上均有插挂各种兵器的贮放筒和挂件。^①而在曾侯乙墓出土的两件长达 37 厘米和 41.4 厘米的矛状车害上，可以知道曾、楚的战车车轮有刀轮样式（曾侯乙墓出土许多车马器为楚王和楚贵族所赠）。这种战车上加装刀刃在中国极为少见，仅在陕西户县宋村春秋墓葬中发现过较短的矛状车害。这种长刃车害要求更好的铸造技术制作，它显然是为了加强战车的陷阵能力。文献一般称这种加刀刃的车为“销车”。^②从出土的两件车害配置来看，它们似分属两乘战车，使用时左右配合。在西洋史上，亚洲国家使用刀轮战车的记载较多，如小居鲁士（Cyrus, the younger 卒于 401 BC）利用希腊雇佣兵对其波斯王兄阿尔塔泽西斯（Artaxerxes）二世远征（401 BC）和

① 裴明相：《说楚车》，《楚文化研究论集》，荆楚书社 1987 年，第 160—163 页。《包山楚墓》第 224—237 页。

② 《淮南子·汜论训》“连弩以射，销车以斗”，高诱注：销车，以刃著左右。或“冲车”（《太平御览》）卷 336 引《春秋感精符》云：“齐晋并争，吴楚更谋……作冲车，厉武将，轮有刃、衡着剑，以相振惧。”该墓竹简所记“僮车”疑即“冲车”。古音僮、冲相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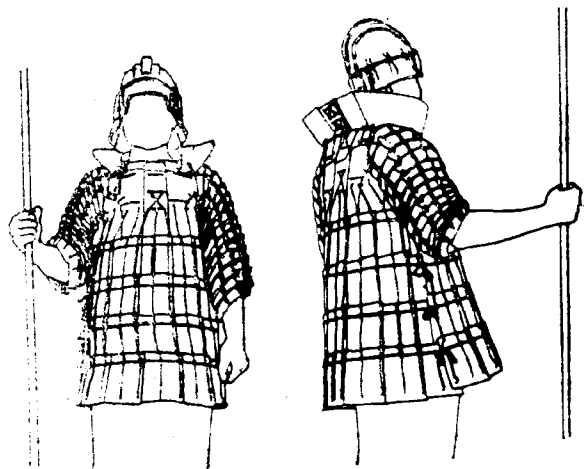
著名的高格米拉会战（Battle of Gaugamela 331 BC）波斯王大流士（Darius III 336—330 BC）与亚历山大大帝作战，都用二百辆刀轮战车并配以马甲、长杆矛攻击对方。后来叙利亚王安提阿（Antiochus III 223—187 BC）在马格尼西亚会战（Battle of Magnesia 191—189 BC）中也采用刀轮战车与罗马人交战。按照色诺芬的描述，波斯人的刀轮是从轮中轴两端向旁伸出，正与曾侯乙墓矛状车𦍋同制，可见古代东方使用战车刀轮的技术源远流长。^① 由于车战的盛行，楚地的长秘兵器制作十分讲究。所谓秘是以木为芯，外贴竹片然后用丝、藤缠绕髹漆而成的兵器杆，它刚柔相济，不易折断。包山2号墓的长秘达到4.17米，曾侯乙墓的长秘则达到了4.3米。这些长秘兵器或是装有三戈一矛、双戈无矛，或是装有三刃状的兵器𦍋，在战车上使用时，都极具杀伤力。

在防护装备上，曾侯乙墓出土皮质人甲胄13副、马甲胄2副，是中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保存最好的皮质甲胄。包山楚墓也发现了皮质的2副人甲和2副马甲。从包山人甲来看，它分头盔、领甲、身甲和裙甲，甲片用丝带遍联。其中1号甲残存203片，仅裙甲完好，它用70片甲，分5排编成。全甲长96厘米、胸围126厘米、袖长56.8厘米，基本将身体遮蔽。马甲分胄、胸颈甲和身甲。胸颈甲长70厘米、宽处60厘米，身甲长130厘米、两侧宽约60厘米。^② 这种装甲或许

① 孙机：《有刃车𦍋与多戈戟》，《文物》1980年，第2期。色诺芬；《长征记》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3页。阿里安：《亚里山大远征记》第97页。阿庇安：《罗马史》上卷，第375页。

② 《包山楚墓》，第216—223页。

就是甲士的装备和步兵的组甲。曾侯乙墓和楚墓中都没有发现金属铠甲可能与楚地皮甲资源丰富有关，皮甲轻便的特点也加强了楚军的机动性。另外，从楚墓出土的大量兵器来看，短兵器如剑、匕首和远射武器弓、弩的数量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增多，戈、矛、殳一类长柄兵器则不断减少，显示出步战和野战逐渐成为流行的作战方式。^①



图十四 曾侯乙墓出土的人甲胄复原图

楚人最先发明了弩，目前发现完整的弩都出土于楚墓。1987年在江陵秦家嘴47号墓发现了一具完整的20支双矢连发的弩，它是用于近身肉搏和突袭的利器。^②在舟师装备上，楚人请鲁班设计了一种“钩强”的装

① 《楚文化》，第81页。

② 陈耀均：《江陵楚墓出土双矢并射连发弩的研究》，《文物》，1990年，第5期。



置，敌船退时则钩，进攻时则强（或拒）。这种钩强实际应用不得而知，因大江作战不似海洋，水流的因素起很大作用。强的主要作用似乎在于节制船速，而钩的作用或许有罗马船上的“乌鸦”类似的功能，可以直接攻击敌船。^① 另外，与吴越的舟师比较，楚舟船都是彩漆髹饰，华丽壮观。

科 学

科学作为系统化的自然知识在人类社会早期与巫术、宗教同源。^② 在古代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和希腊罗马的社会中，只有希腊的科学实践和科学认知逐步摆脱了宗教，又与特定的技术分离，产生出了唯理主义的精神。它早先是哲学的一部分，后又独立发展，其抽象的思辨、实证的方法和理性的归纳直接引导出了今天的现代科学。可以说没有哪种文化中的科学有希腊科学如此巨大的影响。罗马文化的科学只是希腊科学的延续和尾声。罗马帝国衰亡，西方的科学就停滞了一千年。

在楚文化中，楚人的科学框架一直未摆脱巫术和仪式，从中发展出理性的精神而始终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在实践中也一直混淆技术与法术，无法产生出科学

① 《墨子·鲁问》。

② “Science”是自然科学的简称。它源于拉丁字“Scientia”，原意为学问和知识。在古代社会里，自然科学只是人类社会经验的一个部分，它们往往是宗教和巫术的起点。详见弗雷泽：《金枝》和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1986年。

实证的方法。^① 两种不同的结果是因为依附哲学的希腊科学很早就摆脱了神学的束缚，形成了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体系，而楚人的哲学体系中缺乏自然哲学，始终带有数术的色彩。

① 希腊的科学

希腊的科学有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分为爱奥尼亚、雅典、亚历山大利亚（或希腊化）和罗马 4 个阶段。爱奥尼亚阶段是整个公元前 6 世纪，它以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 约 580 BC）为代表。泰勒斯首次指出了宇宙的自然属性可以用理性知识来解释。他之后的阿拉克西曼德（Anaximander 610—545 BC）的地心说、阿拉克西米尼（Anaximenes ?—526 BC）的世界物质本原为气、火、水、土说和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585—?BC）学派等，为雅典阶段的科学发展打下了基础。雅典阶段（480—330 BC）是希腊文化的高峰期，科学开始摆脱哲学的依附，而不像从前由哲学家们来从事科学研究。其代表人物有百科全书式的阿拉克萨哥拉（Anaxagoras 500—?BC）、亚里士多德和以柏拉图为代表的柏拉图学院（Academy）。柏拉图学院由柏拉图传授科学知识，但只限于数学、天文和音乐。学院大门上有“不懂数学者免进”的匾额。柏拉图死后，学院还维持了 900 年，到公元 525 年才被查士丁尼（Justinian I 505—565）封闭。它是所有现代大学和研究院的始祖。亚历山大利亚阶段是从亚历山大东征到公元前 1 世纪希腊并入罗马前。这 300 年的时间科学的发

^① 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102 页。



展最为辉煌，代表人物有欧几里得（Euclid 300—？BC）、阿基米得（Archimedes 287—212 BC）和喜帕恰斯（Hipparchus 190—120 BC）。这一时期，科学由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描述发展为专业化的系统研究，形成完整的体系。从前科学依靠观察和形而上学式的哲学思辨，现在被专业化的分析所取代。^① 其中原因有二条：一是希腊化时代希腊与埃及、巴比伦乃至印度的来往更密切，这些地方的科学知识传入希腊。二是政府提倡、资助科学。亚历山大在亚历山大城建立博物院，设立数学、天文、医学、文学 4 个部，藏书 40 万册，直到公元 640 年才被穆斯林入侵所毁坏。罗马阶段另行叙述。

科学史家都认为，世界各地科学的发展过程相似，“若干经验领域被纳入科学境界的先后顺序大概是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但各项技术在历史上的顺序几乎相反，而是：社会组织、狩猎、家畜、农业、陶业、烹饪、织布、冶金、运输工具和航行船、建筑、机器、发动机。”^② 希腊科学正好如此，最为出色的就是它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

数学

古典希腊时期的数学是初等数学的形成期。在伯里克利以前，希腊十进位计数来自埃及，天文地理采用 12 或 60 进位法则来自巴比伦。爱奥尼亚学派的出现，开始有了数学的抽象研究。毕达哥拉斯首次将数学构成体系，用抽象的理性方式来讨论数学概念，使之变为纯粹的科学。几何学是古典希腊另一巨大成就。泰勒斯从

① 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第 90 页。

② 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第 16—17 页。

楚人、希腊人、罗马人的社会生活与物质文明

埃及那里学习过几何学，在巴比伦学习过天文学，他第一个建立了演绎法，使希腊几何学重视抽象概念，用概念作为判断和推理的基础，逐步形成了数学证明的观念，使几何学提高到理性阶段。数学史家指出：“希腊人对数学的最重大的贡献是坚持一切数学结果必须根据明白规定的公理演绎法推出。”^① 这就为数学发展成为严密的科学作了准备。

亚历山大时期的数学是接近高等数学的时期，数学家们与哲学家们分离，他们往往是研究力学、机械、天文的专家和发明家。这一时期创立了三角学，算术和代数也成为独立的学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阿波罗尼斯（Apollonius 262—190 BC）的《圆锥曲线》虽然是古典数学的精华，但也完成于这一时期。阿基米得又将几何发展到了顶峰。在公元 100 年前后，尼寇马卡斯（Nichomachus 约 AD 100）的《算术入门》完全脱离了几何来研究数论，其意义相当于《几何原本》在几何学上的地位。而刁番都（Diophantus 约 250）13 卷的《算术》巨著则代表了古代希腊数学思想的最高成就。它包括 189 个问题，每个问题有多种解法，共 50 多种类型。因时代已近文明的毁灭期，刁番都的代数未有后续的发展，殊为憾事。

a. 毕达哥拉斯学派

毕达哥拉斯生于萨摩岛（Samos），据信师从过泰勒斯。他建立学派后秘密传授知识，今天只能从柏拉图、希罗多德等人的著作中来了解。毕达哥拉斯首先确

^① 克莱茵：《古今数学思想》第 1 册，上海科技出版社 1979 年，第 39 页。



立了数学是研究抽象概念，使数学与埃及、巴比伦的数学区别开来。他最大的功绩是将证明引入数学。他们研究过质数、普通完全数、递进数列、比和比例、用几何作图法解代数二次方程。最有名的是勾股定理。据说证明成功后，曾杀了 100 头牛来庆祝。

b. 爱里亚 (Elea) 学派

毕达哥拉斯学派曾称自然界是建立在正整数的离散模式之上的。他们发现了“不可公度比”（即 $\sqrt{2}$ 与 1 不能公度是由毕达哥拉斯学派用归谬法证明的），使希腊数学家关注数的离散与连续问题。居于意大利南部爱里亚的芝诺（Zeno 生于 495—480 BC）提出了关于运动的 4 个著名悖论：二分悖论、乌龟与阿基里斯（Achills 是希腊神话的神行者）赛跑悖论、飞箭不动悖论和操场悖论。前二个悖论是针对当时人们认为时间和空间无限可分学说，后二个悖论针对时间和空间由不可分的小段组成的学说。按乌龟悖论，时间的无限性使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按飞箭悖论，任何瞬间是不可分的，箭就不能运动。离散和连续问题是现代分析数学的基础，但芝诺的悖论使数学在这上面的进步受到了阻碍。^①

c. 欧多克斯学派

欧多克斯（Eudoxus 408—355 BC）是小亚细亚的克尼得斯（Cnidos）人。他与毁灭性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芝诺相反，是建设性批判学派的代表。作为古典希腊时期最伟大的数学家，他的一大贡献是运用等比例方法（它被称为希腊数学的王冠）可以严密地处理无理数，

^① E. T. 贝尔：《数学精英》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第 7 页。

它成为无理数的现代理论的起点。其次，他创立了解决曲边面积和曲面积的穷竭法，虽然没有明确的极限理论，但确实是走向微积分的第一步。^①

d. 欧几里得

欧几里得在公元前 3 世纪左右受教于柏拉图学院，后在亚历山大城教学。他总结古典时代的数学写成《几何原本》一书。全书 13 卷 467 个命题。第 1 卷到第 4 卷讲直边形和圆的基本性质。第 5 卷是比例论。第 6 卷是相似形。第 7、8、9 卷是数论。第 10 卷是不可公度量的分类。第 11 到 13 卷是立体几何与穷竭法。该书对数学发展的影响比任何书都大。欧氏独创的先提出公理、公设、定义，然后由简到繁的证明定理、陈述方法，一直沿用至今。现在的几何课本是依据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Lagrange 1736—1813）对《几何原本》改写本编定的。欧氏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二次曲线》，部分地保存在阿波罗尼斯的书中。

e. 阿波罗尼斯

阿波罗尼斯生于小亚细亚的伯加（Perga），在亚历山大城师从欧几里得的门人。他的重要著作是《圆锥曲线》，共 8 篇 487 个命题。在他之前都有希腊学者研究圆锥曲线，但他是第 1 个依据同一个圆锥截面来研究圆锥曲线理论的人，第 1 个发现了双曲线有两支。他近乎完美的工作在约 2000 年后为开普勒（Kepler 1571—1630）和牛顿（Newton 1642—1727）原样照搬，用来推导行星轨道的性质。

f. 阿基米得

^① 《古今数学思想》，第 1 册，上海科技出版社 1979 年，第 39 页。



阿基米得生于叙拉古，是古典希腊最伟大的数学家，他的几何学著作是希腊数学的顶峰。^① 他用穷竭法求曲边形面积和体积，算出 π 大于 3 又 $10/71$ ，小于 3 又 $1/7$ ，也算出 π 的平方根不足近似值和过剩近似值。他发明了能够写出无穷大数的计数系统。在求抛物线弓形面积问题中，他用到了积分。在螺线上任意给定的点上做出切线问题上，他用了微分。因此他被认为领先莱布尼茨、牛顿 2 千多年发明了微积分。他所使用的无限小量的概念正是微积分的基础^②。公元前 212 年，罗马人攻入叙拉古时，一位罗马士兵踩到了阿基米得所绘的图形上，他大声喊到：“别弄乱了我的图形！”结果被杀死，终年 75 岁。

g. 亚历山大利亚学派

公元前 3 世纪到公元 3 世纪，亚历山大城是世界学术的中心。几何学的发展偏重于应用，数学家们想建立定量的天文学以解决历法、航海等问题创立了全新的三角学。它是由喜帕恰斯、梅内劳斯（Menelaus 约 98 年左右）和托勒密（Ptoemy 90—168）建立的。主要是球面三角，也有平面三角的内容。托勒密的《数学汇编》13 篇是几何学的代表作。他的一些重要贡献包括提出投影法和球面经纬度、制定第 1 个三角函数表、在公元 150 年算出 $\pi = 3.14166$ 等。此后 1000 多年，三角在此书的框架内毫无变化。与之同时，算术和代数脱离了几何学独立发展起来。在亚历山时代的前期，希腊纸草手稿中就有了零的记号。阿基米得发明了记大数法，还有

① 《古今数学思想》，第 1 册，第 121 页。

② 《数学精英》，第 34 页。

分数运算。尼寇马卡斯的《算术入门》是第一部脱离几何学的纯数论著作。它主要介绍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算术工作，讲了偶数、奇数、正方数（毕氏将数描绘成沙滩上的点，1、4、9、16、……是正方数，可以摆成正方形）、矩形数、多角形数、质数、复数、乘法表、提出了求质数的筛法等。此书一出，算术取代几何成为标准课本。代数则由刁番都达到顶峰，其成就在于用符号代替数，使用了高次幂，研究了不定方程的解法。

天文学

由于埃及、巴比伦的天文学的影响和商业航海的需要，希腊古代天文学十分发达。希腊人长于哲学思考和数理分析，在天文理论建树上超过任何古代文明，这是中国古代以观象授时为主的天文学所无法比拟的。从泰勒斯到托勒密近 800 年间，希腊天文学有 4 个主要学派和发展阶段，即爱奥尼亚学派（c. 7—5 BC）、毕达哥拉斯学派（c. 6—4 BC）、柏拉图学派（c. 4—3 BC）和亚历山大利亚学派（c. 3 BC—c. AD. 2）。其中柏拉图以前的天文学以思辨性的宇宙论占主导地位；之后，数理天文学派成为主流。

a. 爱奥尼亚学派

爱奥尼亚学派是第一个抛弃神话创世和巫术传统的自然哲学家学派。他们认为宇宙是自然的，可以用理性探索、用普遍性的知识来解释。泰勒斯认为大地是浮在水上的扁平盘子；阿拉克西曼德认为大地是有限的扁平圆筒，由水、空气、火包围，浮于天球之中，太阳、星辰绕地球运动。据说泰勒斯还预测过公元前 610 年或是 585 年的一次日食，大概利用了巴比伦的历法表。爱奥尼亚的代表人物是阿拉克萨哥拉。他在公元前 480 年来



到雅典。当时雅典禁止天文学的研究，天文学极为落后。各城邦都有一套历法，全希腊有 4 种计年的方法，月份名称也各不相同。雅典按月亮计月，却按太阳计年。阴历一年 360 天，这需要每隔一年增加一个月。到梭伦改革时，才用大月 30 天、小月 29 天的计年法。每年多出的 4 天再隔 8 年省除一个月，经过如此复杂的算法，才使一年为 365 又 $\frac{1}{4}$ 天。阿拉克萨哥拉因是伯里克利的朋友得以在雅典从事天文学研究，著有《论自然》一书，被称为当时最伟大的科学著作。他最早提出月光来自太阳，正确地解释了日蚀、月蚀的成因。后因被控对太阳神不敬，（将太阳形容为一堆燃烧的石头）而被逐出雅典（432 BC）。

b. 毕达哥拉斯学派

毕达哥拉斯年轻时曾游历阿拉伯、腓尼基、迦勒底，与埃及的祭师讨论过天文学和几何。他及学派将数看成宇宙存在的要素，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第一个指出地球是球形，自西向东旋转。他认为月光是阳光的反射光，月蚀是地球或其他星体介入太阳与月亮之间。底比斯的菲洛劳斯（Philolas c. 5 BC）为了解释天体的视运动，提出了“中央火”的理论。中央火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每天、月球每月、太阳每年绕行一周，天体与中央火的距离服从音阶与音程间的比例关系。地球、日月和五大行星，加上中央火共有 9 个运动的天体，因此还存在第 10 个运动天体——反地球。它在中央火的另一侧与地球同速运行，所以人们看不见它。这是第 1 个地动说，其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埃克方达斯（Ecphantus 约 390 BC）还提出过地球自制转的学说。

c. 柏拉图学派

柏拉图本人也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杰出代表。他也认为只有通过数学才能认识世界的精髓，天文学实际上就是研究数学天空里的星球运动规律。从柏拉图开始，希腊天文学放弃了埃及、巴比伦以观察为主的天文研究而代之以“把天放在一边”的理论天文学的研究。欧多克斯和亚里士多德是两个代表人物。欧多克斯曾在柏拉图学院学习，他着手解决柏拉图所说天文学缺乏体系的问题，写出了4部天文著作：《镜》、《现象》、《八年周期》和《论速率》。欧多克斯认为，日月星辰的运动基本上是匀速圆周运动，所有恒星共在一个球面并绕过地心的轴线每日旋转一周，他一共用了27个球来解释当时所观察到的天体运行数据。虽然其理论不符合实际，但追求数学描述而不是物理现象的解释是符合科学精神的。其后亚里士多德将球增加到56个，设计了一套让一球推动另一球旋转的系统，由此产生了第一个原推动力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称“宗动天”）。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地心说的思想一直主宰天文学到哥白尼时代。

d. 亚历山大利亚学派

亚历山大利亚时期最伟大的天文学家是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 310—230 BC）。他首先提出了“日心说”，恒星固定，因地球自转而动，月球绕地球转动等学说。第一个用几何方法测算日、月、地球的大小和距离。他算出日月夹角是 87° （应为 $89^\circ 52'$ ），距离之比在18至20之间（应为346），太阳比月球大7000倍（应为2296000倍），太阳与地球直径比在 $19/3$ 与 $43/6$ 之间（应为107）。日心说过于超前，按当时亚里士多德的力学，重物趋向宇宙中心，运动的地球是放不下物体的。



所以当时学者说阿利斯塔克竟敢“让宇宙的炉灶（地球）移动”，应当被起诉。^①

亚历山大利亚时期的喜帕恰斯和托勒密代表了古希腊天文学的最高成就。喜帕恰斯是小亚细亚的尼西亚（Nicaea）人，其成就主要保存在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中，其实也很难分清楚哪些成果是属于喜帕恰斯，哪些是属于托勒密。喜帕恰斯的独特贡献是发现了黄道和赤道交点的移动（岁差），定出岁差值为每年 45"（今值为 50"）。由此他区别出恒星年和回归年，制定出较精确的回归年是 365 天 5 小时 55 分 12 秒（比今值多 6 又 1/2 分）。他还编制了包含 850 颗（一说 1080 颗）恒星准确位置和亮度的希腊第一个星表。他用视差法算出月、地距离与地球半径之比为 67.74（应为 60.4）。他编制了几个世纪内的日月运动表来推算日蚀和月蚀。因采用了本轮和均轮的体系，^②月蚀能精确到一两个小时之内，日蚀则不大准。托勒密推广了喜帕恰斯的本轮、均轮理论并对所有天体的数学描述加以改进。托勒密的理论是希腊天文学的总结，它为宇宙具有不变的规律提供了完整的证据，也是对柏拉图要求合理解释天象的最终答案。《天文学大成》在西方的影响力也只有《几何原本》可比。

物理学

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历史上第一个将物理知识分类和

① 威尔·杜兰：《希腊的生活》下卷，第 827 页。

② 本轮（epicycle）、均轮（deferent）由阿波罗尼斯创造，日、月、行星绕地心在一个轨道运动即在均轮上运动。它们各自又有自己的轨道，本轮。直到哥白尼学说出现它才被放弃。

讨论的人。他在《物理学》一书中讨论了自然哲学、存在的原理、物质与形式、运动、时间与空间等。但他的错误在于认为所有物理现象都存在一个终极原因，这非常有害于科学的发展。

希腊物理学中最杰出的学者是阿基米得，他发现了著名的“阿基米得定理”。他在《论浮体》一书中提出“一个物体浮于液体时，其所失重量与所排开的液体重量相等”的浮力定理。据说叙拉古的希罗王（Hiero）怀疑所定制的王冠不是纯金所制，于是将王冠交给阿基米得测试，但不得损坏。一天，阿基米得在沐浴时发现自己的身体被水浮起，就联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因此兴奋地竟光着身子跑到大街上喊：“找到了！”（Eureka！即今天世界尤里卡发明奖之来历）阿基米得还研究了杠杆原理得出了杠杆定律。他利用丰富的物理学知识设计了用水力推动模仿日、月、星辰运动的行星仪（Planetarium）、螺旋提水器（Archimedes）、起吊船只的大型滑车和能聚集阳光的抛物镜，后两项在叙拉古人抗击罗马人的进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型滑车可以将罗马人的船只吊起来摔碎，抛物镜可以聚集阳光将罗马人的船只烧毁。当时罗马将领马塞勒斯（Marcellus）不得不放弃强攻战术改用封锁战术，并下令攻下叙拉古后不得伤害阿基米得。阿基米得被杀后，马塞勒斯为之建造了坟墓，上面刻有阿基米得的一个著名定理。

除力学之外，希腊在光学上也有许多成就。毕达哥拉斯以后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探讨过光的性质。欧几里得是第一个有系统的阐述者，他在《光学》和《镜面反射》中提出了许多命题和定律。《光学》中共提出58个命题，《镜面反射》提出最重要的定理是光的入射角等

于反射角。其后的希罗（Hero 约 100 BC—AD 100）、阿波罗尼斯都在欧几里得的基础上发展了光学研究。

地理学

荷马被希腊人奉为地理学的鼻祖，但真正的地理研究是从爱奥尼亚学派开始的。阿拉克西曼德绘制了第一幅有比例尺的世界地图，在他之后绘制地图成为风气。从希罗多德始，希腊地理学的任务不再是列举旅行路线，而是通过气候、土壤、植被、动物，特别是人类种族定居方式来阐述空间与环境。^① 亚里士多德是自然地理学的创始人，他在《气象学》一书中，总结冷、热、干、湿 4 种自然要素，将它们两两结合来说明自然的特性变化，他的地形学就是以干湿说为基础来解释地表形态的变化。

地理学在亚历山大时代有很大的发展，代表人物是担任过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的埃拉托色尼（Eratostheues 284—192 BC）。他生于利比亚的昔兰尼（Cyrene），他的重要成就是首次测出地球的周长是 39690 公里，与地球的实际周长（4 万公里）十分接近。埃拉托色尼还写了《对地球大小的修正》和《地理论著》二部重要著作。前者包括赤道长度、回归线与极圈的距离、极地带的范围、日月大小、日地和月地的距离，白昼长度随纬度与季节变化等项研究。后者运用几何方法说明地表变化等项性质的原因。他第一个使

CHUWENHUA
ZHISHI CONGSHU
楚文化知识丛书



^① 保罗·佩迪什：《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49 页。

用了“地理学”这个词，被人们尊为“地理学之父”。^①

②罗马的科学

希腊罗马的地理位置接近，居民成分相似，文化也有继承关系，以至于我们中国人很少去区别两者。实际上，希腊罗马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最重要的一个差别就是罗马人几乎对科学、哲学不感兴趣，而在军事、法律、行政上表现出了杰出的才能。这或许与罗马人的主要成分是农民有关。在科学和哲学上，罗马人没有任何独创的能力，他们只对技术感兴趣，如农业、建筑、工程和医学方面的技术，而对技术的源泉科学却不关心。公元前3世纪，保守的罗马人竭力反对希腊思想对罗马的影响，如监察官老加图（Cato the Censor 234—149 BC）认为希腊课本歪曲了罗马青年的心智，哲学和文学瓦解了罗马青年的宗教信仰。^② 这种保守的观念与楚人的思想倒有些相似。罗马人不喜欢科学研究并不妨碍他们在工程技术上聘用希腊学者为之服务。但总的来看，他们使用知识而不是培育其源泉——科学，结果使科学在罗马手中，不过几代人就源、流俱竭。^③ 公元前146年，罗马征服了希腊本土；公元前64年，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在征服埃及时，于公元前47年烧毁了亚历山大图书馆，收藏近两个半世纪的藏书和50万份手稿被付之一炬。幸而图书馆放不下的图书存放在塞纳

① 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8页。

② 威尔·杜兰：《恺撒与基督》上卷，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45页。

③ 《科学史》，第99页。



皮斯（Serapis）神庙希腊的精神财富才未完全毁掉。在帝国后期，基督教流行，这也阻碍了科学在罗马帝国的发展。基督教嘲笑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347—395）下令将希腊神庙改为教堂，许多神庙的书籍因此被毁。塞纳皮斯神庙保存的30万种手稿也难逃厄运被基督徒一烧而光。公元529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封闭了所有的希腊哲学学校，包括柏拉图书院，希腊学者被迫离开东罗马，直到7世纪回教徒攻占亚历山大后，部分学者才又回到君士坦丁堡。他们为黑暗的中世纪保存下来了部分古代的希腊罗马文化。

数学

罗马人的兴起是在公元前8世纪，到西罗马灭亡整整1200年，罗马没有出现一个数学家，这本身就足以说明罗马的数学有多糟糕。罗马人只有粗浅的算术和一些近似的几何公式。罗马数学对今天数学的贡献是以12为分母的分数计算。今天英制计量单位的盎司（once）、英寸（inch），就是来源于罗马的计量单位阿司的12分之一“安色亚”（uncia）这个词。在帝国时代，数学遭到罗马的鄙视，他们把占星术士称为数学家，而占星术在罗马又是被禁止的。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 245—316）时代，几何学从数学中分离出来以用于建筑物的测量、城市边界的划分，“数学方术”则完全禁止，其规定一直影响到中世纪的欧洲。^①

天文学

早期罗马的天文学只是照搬巴比伦和希腊的成果。

^① 《古今数学思想》第1册，第204页。

罗马人的计时靠水钟和日晷，每天分成 12 个小时，一年 12 个月共 355 天。每隔一年加上 22 或 23 天的一个闰月，这样平均起来就有 $366 \frac{1}{4}$ 天。直到恺撒请来亚历山大天文学家索西吉斯（Sosigenes）修订儒略历（Julian calendar）才放弃旧历法。公元前 46 年，恺撒修订的儒略历一年 12 个月，1、3、5、7、8、10、12 月为大月，每月 31 天；4、6、9、11 为小月，每月 30 天；2 月平月 28 天，闰年 29 天。平年 365 天，闰年 366 天。公元前 8 年奥古斯都又作了若干调整。它实质是阳历，以回归年历法的基本单位，但比实际长了 11 分钟，到 1582 年误差已达 10 天。教皇格里高利 13 世（Gregory）才下令纠正。它是今天我们所用公历的前身，这是罗马人在天文历法上的一大贡献。但总的来看，罗马人对天文学的兴趣只限于个人的命运与某星宿有关，这一点甚至也影响到了亚历山大利亚学派的托勒密。

地理学

罗马人对地理学的兴趣要强于天文学，希腊地理学影响依然存在。公元前 29 年，出生于土耳其中部的阿马西亚（Amasia）的希腊学者斯特拉波（Strabo 64 BC—AD 23）在罗马获得公民权，随后他又在亚历山大居住多年，他见证了罗马帝国的建立。为了向罗马人提供有价值的知识，他撰写了 17 卷的巨著《地理》，该书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这是第一部全面系统描述世界地理的书，前 2 卷是地理学总论，后 8 卷讲欧洲，又 6 卷写亚洲，最后一卷写非洲。斯特拉波给地理学下了一个很接近现代地理学观点的定义：地理学就是描述人们所



居住的世界。^① 这为“描述地理学”奠定了基础。

罗马本土值得一提的地理学家似乎只有瓦罗（Varro 116—27 BC）。他本人是一位政治家兼学者，最著名的著作是《论农业》。他写过一本地理学概要，没有什么创见，但因他在书中提出了文化阶段论而备受重视。瓦罗指出，人类文化按一定的顺序发展，由采集、游牧、农耕到达现阶段（公元前 1 世纪）。直到 19 世纪德国学者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指出美洲没有游牧阶段前，瓦罗的观点没有人质疑。^② 罗马以外，古典世界最后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家仍然是托勒密。他在完成《天文学大成》后，撰写了《地理指南》8 卷。他对罗马人所知的地理世界进行了描述，将每一地点标上经纬度，结尾附有 6 卷表格，形成事实上的第一部地名词典。根据词典，他又重绘了地图。托勒密之后，整个古典世界的地理学都陷于贫困，走向了衰落。

③楚人的科学

与希腊罗马的科学相比，楚人的科学最为落后，这是因为在信巫好鬼的文化传统中，科学发展所需的求知、求真精神会变成萨满的仪式活动，归纳演绎的证明方法会成为宗教的祈祷占卜，科学的实践仅仅限于炼丹术、寻找不死药和符篆效验。例如在医学上，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流行于战国晚期楚国南方的医书，其中 36 个巫方记载各种巫术治疗的效验，反

① 《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第 157 页。

② 《地理学思想史》，第 47 页。

映出楚国民众无论从实践还是从理论上都相信巫术的效验。^①当然在李约瑟看来，这种左道旁门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医药化学。^②但是仅凭此还无法表明楚人具备了理性的科学，只能证明在中国没有哪个地域的文化象楚文化那样，与科学是如此接近。

数学

1950年代，湖南长沙楚墓出土了40支长12厘米的竹签，当时的报告称其“用途不明”。^③这实际是用于计算的算筹，它的用途与算盘相似。钱宝琮指出，运算算筹时，“五以下的数目用几根筹表示几，第6、7、8、9四个数用一根筹放在上边表示五，余下来的数，每一根筹表示一。”^④表示方法如下：

纵式：|、||、|||、||||、|||||、||||||

|、𠄎、𠄎、汙、洵

横式：-、=、≡、汎、𠄎、⊥、⊥、佔、𠄎

1 2 3 4 5 6 7 8 9

在楚金币中曾发现类似的符号，可见楚人使用算筹很普遍。这种记数符号源于商代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系统，“九”后的空位，李约瑟认为会产生“零”的使用。尽管证据不够，这个记数方法要比同时代古巴比

① Donald Harper (夏德安)：《五十二病方与越方》，《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8页。

② 李约瑟：《中国古代金丹术的医药化学特征及其方术的西传》，《中华文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三辑，第110页。

③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楚墓》《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④ 钱宝琮：《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8页。



伦、埃及的更为先进、更为科学。^①

1984年在江陵张家山西汉早期的247号墓中出土了一部《算数书》。该墓时代距楚亡不过40余年，所以该著作可以视为属于楚人的数学体系。《算数书》记载了70多个问题，有《分乘》、《增减》、《相乘》、《合分》等篇，不少内容与《九章算术》关系密切，基本上属于初等数学的问题。^②李约瑟指出，中国古代数学的特点是算术和代数不过问从基本假设出发得以证明的定理和命题组成的抽象几何学。^③《九章算术》中有面积和体积的几何计算，如《方田》、《少广》部分。张家山《算数书》中的《里田》与丈量土地有关。其中《少广》篇的文字与《九章算术》基本一样。公元前548年，蒯掩调查全国资源时就会广泛“书田土、度山林、鸠薮泽”进行土地山林的丈量工作，一般的几何方法应该为楚人所掌握。

《庄子·天下》曾列举了一些在楚地活动的辩者如公孙龙子、惠施等人的辩论题目。其中第15条“飞鸟之影未尝动也”、第16条“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第21条“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与数学有一些关系。飞鸟和镞矢二说与希腊芝诺的二分悖论相似，也略为涉及到数学的连续和离散问题，但是这些命题对连续性和运动的真实都没有否定，与芝诺的论点仍有区别。“一尺之棰”的论点即是现代很经典的极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25—30页。

② 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墓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

③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第53页。

限理论，问题本身已超出了人的感官认知，属于理性思辨的范畴，它与芝诺的乌龟悖论是完全一样的。

天文学

从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来看，楚人的天文学材料是先秦各国中最丰富的。如屈原的《天问》、庄子的《天运》、甘德的《天文星占》、《楚帛书》，江陵、荆门楚简中的大量历法材料以及长沙马王堆帛书中的《五星占》等等，都是研究和了解楚人天文学面貌的珍贵材料。史书记载，楚人祖先祝融氏曾为“火正”。“火正”是上古时代的天文观察官员，他要根据“大火”（俗称心宿二，即天蝎座 α 星）春分时在南方昏见的情况分布天象消息，以不误农时。这种现象授时的传统对楚贵族社会会产生影响。

楚人的天文学也继承了中原的传统，其宇宙论采用了盖天说。盖天说最早见于《周髀算经》，这是一部主张盖天说的天文学著作。钱宝琮认为它成书较晚，约在公元前100年，^①但是其思想的来源应该是西周时期的宇宙结构学说。这一学说的基本观点是“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在屈原的《天问》中，屈原问道：“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天地未形成时如何考察它们？）、“圆则九重，孰营度之”（圆天九层，谁设计的？）、“地方九则，何以坟之”（地分九块，根据何在？），反映了天圆地方的基本观念。天圆地方的观念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呈内圆外方状，即表达天圆地方的观念，商代西周相沿不变。

^① 钱宝琮：《盖天说源流考》，《科学史集刊》第1期，科学出版社1958年。



观象授时是中国古天文学的主要内容。中国以农业立国，不像迦勒底（Chaldea）、希腊等地以商贸立国，天文学以计算和理论建树见长，因此西周有专门的观象官员保章和授时的官员冯相。周代的观象主要是日月五星的运行，其成就集中反映在世界上最早的星表《甘石星经》上。现存的《甘石星经》由楚人甘德^①和魏人石申二书合编而成。甘德的书涉及了金、木、水、火、土5星的运动、交食和恒星等内容。最重要的是将星空分为28宿和中外官星座（以28宿为界，以北恒星属中官，以南属外官。星官相当于现代星座或星宿），按度数给出星坐标位置。它包括“去极度”（恒星与北极星的距离）、28宿距星（每宿中的测量标准星，两宿的距星差为距度）的距度和黄道内外度（星与黄道的距离，黄道以北为内度，以南为外度）。共载有28宿和中外星官120座，含恒星121颗（另有恒星118座，含星511颗之说）。根据《汉书·天文志》载，岁星（木星）晨出东方，石申记录在斗、牵牛，甘德记载在建星、婺女，而汉初的《太初历》却记载在营室和东壁。由木星轨道可知《甘石星经》的恒星位置是在公元前360年至350年之间。新城新藏根据去极度逆行推定观测年代约在公元前300年，^②希腊的喜帕恰斯制定

① 《史记》称甘德为齐人，刘向《七录》称“甘公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汉书·艺文志》也说是楚人。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与《甘德星经》关系密切，更证明了甘德可能为楚人。席泽宗：“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五星占》”《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年》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46页。

② 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华学艺社，中华民国廿二年，第19页。

的第一份星表是在公元前 134 年。此外,《甘石星经》对木星的观察很准确,测出的会合周期是 400 天,恒星周期是 12 年,今天的数值为 398.8 天和 11.86 年。对木卫三的发现更比伽利略早了约 2000 年。

楚文化所在地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一年四季分明。春秋战国时期农业已成为楚国霸业的基础,因此在天文历法中制定精确的数据,合理安排四时、月份以符合农业节气就非常重要。在出土文献资料中,这一部分的内容最多,也最为复杂,却反映出楚人在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需要之间所做出的妥协。

先秦时中国的历法有周正、殷正、夏正 3 种。周以冬至所在月份为正月,殷正以周正后一月为正月,夏正则以殷正后一月为正月。因古人用干支编 12 月序列,周历法以子月为正月。殷历法以丑月为正月。夏历法用寅月为正月,即今天所用的农历。在《楚帛书》中,楚人用四个神代表四季,按照五行的方式将四季分配于 4 个方向,它带有一种原始的宇宙间架的思想。^①《楚帛书》与屈原赋中所使用的历法是夏正的建寅历。1975 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和 1987 年包山楚简出土后,楚人的历法编制又有新的证据,即楚人在公务中还使用与夏正不同的历法。现据文献列表如下:

^① 李学勤:《楚帛书的古史与宇宙观》,《楚史论丛》(初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5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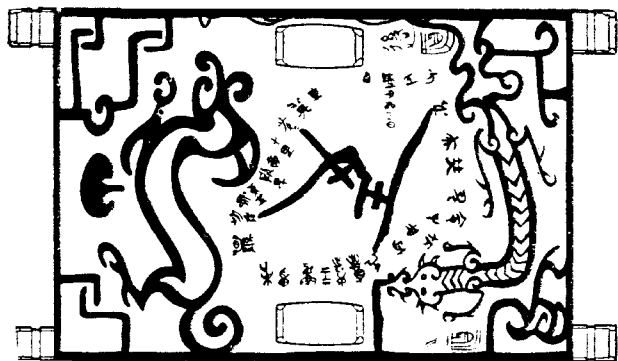


楚月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月建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包山简 月名	冬 唵	屈 唵	远 唵	習 唧	夏 唧	育 月	夏 唵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夷 月	(缺)
秦简楚 月名	冬 夕	屈 夕	援 夕	刑 夕	夏 辰	纺 月	七 月 (夏 夕)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夷 月	献 马
秦简秦 月名	十月 (岁 首)	十一 月 (冬 至)	十二 月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夏 至)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这个历法是楚官方的历法，它是在周正基础上改用亥月为岁首。^① 使用亥正的楚历与当地农作物的播种、收割很不协调，它只是楚人保持中原周历传统的一种做法，在政府公务中使用。包山简的历法因多涉及司法，故可知它为官方通行之历法。屈原的诗歌和《楚帛书》因具有民间色彩，仍使用符合节气规律的夏正。另外，在《楚帛书》的夏正系统中，楚人有闰月，但是一、二、三月置闰，楚人认为会妨碍岁末的祀神活动。四、五月置闰则扰乱一年的历法，妨碍春季的祀神活动。这些都反映出楚人采用的兼顾朔望月和回归年周期的阴阳历。

楚地的另一项天文学成就是有关 28 宿的应用。曾侯乙墓出土了几件反映当时天文学知识的衣箱，有的绘有传统的后羿射日故事，有的绘有日月星辰的星图。其中一件箱盖正中朱书“斗”字，四周写有 28 星宿全部

^① 王胜利：《关于楚国历法的建正问题》，《中国史研究》，1988 年第 2 期。林素清：《从包山楚简纪年测量论楚历》，《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四，1997 年，第 1119 页。



图十六 曾侯乙墓出土的
战国早期衣箱上的 28 宿图案

名称，东西两侧分别绘有苍龙白虎图像。28 宿个别名称最早见于殷墟卜辞，全部名称的记载则见于成书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239 BC)。28 宿衣箱的发现说明战国早期以前就已存在完整的 28 宿观象体系。(图十六)

中国古代早期制定历法是依据冬至。冬至点的确定需要星空作为背景，没有一个完整的位于黄道和赤道附近的星象体系就无法确定冬至点，也不可能以昏旦中星或夜半中星或者是月望冲来定太阳的位置。28 宿体系就是分布于天球赤道和黄道带的 28 组恒星，用来观测冬至点、日躔（太阳运行轨迹）、月离等天象的恒星坐标系，是中国最早的观象授时的科学体系。中外一些学者一直认为 28 宿源于印度或巴比伦，时间是在战国晚期。李约瑟虽然承认北斗与 28 宿相联系是中国天文学现象的特点，但他还是认为《尚书·尧典》所载的四宫天文观象不是中国固有的而是属于巴比伦。由于 28 宿衣箱的出现，中外许多学者认为 28 宿衣箱上的苍龙、



白虎图案实际上已能证实《尧典》四个象限上有四宫分配不是来自巴比伦。环北斗的 28 宿呈赤道环分布，表明中国传统的四个象限属于赤道系统，它把 28 宿的确立的年代至少提前到春秋时期。而巴比伦天象观测并非绝对地采用赤道观测系统，直到公元前 3 世纪塞琉古（Seleucid）时期出土的巴比伦泥砖上还有黄道系统出现。^① 中国的 28 宿除了用来编制历法外还是表示日月五星等天体位置的依据。殷墟卜辞记载：“七日己巳夕佈出新大星并火”。新星的位置是用“火”（即心宿 Sco α , Antares. 天蝎 α ）表出，这是赤道天体坐标发展的证据。28 宿衣箱上可能反映出了“火历”观象的实事，它与祝融氏为“火正”或许有关。箱盖的“斗”字故意伸长四足分别指向四宫中心附近的星宿。斗柄指向东南的心宿（即《史记·天官书》中所说的斗柄指向角宿“杓携龙角”之意）。学者们认为这是为了强调大火昏见，表示时当火历正月的“出火”期。西宫白虎腹下有一“火”形指向参宿，是“秋季内火”、“火伏”（日月交于火之辰）。这种“火历”的痕迹正是 28 宿出自中原的印迹，^② 这些与巴比伦犁星（Mul Apin）泥砖中发现的 36 星群的赤道恒星系统没有明显的联系。楚地这项成就是希腊罗马的天文学所不具备的。

① J. Needham: Science & Civilization in China. I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46. 饶宗颐、程贞一、席泽宗：《曾侯乙编钟时代之前中国与巴比伦音律和天文学的比较研究》，《曾侯乙编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第 428 页。

② 庞朴：《火历钩沉》，《中国文化》1989 年创刊号。

四 楚人与希腊人、罗马人的精神世界

人类以系统地制作工具，运用抽象的语言和享受精神生活从自然界中独立出来。人类的精神世界包括宗教信仰、神话、哲学和艺术等。以现代人类学的观察，人类有“心灵统一”的原则，只要有相似的环境就有相似的精神活动产生。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史前文化中，宗教普遍存在和世界各地的人们普遍运用象征来表示某种意义的文化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会发生变异，宗教神学的基本问题会成为哲学问题。人们运用象征的形式也会复杂起来，象征会扩大为仪式或出现“多义性”，象征物变成艺术品。由于中国的艺术、神话和仪式“摆脱不了政治”^①，而“西方神话和仪式的主要功能放在与人神沟通上面”^②。因此在中国、在楚文化中，宗教、哲学、神话艺术都成为政治工具，而希腊罗马文化却从中引出了对事物本原的追问，艺术品也最终放弃了超自然的想象。这也是双方环境不同所致。

① 张光直：Art, Myth, and Ritual.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

② Joseph Campbell：Occidental Mythology. The Macmillan Company of Canada Limited 1964. p. 4.

哲 学

CHUWENHUA
ZHISHI CONGSHU
楚文化知识丛书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社会，哲学出现之初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哲学（Philosophy）一词的希腊文原意是“爱智慧”之学，它与宗教神学、科学的发端是一样的，始于对世界本质的思考，并由此产生本体论、认识论、形而上学等一系列的问题，与前者的区别只在于对终极问题的答案不同。神学要诉诸天后权威，科学则依靠理性确定的知识，哲学刚好介于二者之间，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神学的追问。罗素（B. Russell）说，哲学就是思辨的心灵所感兴趣的一切问题，这些问题科学不能解释，神学家又有信心百倍的答案。如世界分成心和物吗？宇宙的统一性和目的，自然规律的存在与否，等等。^① 总之，哲学关注的是普遍性的问题，包括自然界的神秘和人心中的疑惑。

在文明之初，任何文化对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都会有大致相同的思考。如：世界是一元的，还是分成主体（心灵）和客体（自然）的二元世界？希腊前苏格拉底（Socrates 429—399 BC）时代，印度吠陀时代和我国先秦时代的主流哲学都是一元论，将世界看成一个连续性的整体。不同文化在哲学的中心问题上的关注程度、概念和方法上的差别则由不同的社会存在所决定，它不能表示文化的优劣。希腊罗马的哲学和楚国的哲学各有特点，都在公元前达到了高峰，又都对各自的传统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些基本问题今天也依然存在。如宇宙

^①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1页

起源究竟是有还是无的问题。^① 这既反映出时间不能改变哲学的基本问题，又说明人类无休止的求真本能和思维共性。

① 希腊哲学

英国学者基托 (H. D. F. Kitto) 认为希腊人的精神特征是相信“万物一体”和“理性”。^② 前者导致对事物本原的追问，后者发展出逻辑的证明。希腊因之对人类社会作出了哲学和科学两大贡献。与楚国的哲学一样，希腊哲学也有它的原始宗教和神学的背景。公元前 6 世纪以前，希腊普遍存在多神崇拜和奥菲 (Orphic) ^③ 教义。奥菲教义强调人神合一和心灵快乐、人死后灵魂要受冥神海德斯的裁判等。因此著名学者埃利亚德 (M. Eliade) 认为奥菲教义是希腊典型的萨满教，其观念和技术都带有萨满特征。(Eliade 在书中指出 Orpheus 是希腊的“大萨满”，举证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的例子。) ^④ 公元前 6 世纪后，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的希腊城邦因商业发展，当地的哲学最先摆脱神话和宗教的束缚形成了以泰勒斯为代表的自然主义的哲学，而南意大利等地的希腊城邦在奥菲教义的影响下形成了神秘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前者的代表人物还有阿拉

① 今天科学界以霍金 (S. Hawking) 为代表的天体物理学根据黑洞和宇宙转移现象证明世界似乎起源于一个奇点，起源于“无”。

② 《希腊人》，第 218、228 页。

③ 希罗多德认为奥菲教义来源于埃及。Orphens 可能实有其人，是一个传说的音乐家。奥菲教义有大量的神秘仪式，也有关于天体起源的学说。它的巫术色彩与楚国和古代印度吠陀时代的幻术仪式等并无不同。

④ Eliade: Shamanism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391—393. 另参见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第 428 页。



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530—470 BC）、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 460—370 BC）、伊壁鸠鲁（Epicurus 341—270 BC）等，后者的代表人物还有巴门尼德（Parmenides 480 BC）、芝诺、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 450 BC）等。黑格尔按地域将希腊两派哲学特征分为感觉物质的东方和以思想占优势的西方二派。^① 这两派大致是唯物和唯心两个阵营。雅典兴起之后，苏格拉底（Socrates 469—399 BC）、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两派哲学都有综合与继承，使希腊哲学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泰勒斯

泰勒斯只有残篇著作传下来，他的重要观点是“万物产生于水”，其重要意义是首次认为宇宙是自然的而不是神创的。实际上，他也间接得出了“万物为一”的假说。这种唯物论另一方面也鼓励了哲学上的怀疑论的产生，指出人的感官并不可靠。

毕达哥拉斯

以泰勒斯为代表的米利都（Miletus）的哲学家已摆脱宗教神学束缚，把哲学看成生活中的实际需要。毕达哥拉斯学派则刚好相反，他们受奥菲教义的神秘主义的影响，将哲学看成超现实的冥想，是基于某种信仰的生活方式，这后来影响到了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基本的哲学命题是：“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② 它完全把世界本质是物质的否定掉了，但也因此把希腊的哲学和科学引向不依赖感觉而依靠理性的正确之路。另外，毕达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第 173 页。

②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第 12 页。

哥拉斯放弃单一元素说，认为物质由土、水、火、气四者构成。它影响到恩培多克勒的化学四元素说，^① 主导化学近 2000 年之久。

赫拉克利特

赫拉克利特是希腊移民城邦以弗所（Ephesus）人，留传下来约有 130 件残篇。他是个隐者，这一点很像老子。从他开始，希腊哲学家才为哲学而做研究。他本人属于爱奥尼亚哲学派别，却瞧不起该学派阿拉克西曼德等人的唯物论。他认为“火”才是存在的本质，并以此证明宇宙的本质是变化。他有名的话是：“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赫拉克利特接受了毕达哥拉斯某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如关于爱憎、善恶、光明与黑暗等对立原则，主张感觉中没有真理等，但他把对立的统一、矛盾的和谐和事物的永恒运动看成普遍的规律（Logos），又大大超越了毕达哥拉斯，成为希腊哲学中第一个全面阐述辩证法的人。他对后来欧洲哲学影响很大，尤其是对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称：“没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命题，我没有纳入我的逻辑学中。”^②

巴门尼德和芝诺

前苏格拉底的希腊哲学流派的一个共同点是用单一原则解释世界，以巴门尼德和其弟子芝诺为代表的爱里亚学派与赫拉克利特形成了两个极端。赫氏将“变化”当成普遍原则；而巴门尼德却证明到，“非存在”是不

① 恩培多克勒是希腊 Acragas 人，认为物质由土、水、气、火构成，因组合比例不同形成不同物质。其动因是受到宇宙中两个对立的神力影响。

② 《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 295 页。



存在的，不能从无中生有，因而任何事物都是永恒不变的。由于人们不能想像不存在之物，也就决定了感知不能发现真理，理性才能发现真理，才是惟一的实在。换言之，即事物形式上的差别去掉之后只剩下“存在”本身，这个“存在”就是“一”，就是一切。这即是所谓“万物归一”。^① 在希腊数学中，我们提到芝诺有关离散和连续的数学问题，这实际上是芝诺用归谬法为巴门尼德反对“非存在”和变化的普遍性辩护。例如他的“飞箭悖论”证明在空间的某一点上，飞箭和空间是静止的，这至少说明了运动和变化在感官上的真实，在逻辑上却是不真实的。^② 芝诺否定运动尽管错误，但他第一个系统地运用了辩证法，影响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整个爱里亚学派张扬理性的旗帜，对希腊哲学带来二个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促进了对逻辑的研究，二是万物归于“一”，“一”是惟一真实的“存在”的观点促使了原子论的产生。

德谟克利特

公元前 435 年，小亚细亚的留基波（Leucippus 453BC）到爱里亚拜芝诺为师，他提出物体是由不可被物理分割的、看不见的无数小粒子即原子构成的学说，以此来调和爱里亚学派“一”与“多”、“存在”与“不存在”的矛盾，他因此被称为“原子论之父”。他的弟子德谟克利特将其发展成为完整的唯物主义的原子论。其主要观点是：（1）原子是不可分的基本粒子；

① 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第 307 页。

②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191—192 页。

(2) 永恒存在；(3) 大小形状多样、性质一致；(4) 在虚空中运动。在此后二千年的西方哲学中，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最接近科学的。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没有雅典人，哲学问题也仅限于自然哲学方面。苏格拉底把伦理道德引入哲学，特别强调善就是知识，道德就是有关善的知识，因此苏格拉底的哲学也就是伦理学。苏格拉底强调善的社会背景隐含了对民主政治的批评，因而在公元前 399 年已届七十的苏格拉底受到不信神和蛊惑青年的 2 项指控而被判死刑。其实苏格拉底只是认为神已安排好了自然界，社会道德才是哲学的对象。他申辩所做的劝善正是神的指示，指控纯属捏造。^① 正是为了向公民宣扬善，他才用辩论手法让公民认识什么是普遍真理。他通过反嘲（让对方陷入矛盾）、接生术（找出普遍真理）、归纳（由个别到一般）几个步骤使对方认识错误，接受真理，这就是“辩证法”（苏格拉底在哲学上第一次使用“辩证法”一词，也即“苏格拉底的方法”。它是认识论中由个别到一般的方法）。它在逻辑上有两大贡献：一是追求普遍的定义，二是归纳推理。黑格尔说从苏格拉底始，希腊哲学家不再问答什么是本质，而只问答什么是真理。^② 他对西方思想的贡献犹如孔子之对中国哲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哲学巨匠也无不受他的影响。

柏拉图

①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第 66 页。

② 《哲学史讲演录》第 2 卷，第 109 页。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一生大半居于雅典，有 25 篇对话（据考有 6 篇伪作）流传于世，除晚出的《法律篇》外，均以苏格拉底为主要对话者，其思想之大半倒是柏拉图自己的。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核心是“理念”（idea），即只能在思维活动中存在、被思想所把握的而与“个性”对立的“普遍性”。爱尼亚学派将世界本质定义为单一物质。赫拉克利特指出感官所认识的世界本质是运动，这就为柏拉图认定感性世界不真实，理性世界才是真实的和永恒不变的客观唯心论作了准备。

由于“理念”是惟一真实的存在，所以柏拉图的认识论自然否定了实践是认识真理的途径。普遍性、理念、善、美都潜伏在人的心灵之中，真理（理念）也只有通过回忆来认识，所以认识理念也就成为哲学的目的和任务。^①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的口说到：“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有的一种能力，而每个人用以学习的器官就像眼睛。”^②在感官的刺激下，灵魂原有的知识才能重新唤起。柏拉图的这种先验论使希腊哲学最终导向了宗教。在欧洲中世纪，柏拉图主义成为基督教哲学的主要来源。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是希腊文化中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达 2000 年之久，如此人物在楚国乃至

① 黑格尔指出，认识理想的东西是惟一真实，是柏拉图的伟大创见。只有思想产生出的东西才是真理，形成了柏拉图关于理念的“科学体系”，即思辨哲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哲学史讲演录》第 2 卷，195—199 页。

② 柏拉图：《理想国》，第 277 页。

中国都没有产生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有 400 卷之多，流传下来的有 47 部。他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形而上学》一书中。“形而上学”的希腊原文意为“在物理学（物理学就是指自然哲学）之后”。亚氏的哲学著作因编在物理学著作后而得名，后来专指抽象的哲学体系。亚氏本人却是将他的哲学作“第一哲学”（在《形而上学》第 6 卷第 1 章称形而上学为“统属万类的”“第一哲学”）^①，它是研究“存在”的科学。^②他与柏拉图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承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是人的认识来源。以此为基点，他认为哲学即“旨在寻求可见事物的原因”。^③这种原因有 4 种，即：形式因（本因）、质料因（物因）、动力因（动因）和目的因（极因）。形式因是说本体是什么和为什么，它离不开质料因。例如建筑样式与建筑材料的关系，材料只有获得样式之后才成为建筑，但形式却比材料重要，所以罗素说亚氏的形式因与“理念”没有太大的不同。^④动力因和目的因是亚里士多德本人认为的对哲学的贡献。他承认事物的运动，但他又在寻找运动的终极原因，认为存在一个“第一动因”^⑤，这种摇摆于唯物、唯心论之间，他就为日后上帝的存在留下了一个理论空间。

在《形而上学》之后的《物理学》也就是自然哲

① 《形而上学》第 120 页。“存在”的希腊文是“τὸ ὄν”也可以译成“是”、“有”，但都不如“存在”。英文“Being”较能传达希腊原文含义。

② 《形而上学》第 56 页。

③ 《形而上学》第 28 页。

④ 《形而上学》第 6 页。《西方哲学史》上卷，第 217 页。

⑤ 《形而上学》第 246、249 页。



学中，亚里士多德承认世界的基础是物质的，是运动的。他在此提出了四因说，其“第一推动说”的影响一直到牛顿都无法摆脱。另外，在逻辑学方面他第一个给概念分类，得出本质、数量、性质、关系等 10 个范畴，提出归纳法和演绎法。^① 这些都表明亚里士多德作为希腊最后的伟大哲学家，其基本的精神是用科学证明的方法来解释世界，寻求事物的本因。它也基本代表了希腊哲学家们的共同特征，这与东方哲学缺少理性的证明，而只满足于描述的状态是截然不同的。

② 罗马哲学

罗马人的务实态度与哲学的思辨精神十分不协调，罗马的哲学也就缺乏独立性，而只是希腊哲学的附庸。亚里士多德之后到罗马帝国时代正好是希腊化时期，先后有 4 派哲学影响了罗马，它们是犬儒（Cynic）派、怀疑派、斯多葛派（Stoic）和伊壁鸠鲁派。

犬儒派是在城邦制度衰落中出现的。代表人物第欧根尼（Diogenes 412 ? — 323 BC）是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犬儒派以舍弃世俗财富、返回自然为最高的善，一切习俗都被放弃，乃至像狗一样地生活，这在希腊化世界中得到民众的支持，部分观点后为斯多葛派吸收。怀疑派的代表人物是皮浪（Pyrrhon 365 ? — 275 ?），其主要观点是，感官和理性知识均不可靠；真理不可知和不求真理只求宁静。这种哲学出现的背景在于希腊哲学家除了坚决否认感官价值的巴门尼德和柏拉图之外，几乎都有些怀疑感官知觉。怀疑论反对一切判断，这在精神上契合了罗马人的务实品质，在哲学上却成为“一切

^① 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第 11 页。

确定东西的辩证法”，^①促进了哲学的发展。斯多葛派的创始人芝诺（340—265 BC 不是爱里亚的芝诺），他因在雅典集市画廊柱下讲学，其学派即以画廊名字而被称为斯多葛学派。芝诺的哲学分成逻辑学、物理学、伦理学 3 部分。他承认世界的物质性、知觉是确实知识的基础，但是事物运动的主要原因仍是神。斯多葛派流行近 500 年，其始终如一的是它注重德行，强调忍受的伦理学，因之也被认为是禁欲主义的哲学，在罗马共和后期和帝国时代尤其受到重视。其中有关天赋权利的思想影响到罗马的立法和日后文艺复兴时代反对君权神授的斗争。^②

与斯多葛派相反的是被人认为“享乐主义”哲学的伊壁鸠鲁派。伊壁鸠鲁认为快乐就是善，这种伦理学是旨在消除恐惧的两个根源：死亡和宗教（这与宗教是慰藉的看法刚好相反）。在物理学上，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认为重量是原子的基本本质。^③ 伊壁鸠鲁著名的弟子就是罗马的卢克莱修。以上这 4 派哲学没有一派在罗马取得支配地位。在罗马早期形成了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混合的折衷主义，代表人物是西塞罗；晚期则流行混合了斯多葛主义、神秘主义哲学的新柏拉图主义，它后来成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哲学基础，代表人物是普罗提诺（Plotinus 204—

① 《哲学史讲演录》第 3 卷，第 107 页。

② 罗素：《西方的智慧》，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第 147 页。

③ 伊壁鸠鲁的原子论范围并没有起过德谟克利特，只是否认原子由自然律控制，他说原子有由重量下落产生的自然运动、由碰撞产生的被迫运动和同偏离直线的自由运动，原子的不同就由此而形成。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3 卷，第 60—64 页。

270)。

西塞罗

西塞罗的哲学混合了柏拉图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对伊壁鸠鲁派持否定态度。但他自称是柏拉图的“新学院派”(The New Academy，柏拉图的后继者在哲学上分成老、中、新三派，其共同之处都是将真理看成自我意识的主观信念，以辩证的方式反对斯多葛和伊壁鸠鲁哲学的确定性)，对多数事物抱有怀疑态度。他承认神的存在，但又怀疑任何独断的说法，因此基本上不谈怪、力、乱、神。其重要哲学著作有《图斯库卢姆谈话录》、《学院派哲学》、《论神性》等。他本人并不强调他的著作有独创性，只是为了向罗马人提供哲学百科知识，其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性也正在于他向罗马传播了希腊哲学思想，给欧洲哲学一套哲学术语，后人是通过他才了解希腊的哲学。

卢克莱修

罗马共和国末期自由思想成为风气，伊壁鸠鲁的学说在贵族中十分流行，卢克莱修却继承了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成为罗马最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卢克莱修在其长诗《物性论》中论述了原子的特点：世界只存在原子和虚空；万物由原子构成；物质灭亡后分解成原子；原子有重量、形式的区别；原子有3种运动形式（垂直、碰撞、斜线）；原子不能由无中产生。他写道：“物体可以分两种：一种是事物的始基，一种是始基结合而成的东西，始基没有什么能加以毁灭，因为由于它们的躯体。”“哪里是虚空，哪里就没有物体。”^① 从后

^①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26、27页。



一点看，巴门尼德、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唯物论都缺乏东方哲学中的辩证思想，要么否认变化，要么就否认“无”可以生“有”。楚国老子哲学中对事物绝对性的否定就显得要比希腊罗马哲学中的原子论者聪明得多。由于奥古斯都提倡复古和后来宗教的昌盛，卢克莱修的著作几乎湮没。中世纪留下了惟一一份手稿直到1473年才再次出版，伊壁鸠鲁及他本人的思想才逐渐为人所重视。

③楚人的哲学

人类社会之初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和认识经过了一个神话和巫术的阶段，它是一个人神不分时代。人们对世界本原、天象变化、生老病死乃至个人梦境等自然和超自然现象的不同解读，容易产生简单的因果判断、恐惧、忧虑等情绪，也必然会相信祈祷、宗教仪式可以减轻焦虑，多神崇拜也由此而出现。随着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驾驭能力增强，泛神信仰会转变成主神崇拜。在萨满、祭司集团和教士阶层中的知识分子里产生了早期的哲学家。人神分离之后，他们不满足于用人格化的神来解释世界，希望从神之外找原因。如印度吠陀时代“原人”中认为“原人”（*purusa*）为宇宙之源；希腊的泰勒斯认为“水”构成了世界；商代把“帝”作为宇宙的主宰；楚国晚期出现“太一”等，这些都形成了哲学中的本体论。

作为中原文化的支流，楚人的哲学面貌与中原没有本质差异。楚人哲学的代表是道家哲学，它出现于人神已分的春秋时代。与积极的儒家哲学相比，它消极面较多，原因在于南北生态环境的差别。南方更多是靠天吃饭，因而当地知识分子对天道、自然有不同于北方学者



的看法。但在一些根本方面，如世界的“五行”构成，存在着天道、伦理哲学中的仁、义、礼的基本范畴等，儒、道二家的差别并不大。如《老子》十九章“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的反对儒家的一语，在新出的荆门郭店《老子》简中作“绝伪去诈，民复孝慈”。^① 释者裘锡圭在 1999 年召开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纠正我在郭店〈老子〉简释读中的一个错误——关于“绝伪弃诈”》一文中重新释为“绝为去虑”。意思是放弃违背自然的作为和思虑。^② 两种解释都没有攻击仁义范畴的内容，明显与今本和帛书老子本不同，没有敌视儒家的东西。它表明儒、道的分野没有汉以后那么严格。胡适早就指出老子也是儒，他和孔子分别代表儒的消极和积极方面。^③ 可以说以老子为代表的楚人哲学才刚刚摆脱原始宗教的神秘背景，还没有进入到伦理哲学的阶段。

老子

老子是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东）人，做过周朝的史官，约生活在公元前 580 至公元前 500 年之间。根据近年湖北荆门郭店《老子》竹简本和 70 年代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的发现和学者们的研究，

①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第 111 页。

② 裘锡圭：《纠正我在郭店〈老子〉简释读中的一个错误——关于“绝伪弃诈”》，《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第 29 页。

③ 胡适：《说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民国二十三年，第 233—284 页。

《老子》一书至少在战国早期就由其弟子或学派编纂成书。^① 老子在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犹如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不同的是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一直没有中断，直到今天他对西方现代哲学如海德格尔（M. Heidegger 1889—1976）还有深刻的影响。

老子哲学思想之博大精深可以略从他的宇宙构成之本体论、“静观”与“玄览”的认识论以及辩证法三方面简述。

在本体论方面，老子把“道”作为其哲学的基础。“道”本意为道路，有通达意思。老子将“道”上升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成为宇宙构成的本原。老子说他自己也无法描述“道”是何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② 这里包含了3层意思。（1）道独立于万物存在。（2）运动不息。（3）为万物之源。东周以前人们认为宇宙万物由人格化的神“帝”或“天”创造，这是受原始宗教或神学思维影响的自然结果。春秋时期，管子已提出“水”创造万物：“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③ 这和希腊泰勒斯的主张类似。老子提出“道”创造万物，从认识论的发展来看，他已发现了感官认识真理的缺陷，其意义相当于希腊爱尼亚学派发现只有理性才是认识真理的途径。老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像巴门尼德将产生万物的“一”

① 裘锡圭：《郭店〈老子〉简初探》，《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三联书店1999年第30页。

② 《老子·二十五章》。

③ 《管子·水地篇》。



看成不变化的终极存在。道本身可由“无”产生，并具有“有”、“无”两种性质。他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① 这个“无”不是“零”和空无的意思，而是一种先于物质的自然界的混沌状态。在现代宇宙论看来，老子的观点并不是唯心论。根据恒星光谱红移现象，科学家发现了宇宙的膨胀，由此推论出宇宙起源于一个“奇点”，而“奇点”在“虚时间”中并不存在，^② 这相当于宇宙起源于“无”。^③ 在郭简《老子》简中，这句话为“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④ 它进一步证明老子的“道”包含“有”和“无”二个范畴，不仅是宇宙的生成论，更属于哲学中的本体论，“有”、“无”之间恐怕没有逻辑的先后关系。^⑤

在认识论方面，老子已意识到个别感官经验无法认识事物本质，认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⑥ 老子的看法是其宇宙本原为“无”哲学体系的必然结果，他省略了对经验论的批判，直接提出人们认识世界事物本质（“道”或“太一”）要排除一切人为因素的干扰，用理性的“静观”和直觉的“玄览”去领悟。这即是在竹简《老子》中提倡的“绝

① 《四十章》。

② “虚时间”是数学概念，相对“实时间”而言。即人们为计算必须用虚数而不用实数来测量的时间。在“虚时间”中，时间空间的区别完全消失。

③ 霍金：《时间简史》，湖南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28页。

④ 《郭店楚墓竹简》第113页。

⑤ 陈鼓应：《从郭店简本看《老子》尚仁及守中思想》，《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第78—80页。

⑥ 《四十七章》。

伪去虑”，去掉违背自然的人为做作和思虑，达到虚空无一物挂碍的婴孩状态后，才能认识“天道”。这种主张由理性而不是个别感官经验来认识事物的先验论，在认识论上是对经验主义的超越，与柏拉图认为只有理性世界才是惟一真实存在的思想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也成为日后中国道教、佛教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极为丰富。他指出事物的存在是相互依存的，有无、大、小、强弱、祸福等都是对立统一体，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间相和、前后相随”，^①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以相互转换。其核心是要借以阐述老子的贵无、贵柔、守雌的思想。主旨也是阐述万物生于无的本体论和清静无为的政治学说，因此他只阐述这些概念，而没有给出任何理性的证明。与希腊的赫拉克利特相比较，老子的辩证法没有强调运动的绝对性，是一个进步，但强调柔弱一定胜刚强而不讲转化条件则陷入了唯心论。

文子

文字为老子弟子，其书《汉书·艺文志》有记载。1973年河北定县发现《文子》竹简，^②它与竹简本《老子》有密切的渊源关系。^③文子在哲学上的重要贡献是将老子思想中提到的“道”、“德”、“仁”、“义”、“礼”系统化成为“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哲学。《老子》一书没有提过“无不为”的概念，文子哲学思想

① 《二章》。

② 国家文物局古文文献研究室等：《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

③ 丁原植：《就竹简资料看〈文子〉与解〈老子〉传承》，《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集，第81—117页。



为汉代统治者以“黄老思想”为治国理念起了将道家哲学与权力政治沟通的桥梁作用，对整个古代中国的统治阶层都有深远影响。

“太一生水”

郭店楚简有《太一生水》一篇，它极可能与《老子》是同一系统。“太一”在战国中后期是楚国最高的神，其哲学概念相当于“道”。“太一生水”简言之是一种宇宙论。在早期的唯物论中，水的重要性，东、西方哲学都很看重。但在该篇发现之前，西方哲学似乎更为重视。中国原有文献的“太一”概念则有神话和原始宗教的背景，与老子的宇宙论比较，太一生水似较为原始，因为它兼有星、神、终极物等多种含义。在包山楚简中，“太一”与祈祷、禳除仪式也有关系，不是简单的哲学概念。^①竹简中有“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的观点，^②这是唯物主义的宇宙生成论。老子哲学的宇宙论应该是由此发展而来。所以该竹简发现之后，就有学者指出：“道就是以水为原型的抽象概念”^③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弥补了中国哲学史在宇宙生成学说的一个缺环。

庄子

庄子是宋国人。宋为殷商后裔，其习俗与楚极为接近。庄子思想一般也作为楚人哲学体系的重要部分。老

① 李零：“太一崇拜的考古研究”《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07—238页。

② 《郭店楚墓竹简》第125页。

③ Sarch Allan（艾兰）：《太一、水、郭店〈老子〉》，《郭店楚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531页。

子讲道生于无，庄子也讲道“无为无形”、“先天地生”。^①但庄子也将它推向到极端，认为“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②结果是没有“有”，也没有“无”，陷入相对主义和怀疑论，这一点与罗马亦有文采的哲学家西塞罗略为相似。庄子否认了客观认识标准，真理也就不可知了。根据郭店《老子》竹简本的推测，庄子哲学的另一重大影响是将老子哲学中的仁义观改成了否定意义，使之成为反仁义的伦理哲学。今本《老子》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竹简本则为“大道废，安有仁义？”。^③这是由于庄子的怀疑论产生“大道不称，大仁不仁”（《齐物论》）、“攘弃仁义”（《胠篋》）的必然结果。可见人们认为“《老子》系统中的仁、义、礼是否定性的，不是肯定性的”^④看法是由于庄子修改误导的结果，这一改动影响中国哲学对道家思想的研究达 2000 年之久！

宗教信仰

①希腊的宗教信仰

宗教的基本功能是满足社会的和心理的需要。希腊早期克里特文化许多宗教仪式的壁面和祭祀场所的遗存中都发现了对母神（象征物为树、鸟）、操蛇女神、圣牛祭献的仪式画面，发现的双面斧也是一种重要的仪式

① 《大宗师》。

② 《齐物论》。

③ 《郭店楚墓竹简》第 121 页。

④ 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第 244 页。



工具。依进化论的看法，母神以树为本体而不是神的居所，仍属泛灵论，还未到多神崇拜阶段。^① 另外，母神原型特征显示树与生育之间的关系，也是克里特文化的宗教信仰较原始的一个证据。^②

从荷马时代起，希腊的宗教信仰以多神拜为特点，它有3种成份和阶段。即：地神、奥林帕斯山上诸神和复活神。地神较早，是希腊各邦的保护神，与以宙斯为代表的奥林帕斯山神系没有统属关系，它们与原始的宗教信仰关系最为密切。奥林帕斯山诸神受到希腊各地的一致崇拜。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荷马的书中，这些神只接受贵族的祭祀，神人同形的色彩十分强烈，其理性和想像力压倒了宗教迷信。在古典时代，这些并不关心城邦政治、经济，以享乐为目的的奥林帕斯诸神，因为毛病太多导致了整个奥林帕斯宗教生活的衰退，但却由此促成了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发展。^③ 复活神是希腊宗教信仰中最具宗教色彩的部分，它根植于社会下层与古老的巫术仪式关系密切而与奥林帕斯诸神没有联系。围绕丰产和灵魂轮回问题形成了神秘仪式，对复活神的信仰在希腊民间十分流行。

现代希腊学的研究才充分认识到非奥林帕斯的宗教对希腊思想的影响，它以爱留西斯（Eleusis 是雅典西北的一个城邦）密仪和奥菲教义为代表。前者是用巫术仪式祈求丰产、崇奉得墨特尔（Demeter）。得墨特尔是女神，与农业有关。仪式是秘密的，泄密者会被处

① 弗雷泽：《金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78页。

② 诺伊曼：《大母神》，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8页。

③ 《西方哲学史》上卷33—34页。

死。有关仪式的情况只能靠零星的记载及荷马的《地神颂》(Hymn to Demeter) 来推测,灵魂不死是举行这种仪式的一个重要原因。据后者希罗多德说是从埃及传入的。^① 基本信仰是灵魂轮回,主张禁欲而强调心灵的欢乐。到伯里克利时代,它形成了以酒神狄奥尼索斯崇拜的狂欢仪式。奥菲教义在希腊宗教信仰中最为重要,这不仅是指奥菲教义中的一部分较为高尚的观念渗入了希腊哲学,另一部分成为下层民众长期保存的巫术迷信,而是指奥菲教义向人们展示了传统上认为希腊人的精神是理性的、经验的、静穆的另一面,这就是激情、神秘和宗教情结的一面,它与世界任何地方早期文化中人类所具有的特征完全一致。在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祭祀中,它的复活成为希腊人纵酒的理由。在对奥菲的崇拜中,他的音乐才能和他与动物的友好关系以及招魂的能力,显示出了希腊宗教信仰的萨满教特征。^② 在东西方文化的精神世界比较中,这是与楚人精神最为接近的一点。

②罗马的宗教信仰

公元前 9 至前 6 世纪,统治罗马的伊特拉斯坎人有自己的神系,多数与希腊契合。最大的神是管雷电的提尼亚 (Tinia),她相当于希腊的宙斯。爱神特兰 (Turran)、酒神弗伦斯 (Fufluns)、战神马里斯 (Maris) 都与希腊神祇一一对应。值得注意的是其恐怖死神加伦 (Charun) 不同于希腊的海德斯,他与死人世界能沟通,显示出在伊特拉斯坎人的多神崇拜中已有来世观

① 《历史》上卷,第 165 页。

② M. Eliade: Shamanism. p. 391.



念，从考古发现的器物和壁画中也确实证明他们的宗教信仰中已有地狱观念。伊特拉斯坎人的宗教信仰影响了罗马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特有的占卜法（包括骨卜、飞鸟占卜和内脏占卜）被罗马人完全接受。

与希腊的宗教信仰比较，罗马人早期的宗教信仰更接近楚人，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普遍存在的巫术仪式。二是祭司集团的存在且与政治关系密切。早期罗马人的巫术与宗教区分不严格，罗马诸神类似泛灵论中的精灵，每件物体或者概念都有自己的神（精灵）。如山川、河流、道路、房屋、绳索等物，青春、幸运、希望、恐惧、记忆等概念，这些信仰背后有大量的巫术活动，人们的一切活动都靠这些神给予庇护和解释。瓦罗说罗马人的神有3万个。在伊特拉斯坎和希腊的影响之下，外来神进入了罗马的神谱，开始出现大神和神灵人格化的趋势。像丘比特（Jupiter）最初是茅屋门神，形象是一支石箭，后变成类似宙斯的主神。战神马斯（Mars）原为耕种之神，形象为长枪，后变成了罗马的象征战神，它们来自伊特鲁尼亚。得墨特尔、狄奥尼索斯、阿波罗等希腊神都被吸收为罗马的神。

罗马人与神的契约关系比希腊强烈，知道仪式的细微错误会破坏仪式效果，这种态度是受到巫术社会的影响。罗马社会有一支庞大的祭司集团负责仪式、占卜，所有的大小政务必须占卜问神之后才能执行，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由百人团选出，国王也只是祭司团中的一员。伊特拉斯坎人的占卜术（普林尼在《自然史》中对罗马占卜作过许多描述，据说伊特鲁利亚的占卜是来自巴比伦）成为罗马人的常用技术。罗马的占卜官（augur）一词起源于“鸟”（avis），由伊特拉

斯坎人的占鸟术而得名。稍后，罗马人又采用内脏占卜和骨卜技术。每当政策出台、战争之前都要由执政官占卜，然后占卜官予以解释。英国学者泰勒认为这类行为只有非常落后的民族才使用，在奥古斯都之后就基本停止了。^①实际上对非常迷信的罗马人来说，他们对宗教仪式、占卜活动的虔诚一方面反映出了他们农业社会的背景与自然力量有更多的敬畏和亲近感，另一方面也将爱国主义溶入对神的信赖之中，培养罗马人的狂热爱国精神。^②所谓落后的问题，只是进化论者不太了解占卜一类萨满技术也是社会的一种调节机制，即使在基督教引入罗马社会后，萨满技术与信仰仍在民间广泛使用。^③

③楚人的宗教信仰

《汉书·地理志》说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实际上这在先秦社会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只不过楚人表现尤甚而已。《汉书》所称反映了楚人宗教信仰的二个特点，一是信巫好鬼，二是多神崇拜。所谓“信巫鬼”是来源于人类早期社会的泛灵论信仰，以世界万物均有灵性为特征。社会结构复杂之后，“夫人作享，家为巫史”^④的状况被专业的神职人员所改变。他们凭借与超自然力量沟通的技巧获得了“神通”，这就是巫，其活动也成为宗教仪式行为。在古代宗教的研究中，学术界常用“萨满教”（Shamanism）来描述它。“萨满”来

① 泰勒：《原始文化》，第130—131页。

② 《凯撒与基督》上卷，第90、93页。

③ M. Eliade：Shamanism. p. 375.

④ 《国语·楚语下》。



源于西伯利亚通古斯族的“巫师”一语，其最显著的特点是靠仪式工具，与神灵沟通。像歌舞、萨满式昏迷（ecstasy 可以用酒、大麻、古柯叶一类致幻剂获得）等都是常见的伴随现象，萨满都相信自身所具有的超凡能力。^① 按照现代宗教学的定义，萨满教（巫教）严格地讲还不能称得上是宗教，它还缺乏教义、教阶组织和僧侣集团。在楚文化中，“信巫鬼”显然就是当时楚人相信萨满的法术，萨满就是巫，这还只是处于前宗教状态。所谓“重淫祀”是指楚地普遍存在祭祀非正统神系的仪式活动。它反映出楚人社会中还存在与萨满不同的另一类宗教仪式的神职人员即祭司集团，他们的地位不像萨满来自与超自然交往的能力，而是来自世袭继承。两者的另一个差别是萨满更多地是代表神与人的交往，祭司更多地是代表人与神的交往。楚人进入南方社会之后，其中原文化的背景使代表楚民族的祭司集团仍保留了中原文化系统中的神系，而地方原住民社会存在的祭司也将自己的神谱编入楚人的祭祀仪式中，后者主要表现在屈原对《九歌》的改编中。

公元前 6 世纪末，楚大巫师观射父对楚昭王（515—490 BC）说，上古时代，民神杂糅，颡顼帝命楚先君重黎“绝地天通”，切断民众任意与神的来往，改由巫师或萨满来沟通人神关系。楚人进入江汉地区之后，当地生活仍是靠天吃饭，人与自然的联系非常紧密，巫师的活动就一直很活跃。相反西周以后，北方因人口增长，集约式农业的出现，使人、神沟通的萨满仪式的重要性渐被协调人与人关系的“礼”所取代。掌

^① M. Eliade: Shamanism. p. 68.

握知识的祭司集团的地位也得到了强化，但却分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积极儒和以老子为代表的消极儒。对老子为代表的道家而言，自然无为的价值观与南方粗放型雨水农业更为协调，社会付出的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都是最小的，他们也更愿意吸收原有社会信奉的神灵，一切顺之于自然。相对于萨满巫师仪式的狂乱和昏迷来说，祭司集团对神、祖先的崇拜显得较为理性。他们的仪式逐渐变成政治活动，但一些技巧和方法，如占卜、祭祀仍被保留，当然怀疑者也会越来越多。如公元前 703 年，楚郑交战，楚莫敖卜卦，斗廉却阻止，说占卜仅仅是去疑而已，不疑何卜？又如公元前 633 年，城濮之战楚败，荣黄认为这与不祭祀河神没有关系。屈原在《天问》中，更是对楚人的知识系统提出全面的疑问。在这种对神灵的怀疑当中，楚人就为自然哲学的萌生留下了空间，遗憾的是它没有像希腊那样出现形而上学的、纯粹理性的思辨哲学。

楚人或楚地信仰可以分成官方和民间两类。在官方信仰中，“帝”是最高神，它源于商代，到战国却有上帝、上皇、皇天、太一、东皇太一等别称，这表现出楚人主神来源的多样性。^① 它们可能是楚地原有信仰，也可能自外传入。比如“太一”与天文观察有关，起源很早，属于饶宗颐所指出的“先老（子）”概念。到战国中晚期，在民间祀神仪式中，它成为人格化主神“东皇太一”；在道家思想中，它又成为宇宙生成论的基础。东皇太一后来为楚人所尊崇，恐怕既有原生因素，也有外

^① 文崇一：《楚文化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第十二卷，中华民国五十六年，第 141 页。



来阴阳术家的影响将它作了理论化的描述。^① 围绕着“帝”而构建起来的中原文化的神系和英雄都在楚人的官方信仰之列，这在《离骚》和《天问》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在民间信仰中，泛灵论的色彩则十分浓厚，山精、水怪、河伯、湘君都在祭祀信仰之中，各地的鬼神都混杂在一起。屈原的《九歌》就是描写民间祀神仪式的作品。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则反映了楚地民间已将中原流传的开天辟地故事与楚地流传的女娲创世神话等融为一体。至于文献反复强调的楚地盛行各种招魂、跳丧的巫覡仪式和歌舞娱神的神秘庆典，在文化比较中并不意味着落后，它们在中原文化和希腊罗马也同样存在。在今天可能有人把“信巫鬼、重淫祀”当成是一种价值判断，而在楚人那里，这仅仅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文学与艺术

① 希腊的文学艺术

文字

古代的希腊由于有不同时代迁徙进来的民族，语言较杂。希腊最早的克里特语与希腊语不同，它更接近埃及语、赫梯语等近东的方言。在公元前 13 世纪，希腊开始有了属于印欧语系的共同方言。这些方言分成爱奥尼亚、多里安、伊奥尼亚、阿提卡等，但彼此之间可以

^① 李学勤：《初读〈太一生水〉》，《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第 297-300 页。

沟通。在公元前 5 世纪以雅典阿提卡方言为主形成后来的希腊语，几乎被当时所有受教育的阶层使用。

早期克里特人受东方的影响也使用象形文字。在公元前 1800 年左右，其象形文字中已夹有 $1/3$ 的线形文字 A，它们是由象形文字简化而成的，缩为 90 个音节符号，使用时也用表意符号来说明前面的音节符号，文字书写自左向右，该文字迄今未能释读成功。其后 200 年，克里特和希腊大陆一些地区流行线形文字 B，它与腓尼基字母有些相似。1952 年它由英国建筑师文特里斯 (M. Ventris 1922—1956) 释读成功。公元前 14 世纪，腓尼基语传入希腊，腓尼基语是闪米特语 (Semitic) 的西北语支，其字母为闪米特字母，共有 22 个，只表示辅音，书写时从右到左。希腊人则在其辅音字母外增补了元音字母。考古发现最早的希腊碑铭 (公元前 8 世纪) 上的文字与公元前 9 世纪闪族有名的美沙王 (King Mesha) 的摩阿布 (Moabite) ① 铭文基本相似，也自右向左书写。稍晚时候的文字书写方向已有变化，最后完全变成自左向右书写。由于荷马史诗一类作品流传日益广泛，伊奥尼亚人的文字成为了全希腊的通行文字，后又传入东欧，至今仍在使用。

考古发现早期希腊的文字内容多为祷词和提货单，涉及宗教和商务。前者成为诗歌文字的源泉，后者为散文之母。希腊字的书写有正体、草体之分。碑铭、题辞用正体，书写时既不标重音也无字间间隔，更无标点符号，仅在变换题目时画一条横线。这和楚人在书写竹简

① 摩阿布在死海之东，今外约旦地方。腓尼基在地中海东岸靠近黎巴嫩山。



时，一段、一句完了之后用符号标出的情形相类似，只是没有楚人细致，只限于标题的变化而已。

希腊早期的书写材料很多，有树叶、泥板、木板涂蜡（用于学童）、石、铜或铅板（用于刻碑铭）等，永久保留的材料则用纸草书写。纸草是埃及特产，希腊所用是经过腓尼基人输入的。希腊文明的繁荣期也用羊皮做书写材料，在纸草、羊皮上书写时使用芦苇沾墨书写，修改时则用海绵擦掉墨水。古希腊诗人马提尔（Martial 40 ? —102 ?）送给朋友诗作时，总要附上一块海绵。在同时期的楚国，人们去掉竹简文字的办法是用削刀将字刮去。

文学

希腊文学在传统上分为 3 个阶段，即古典社会以前的神话、史诗阶段：古典社会的悲剧、喜剧、散文阶段和希腊化时期的新喜剧阶段。这基本上与人类社会文学发展的规律一致，但也不那么绝对。在克里特岛的考古中，人们发现了克里特人留下了许多剧场遗址，在克里特岛中部的菲斯托斯（Phaistos）发现了公元前 2000 年的剧场，它有 10 排石头座位，长达 24 米。在克诺索斯发现同期更大的一个剧场有 2 个观众区，一个 18 排座位长 10 米，一个 6 排座位长度从 5.5 米到 15 米，可容纳四五百名观众。这两个剧场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剧场，前者可能还用于体育和仪式活动。从当地出土的壁画中可以推断出，后一剧场已有舞蹈、戏剧之类的表演，只是所演剧目现在仍是一个谜。

a. 神话

希腊神话是人类文学史上的宝库，早先它以口头文学的形式在各部落流传，后来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的

《神谱》等著作都记载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它们是经过后人的整理而形成的比较系统的神话。希腊神话包括神和英雄传说两部分，它们多半是某一地民众知识的总汇或者是史诗吟诵者的发明，在流传过程中还不断地被增饰或创造出新的神和英雄。每一地区所崇拜的英雄和神也不尽相同，如雅典崇奉雅典娜（Athena）、萨摩司崇奉赫拉（Hera）、波塞冬尼亚（Poseidonia）崇奉波塞冬（Poseidon）等，但对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却是一致崇拜，这也成为希腊神话的一个特点。

考古曾发现公元前 1325 年的赫梯人的泥板文书上有阿哈伊亚人（Akhijawa）的记载，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阿加门农就是阿哈伊亚人的领袖，阿哈伊亚的意思是“亚该亚国”。在神话传说中，阿加门农是宙斯的直系后裔。宙斯之子坦塔洛斯（Tantalus）是弗里吉亚（Phrygia，为小亚细亚的一个城邦，也是特洛伊的盟邦）的国王，其子派罗普斯（Pelops）的孙子就是阿加门农，阿加门农后来统治伯罗奔尼撒半岛。该岛即派罗普斯岛之意。

希腊的神话传说十分丰富，它们包括创世神话、自然现象神话、人类诞生神话等。对希腊人而言，因各族成份复杂，神的谱系也比较复杂，他们自己也很难讲清所有的神，现在按类可以分成七种，即天神、地祇、生殖神、动物神、地下神、祖先或英雄神和奥林帕斯山上诸神。

天神包括太阳神赫利奥斯（Helios）、月神塞勒涅（Selene）等，他们在希腊神谱中是小神，原因是天象对当地生活影响不大。比如当地气候过度干旱，就不盛行太阳崇拜。因多数神都是住在地上，地祇成为希腊神



谱中的主流。地神最重要的是大地母神，她创造出乌拉诺斯（Ouranos 天），又与天合创黑夜、白天等。河流、森林、风雪、雷电也是地神的一部分。生殖神在希腊广为崇拜，在祭祀农业女神得墨特耳、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等重要神祇的仪式上就要放置象征再生的阴茎，在宗教狂欢的节日上，还有由阴茎引导的游行。动物神在早期受到崇拜，在古典时代，人们强调神人同性同形，多不许动物再进入神的领域，仅个别动物因特点显著仍被视为神。如牛因强壮、猪因多产、蛇象征幽灵也仍能成为神。地下神是最恐怖的神，希腊人是以摆脱恐惧的心理来祭祀它们的。阴间的冥神是海德斯（Hades），他是宙斯的兄弟，希腊人讨好地称之为普卢托（Pluto）意为赐予者。最大的地神是宙斯·克特尼奥斯（Zeus Chthonios），他与宙斯无关，是一条恐怖的大蛇，希腊人美其名为仁爱之神，是希望这类恶神不要来找麻烦。对祖先或英雄神的崇拜与楚国也差不多，特洛伊的预言公主卡桑德拉（Cassandra）、海伦、俄狄浦斯（Oedipus）等名人都受到祭祀而产生神性。一些行业的创始人也被尊为神，这类神是人神区别最不严格的一类。第七类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是希腊神谱中最重要之神。他们在荷马史诗中反复地出现，其中主神宙斯主宰天上，其兄弟波塞冬、海德斯一个管海洋，一个管地府。他吃掉妻子美梯丝（Metis）生下雅典娜；和特密斯（Temis）结婚，生下12位司季节、秩序、和平、正义的女神（12 Hours）；和梅勒莫塞尼（Mnemosyne）结婚，生下司文艺、科学、艺术等9位女神缪斯（Muses）；与勒托（Leto）结婚，生下后来的太阳神阿波罗（Apollo）等。奥林帕斯诸神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们

不是人的创造者，不是全知全能的神，它们和人类一样任性，爱享乐，爱虚荣，有嫉妒心和报复心，其原因在于希腊人从来就不把自然与人类的本性区别开来，在人类早期社会里，这实在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楚国神话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现象。

希腊的英雄传说往往是各族历史发展的口碑史，其中不少有史实依据。传说在公元前 15 世纪，宙斯厌恶人类，引来大水，仅德尤卡连（Deucalion）和其妻普瑞沙（Pyrrha）获救，他们的儿子赫伦（Hellen）就成为希腊人的祖先，希腊人也称为“赫伦人”（Helleners）。^① 赫伦的孙子阿卡尤斯（Achaeus）和伊昂（Ion）就分别成为亚该亚人和伊奥尼亚人的祖先，两族后分别定居伯罗奔尼撒和阿提卡。伊昂的后代在雅典娜的帮助下建立了雅典，开始其城市文明。在雅典以北的维奥蒂亚平原（Boeotia），传说腓尼基或克里特的王子建立了底比斯城，在公元前 13 世纪因内乱被毁灭，该城已被考古发现。传说宙斯与阿克墨涅（Alcmene）生下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他经过许多劫难后长大成人，他掠夺过特洛伊，释放过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开劈山脉，改变河道，使希腊变得宜于居住，他因而也被许多希腊部族奉为祖先。俄狄浦斯王是底比斯传说中最有名的一位，他因杀父娶母而成为希腊历史上著名的悲剧式英雄人物。

^① 希腊维奥蒂亚（Boeotia）平原有一沿海小镇阿尤利斯（Aulis），该镇一个名叫格拉夷（Graii）的部族曾到那不勒斯附近殖民，罗马人就称他们为格来克人（Graici），即希腊人（Greeks），后该称呼又泛指所有的希腊人。希腊人自己从不称自己为 Greek，而是称 Helleners。



希腊的神话传说是希腊社会早期生活、宗教信仰的反映，它成为希腊文学的土壤，其后史诗、悲剧、瓶画等都以它为题材，由于希腊文明在地中海地区的扩张，它又影响到罗马成为后来欧洲文学的源泉。

b. 史诗

希腊两部最伟大的史诗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传说为荷马（Homer）所作，一般认为荷马是小亚细亚西部的伊奥尼亚人，生活于公元前9—8世纪，两部长诗均经过荷马之手。《伊利亚特》描述的是希腊与特洛伊之间长达10年的一场战争，伊利亚特（Iliad）的意思是伊利昂（Ilium）之歌，伊利昂是特洛伊之别名。史诗集中描写了战争结束前约50天发生的事。联军统帅阿加门农夺取了自己将领阿基琉斯的女俘，阿基琉斯一怒拒绝参战并祈求宙斯降灾于希腊人，希腊人由此屡战屡败。阿加门农谢罪之后，阿基琉斯仍不领情，直到好友被特洛伊的英雄赫克托尔（Hector）杀死，阿基琉斯才上阵杀死列赫克托尔报仇。全诗共15693行，紧紧围绕阿基琉斯及其愤怒展开，其他事件作为穿插，结构十分严谨，情节曲折整一。诗人刻画人物时主要通过语言、行为和环境，而不注重白描。在描写引起特洛伊战争的美女海伦时，作者未加任何外貌描述而是通过海伦上城观战、特洛伊的长老们评论来表现其美的。

他们望见海伦来到望楼上面，便彼此轻声说出了有翼飞翔的话语：“特洛伊人和胫甲精美的阿开奥斯人为这样一个妇女长期遭受苦难无可抱怨；看起来她很像永生的女神；不过尽管她如此美丽，还

是让她坐船离开，不要成为我们和后代的祸害。”^①

这种描写与楚辞“山鬼”中，屈原借山中景物描写女主人之美的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奥德赛》描述希腊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返乡的经历，奥德赛（Odyssey）意即“关于奥德修斯的故事”。故事围绕奥德修斯之妻佩涅洛佩（Penelope）受到求婚者的纠缠和奥德修斯在漂泊10年后返乡落难费埃克斯（Phaacia）人的地盘这两条主线展开，全诗共12150行，集中描写后40天发生的事情。它作为一部描写个人遭遇、以航海和家庭生活为主的史诗与《伊利亚特》的艺术特点有所不同。《伊利亚特》格调悲壮，它以大小战争场面的精彩描写为特点，《奥德赛》格调平静，它以不同的“发现”情节来演绎戏剧性的高潮。如奥德修斯被独目巨人发现，使独目巨人明白命运的安排；奥德修斯被费埃克斯人发现，引出其漂泊经历的叙述；回家后又被一系列的发现逐步推向夫妻间的发现高潮。亚里士多德评价到：“史诗里也必需有‘突转’（指意外的转变，但转变是有依据的）‘发现’和‘苦难’。荷马是第一个运用这一切种类和成份，而且运用得很好。他的两首诗各有不同的结构，《伊利亚特》是简单史诗兼苦难史诗，《奥德赛》是复杂史诗——因为处处有发现——兼性格史诗。”^②

佩涅洛佩一听双膝发软心发颤，奥德修斯说出的证据确凿无疑端。她热泪盈眶急忙上前，双手紧抱奥德修斯的颈脖……白净的双手从未离开丈夫的

① 《伊利亚特》第72页。

② 亚里士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85页。



脖颈。他们会直哭到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呈现，若不是目光炯炯的女神雅典娜看见。女神把长夜阻留在西方，让金座的黎明滞留在奥克阿诺斯（奥克阿诺斯是指环地长河，英文 Ocean [海洋] 就来源于它，所以英译本就直译为海岸，作者注。）岸旁”。^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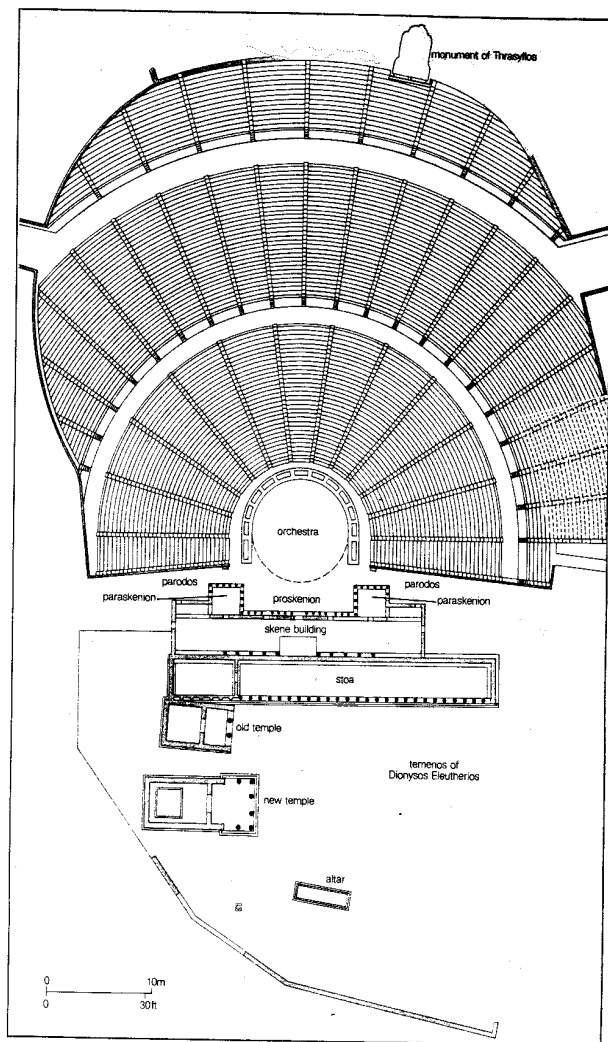
荷马史诗在古典时期已成为希腊公民的教育基础，当时专门有行吟诗人到各个城邦吟诵荷马史诗，用荷马诗句解答道德与行为问题，就相当于先秦儒士动辄引《诗》一样，将其作为社会的伦理规范。荷马史诗对西方文学的巨大影响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会过高。在其影响下，希腊的民族精神得以重塑，并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伟大的艺术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它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后来也只有《圣经》可以媲美。

c. 戏剧

考古发现希腊各地的剧场有 60 余座，多数集中在古典时期。克里特时代的剧场还有仪式等功能，到古典时期就基本上是表演戏剧了。从公元前 480 年到公元前 380 年，仅雅典上演的戏剧就有 2000 多出，它们可以分成悲剧和喜剧两大类。

希腊悲剧起源于酒神祭典。演唱酒神颂歌的人要披羊皮，最佳者奖一只山羊。公元前 560 年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 (Peisistratus 605—527 BC) 将农村的酒神祭典移到雅典城里。公元前 534 年他又规定希腊等九月 (Elaphelolion, 相当于阳历 3 月) 有一个酒神节，以悲剧

^① 《奥德赛》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482-484 页。The Odyss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82.



图十七 雅典的酒神剧场平面图



作为庆祝节日的部分,在雅典演三天戏,每天演 3-5 出悲剧和 1 出喜剧。希腊的悲剧因源于酒神祀典,它具有宣扬崇高、引起人们怜悯和恐惧的社会功能,是为了使情感得到“净化”(Katharsis)。^①政府为了鼓励民众看戏,不分阶层均可入场。自公元前 420 年后,政府还发放看戏津贴。雅典卫城南坡的酒神节剧场就有 1.5 万个座位(图十七)。在这里最受欢迎的剧作家是埃斯库罗斯(Aeschylus 525—456 BC)、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496—406 BC)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485—406 BC)。

埃斯库罗斯出身贵族,参加过波希战争,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普罗米修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本是神谱中的小神,经过他的改编,成为不畏强暴、永不屈服的斗士,成为雅典民主派的化身。他最伟大的作品则是《奥瑞斯特斯复仇记》。它的第一部讲阿加门农回国后为妻子所谋杀。第二部讲其子奥瑞斯特斯(Orestes)杀母为父报仇。第三部讲雅典娜最后宣判奥瑞斯特斯无罪。

埃斯库罗斯一生写了 90 部悲剧,但只流传下来 7 部,他共获得过 16 次酒神节奖,直到公元前 468 年才败给索福克勒斯。他首创了三部曲的悲剧形式,首先采用了舞台布景和轻柔鲜明的戏装,酒神节的颂神歌唱是经过他的改造才成为戏剧。

索福克勒斯的父亲是个盔甲作坊主,他本人是伯里克利的朋友。公元前 440 年,他被选为雅典的十将军之一,他是一个温和的民主派。伯里克利看中他并不是他的军事才能而是他的诗。他在 27 岁那年首次从埃斯库

^① 亚里士多德:《诗学》第 19 页。

罗斯手中夺走悲剧奖。他的代表作品是《俄狄浦斯王》(413 BC) 和《安提戈涅》(Aatigone 441 BC)。《俄狄浦斯王》描写的是个人的英雄行为与命运的冲突，被认为是希腊悲剧的典范。主人公俄狄浦斯出生前曾被阿波罗神预言将会杀父娶母，因而被父母抛弃。孰料他长大后一步步验证了预言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在恐怖的命运面前，俄狄浦斯的行为英雄而壮烈，从而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安提戈涅》是描写俄狄浦斯之女安提戈涅，反抗暴君命令埋葬其兄因而被处死的故事。主题是宗教伦理和国家法律之间的冲突，在社会转型中，这种危机在诗人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安提戈涅虽然死去，但暴君也众判亲离造成悲剧。其中作者的反独裁、倡导民主的精神是非常明显的。下面是安提戈涅被判活埋后，暴君克瑞昂 (Creon) 之子赫蒙 (Haemon) 决心以身殉葬所吟诵爱神埃罗斯 (Eros) 的著名诗篇：

爱具有无可抗拒的力量，只要你轻轻一瞥，没有人不投资；爱彻夜依偎在少女的面颊上；你徜徉在丘陵的幽谷与无痕的海洋上。爱使神也成了俘虏；难道人不能向你臣服？^①

索福克勒斯一生写了 113 个剧本，也只传下来 7 部。他共得 24 次戏剧奖，是获奖最多的诗人，最后一次获奖是在 85 岁的高龄。他放弃了三部曲而用一出悲剧的形式来表现复杂剧情；他增加了第三位演员，加强了戏剧动作减少了合唱队的作用，这就突破了抒情诗的悲剧形式，使人物的性格刻画成为剧情发展的主要原

① 《希腊的生活》下卷，第 511—512 页。

因。

欧里庇得斯出身贵族，喜欢哲学，因此他所写剧本常常充满冗长的说理和雄辩。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美狄亚》（Medea 431 BC），它描写伊阿宋（Iason）被其同母异父兄弟珀利阿斯（Pelias）篡夺了王位，并允诺伊阿宋去科尔喀斯（Colchis）取回金羊毛就让位给他。伊阿宋得到科尔喀斯公主美狄亚的帮助取回金羊毛。其后发生一系列的变故，伊阿宋遗弃美狄亚另娶新欢。美狄亚杀死他与伊阿宋的 2 个儿子逃亡雅典。全戏的主旨是在批判男女的不平等。欧里庇得斯一生共写了 92 部悲剧，仅获奖 5 次，传下来的有 18 部作品。

希腊喜剧也源于酒神节祭祀歌舞和民间滑稽戏，首先出现在西西里。公元前 487 年，雅典规定在酒神节中专门有一天要演喜剧。当时喜剧主要讽刺当权者，成为雅典人表达民主的一种手段。喜剧的代表作家是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446—385 BC），他一生写了 44 部喜剧，流传下来 11 部，代表作品有《阿卡奈人》（The Acharnians 425 BC）、《鸟》、《云》等。到希腊化时期，悲剧已不流行，以娱乐为主的新喜剧盛行，当时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剧院，上演轻松愉快、有欢乐结局的新喜剧，当时代表作家是菲利门（Philemon 361—263 BC）和米南德（Menander 363—291 BC）。根据雅典人的记载，他们更喜欢菲利门，但菲氏无剧作流传下来。米南德写过 104 个剧本，有 8 个获奖，但也只传下来一些残篇，约 4000 行。新喜剧经过罗马作家改编后，对欧洲喜剧产生了影响。

艺术

希腊的艺术起源早，来源丰富，它以人为艺术中心



的特征影响到了罗马以及后世的西方艺术，这与楚国艺术发端的时间较晚，来源单一，以动物等为母题，对中国后来的主流艺术缺乏影响力形成了对照。希腊最早的艺术品仍然出自克里特文化。从那一时期起，腓尼基——迦太基系的艺术、塞浦路斯尤其是埃及的艺术对希腊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若按时代划分可以分成克里特与迈锡尼时期、荷马与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希腊化时期。我们简单地按类型把它分为雕塑和绘画二类叙述。雕塑包括陶塑、石刻青铜雕塑和神庙山墙浮雕等，绘画包括壁画和瓶画。

a. 雕塑

克里特岛发现的米诺斯文化中已有石雕、陶塑、象牙雕刻和青铜雕像，雕塑都是小件物品，但是人体的雕塑已占有一定比例。如代表性的作品有施里曼在迈锡尼卫城发现的红陶女神（1500 BC），其双手操蛇的形象与楚国常见神人操蛇形象十分类似。在斯巴达的瓦菲奥（Vapheio）村发现的浮雕捕捉野牛场面的金杯（1500 BC）上，人已定位成最终的胜利者，成为图案的中心。

迈锡尼文化衰落之后，希腊文化处于低谷。荷马时期（c. 11—8 BC）和古风时期（Archaic 750—491 BC）的雕塑以古朴稚拙的风格而闻名。荷马时代还是以小型雕像为主，到古风时期受到埃及和西亚风格的影响后，大型雕塑才出现，由此揭开了希腊人体雕塑的序幕。

我们知道埃及雕像有巫术和仪式的功能，无论多长时间、哪一王朝，各时期的雕像风格都差不多相似。希腊的雕像风格多样，它有代表神、又可奉献给神、还可作为死者的纪念碑的多种功能，尤其是后一种功能为希



图十八 迈锡尼的红陶女神像

希腊人像雕塑摆脱埃及模式走上自然主义之路提供了机会。古风时期的男性雕像多为男性裸体，过去被称为“阿波罗”。实际上它是青年男子的标准样式叫做“库罗斯”（Kouros）。^① 到希波战争前，雕像的人体比例已接人体解剖学的比例，人物表情也时常带有“古风式的微笑”（Archaic Smile）。女性雕像在古风后期也逐渐

^① John Boardman : Greek Art. p. 66.

摆脱埃及式的宽大石裙，引入了褶皱的雕刻，并以此作为显示美的标准。这在不时兴女性裸体雕刻的古风时期，衣褶的标准变化实际上含蓄地表现了希腊人对女性人体的欣赏标准向自然主义变化。（图十八）

希腊神庙有三处一定要用雕刻装饰，它们是三角形的山墙（Tympanum）、排挡（Metope）和中楣（Frieze）。古风时期山墙上的雕塑以神话故事为主，故事多不连贯，人物作正面表现，往往带有“古风式的微笑”。古典时期山墙上的故事都有明确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山墙、排挡和中楣的雕塑已达到了希腊雕塑艺术的高峰。这些雕塑人物比例和谐，身体刻画准确，皮肤、肌肉乃至衣褶的处理都恰到好处，使雕塑本身具有了活力。其代表性的作品有菲狄亚斯（Phidias 490—432 BC）在帕特农神庙创作的浮雕和雕刻。这些浮雕和雕刻在 1687 年神庙遭受严重破坏后，大部分被运到了英国，其代表性的作品有名为《命运之女神》的雕刻和长达 160 多米的浮雕带饰《骑士行列》（雅典每 4 年举行一次祭礼雅典娜的游行，包括骑士、长老、市民、官吏、少女、众神共 500 多人物和 100 多匹马被刻在浮雕带饰上以表现这一盛大节日场面）。《命运之女神》虽然头部损坏，但其人体轮廓和衣褶的精心刻画使之显得有血有肉。除菲狄亚斯外，古典时期重要的雕塑家还有《掷铁饼者》的作者米隆（Myron）等。

古典后期，希腊雕塑出现了自然主义、专业化和表现抽象观念的倾向。^① 代表人物是以雕塑女性裸体著名

^① 唐纳德·雷诺兹等：《剑桥艺术史》第 1 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年，第 95 页。



的普拉克西特 (Praxiteles 创作时间 370—330 BC)，他创作的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特 (Aphrodite) 被克尼多斯 (Cnidus) 人买去后再被复制，现今最好的复制品是藏于梵蒂冈博物馆罗马人的复制品。由普拉克西特开创女性裸体雕塑的艺术新主题一直影响到希腊化时代的雕塑。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雕塑莫过于现藏于卢浮宫的“米洛斯 (Melos) 的阿芙洛蒂特”它又称为“米洛的维纳斯” (The Venus de Milo)。它于 1820 年在米洛斯岛发现，后被法国人购得。雕像出土时右臂下垂、手抚衣衿，左臂上伸过头，拿一只苹果。后因争夺雕像双臂折断，即成今天断臂模样。该雕像也采用了普拉克西特的头胸向左、胯部向左、足部又向右的反 S 形的优雅造型，是希腊化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希腊化雕塑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雕塑的多样化。它表现为群像雕塑和肖像雕塑成为新主题，群像雕塑往往有故事性。由于雕塑已不仅仅只为神庙，也成为了园林摆设，故事性的群雕就不限于神话也有世俗内容。群雕代表作是 1506 年在罗得岛出土的《拉奥孔》(Laocoön)。肖像雕塑则以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为时尚。代表性的作品有《亚里士多德》、《荷马像》、《狄摩西尼像》(Demosthenes) ① 等。

b. 绘画

希腊绘画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 3500 多年的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王宫的壁画。这此壁画直接画在王宫墙壁

① 狄摩西尼是领导希腊反马其顿的政治家，雕塑家 Polyeyktos，在公元前 280 年创作，并树立在 Athenian Agora，现存者为罗马的复制品。
Greek Art. p. 197.

的石灰泥上，因涂了一层透明液体至今仍色彩鲜明。这些王宫壁画内容分为仪式和神话、世俗生活与动物形象两类。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壁画已基本摆脱埃及绘画神像的呆板风格，清新而写实，仅人物侧面上仍绘出正面才看得到的眼睛，男女肤色用红、白区分，不同于埃及男女肤色一致的画法（最先注意到两者绘画区别的是伊文思）。代表性的作品有《巴黎少妇》、《蓝色贵妇》和《戴百合花的国王》。

迈锡尼时期的壁画在克里特壁画的影响下增加了描绘狩猎和战斗的场面。此后希腊的绘画则主要靠瓶画来研究。我们在工艺部分曾介绍过希腊的陶器工艺。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人物故事画取代几何装饰纹样成为瓶画的主要题材。除了在工艺上有“黑花式”、“红花式”的变化之外，艺术家们在陶瓶画要有清楚故事情节的社会风气和有装饰效果的市场要求下，追求自然主义尤其是故事细节的描绘成为时尚，为此又发展出了在平面表现三维空间的绘画技巧。这都是楚国绘画所无法比拟的。希腊瓶画艺术发达的原因在于市场要求有生活气息的作品给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的进步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而服务于仪式的艺术品讲求严肃性和程式化，即便出现生动活泼的作品也很快变成抽象化的装饰风格，戏剧化的内容是会干扰、分散仪式进程的。我们只需比较一下希腊瓶画图案和楚国漆器流行二方连续的动物图案或几何化图案就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这里面当然也还有一个东西方不同审美观的差别在起作用。

公元前4世纪末以后，希腊瓶画艺术走向衰落。希腊化地区的一些瓶画出现了花卉、动物装饰，已没有早



期那种激动人心的故事画了。^① 这一时期希腊化地区的画家都已知道透视、光线、构图等绘画技巧。据普林尼和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记载，当时普洛托格尼斯（Protagenes）是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他曾画森林之神和松鸡，以致活松鸡都对所画的松鸡啼叫。他用了 10 年的时间创作名画《伊阿利苏斯》（Ialysus），上面涂了 4 层颜料，该画在罗得岛保存有 200 年之久，后被罗马人掠去，毁于火灾。传说他创作《伊阿利苏斯》时，因不能将伊阿利苏斯的爱犬口中的泡沫描绘生动，不禁用海绵掷去毁掉所画，孰料恰好海绵印迹正像猎狗口中的泡沫，此事与中国画龙点睛一类故事有类似之处。该画名声之大，以致当马其顿进攻罗得斯时，严禁纵火以免烧毁这幅名画。

希腊化时代画家地位等同于雕塑家和建筑师，他们的工作不依附于宗教建筑和宫殿，个人创作的空间十分广阔，这和中国古代画家依附于朝廷是不同的。例如马其顿王德米特里（P. Demetrius 336 - 283 BC）问普洛托格尼斯为何不避难。普氏回答到：“因为我知道你是与罗得斯人打仗，而非与艺术为敌。”^② 在自由的环境下，希腊化时期画家题材十分广泛，人物肖像、风俗画、静物画都受到欢迎。这一时期一个重要发展是使产生于两河流域的镶嵌画流行起来，镶嵌材料有大理石、宝石、玻璃、陶片等多种多样，最著名的镶嵌画是现藏那不勒斯博物馆的《伊苏斯之战》（The Battle of Issus）。该画于 1831 年在庞贝城发掘出土，是仿公元前 4

① Greek Art. p. 211. A Handbook of Greek Art, pp. 364—369.

② 《希腊的生活》下卷，第 805 页。

世纪希腊画家菲洛克西诺斯（Philoxenos）的同名壁画。内容是亚历山大大帝与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纪在伊苏斯大战的场面。庞贝的这幅镶嵌画长 4.8 米、宽 2.4 米，有红、白、黄、黑 4 色，共用镶嵌片 150 万块。它采用明暗对比和透视手法来表现空间感和立体感，以色调和明暗造型取代了线条造型，已基本具备了西洋古典绘画的特征和表现手法。

② 罗马的文学艺术

文字

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原是台伯河下游几个部族的方言，因罗马人的扩张它后来成为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欧洲的标准语，也成为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现代罗曼诸语（Romance）的原始母语，它对现代欧洲语言的影响大大超过了希腊语。考古发现罗马人的拉丁语受到与印欧语系无关的伊特拉斯坎语的影响。伊语却是用希腊字母书写的，它与小亚细亚的利底亚语（Lydian）、爱琴海东北部的利姆诺斯语（Lemnian）等爱琴海方言有亲缘关系。^① 在一枚公元前 7 世纪的斗篷别针上发现一行最早的拉丁文字，从左向右读作：“MANIOS MED FHEFHAKED NUMASIOS”意思是：“马尼乌斯为努梅利乌斯制作此别针”。在发现的公元前 6 世纪的拉丁字母却又与希腊早期碑铭一样自右向左读，显示出拉丁文字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

伊特拉斯坎的 26 个字母，罗马人采用了 21 个。公元前 1 世纪又采用通行的 2 个希腊字母形成 23 个新的拉丁字母表（原来的拉丁字母是：A、B、C（代表 q

^①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第 73 页。



和 k)、D、E、F、τ、H、I (代表 ij)、K、L、M、N、O、P、Q、R、S、T、V (表 uv 和 w) 和 X, 后 τ 代以新字母 G, 征服希腊后采用其字母 Y、Z 放在字母表末尾, 到中世纪才加上字母 J 以区别 I, 和 U、W 以区别于 V)。拉丁语没有希腊语灵活多样, 语汇也贫乏。西塞罗曾抱怨拉丁语缺乏语气的微妙变化。但是拉丁语读起来铿锵有力、行文简洁, 所以成为演说家和法律的有力工具。在书写上, 拉丁字母有大写和草写体两种。罗马人的书写工具是用一根细长的可以蘸墨水的金属管。书写材料最早的树叶 (folia) 和树皮 (liber), 这两个词后来也被英语等语言用来表示“页” (folio) 和“书” (Leaf)。后来又用涂了蜡的木片、皮革、亚麻纸和羊皮纸为书写材料。这些材料要么不易保存, 要么昂贵不利于文化普及, 与楚人使用竹简、帛绢一样在文化传播上都处于尴尬的地位。

文学

罗马早期的文学无法和希腊相比, 它只有一些民间的口头创作如葬歌 (neniae)、讽喻诗 (Saturnae), 而后者据李维的说法还是源于公元前 364 年伊特拉斯坎人的优伶表演。由于缺乏文字工具或许罗马人的文学素材因此失传。公元前 272 年斯巴达在意大利建立的殖民城邦他林敦 (Tarentum, 今意大利之塔兰托 Taranto) 被罗马攻下, 利维乌斯·安德罗尼克斯 (Livius Andronicus) 成为奴隶被带到罗马。他教主人学习拉丁文、希腊文, 同时把《奥德赛》译成拉丁文使希腊优秀的文学首次传入罗马。在前 240 年他又编了二出戏剧受到欢迎。5 年以后, 涅维尤斯 (Cneaus Naevius 约 270—200 BC) 在罗马演出了他第一部喜剧, 又以第一次布匿战争为题

材用一种打丁语最古老的韵律（萨图尼乌斯 Versus Saturnius）写出罗马第一部长篇叙事史诗，可惜它只有片断残留下来，但罗马文学自此兴起，在戏剧、散文、诗歌、传记文学等方面为人类文明留下了宝贵财富。

a. 戏剧

罗马戏剧和希腊一样由政府主持内容多效仿希腊，从普劳图斯（Plautus 465 ? —184 BC）^① 起，喜剧成为罗马文学中的独立部分。普劳图斯写过 130 多部喜剧，传下来 20 余部，题材多采用米南德的喜剧并用它们来反映罗马的生活，其戏剧极具平民性并对后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莎士比亚、莫里哀的喜剧起了积极作用。

普劳图斯去世的那一年，罗马又有一位喜剧作家泰伦提乌斯（Terentius 184—159 BC 通称泰伦斯 Terence）出生，他原是迦太基的奴隶，被主人释放后用了主人的名字。他写了 6 部喜剧，其结构与普劳图斯并无不同，只是他抛弃了普劳图斯语言中粗俗搞笑的成份，其剧本显得优雅、流利，人物内心刻画细微，其喜剧序曲的优美使之成为后来罗马演说家的典范。他去世时只有 25 岁，但对欧洲近代戏剧影响比普劳图斯还要大。

b. 散文

老加图是第一个拉丁散文的伟大作家。他出身于世代养猪的农民家庭（他取名 Marcus Porcius Cato，Portcius 即世代养猪，Cato 是因为精明）。他一生从军，从政。他晚年整理发表的重要演说有 150 多篇，现仅存 80 个左右的片断，惟一完整保留下来的是《论农业》

^① 普劳图斯全名 Titus Maccius Plautus，直译为平民小丑，生于意大利中北部的翁布里亚（Umbria），后取得罗马公民权。



一书。到罗马共和国末期和屋大维统治时期，即所谓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由于戏剧迎合贵族口味，群众减少；而贵族与平民的斗争，法律的发展，使散文的地位日益提高，其代表人物有以雄辩著称的西塞罗和恺撒。

西塞罗是罗马的政治家、哲学家和最重要的散文家，作品现在保存下来有 57 篇讲演和 20 篇残片。在他的演说中，他按修辞程式组织材料，词汇丰富，句法考究。他提出了一些演说的技巧包括（1）提问；（2）以幽默和轶事取悦听众；（3）揭露对手隐私；（4）不时转移听众注意力；（5）设置修辞学的问题，使对方无法招架；（6）以语句和语气来吸引听众。其中最重要的是煽情而不是理性判断，这些都被后世作家奉为主臬。

恺撒是罗马的军事家也是一个杰出的散文家，他的代表著作是 7 卷的《高卢战记》和 3 卷的《内战记》。其文体特点是简单清楚，不用任何修辞上的装饰，特别是不用韵律的语言，因此被称为“黄金拉丁语”的典范。

c. 诗歌

罗马缺乏希腊的史诗传统，直到共和国末期才出现几位有名的诗人如卢克莱提乌斯（通称卢克莱修）、维吉留尔·马罗（P. Vergilius Maro 70 - 19 BC 通称维吉尔 Virgil）。卢克莱修生活于罗马的政治、经济转型阶段，人们在内战中对生命的担忧、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宗教所带来的迷惘，使卢克莱修提出唯物论、无神论的主张。他利用诗歌的艺术手法来描绘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让人们摆脱恐怖的幻想。他的著名作品是《物性

论》，他用六音步诗句和优美的词藻将哲学、科学和诗融为一体，成为罗马文学和哲学上的一部伟大作品。例如在第1卷序诗中，作者写道：

“罗马的母亲，群神和众生的欢乐，维纳斯，生命的给予者，在悄然运行的群星底下，你使生命充满航道纵横的海洋和果实累累的土地，因为一切生物只由于你才不断地被孕育，只有你才生出来看见这片阳光——在你面前，女神啊，在你出现的时候，狂暴的风和巨大的云块逃奔了；为了你，巧妙多计的大地长出香花；为了你，平静的海面微笑着，而宁静的天宇也为你发出灿烂的光彩！”^①

在解释宇宙形成的问题上，他写道：

“那太古的物质的结集以什么方式形成天地和深不可测的海岸，形成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轨道？我将逐一来说明。因为，实在说，事物的始基既不按计谋而建立自己，不是由于什么心灵的作为而各个落在它自己适当的地位上。”^②

这与屈原《天问》中“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以文学的形式关注自然和哲学问题是完全一样的，不同的只是卢克莱修对这些问题用诗歌作了唯物论的解答。

维吉尔出生于南高卢的农民家庭，16岁时到罗马学习法律，后改学哲学和文学。他一生写了3部作品：《牧歌》、《农事诗》(Georgics)和《伊尼德》(Aeneid)。《牧歌》是在希腊田园诗影响下写成的，共10首，

① 卢克莱修：《物性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页。

② 《物性论》，第286页。



诗人谴责战争，将农村生活理想化，发表后受到屋大维的重视。随后他的长达 2000 行的《农事诗》完成，以宣传因内战而凋零的意大利农业，鼓励战士解甲归田，罗马政治家梅塞纳斯（Maecenas ? - 8 BC）将他引见给屋大维。屋大维刚好战胜埃及女王克娄帕特拉（Cleopatra 69 - 30 BC）凯旋，在一个名叫阿特拉（Atella）的小镇连续 4 天听了该诗的朗诵。

维吉尔最主要的作品《伊尼德》共 12 卷，近万行，写了 10 年。原计划是歌颂屋大维，后改成模仿荷马史诗写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伊尼斯（Aeneas）。诗中描写特洛伊被攻陷之后，伊尼斯逃亡并在海上漂流 7 年之久。后受诸神的命令在意大利建立新国家，罗慕洛、恺撒、屋大维等都是伊尼斯未来的子孙。该诗是第一部伟大的罗马史诗，主题是谈帝国的命运，颂扬罗马的伟大。维吉尔死前该史诗仍未定稿，他遗命将其焚毁，却被屋大维下令保存下来。《伊尼德》在主题、结构、语言上都模仿荷马史诗，被后人批评为矫揉造作，但是它鲜明的政治倾向，注重人物的心理描绘，第一次在欧洲文学史上描写爱情与责任的冲突；第一次剔除了民间口头文学的粗糙词语，第一次在史诗中注入了严肃的政治内涵和宗教情结。这使得维吉尔成为中世纪少数未被排斥的古典作家，他对后来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的文学产生的影响最大。

下面是《伊尼德》第 6 卷伊尼斯在意大利海岸登陆后，其父安齐赛斯告诉伊尼斯，今后罗马有一些伟大的子孙：

“看啊！那边山下是恺撒大将，还有攸勒司的子嗣、罗马的栋梁，都在等待着一朝重见天光。

这就是他，预言里时常提起的，奥古斯都恺撒。天帝的亲友他将在拉丁姆重现黄金盛世，统驭着萨图恩当年统驭过的土地，把他的权力推向八极八荒。”^①

d. 传记文学

屋大维死后的公元 14 年到 117 年是拉丁文学史上的“白银时代”，它在警句、讽刺小品、小说、历史、哲学方面达到高峰，其中希腊语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 46 - 126）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则代表了传记文学的高峰。普鲁塔克出生于希腊中部的小镇，少年游学雅典，也曾在罗马住过一段时间。《希腊罗马名人传》共 50 篇，作者将一个希腊名人和一个罗马名人并列作传，他从传主的身世写起，叙述传主的性格、事迹，着重细节和轶事，有说教目的，许多方面的描述近乎中国的《史记》，书中保留了许多史料，为后来的作家所吸取，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之后成为欧洲家喻户晓的经典著作。

艺术

和楚国艺术在当地很难追溯到它的直接源泉不同的是，希腊罗马的艺术都有明确的来源。希腊艺术受到埃及、西亚的影响经克里特、迈锡尼直到古典时代、希腊化时代，发展轨迹清晰。而罗马艺术早期是作为伊特鲁尼亚（Etruria）文化的一个部分，或者说罗马艺术的前期是伊特拉斯坎人的艺术，它主要受希腊艺术的影响，到罗马共和时期才开始形成以实用为特征的艺术风格，

^① 维吉尔：《伊尼特》第六卷，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第 133 页。

在建筑、肖像雕塑、室内绘画等方面显示来直到帝国时代。^①

CHUWENHUA
ZHISHI CONGSHU
楚文化知识丛书



a. 雕塑

陶塑和青铜雕塑是伊特鲁尼亚艺术中最重要的部分。考古发现公元前 7 世纪伊特鲁尼亚的雕塑艺术品尚粗糙，到公元前 5 世纪，其雕塑已有自己的写实风格，但希腊古风时代的影响仍十分强大。到公元前 3 世纪，伊特鲁尼亚的雕塑与罗马共和时期的艺术风格完全一致了。伊特鲁尼亚的代表性作品是公元前 5 世纪的青铜雕塑《母狼》（Lupa Romana），它是根据特洛伊王子伊里斯逃亡意大利，其后代罗慕洛兄弟在婴儿时受母狼哺乳，长大后建立罗马城的传说而创作的。该雕塑风格写实，但通过夸张母狼的乳房强调狼的母性。在文艺复兴时代，该雕像又增加了两个吃奶的婴儿更加张扬了罗马建城的母题。

罗马的雕塑继承伊特鲁尼亚的传统在三个方面给人印象深刻：一是大量地复制希腊的雕塑作品。二是人像雕塑的普及。三是浮雕带有明确的纪事特征。下面简要介绍后两种。

希腊人像雕塑是以著名人物如诗人、哲学家、神话人物等为主，而罗马因宗教关系对祖先的崇拜使人物肖像成为祭祀活动的一个部分，只要比较富裕的家庭都可以铸造已故主人的肖像。与希腊雕塑相比，罗马雕塑更为注重人物的面部刻画而不在意人物的姿态和动作。这种写实特征从共和时代一直持续到帝国时代，成为罗马

^① Donald Strong: Roman Ar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1.

肖像雕塑的传统。^① 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现藏于罗马康塞维托博物馆（Conservatori Museum）的青铜雕像《布鲁图》（Brutus），布鲁图是共和初期的第一政执行官。作品创作于公元前 4 或 3 世纪，铜像本身有伊特拉斯坎、中意大利、罗马、希腊等多种文化因素，但人物面部流露出的坚毅、严肃的神态却是罗马人所独有的。^② 这种表现世俗人的写实主义风格承袭了伊特拉斯坎的艺术并开始冲破希腊雕塑仅表现神、表现柏拉图式理念的模式，开启了帝国时代雕像歌颂君权的先河。

帝国时代是罗马肖像雕塑的鼎盛期，每个皇帝都有雕像，每个帝国城市也都竖立皇帝雕像，不同时期雕像的风格略有差异，但面部写实的风格却一以贯之。我们以 1863 年在罗马附近的普瑞马波塔（Primporta）出土的、现藏于梵蒂冈博物馆的著名雕像《奥古斯都》为例说明。

该雕像作于公元前 19 年，是一件高 204 厘米的大理石雕像。基本风格遵循希腊古典时期雕刻家波利克利特（Polyclitus 450 - 420 BC）^③ 所作的多菲罗斯（Doryphorus）的风格。但是作为君主，《奥古斯都》没有裸体，面部表情是世俗君主的威严而不是希腊英雄的安详。^④

① Anthony Bonanno: "Sculpture" A Handbook of Roman Art. pp. 82 - 83.

② Roman Art. p. 47.

③ 波利克利特是希腊 Argos 的雕刻家，以雕像的形式对称和精确为最高准则，强调雕像的力量的表现对菲迪亚斯都产生了影响。

④ Heinz Kahler: The Art of Rome and Her Empire. Greystone Press. New York 1965. pp. 33 - 34.



罗马浮雕与表现神话故事的希腊浮雕不同，它有明确的记事和纪实特征。代表作品有公元 13 年的《和平祭坛》（The Ara Pacis）和图拉真纪功柱（Trajan's Column 112 - 113）。前者形式上接近帕特农神庙中楣上的浮雕，但人物个性鲜明，表现事件的许多特征都清楚可辨。^① 后者浮雕人物多达 2500 个，表现图位真皇帝于 101 年对达契亚人（Dacia）的战争，内容包括战斗、行军、攻城、渡河、谈判、凯旋一系列情节，长约 200 多米。所刻画的人物故事和细节的真实几乎就被当成“照相写实”风格的开端。但它只注意整体构图在概念上的真实，而不强调视觉逻辑的真实，显示了与希腊浮雕注重视觉逻辑连贯的不同，^② 它对西方后世浮雕艺术影响非常之大。

b. 绘画

考古发现公元前 6 到 5 世纪伊特鲁尼亚的壁画墓有 60 多个，多数壁画绘于白灰泥的底子上（stucco），个别直接绘在石壁上。有 20 多个壁画墓保存完好，绘画内容以生活情趣为主，技法尚幼稚，埃及画法的影响随处可见。但写实风格对罗马共和时期的壁画产生了影响。文献记载，公元前 3 世纪罗马流行军队凯旋的壁画。考古发现罗马埃斯奎奈（Esquiline）墓葬壁画残片的主题仍是生活情状。^③ 公元前 146 年，罗马控制希腊后，希腊化时代的壁画风格如镶嵌画、湿壁画的题材、

① Roman Art. p. 83.

② Roman Art. pp. 142 - 452.

③ Joan Liversidge: "Wall Painting and Stucco" A Handbook of Roman Art. p. 97.

技法都反复被罗马画家模拟、复制，使我们有幸从中看到希腊绘画的风貌。公元 79 年，维苏威火山爆发，罗马控制的原希腊移民城邦庞贝城被埋于火山灰之下，经过 18 世纪以来近 300 年的发掘庞贝及附近的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大半已重见天日。二城所保存大量完好的壁画基本上反映了罗马绘画的整体面貌，这是欠缺材料的楚国绘画所不能企及的。

1882 年德国学者马奥（A. Mau）将庞贝绘画分为 4 种风格，基本上反映了罗马绘画的特点。^① 第一种是“镶嵌式”（Incrustation），在公元前 2 世纪遍及地中海，它是用灰泥抹在墙上做成或绘成大理石装饰宫廷的豪华模样。第二种是“建筑式”（Architectonic），在公元前 90 年独自起源于罗马（最早的例子见于罗马巴拉丁的 Griffins 房屋壁画）。它承袭第一种风格，直接在墙上绘出各种有主体感的建筑以及自然风景，代表性的作品有“秘仪别墅”（Villa of Mysteries）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秘仪图。该图画上、下都绘成建筑样式，中部有高达 1.85 米的首尾相连的巨幅绘画，人像高约 1.5 米，造型与服饰仍是希腊式的，构图保持了视觉逻辑上的真实。第三种“装饰式”（Ornamental）不再靠绘制建筑图案来扩大室内的视觉空间，它以描绘精细画中套画为特征，装饰性极为强烈。其中一种类型以黑色为背景产生出奇妙的装饰效果，学者们认为它有些类似中国的漆画。^② 若与楚国漆画比较，两者在题材、构图技法上还是有相当不同。第三种风格的代表作有庞贝附近博斯科

① Roman Art. p. 63.

② Roman Art. p. 96.



瑞勒（Boscureale）别墅的壁画。第四种“调和式”（Compromise）是因公元62年地震后，许多人厌倦第三种风格，将第二和第三种风格综合后产生的。代表作是庞贝维蒂房屋（House of the Vettii）的壁画，该房屋内的壁画就好像是一个绘画美术馆，绘画追求繁复，给人杂乱平庸的感觉。

除庞贝壁画之外，罗马绘画一项重大的发展是镶嵌画（Mosaics）。南意大利和西西里一直保存了希腊化时期镶嵌画的传统，后经商业往来影响到中意大利。但遍及罗马帝国历史悠久的黑白两色的马赛克装饰画都是意大利自己的创造。^① 早期镶嵌画写实性强，注重色彩、立体感。晚期的镶嵌画反而强调单色对比，注重二维平面的装饰效果，几何纹样几乎成了画面的主体，这也为中世纪拜占庭的美术发展奠定了基础。惟一不同的是在北非行省如突尼斯等地和欧洲西班牙、高卢等地更多地保存了希腊化时代的装饰风格和装饰母题，使罗马的镶嵌画显得多姿多彩。

③楚人文学艺术

文字

楚疆域内语言较杂，主要有操古汉语的楚贵族集团和操古越语的原住民，古越语需经翻译才能沟通。楚地居民经过几世融合形成“南音”，孟子还认为他们是“南蛮貊舌之人”。^② 这种南北语言的差异是方言中音值的不同所致。王力在《诗经韵读》、《楚辞韵读》的考证里指出中原和楚地的音系完全一致。退一步讲至少在

① D. J. Smith：“Mosaics” A Handbook of Roman Art. p. 121.

② 《滕文公上》。

受教育的楚贵族中是使用中原的语言体系。

考古发现楚人的文字按早晚有金文、简牍、帛书文字，发现的字数是先秦列国中最多的。从西周中期的“楚公𠄎钟”等金文中，可知楚人文字同于周人。楚国简牍文字只见于战国，目前已知的重要发现有长沙仰天湖楚简、慈利楚简、信阳楚简、江陵望山楚简、郭店楚简及上海博物馆收购之楚简等多批，字数为列国之冠，另外曾侯乙墓也发现了 240 支现存中国最早的竹简。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南方地下保存情况优于北方。这些简牍文字基本同于列国文字，属于《说文解字》古文系统，而与秦国籀文相距较远。其文字特色是异体字多，新造字多，文字通假现象普遍，甚至一人所书也有一字多形的现象。不仅正体、繁体、简体字互见，而且文字的义符、形符也可以随意增减。例如：简体字有“并画”、“合文”、“省重”（省去重文或偏旁）、“省形”，繁体字有“羡画”（增画以求装饰之美）、“增添义符”等现象。^①长沙子弹库帛书有 948 字，它与楚简文字一样均出现隶化倾向，说明楚人文字对秦汉的文字有影响。在中国书法的发展史上，这是过去受到忽略的地方。现代学者如郭沫若、饶宗颐、李学勤诸人都指出楚国文字影响了隶书的形成，隶书不仅仅只是受秦国籀书简化的影响。其意义大体上与伊特拉斯坎人的字母对拉丁文字的影响相当。楚人文字的书写工具是毛笔，需修改时则用削刀将字体刮去，两样工具在楚墓中均有发

^① 林素清：《探讨已山楚简在文字学上的几个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六本，第四分，中华民国八十四年，第 1104—1123 页。

现。

文学

中国的先秦文学，北方以《诗经》为代表，南方以《楚辞》为代表，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犹如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楚国疆域范围内周初就有民歌流传，保存在《诗经》中有《汉广》、《江有汜》等，其他文献记载的《子文歌》、《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年代也都较《楚辞》早。战国时代楚国流行的《涉江》、《采菱》、《劳商》、《薤露》、《阳春》、《白雪》等曲调被中原人认为是南音。这里既有音乐调式的不同，也有语言的差异，如楚人歌词中喜欢用“兮”、“思”、“些”之类的助词。更重要的是南音多为民间巫歌，属于“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萨满传统，而不像北方音乐成为礼乐仪式的一个部分为政治服务。《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楚军犯晋，师旷认为不足为害，因为他唱南方曲调时，感到“死声”太多，楚军一定无功而返。所谓“死声”即表明南音仍未超出丧葬歌曲的传统。

从现在流传下来的楚国文学作品来看，音乐的部分已不清楚，文字部分则分为神话和诗歌两类。神话也不像希腊文学中有很系统的叙述，它只是保留在诗歌当中，而后者又包括民间集体创作和个人作品两种。

神话

现在并不知道楚国兴起之前江汉地区的神话，《楚辞》等作品零星记载的神话有少量当地的远古神话杂糅其中，但基本上为中原神话系统。除了缺少希腊奥林帕斯山上诸神之外，分类也与希腊相同，有天神、地神、生殖神、动物神、地下神、祖先或英雄几类神。

CHUWENHUA

ZHISHI CONGSHU

楚文化知识丛书



天神最高者称“帝”，“导帝之兮九坑”（《九歌·大司命》）、“帝告巫阳曰……”（《招魂》）。其次有五方神“五帝”，它们是“帝”的辅佐（“令五帝以折中兮”《九章·惜诵》）。地祇有山神“烛龙”、“山鬼”、水神“河伯”、“湘君”。生殖神是女娲，地下神是“土伯”，动物神往往由英雄变化而来，如羿、高辛、鲧、简狄等。在《楚辞》的零星神名中虽然看不出完整的神话结构，但一些主要的神话类型如创世神话（“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天问》）、灾难神话（“十日代出，流金砾石些”《招魂》）、洪水神话（洪泉极深，何以填之……，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天问》）都有反映。除女娲神话可能属于南方神话系统之外，其余为北方的神话。楚人缺乏神人同性、同形的思想，因之多数神鬼为动物或组合人、兽某一部位的形象，而不像希腊古典时期禁止动物进入神的领域。以楚神话中的地下神“土伯”为例，它头上长角，三目虎首，身体如牛，是多种动物特征的组合起来的形象，它与希腊冥神海德斯形象相去太远。因此可以说，楚人的神话是采用中原体系，神话没有能成为楚地文学的源泉，相反倒成为巫术系统的一种补充。

《楚辞》

《楚辞》一名最早见于《史记》，西汉刘向将楚人作品结集最后定名为《楚辞》，此后《楚辞》研究一直是中国文学中的显学。《楚辞》包含两类作品，一是民间的集体创作，后由文人加工，如《九歌》；二是个人作品，如屈原、宋玉的作品。

屈原整理过的《招魂》、《九歌》是楚地民间集体创作的代表作品。招魂本是萨满巫师的标准仪式，其词



在世界各地都大同小异。屈原整理后的《招魂》前有叙文，后有乱辞，全文以巫阳招魂词为主。它与屈原其他诗歌不同之处在于每隔一句用“些”字收尾。这个“些”字是巫觋招魂时的咒语，今天苗语招魂词尾还有类似发音。^①招魂词铺陈华丽，气象宏大，全无时空、幽明界限，这种非理性事态的描写在希腊史诗中很少看到，其手法对汉赋有直接的影响。《九歌》是楚地民间巫术仪式中传统的祭神乐歌，形式为歌、舞、乐三者合一。屈原整理的《九歌》有11篇，所谓“九”的解说很多，很可能它指的是原始宗教音乐中普遍存在的“九声”。文献很早就有“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②的记载。作为民间集体创作，《九歌》中的音乐、戏剧成份也最浓厚。闻一多据此编成的剧本最为贴近《九歌》实际吟唱的状态。不幸的是，其中的戏剧因素未能像希腊那样从仪式中独立出来发展成为戏剧，这应该是一种遗憾。下面以闻一多编定的《湘君》举例为证。

女甲：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
今未来，吹参差兮谁思！（湘君看见船来了，急忙
跳下车来，跑到水边。）

湘君：驾飞龙兮北征，汎吾道今洞庭，薜荔柏
兮蕙绸，荪桡兮兰旌。……^③

《离骚》是《楚辞》中个人作品的代表作，它有

① 汤炳正：《〈招魂〉“些”字的来源》，《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第383页。

②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③ 闻一多：《“九歌”古歌舞剧悬解》，《闻一多全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1卷，第313页。

373 句，2490 字，是先秦文字中最长的诗。它是楚贵族屈原见疏于楚怀王之后所作，其情感丰富，文辞华美，立意高远，居中国文学史之首位。所开创以香草美人讽谕政治的传统，除了对中国文学产生 2000 多年的影响之外，也一直是中国士大夫阶层追求政治理想主义的长久动力，至今不衰。这是希腊、罗马文学中的任何作品所无法媲美的。

从文学特征上来看，它将中原《诗经》传统的比、兴手法和楚地流行的“隐语”（又句“瘦辞”，是以字谜的形式讽谏政治）结合起来，开创了中国文学以“寄托”、“婉而多讽”为评判标准的主流道路，^① 而不像西方同期文学以直白、个人情感为标准，这与中国自古特有的非民主的政治架构有关。所以直到今天，中国文学能够将政治危害最小化的“比兴”手法和“婉而多讽”的政治标准融为一体，并在现代文学评鹭中时常见，其影响之巨尤见一斑。

下面是《离骚》中代表性的诗句：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鞅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之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偃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忼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① 游国恩：《论屈原文学的比兴作风》，《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9 年，第 167—172 页。



（郭沫若译文如下：我哀怜着人民的生活多么艰苦，我长叹息地禁不住要洒下眼泪。我虽然是爱好修洁而自制花环，在清早制成，晚上便已被人拆毁。我不怕他就毁坏了我的秋蕙的花环，我又要继续着用白芷花来替代。说到头是我自己的情愿心甘，纵使是死上九回我也不肯悔改，我怨恨你王长者呵真是荒唐！你始终是不肯洞鉴我的心肠，你默默的侍女嫉妒我的丰姿，造出谣言来说我是本来淫荡。固然是糊涂的人们善于取巧，不守一定的规矩而任意胡闹。抛弃了不正之风的准绳只图牵就，竞争着在依阿取悦以为常套。我忧郁，我不安，我感受着孤独，我孤独地遭受着今世的困穷。我就是淹然死去而魂离魄散，也决不肯同乎流俗，屈节卑躬。）^①

屈原之后，楚地文学家有宋玉、唐勒、景差等。其中宋玉的作品《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艺术水准较高。尤其是长达 250 句的《九辩》以“悲秋”为主题，将自然景观、个人境遇与仕途多艰融为一体，开拓了中国诗歌的新意境，赋予诗歌政治功能。从此文人的自恋和精神乖张都掩盖于“赖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之无恙”的冠冕之下，因而“悲秋”情绪也成为了中国士大夫阶层软骨症的标志，受到历代文人的追捧。这类文学作品也成为文学上的“清流”，像后世陶渊明、李白、苏轼等都是。而希腊诗歌、戏剧及罗马维吉尔的诗歌中看不到有这种病态精神的审美意趣。

艺术

楚人的青铜器艺术、漆器艺术、丝织品艺术，如同

^① 郭沫若：《屈赋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第 94—96 页。

希腊艺术中的建筑、雕塑和瓶画，在楚艺术中最具代表性。与希腊艺术不同的是，在当地原始文化的考古材料中，至今还找不到楚艺术的源头。^① 楚艺术的总体面貌和特征仍属中原系统，原住民文化及周边异族文化因素也时常在楚艺术品中体现出来。楚艺术的最大特点是艺术的政治功能与萨满的文化传统紧密结合，所以艺术中缺乏以人性为中心、以历史为题材的表现。但是楚艺术品中用夸张的色彩、飞扬的线条表现动物、神怪的艺术母题，在视觉上易产生强悍的冲击力，引发人们巫术式的审美快感，这也是现实主义或唯美主义的艺术品做不到的，在世界艺术史中当占有一席之地。

a. 雕塑

楚国的雕塑艺术与政治功能有密切关系，目前已知的青铜器、漆木器和玉器在楚地都是作为仪式用器。楚地西周以前的文化遗存中很少发现雕刻作品，如石家河文化中的陶塑、玉雕和后来的楚艺术缺乏相连的环节。楚地雕塑艺术的主要影响来自中原，但地方的文化因素如萨满式的世界观在作品中亦可见到，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漆器木雕器物中常出现超现实的组合动物形象。从这类艺术形象出现时间来看，它们多集中于战国早期而不是春秋中晚期，似乎也表明这是受到江汉地区原住民文化长期浸润的结果。

青铜器雕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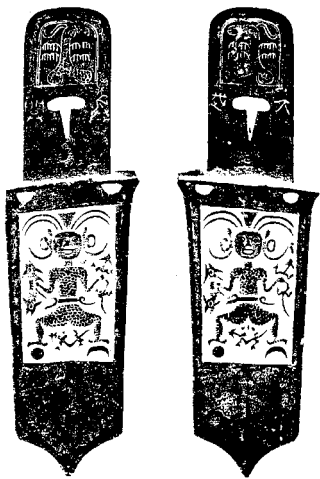
从传世和最新的考古材料看，西周至春秋中期凡能判定为楚人的青铜器均为中原风格，这是楚人继承或采用周人青铜技术的明证。就雕塑而言，过去学术界曾不

^① 舒之梅等：《楚文化》，第206页。



理解为何楚人的雕塑“一出现就是上好作品”，^① 现在知道，它只是在中原文化基础上的发展结果，在青铜雕塑上，楚地作品似乎依据器物用途呈 3 种不同风格：一是写实。它多反映在日常生活用具上，代表性的作品有曾侯乙编钟的青铜武士立柱、江陵望山楚墓，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人骑骆驼灯、人擎铜灯等。器物造型多简洁朴实，无神秘意味。二是繁缛。它多表现在高级贵族使用的青铜礼器上。代表作品有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青铜盖鼎、簠、禁，曾侯乙墓的尊盘、连禁对壶，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铜尊等礼器。

特点是在器物的口沿、耳、足，附饰或表面用多种雕塑手法，如镂空、透雕、浮雕、嵌错或失蜡法极尽繁缛之能事，不仅商周传统厚重威严的装饰风格为之一变，在雕塑技巧上也达到中国青铜时代的工艺顶峰，在世界文化史上尚无前例可比。三是神秘。它多出现在与仪式有关联的器物上。典型作品有淅川下寺徐家岭 9 号墓出土的青铜神兽，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鹿角立鹤、青铜磬簠簠。楚人铜镜的雕刻纹样中也含有类似的意味，如“山字纹”铜镜。（图十九）



图十九 湖北荆门东桥楚墓出土的“兵避太岁”戈

① 文崇一：《楚文化研究》，第 111 页。

漆木器雕塑

楚地漆木器因地下保存条件较北方好，所以楚墓中能見到春秋到战国的大量漆器。从雕塑艺术来看，春秋时代的漆器艺术品仅在当阳赵巷4号墓中有集中反映，所出土漆器明显是仿青铜礼器风格的“漆礼器”。^①到战国时代，漆器雕塑的艺术风格与青铜器雕塑一样有繁缛和神秘二种。前者代表性的作品有曾侯乙墓出土的漆木盖豆，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漆座屏，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蟠蛇漆卮和2000年2月江陵天星观2号墓出土的浮雕龙凤纹漆豆等。^②后者则是常见于各地楚墓的镇墓兽、虎座飞鸟等器物，其非自然主义的艺术手法与同类的青铜雕塑是完全一样的。

玉器雕塑

楚地见到的春秋至战国时代的玉器绝大多数是礼玉器，如璧、璜、块、佩一类。在雕刻技法上，与中原并无差别，器物造型也不出中原礼玉器的系统。曾侯乙墓出土16节玉挂饰代表了中国先秦时期玉雕工艺的最高水平。它用5块玉料雕成可以活动卷折的16节，用3个玉活环和1根玉销钉连接成一条龙形挂饰，整个挂饰雕刻出37条龙、10条蛇和7只凤。从玉挂饰的雕刻痕迹可以知道，在雕塑时，工匠事先有画稿，然后再据以雕刻出龙、凤、蛇、云纹等图案。其中双首龙、龙蛇共体、凤鸟噬蛇都是中原和南方常见的纹样母题。在雕刻技法上，采用阴刻、浮雕和透雕等琢出纹样主体，其细

① 《楚文化》第95—100页。

② 张万高：“湖底楚墓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2000年3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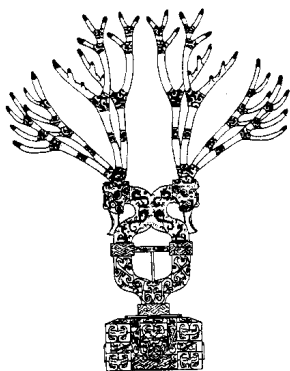


微之处如毛发、利爪、尖喙、鳞甲等都惟妙惟肖，极为传神，显示出了卓越的匠心和高超技艺，是迄今所见先秦玉器的罕见佳作。像曾侯乙墓¹⁶节玉挂饰这样复杂精致的礼玉器在楚墓中尚未见到。在战国晚期安徽长丰扬公的楚墓中，所出土的⁷⁹件玉器中，其组合为璧、璜、圭、佩等。艺术母题为龙、凤、涡云纹（谷纹），玉璧占到了⁴²件，基本仍是中原文化中的礼玉体系。^①

楚人雕塑作品中的繁缛和神秘作风体现了与中原主流艺术不同的风格。从青铜文化的发展过程来看，青铜礼器的繁缛装饰并不意味着它的政治功能衰退，而是被赋予了以炫耀技术、显示身份等级的符号，这种新作风的审美体验背后是新技术的支持，能消费得起这种技术的人只有贵族。它所反映的问题是楚国的青铜工艺水准虽然已高于北方，但是其精神状态仍限于巫术的传统中，他们是很难将新掌握的技术用于工程、机械或生产等方面的。在青铜器、漆木器的神秘作风中，地方原住民文化中的超自然的巫术信仰的确起了作用。今天理性社会认为“怪诞”的镇墓兽、虎座飞鸟等艺术造型在民间巫术传统中是整体性、连续性宇宙论的反映：动物界与人是一个连续体；各种生物间的灵魂转换、叠加或组合都是现实合理的；幽明之间没有不能沟通的界限。楚人和楚地居民接受或更确切地说是保持了这种巫术世界观，这使他们自己从不会产生出其作品“怪诞”、“浪漫”等的现代理性社会才有的观念，它们（镇墓兽等）只是社会功能的一种体现而已。实际上在中原文化系统

^①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长丰扬公发掘9座战国墓》，《考古学集刊》第2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中，同类造型也并非不可见。如 1923 年新郑的郑国大墓出土的青铜镇墓兽（现藏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曾侯乙墓出土的鹿角立鹤等，都反映出同样的世界观，郑、曾两国均为姬姓。其中曾侯乙墓青铜磬架之铜立兽与淅川铜神兽的作风完全一致。至于漆木器中类似的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北方保存条件不易发现而已，无法证明中原漆木器中不存在类似的作品。我们惟一能确定的是，这类神秘的雕塑艺术品并不完全是纯粹的艺术想像物，而是社会宗教意识，尤其是萨满式思维在一些高级贵族随葬品中的反映。^①（图二十）



图二十 湖北江陵
天星观楚墓出土的
战国中期镇墓兽

b. 绘画

楚地的绘画艺术按主题可以分成无标题的装饰绘画、有标题的情节绘画和介于二者之间以动物（主要是龙凤）为绘画母题的装饰画三类来论述。第一种所谓“无标题”装饰绘画是指在青铜器、漆木器、丝织品上常见的绘画无确切意义，仅仅在器物上作装饰作用，艺术图像本身或许有的社会意义已被纯审美意义上的绘画技巧如色彩运用、线条韵律、纹样结构等所掩盖，例如器物上原有云纹、龙凤纹等的几何化现象。这

^① 巫鸿：“Art and Architecture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740.



类纯装饰性的绘画从新石器到商周都在中国各地反复出现，其中楚国这类装饰性绘画与中原文化比较没有太大的差别。第二种“有标题”的情节绘画是指绘画本身存在某种故事结构，它或是表现某种场景，或是宣扬某种观念，是楚地绘画艺术中最有趣味的。代表性的作品有曾侯乙墓的墓主内棺图像，荆门车桥出土的“兵辟太岁”铜戈图像，信阳楚墓出土的锦瑟图像，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漆奁上的“车马人物出行”图像，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舞人动物纹”锦、“田猎纹”绦，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帛画以及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书、帛画上的图像。第三种以动物为母题的绘画，尤其是作为华夏文明艺术符号的龙凤母题大量地出现在与仪式有关的器物上。如青铜礼器、铜镜等。代表性的作品有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大量织有龙凤图像的丝织品和包山2号楚墓出土的墓主内棺。龙凤完全是图案的主体，虽然看不到故事结构，但其绘画语言的背后有社会和当时宗教生活的支持。

在“有标题”的情节绘画中还可以分出萨满式和写实性二种不同的风格。前者在与丧葬仪式有关的用器上频繁出现，后者只在包山2号墓的漆奁上的“车马人物出行”图像中发现。漆奁应是漆礼器的一种，或许可以认为这种自然主义风格的绘画与礼教在楚国推行有关。在楚地萨满式的绘画作品中，一般认为这是与中原绘画艺术最不同的部分。实际上这些非写实的艺术作品所描绘的无论是神怪作法仪式还是人兽相处的场面，

均为巫术活动的一个部分，中原是一样存在的。^① 楚地多见这类作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商周以来广为存在的巫术与政治紧密相连的艺术传统在社会变化缓慢的楚地得以保存的结果，它并不能反证萨满式的艺术中原不存在。二是楚地有较好的保存艺术品的条件。以曾侯乙墓漆内棺上的绘画为例，该内棺绘有各种龙、蛇 753 条，鸟、兽等动物 142 个，神人 20 个，^② 许多图像似乎可以与《山海经》一类的文献记载相印证，曾经被认为是楚文化浪漫艺术的代表作。但是只要注意到曾侯乙墓的基本文化属性是属于姬周的传统，墓主的身份是国君，就可以知道这一篇幅巨大、涵义明确、叙事清楚、结构完整的图画是当时社会主流阶层的观念的反映，它是先秦社会普遍存在的死亡和再生仪式事实的图解。这些图像既是当时人们社会信仰的体现，也是中原文化同样具有萨满式风格的反映。这与希腊文化理性色彩中仍然保留有神秘的奥菲教义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它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原文化中的信巫好鬼习俗在楚地的社会环境中仍能延续，^③ 这也是早先人们普遍误将曾侯乙墓文化基本属性当成楚文化来讨论的原因。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车马人物出行”图画从色彩的复杂、情节的整一与希腊同期作品相比，不遑多让。该画长 87.4 厘米，宽 5.2 厘米，用了黄、红、棕、褐、绿多种色彩，绘有 26 个人物、10 匹马、9 只雁、2 条狗、1

①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 1986 年，第 106-107 页。

② 《曾侯乙墓》，第 28-45 页。

③ 《楚文化》，第 207-215 页。



头猪和 5 棵树。其情节是表现东周贵族常见的聘报礼仪活动。在战国中晚期，这类活动的仪式意味已被世俗的生活所冲淡，所以在画面中感觉不到神秘，但是它的政治含义并未因此减弱。今天的学术界将该画视为人们“日常生活”绘画的代表作品是可以成立的^①。

音 乐

东西方音乐的起源都与原始社会的仪式、巫术有关。希腊罗马时代和中国先秦时代，双方的音乐发展出现了差距。希腊的学者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已将音乐作为理性研究的对象，是数学、哲学问题的一个部分，并将音乐作为“沟通宇宙秩序和人类秩序的桥梁”来看待。^②中国的先秦音乐却始终与礼制关联，成为身份制社会的统治工具，尤其是楚国的音乐与仪式巫术密不可分，有强烈的萨满教色彩，反映出“中国青铜时代的音乐者在创建人神沟通的氛围。”^③这种差异在音乐理论、乐器构成和音乐实践上都有所反映。

①希腊罗马的音乐

在乐器的发展上，希腊乐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打击乐器少见，这与中国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磬、鼓、

① 巫鸿：“Art and Architecture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p. 705.

② Schirmer History of Music.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1982. p. 5

③ Lothar von Falkenhansen (罗泰)：Suspended Musi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td, 1993, p. 23.

钟、铃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形成了对照。在克里特岛中部的哈吉亚·特雷达（Hagia Triada）出土的石棺上已发现有七弦琴（Lyre）和双管八音孔的笛子。这两种乐器在荷马史诗中也是经常出现。

公元前6世纪以前，所有的希腊文学都离不开音乐伴奏，所以公民30岁以前都要学习音乐，掌握几种乐器。这和孔子重视“乐教”参差相似。用于抒情诗伴唱的七弦琴，用于叙事伴唱的吉特拉琴（Kithara，一种小竖琴）和多用于吹奏打击乐就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在古典时代，琴完全成为取悦听众的工具，脱离了仪式，种类也十分多。它们基本以七弦为基础发展成为多弦，其共鸣腔一般是金属或龟壳。由于它们演奏轻松的曲调和有复杂的技巧受到了青年的欢迎。（图二十二）



图二十一 七弦琴的弹奏方式

柏图对这种据称是阿波罗发明的、代表理智的乐器也大为赞赏。^① 笛子传说为雅典娜创造。简单的笛子只是在骨管或硬木上掏空钻孔而成，有2—7个指孔，有的装有吹管和调整音阶的活动塞子。最有特色的是用绳子系起来的双笛，一支高音，一支低音，演奏时两支均含入口中，可以奏出和谐的音调。由于笛子用在丧礼和宗教场所的时候居多，所奏曲调阴沉，演奏时又不雅观而被认为是卑下的乐器。亚里士多德认为儿童尤其不应学

① 《理想国》第105页。



图二十二 希腊乐师教学生弹七弦琴

笛，它于心理修养不宜。^① 这些乐器的雅俗划分与中国似乎正好相反，与宗教仪式联系越紧密的乐器越不被重视，可见希腊乐器已成为纯精神的器乐演奏工具。（图二十三）

希腊古典时期七弦琴、笛子的独奏都十分流行。^② 当时有首流行的曲子是这样写的：“这首我一生所喜爱和吟唱的歌曲；当我死去，七弦琴要放在我的脚下，长笛要放在我的头上。吹起来吧，长笛！”^③ 希腊人后来将笛子装于一个可膨胀的口袋中制成风笛，最后发展到数管连在一起演变为排箫（Pan）。公元前 250 年，住在亚历山大利亚的工程师克特斯毕厄斯（Ktesibios）又

① 《政治学》第 427—428 页。

② 保·朗多尔米：《西方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1 年，第 6 页。

③ This song I love to live and sing ; and when I'm dead , Put my lyre at my feet and my pipes over my head ; Pipe away ! Peter Levi : Greek world p. 154.



图二十三 希腊的吹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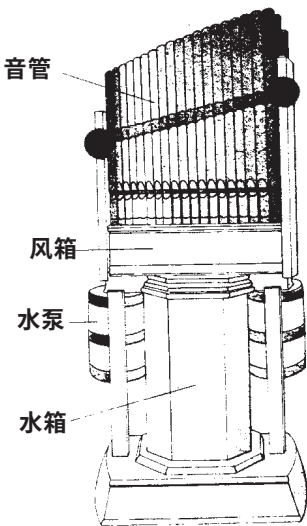
发明了多管的水风琴，它是将大排箫树在风箱顶上，用打气筒供气，演奏者可弹键或滑板让空气进入管内奏乐。它纯粹是供户外演奏的公众娱乐的工具，后被罗马、拜占庭广为使用。（图二十四）

希腊的音乐理论发端于毕达哥拉斯。毕氏发现一根琴弦发主音时，它的 $1/2$ 弦长发一个高八度音，它的 $3/4$ 弦长发第四音（do, fa），而后者的 $2/3$ 弦长（亦即整弦的 $1/2$ ）发出第五音（do, sol）。第四音与第五音合成为一个八度，即： $3/4 \times 2/3 = 1/2$ 。音程的这种和谐关系被毕氏看成“万物皆数”的理论基础。柏拉图在《泰缪斯篇》（Timaeus）中，从造物有完美的理念出发，进一步发挥了音乐和谐的发生原理。他列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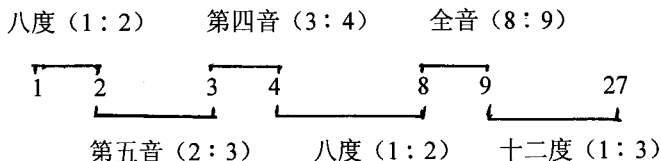


弦长与音程关系的数字是 1、2、3、4、8、9、27。见下表^①

亚里士多德的音乐理论则主要表现在关注音乐的道德教化功能，有些类似儒家的《乐记》。亚氏将音乐的功能定为教育、祓除情感和心灵操修 3 种。^②他指出不同调式的音乐对不同年龄的人功用各异，不能简单扬抑某一音乐，音乐的目的是给人以纯正无邪的欢乐。这些与中国先秦音乐以礼制为核心、“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③的政治目的有明显的



图二十四 公元前 250 年左右由工程师 Ktesibios 发明的希腊水管风琴



区别，与老子“五音令人耳聋”、^④孔子排斥娱乐性音乐（“放郑声”的观点都大相径庭。

① Schirmer History of Music. p. 7.
② 《政治学》，第 430 页。
③ 《周礼·地官》。
④ 《十二章》。

在音乐实践上，音乐是希腊戏剧的重要部分，舞蹈和对白都需要音乐伴唱和吟唱。受到东方音乐的影响，当时主要流行较严肃的多里亚调（EFGABCDE）、较热情的弗里吉亚（Phigaleia）调（DEFGABCD）和较柔和哀伤的吕底亚（Lydia）调（CDEFGABC）。① 后者曾被柏拉图等认为是靡靡之音，到亚里士多德时才予以纠正，亚氏主张各取所需。② 这些音调都采用了七声音阶，但是与现代上行音阶不同，是采用的下行音阶。如希腊主要的多里亚音阶是：



在多里亚音阶中没有主音的概念，只有中间的“La”，听起来和现在的小调音阶相当。在这种自然音阶中，七弦琴的表现力能发挥到极致。

受到东方音乐影响，希腊音乐的音阶结构比现代复杂。现代音阶最小音阶是半音音阶，由 12 个半音构成一个八度音程。希腊除了有半音音阶之外，还有四分音阶，并且有 18 个音符的 45 个音阶。③ 特点是在音阶中引入 $1/4$ 音，第二个音较前一个音低 $1/4$ 音。希腊人还不太懂“和声”，但已知道八度组，合唱时常有八度重唱。音乐节拍的重要性也受到重视，这一点是楚国、曾国音乐所不及的。希腊音乐已采用旋律的方法，可以向下方五度转调。在记谱法上面是用字母写在线谱上，有

① 弗里吉亚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城邦，吕底亚则是小亚细亚的希腊半殖民地区。

② 《理想国》第 104 页，《政治学》，431 页。

③ Oxford History of Music : Oxford, 1929. p. 8



“器乐”记谱和“声乐”记谱两种，只标音程，没有节拍，但这也是中国先秦音乐所缺乏的。

罗马的音乐主要来自希腊，音乐仅仅附属于诗，基本乐器是七弦琴和笛子，但加大、加长了。七弦琴的弦后来多达 18 条。尼禄皇帝时，水风琴受到宠爱，被推广。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响板作为节奏乐器加入到了罗马的管弦乐队中。在音乐理论上罗马人建树不多。总的趋势是音乐越来越远离政治，惟一可以称道的是罗马将希腊世界的音乐遗产广为搜罗到寺院或家庭之中，使之有幸流传下来。

②楚国的音乐

周代以前，楚地乐器的发展面貌不清晰。文献记载周代的乐器近 70 种，按材料分成金、石、土、草、丝、木、匏、竹八类（八音），大大超过了希腊罗马，而楚地的乐器也不出周代的范围。从考古发现看，楚地乐器中的钟、磬、鼓等打击乐器占绝对优势，它们时代跨度大，分布广，数量多，制作精。管弦乐器发展却不及希腊罗马，这可能与楚国的社会特点有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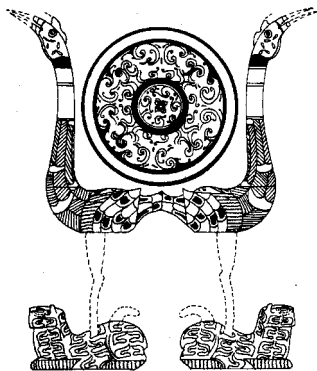
编钟是楚地最主要的乐器。制作时代早的有 1993 年在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出土 8 件一套西周晚期的楚公逆钟。时代晚的有 2000 年 2 月在江陵天星观 2 号墓出土 2 套战国中晚期的编钟。^① 音乐性能良好的编钟有 1957 年河南信阳出土 13 件一套的绞宗编钟、1978 年河南淅川出土的 9 件一套的敬事天王钟和 26 件一套的王孙诰钟。其共同的特点是一钟能发出双音，12 个半音具备，

^① 2000 年 2 月，荆州博物馆在天星观 2 号墓发现 2 套编钟，其中铸钟 10 件，钮钟 22 件（《中国文物报》2000 年 3 月 31 日）。

音阶范围超出了五声。王孙诰钟的音域宽达 4 个半八度，具有旋宫转调的能力。

鼓是楚国很有特色的打击乐器，尤其是虎座鸟架鼓在音乐活动中除了可以节奏钟磬之外，还作为巫师的法器使用。^①从考古材料看，虎座鸟架鼓一类乐器的随葬比例不高。江陵雨台山、九店发表的 1155 座墓葬材料中，出土 26 件，占 2.2%，河南、湖南、湖北三地则

共出土不到 50 件，仅占已发掘的 10000 座楚墓的 0.5% 弱，而且多集中在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一些有身份的贵族墓中。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有节奏的鼓声容易造成精神幻觉，因此，“鼓在萨满仪式中起着第一位的重要作用”。^②这似乎表明鼓这类打击乐器是楚人更多地受到楚地原住民巫术仪式的影响的工具。钟、磬与



图二十五 湖北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虎座鸟架鼓

鼓不太一样的是，在楚墓中它更多的是彰显身份，是楚贵族习用周礼的体现。正是楚国的打击乐器有这么多政治、等级和巫术的意义，其制作的考究和文化的内涵是希腊乐器无法比拟的。（图二十五）

①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 1990 年，第 107-108 页。

② Shamanism. p. 168.



考古发现的楚国弦乐器稍多于管乐器，后者有笙、排箫等不超过 10 件。弦乐器约 30 余件，为琴瑟一类乐器。从流行时间上看，瑟见于春秋晚期，琴仅见于战国。愈到晚期，琴、瑟愈在中小贵族墓中出现，而且琴、瑟的弦数不固定，瑟弦在 18-25 弦之间，琴有 7、10 弦两种，这可能反映出弦乐器的仪式法器功能逐渐向纯乐器转变。《七国考·楚音乐》卷七举宋国华元献楚王“绕梁琴”和楚公子无亏之“青翻琴”均属可抒发个人情感的乐器，^① 与希腊弦乐器的功能庶几近之。

以曾侯乙编钟为代表的曾侯乙墓乐器反映了中国先秦音乐的最高成就，在当时世界范围的音乐中来看也是无与伦比的。曾侯乙墓出土编钟、编磬、鼓、瑟、琴、均钟（调律用的律准）、笙、排箫、篪 9 种乐器共 125 件，另有钟磬演奏工具 12 件，钟磬架及挂件、磬匣、鼓座、琴轸、瑟码等附件 1714 件，是中国出土乐器最多、种类较全、保存最好的一次。在这批乐器中发现了几种失传的先秦乐器，如十弦琴、均钟、篪等。建鼓和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同类乐器。曾侯乙编磬则是所见先秦磬块件数最多、悬挂编列方式最清楚的一具。曾侯乙编钟则是世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发现，它涉及了先秦时期中国音乐、冶金铸造、物理声学等多方面的成就。

编钟共 65 件，分上、中、下 3 层 8 组。上层 3 组 19 件钮钟，中层 3 组 33 件甬钟，下层 2 组 12 件甬钟和

^① 董说：《七国考》引《古琴疏》：“宋华元献楚王以绕梁之琴。鼓之，其声嫋嫋，绕于梁间，循环不已。楚王乐之，七日不听朝”。《古琴录》：“楚王子无亏有琴曰‘青翻’，后质于秦，不得归，因抚琴歌曰……”云云。

1 件编钟，出土时仍屹立完好。编钟最大的一件通高 152.3 厘米，重 203.6 公斤。最小的一件通高 20.2 厘米，仅重 2.4 公斤。全套编钟重 2567 公斤，加上钟架、青铜立柱和挂件等，共重 4421 公斤，堪称世界上最庞大的青铜乐器。

曾侯乙编钟的每件钟和钟架横梁、悬钟挂件都有铭文，共 3755 字。曾侯乙编磬和磬架，磬匣也有铭文共 812 字。编钟铭文内容分铭记（如“曾侯乙乍持”）、标音（如一甬钟不同的发音部位标有“羽反”、“宫反”字样，意即一为高音“la”，一为高音“do”）和乐律关系（如“割肆之宫”、“黄钟之宫”等，意即 C 调的 do，[#]G 调的 do）三部分。

通过对编钟铭文和编钟音响的研究，我们发现曾侯乙墓的音乐材料反映出先秦时期乐律方面的知识已相当全面。曾国乐学体系中已包含了希腊音乐已有的绝对音高和相对音高的概念；有八度组与音域的概念（全套编钟最低音是 C₂、最高音是 D₇，频率范围 64.8 - 2329.1 赫兹，跨 5 个八度又一大二度）；有相生（曾侯乙编钟用八度、五度、三度谐合音程调律的生律法）和相应（每钟的双音谐合共振）的音程概念及由此产生的阶名、变化音名和升、降变化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与编钟具有旋宫转调能力相关的宫调概念以及由标音体现出的音列、音阶、调式规律等，大多数是过去所不知的新内容。^① 所缺乏的是在记谱法上缺少拍子、时值、节奏、速度等方面的记载。由于曾侯乙钟铭体系

^① 黄翔鹏：《曾侯乙钟磬铭文乐学体系初探》，《音乐研究》，1981 年第 1 期。



是以姑洗（C调）为固定名标音，实际上已具备了产生记谱法的前提条件。

在律学上有几个重要发现：

（1）中国十二律计算方法及其产生年代曾引起中外学者的许多争论。曾侯乙钟铭中相当十二律的各音位律名共有28个不同名称，仅有“姑洗”、“无射”、“黄钟”等8个是已知的。其生律法是以《管子·地员篇》记载的方法为主，它说明由三分损益法^①生成十二律是战国末由希腊传入的看法不正确，它应该生成于西周早期或更早。曾侯乙钟律是采用的复合律制，其宫、商、徵、羽4个基音按照三分损益法的五度相生产生，其他各律按照三度生律法（纯律）产生。编钟律名所反映出的各地同律异名现象，正说明了中国音律经过漫长发展的过程。此外在先秦乐律是以管定律还是以弦定律问题上也有新进展，通过对均钟这种以弦定律器物的研究，已能确定以弦定律知识不是来自外来文明，也不是始于汉代的律学家京房。^②

① 三分损益法是根据管长或弦长计算乐律关系的方法。若以弦长计算，则是以一条空弦的长度为基础，依次乘以 $2/3$ 或 $4/3$ 的因数，就得到若干音的弦长。在《管子·地员》中只算了宫、商、角、徵、羽5个音，方法如下： $1 \times 3^4 = 81$ （宫） $\rightarrow 81 \times 4/3 = 108$ （徵） $\rightarrow 108 \times 2/3 = 72$ （商） $\rightarrow 72 \times 4/3 = 96$ （羽） $\rightarrow 96 \times 2/3 = 64$ （角）。毕达哥拉斯的计算音律的方法也与之大同小异。

② 饶宗颐《随县曾侯乙钟磬铭辞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6页。黄翔鹏：“均钟考”，《曾侯乙编钟研究》第549-586页。程贞一（Joseph. C. Y. Chen）：The Generation of Chromatic Scales in the Chinese bronze Set - Bells of the - 5th Centu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World Scientific Press, Singapore. 1987. pp. 155 - 198.

(2) 中国先秦时期有无七声音阶，因没有在先秦文献中发现“变宫”一词而没有结论。曾侯乙钟铭中却出现了“变宫”、“变徵”音名。在实际检测中，编钟完全可以演奏七声音阶的乐曲。排箫在出土时尚能吹出达到六声音阶的乐音，这就表明七声音阶在汉代以前就已产生。

(3) 汉代以后，宫廷雅乐曾有过“唯用一宫”的情况，有人据此认为隋唐以后才从西域引进旋宫方法。曾侯乙编钟乐律铭文包括了楚、晋、申、齐、周等各诸侯国的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关系。如有一钟的铭文为记载“姑洗之商曾，穆音之宫。穆音之在楚为穆钟，其在周为刺音”意思是曾国的姑洗（C）均中的商曾（降（Si）为穆音（ $\sharp$ B）均中的“do”。曾国的穆音在楚叫“穆钟律”，在周叫“刺音律”，这显然就是旋宫转调实践的反映。从实测来看，曾乐的C调 $\sharp$ B音偏高，而B音偏低，不能在所有的十二宫中取全七声，但它的旋宫能力仍在六宫以上，已超过了文献记载和希腊的水平。^①

(4) 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的研究多接受法国学者沙畹（E. Chavannes）的见解，把中国音乐看成单调音乐，五声音阶的理论不纯；没有纯四度、半音与真正的八度概念；并认为中国律学来自亚历山大东征（333. BC.）的传播。李约瑟（J. Needham）和鲁滨逊（K. Robinson）虽然否认沙畹的错误观点但也同意考虑音律由巴比伦传入的问题。曾侯乙墓发掘后，美国音乐史家麦克伦（E. McClain）从曾侯乙编钟精确的

① 黄翔鹏：《曾侯乙钟磬铭纹乐学体系初探》。



振动频率设计中认为其音律与巴比伦的历法相关，可能源于美索不达米亚。通过许多中外学者对曾乐体系的仔细研究，证实当时中国音乐不仅有纯四度，十二半音齐备，并且曾国已有了超过 5 个八度的宽广音域可供五声、六律或七声为主的旋律运用，并能旋宫转调，其音乐的理论与实践与巴比伦的音乐理论没有关系。^①

在音乐学上，曾侯乙编钟本身除了具有良好的音乐性能，采用与当今国际通行的 C 调（其中层 3 组第 8 号钟和上层 2 组第 7 号钟都是“姑洗之宫”，相当于今天的 $C_4 - 35$ 音分，即钢琴上中央 C 音，其频率是 256.47 赫兹，与中央 C 音的物理音高标准 $C_4 = 256$ 赫兹十分接近）音高标准，铭文还记载了中国先秦文献所缺乏的音阶、调式、阶名、变化音名、旋宫法、固定名标音体系、音域术语、八度组、音程变化等方面的内容之外，还有二个重要的发现：

（1）十二半音或十二音阶的形成

十二半音在中国音乐术语中称为“十二律”，它是将一个八度分为 12 个不完全相等的一种律制。按照《国语》记载，公元前 522 年周景王（544 - 520 BC）铸了一套“无射均”的编钟，伶州鸠对他谈到十二律及计算方法，但文献没有记载是否涉及到记录音律的数据和音律度量的方法。因此西方的学者如李约瑟等认为周代的十二个半音每一个虽然都可以作为主音，但无音阶的功能。曾侯乙编钟中心音域的 3 个八度中，十二半音是齐备的。它们是宫（do）、羽角（ $\sharp do$ ）、商（re）、

^① E. G. McClain: The Bronze Chime Bells of the Marquis of Zeng Babylonian Biophysic in Ancient China, J Social Biol, Struct. 8, 1985.

徵曾 (^bmi)、宫角 (mi)、羽曾 (fa)、商角 ($^{\#}\text{fa}$)、徵 (sol)、宫徵 (^bla)、羽 (la)、商曾 (^bsi)、徵角 (si)，其生成方法前面已有介绍。在曾侯乙编钟的实际演奏中，能够演奏五声、六声、七声音阶的曲调，能够旋宫转调。它证明十二音阶在中国的形成非常早，并且有理论计算的依据。^①

(2) 多种音阶结构的存在

曾侯乙编钟的铭文有大量曾国阶名与列国阶名的对应关系、音在某均中的称谓的记载。如中层 3 组 10 号钟的“正鼓音”是“徵”，其铭文为“姑洗之徵，大族之羽，新钟之变商，迟则之羽曾，兽钟之徵角。”译成现代语言即为：“C 调的 sol 是 $^{\#}\text{A}$ 调的 la，也是楚国新钟律 ($^{\#}\text{F}$ 调) 的升 do，申国迟则 (夷则) 律 (D 调) 的升 mi，楚国兽钟律 ($^{\#}\text{G}$) 调的 si”。它表明先秦中国的音乐中存在音阶系列。曾国以五声音阶为主，但也使用七声音阶，编钟采用新音阶^②的七声阶名的标音方法我们举“姑洗”和“浊兽钟”二宫为例，见下表：

① Joseph Needham and Robinson: Science &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IV.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70. 程贞一：“从公元前五世纪青铜编钟看中国半音音阶的生成”《曾侯乙编钟研究》第 342 - 368 页。

② 新音阶是相对旧音阶而言，曾侯乙编钟的钟铭中的阶名在变宫时，不用旧音阶（即七声音阶的半音位置在四度、五度和七度、八度之间的音阶）系统中的“变宫”术语，而用有新音阶（即四度与五度之间相差一个半音的音阶）特点的“徵角”、“徵（冲）”术语。而当变徵时，则用“商角”不用“变徵”来表示。



姑洗之宫	宫	商	角	和 (羽曾)	徵	羽	徵冲
C 调	C	D	E	F	G	A	B
浊兽钟之宫	徵	羽	徵角	宫	商	角	商角
G 调	G	A	B	C	D	E	[#] F

从这种七声音阶的排列上“和（羽曾）”已从变化音的位置变成六声或七声音阶的正音，它是过去未发现的独立阶名，是新音阶的第四级。这些都反映了楚地当时存在多种音阶结构的状况。通过曾侯乙编钟的铭文和楚国钟磬上的实测数据的研究，楚国音乐只是中原音乐体系的变异，尤其是在整个东周时期，其宗庙仪式或音乐很少受地方文化的影响。^① 下面是楚律各表：

Do 在 八度中的 位置	B-12	[#] A -11	A-10	[#] G -9	G-8	[#] F -7	F-6	E-5	[#] D -4	D-3	[#] C -2	C-1
律、吕 (浊)	浊姑洗	穆钟	浊穆钟	兽钟	浊兽钟	新钟	浊新钟	文王	浊文王	坪皇	浊坪皇	姑洗吕钟

除姑洗外，其它律名不见于周律。但从楚国编钟的音乐结构中可以知道楚国钟的高音部分仍是西周钟典型的“角—徵”、“羽—宫”结构，只是楚钟的正鼓音在战国早期出现了“徵、羽、宫、商、角”向“新音阶”发展的趋势而没有恪守西周传统的旧音阶。^②

^① Lothar von Falkenhansen：“Chu Ritual Music” Chu Cul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95.

^② 冯光生：《曾侯乙编钟文化属性分析》，《鸿禧文物》，中华民国八十六年第二期，第 110 页。

文献记载楚人的音乐为“南音”，这主要是指民间的音乐。杨荫浏指出，在楚国的歌唱音乐中有4种不同的曲式反映出高低不同的艺术水平。^①其中“乱”（乐曲高潮）源于《诗经》传统，在《离骚》、《招魂》、《九章》中都有继承发挥。“少歌”（小节演唱高潮）、“倡”（不同曲调的过渡联结）是楚地特有的，它们和一般简单曲调反复的民歌曲式在屈原整理的套曲《九歌》中，有集中的运用，显得较中原丰富。据黄翔鹏的研究，在原始宗教流行的地方都有“九声”（^bB、F、C、G、D、A、E、B、[#]F），它不是指九首歌而是指萨满教的音乐传统。《九歌》正是属于巫文化音乐系统中的乐曲。^②

在音乐理论的建树上，老子、庄子的零星看法仅仅是围绕政治展开，缺乏对音乐本质的讨论；都认为音乐发展会使百姓无所适从，更为愚笨，不易治理。庄子所谓“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人始含其聪矣”，^③就是对较能彰显个性的弦乐器持否定态度，不要说与希腊的贤哲们比较，与儒家认为音乐还有教化功能的观点相比也显得落后。

①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年，第73页。

② 黄翔鹏：《中国古代音乐史》，汉唐乐府出版，中华民国八十六年，第31页。

③ 《庄子·胠篋》。



五 楚文化与希腊罗马 文化简论

近代社会以来，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其生产方式迅速地扫荡全球，其他地区文化在资本主义面前几乎没有反抗的能力，知识界对世界史的描述开始以欧洲为中心。如在社会发展上，资本主义成为了先进的文化发展方向；在史学上，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第 X 次浪潮等事件都以欧美的价值观为参照系进行叙述；在人类学上，其进化理论、传播理论、适应理论等都可以找到种族优越的影子；在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中的社会发展的 5 阶段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等也仍然有欧洲中心的观点。在强大的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下，我们在叙述欧洲以外的历史文化或不同文化比较的书籍中常常可以看到，其叙述的语境多半是以欧洲文化为参照的，不是肯定某种文化在没有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也会如何如何发展，也会达到同样的发展阶段，就是强调该文化在古代是多么多么的伟大，一点也不逊色西方文化等等之类的话语，以掩饰技不如人的文化自卑心理。直到 20 世纪后半期，这种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才开始受到清算，在人类学界和史学界出现了放弃传统上所认为的存在着所谓东方与西方在经济、意

识形态、宗教等方面有巨大差异的看法。^① 像萨义德 (E. W. Said) 的《东方学》 (Orientalism 1978)、伯纳尔 (M. Bernal) 的《黑色雅典娜》 (Black Athena 1987)、弗兰克 (A. G. Frank) 的《白银资本》 (Re-Orient 1998) 等, 古代文化的比较研究才开始向比较健康的方向发展。这套楚文化丛书选定楚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做比对, 是否有意去显示楚文化早先也是很辉煌, 且不输于希腊罗马文化, 而在潜意识中却仍以欧洲文化为参照我并不知道, 但我在撰写时是想努力放弃以欧洲文化为参照的习惯做法, 尽量按照当时这三种文化的各种现象来排队, 但积习也无法完全摆脱, 行文之中, 有意无意还是在做比较。文化的比较本身没有过错, 错误是在于因比较而想到了文化的优劣。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 文化是没有优劣之分的。

弗兰克认为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可以追溯到 5000 年前而不是 500 年前 (指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他援引了伯纳尔的研究成果, 批评欧洲发明了一个所谓起源于“民主”的希腊神话, 指出希腊文化的来源其实是“非(洲)、亚(洲)”文化, 他说: “希腊文化更多地来源于小亚细亚、波斯、中亚以及亚洲其他地区, ……欧洲的‘根源’当然绝不限于希腊和罗马”。^② 从各地考古材料的发掘来看, 古代人的活动能力和范围是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 在先秦时期, 不仅中国大陆与西方有密切的文化交往, 与美洲的交往也同样存在。各地古代

①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 三联书店, 1999 年, 第 332 页。

② 弗兰克:《白银资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 第 31 页。



文化的差异也不像殖民主义者所认为的那么大。各种文化之间存在的不同特点不是文化本身优劣的反映而是文化对不同环境适应的结果。在前面几章楚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的材料排列中，我们尽量避免去做文化的比较，有关政治制度方面的内容一是因为体例和篇幅的关系有意略去，二是这方面的书籍也比较容易找到，如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我们的目的只是要告诉读者在当时楚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各有些什么成就而已，文化比较的工作可以由有兴趣的读者自己来做。当然对于这三种文化的异同，我们也有自己的看法，下面就做一简短的叙述。

首先，三个文化的种族背景都是由不同移民组成，没有哪一个所谓的单一纯种族的文化。希借文化从克里特时期算起到亚历山大时期，种族的迁移和融合持续了 2300 多年。罗马文化如从维兰诺万文化算起到西罗马后期蛮族的入侵也有 1400 多年。楚文化的源头是黄帝一族，它分离出来之后在商朝末年进入荆山，从熊绎立国到建立郢都，郢都后又数迁江陵、淮阳，最后亡于寿春，形成地方千里、带甲百万的大国，其间融合的民族如恒河沙数，不堪胜数，时间也长达 800 年之久，只是因地缘条件抑制了楚人（或者说是整个华夏民族）向西方和海外的大规模移民。

其次，在生活方式上，希腊因岛屿多山不易耕作和海洋环境而形成了重商主义和追求个人自由的传统；罗马有发达的农业又有海洋的便利，很早就有了公民财产权的意识，它导致追求外部利益而形成了帝国精神；而楚国因江南之丰饶，不忧冻饿滋长出了道家的哲学思想，这三者都是由环境所赐，并非文化之优劣可知。正

是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下，希腊出现了民主政治，罗马产生了工商奴隶主与罗马公民联合的专制帝国，而楚国始终保持着贵族统治的专制。关于这一点，黑格尔曾经指出过：希腊没有大河，没有一整块的平原流域，“这里看不到东方所表现的物质的权力——没有恒河、印度河等等江流，在这些大江流域上的种族因为它的天边永远显出一个不变的形态，因此习于单调，激不起什么变化；相反，希腊……民族的统一的起源，必须考虑的主要因素，便是一般分离的性格。”^① 另外，有一点是需要澄清的，无论楚国还是罗马，商业活动始终是受到了政府的支持。只是商业在各自文化的经济成分中所占有的比例有多寡之分，没有像希腊那样对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那么重大的影响。认为先秦社会（包括楚国）抑商的观点是欠妥当的。

其三，在精神上，希腊人率先倡导理性的精神，在追求理性的同时并给出了一系列的证明方法，为人类社会作出了哲学和科学的贡献。罗马人的务实性格使他们有技术的革新而缺少科学的发现，在哲学上也只有怀疑一切和采取折衷主义。而楚人在地广人稀的环境和信巫好鬼的传统中，与自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贵柔、贵无、顺应自然的思想就容易占上风。在“万物生于有，生于无”的思想指导下，一切科学的理性探究还有什么意义呢？不过从今天世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生存观来看，楚人的自然无为的精神才是真正的理性。另外，从近年国外对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中，希腊人在理性的背后仍然存在着非理性的东西，既有日神阿波罗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第 233 页。

的理性精神，也有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原始直觉。如奥菲教义对希腊人的精神影响远比传统所认识的要大，这与世界其他古代文化的情况就基本一致了。

其四，在希腊商业主宰社会生活的情况下，技术的进步与之密切相关，减少成本可以成为技术发展的动力。罗马在对外扩张方面军事上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可以知道军事需要会成为了罗马技术发展的又一动力，这是和希腊略有区别的地方。楚国以武力征服大半个中国，军事对技术的刺激也如同罗马。但在其他技术如农业、手工业方面，其技术发展就有限得很。因为除了技术是应用在政治权力和军事（唯祀与戎）方面，技术本身意味着改变，这和楚人顺应自然的保守精神是相违背的。

CHUWENHUA
ZHISHI CONGSHU
楚文化知识丛书

